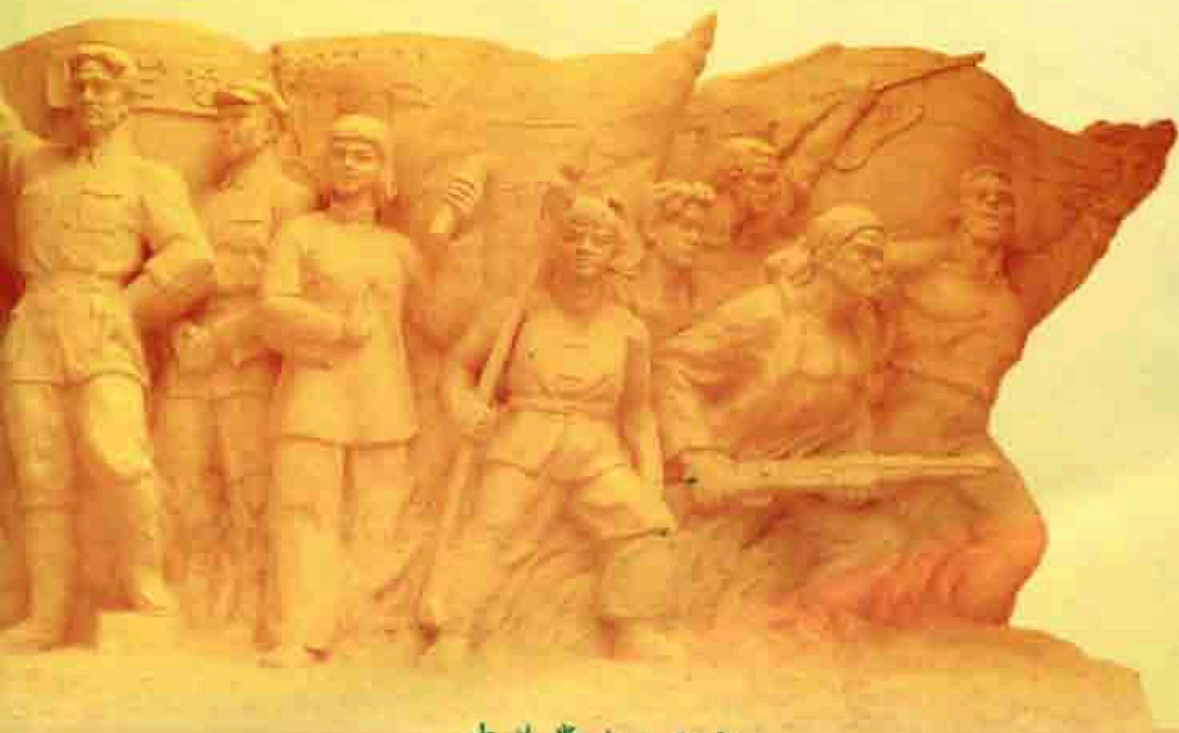


陇东革命根据地

《陇东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编著

主编 巩世锋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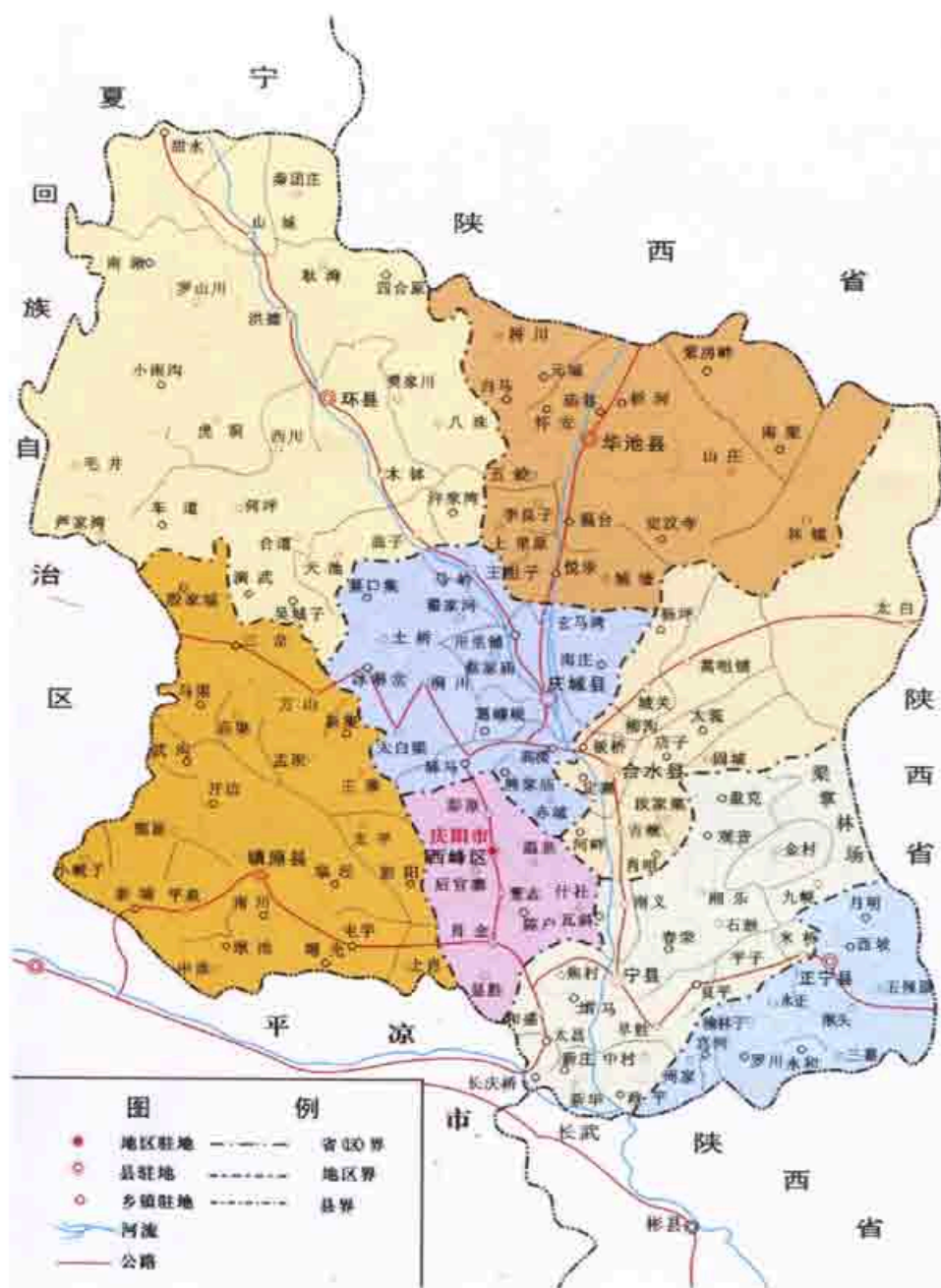
陇东革命根据地

《陇东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编著

主编 巩世锋

中共党史出版社

庆阳市行政区划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布图



陇东分区(含关中分区新正、新宁县)行政区划图
(1940.8—1945.8)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原址——南梁



山城堡战役纪念碑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章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章



王孝锡烈士陵园
王孝峙烈士陵园



大风川军民大生产纪念馆



南梁革命纪念馆新展馆



抗大七分校旧址



三岔红军长征纪念馆



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原址



邓小平和红一军团部分领导在正宁官河

序

欧阳淞

陇东是一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那山山水水、沟沟峁峁,无不透露出一种苍凉、悠远、雄健的风韵与灵气。从远古时期以来,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演出了一幕幕叱咤风云的历史活剧,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陇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黑暗统治,掀起了一场土地革命战争的风暴。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把陇东高原变成一块红色热土,创建了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党在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也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和根据地军民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的统一。

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南方大部分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而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却红旗不倒。中央红军和其他各路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这里成为红军的落脚点。它对于保存和发展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和迎接

抗日高潮的到来,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以这块根据地为基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成为党指导抗日战争的重要政治中心和领导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进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加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是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的一项光荣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批老同志和党史工作者积极开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工作,一些当年参加过根据地创立和建设的老同志撰写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有关地方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收集了一批重要的档案资料,并先后编纂出版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一批历史资料汇编,为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为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庆阳市委,进一步加强对深入开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的领导和指导。在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2009年9月,中共庆阳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了有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推动了这项工作。新成立的庆阳市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还调集精兵强将,组织得力写作班子,编写了《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

《陇东革命根据地》经过反复修改定稿后,庆阳市的同志送来让我先看。读毕,我觉得这是一部十分厚重、很有特色的地方党史著作。通览全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陇东革命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壮阔画卷。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多次重兵“围剿”下为什么能够巍然屹立、坚持红旗不倒,对于根据地群

众为什么如此衷心拥护共产党,衷心爱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我们都可以从书中找到答案。同时,本书在写作形式和表现风格上也有创新。书中有大量的历史细节,叙事写人通俗流畅,行文融史、情、景于一体,有着很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我相信,《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的出版,将会对陇东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和宣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关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精品力作问世。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目 录

序 /1

开 篇 /1

第一章 王孝锡洒尽碧血秦陇播星火 /1

一、投身革命唤起民众觉醒 /3

二、肩负使命整顿甘肃党务 /6

三、千里寻党请示行动方案 /10

四、首建甘肃农村党的支部 /13

五、满腔热血铸就青春颂歌 /23

第二章 刘志丹、谢子长出生入死搞兵运 /28

一、军阀土匪乱陇东 /29

二、挂名建军在敌营 /32

三、太白镇起义成功 /34

四、倒水湾整编武装 /37

五、林锦庙三军会师 /40

六、借水养鱼腾蛟龙 /42

第三章 陕甘游击队浴血战陕甘 /45

一、三嘉原上打红旗 /45

二、首次建政寺村原 /49

三、平原喋血重整军 /52

四、西华池再次起义 /53

五、“左”倾丧失根据地 /56

六、民族英雄谢子长 /58

第四章 红二十六军西北擎战旗 /65

一、转角镇正式建军 /65

二、二次建政在照金 /67

三、红军饮恨终南山 /68

四、陈家坡挽救红军 /70

五、包家寨战略决策 /73

六、革命烈火再燎原 /76

第五章 习仲勋署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79

一、南梁建立政权条件成熟 /79

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85

三、第一任政府主席习仲勋 /88

四、南梁政府经济社会政策 /96

五、南梁政府的宣传教育工作 /101

六、南梁政府不朽的历史功绩 /109

七、反“围剿”打出西北根据地 /113

第六章 张闻天著文阐述红军落脚点 /121

一、移动的红军急需落脚点 /121

二、陕甘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 /123

三、榜罗镇一篇文章定乾坤 /127

四、陕甘苏区成为红军落脚点 /129

第七章 铁流万里到达陕甘苏区 /135

一、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 /135

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 /139

三、党中央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143

四、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决策 /147

五、红军西征开辟新的苏区 /153

六、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 /155

七、陕甘宁省府入驻河连湾 /162

八、结束长征的山城堡战役 /164

第八章 红军从陇东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68

- 一、红军驻防陇东和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 /169
- 二、红一军团从正宁、宁县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72
- 三、援西军从镇原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79
- 四、红十五军团从驿马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86
- 五、红军教导师从庆阳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88
- 六、改编后的八路军三八五旅留守陇东 /190

第九章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 /196

- 一、陇东两起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196
- 二、“三三制”与民主政权建设 /203
- 三、陇东的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 /208
- 四、廉洁政治换来陇东一片净土 /213
- 五、陇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220
- 六、陇东根据地的“双拥”活动 /224
- 七、马锡五和他的“审判方式” /228

第十章 大生产带来陇东经济大繁荣 /238

- 一、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238
- 二、陇东根据地的工商业和金融税收 /246
- 三、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屯田垦荒 /254
- 四、延安求学来到陇东豹子川 /259

第十一章 陇东根据地文教事业大发展 /267

- 一、陇东剧团闻名陕甘宁边区 /268
- 二、红遍陕甘宁的陇东新社火 /275
- 三、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刘志仁 /278
- 四、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282
- 五、抗日战争中诞生的陇东中学 /287
- 六、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和陕北公学分校 /293
- 七、曲子保健药社的创办和发展 /298
- 八、陇东特委机关报《陇东报》 /301

第十二章 陇东革命民歌唱响全中国 /308

- 一、血与火熔铸的陇东革命歌谣 /308
- 二、孙万福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314
- 三、汪庭有和陇东民歌《绣金匾》 /320
- 四、从《推炒面》到《边区十唱》 /325

第十三章 陇东人民踊跃参加解放战争 /329

- 一、陇东人民准备自卫战争 /330
- 二、陇东根据地的“迎王运动” /332
- 三、西华池战役重创胡宗南 /336
- 四、陇东战役痛击胡马匪帮 /342
- 五、彭德怀屯字磨兵三昼夜 /347
- 六、威震大西北的回民支队 /358
- 七、陇东国统区人民的斗争 /363
- 八、王寨原官逼民反闹解放 /368

第十四章 伟大贡献永载革命史册 /380

- 一、发展壮大地方武装 /380
- 二、参军参战支援战争 /382
- 三、配合主力保卫边区 /384
- 四、倾其所有支援前线 /387

第十五章 不朽的庆阳老区精神 /391

- 一、庆阳老区精神的地域内涵 /391
- 二、庆阳老区精神的核心与普遍意义 /395
- 三、庆阳老区精神与和谐社会 /399
- 四、庆阳老区精神与科学发展观 /402
- 五、庆阳老区精神代代相传 /406

资料来源与主要参考书目 /410

编 后 /413

开 篇

陇东，是一个历史名称，又是一个地理概念。从历史名称上讲，专指庆阳市，庆阳古称北地，习称陇东；从地理概念上讲，因为地处甘肃东部，也包括平凉。在中国历史地理上，庆阳“东抵榆林，西界黑水^①，南接泾渭，北控宁塞”，是“三边襟喉，关辅藩篱”，“为诸夏之要害”。在中国人文地理上，庆阳虽属中国西部，却处于这个西部的东部。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陕甘、甘宁、秦晋地域的划分，秦陇、河套的板块学说，泾渭文明、汾洛文明的脉络理论，黄土文明与黄河文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陕甘宁盆地与陕甘宁边区称谓等，都与庆阳有密切关联。

历史上的庆阳“北控羌胡，南辖关陕”，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接宁夏的环县，山岭连绵不断，史称“实银夏之门户，幽宁之锁钥”；东靠陕北的合水，“原阜盘旋，沟涧辐辏”，与峰峦起伏、绵延400公里的子午岭林区浑然相接，成为天然屏障；南临关陕的正宁、宁县，史说“联络关陇，襟带彬岐，川谷高深，地形险固”；西当六盘山的镇原县，“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系于此也”。重要的战略地位，险要的地理形势，使庆阳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庆阳人民历来就有习兵尚武的精神，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庆阳人民习兵尚武的精神和勇于反抗的意识得以陶冶和磨炼，威武不屈、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深深根植于这块古老的黄土地。

极地冰芯、深海沉积物和中国黄土堆积，被学者认为是解读地球变化的“三大天书”，而庆阳则是黄土天书光彩耀目的一页。陇东黄土高原记录了地球演化的历史、气候变化的历史、生物演变的历史、人类进化的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庆阳丰富的石油资源描述了庆阳侏罗纪动

^① 黑水：即平凉灵台县的达溪河。

物园的勃勃生气；庆阳深厚的煤炭资源展示了亿万年前这里林草的繁茂。1973年春在董志原以东的马莲河畔发掘出土的“黄河古象”化石是世界上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剑齿象化石，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宝”之一。陇东董志原沉积的黄土层厚度最深的地方达到200多米，堪称世界之最，她的历史和文化似乎比这数百米黄土层还要深厚，她蕴含了陇东黄土高原对中华文明的意义，同时也蕴含了庆阳对中华文明的意义。

在陇东，从高空俯瞰，黄土高原是平畴沃野，粗犷、雄浑，为世界所罕见。如果你置身沟壑，那平原就破碎成山了。粗看，山是浑圆的、苍老的，山山都刻下深深的皱纹。“天下黄土第一原”的董志原，不仅是我国自然地理上的一块高地，而且又是一块人文地理的高地。

中华民族医学史上的圣典《黄帝内经》，传说是庆阳一个叫岐伯的人与轩辕黄帝论医而整理成书的。从此，在我国产生了“岐黄之术”中医学。镇原县城北山上有个读书台，是东汉大文学家王符读书的地方。这位力举农桑为“治国之本”和“务农富农”的思想家，用他震撼朝野的《潜夫论》，抨击时弊，揭露黑暗，被后人尊为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出生于庆阳的傅介子是西汉时期的名将，见于历代史书的傅氏家族中的文臣武将、诗人作家，就有50多人。其中傅玄、傅咸父子，是魏晋时期的著名学者，所著《傅子》、《傅玄集》、《傅中丞集》，是我国魏晋时期历史的一面镜子。明代大诗人李梦阳，也是庆阳人。他在文学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著有《空同集》、《李梦阳诗集》，为祖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瑰宝。

从中华文化曾经直接影响的范围和中华古人类的足迹所至来看，庆阳属于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心范围，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中心之一。它虽然不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历史却曾多次在庆阳撬动过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董志原就有人类活动。1920年，在董志原以北的华池县赵家岔发掘出我国最早出土的旧石器，使甚嚣一时的“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之说哑然失声。远古时期，轩辕黄帝就在这一带“迁徙往来，披山开道”，开辟荒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后氏政权废弃农业，周族部落首领不窋失去农官职务，率部落和奴隶逃到陇东后，“务耕种，行地宜”，“教民稼穡”，开启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夏桀二十二

年公刘迁豳”，在宁县城西的庙嘴坪筑公刘邑，建古豳国，发展农耕，扩疆辟域，“周道之兴肇始于此”。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义渠戎国所在地，雄踞一方的义渠戎国都城治就在董志原东侧的焦村乡西沟村。秦灭义渠后，在今庆阳设北地郡，并在此修筑了秦长城和秦直道，千古一帝秦始皇沿直道云游天下，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汉武帝率18万大军沿直道出巡北上，威震匈奴。唐太宗李世民和唐肃宗李亨也是在取得陇东稳定之后，才使长安得以安定。从王昭君由秦直道出塞和亲到狄仁杰由宁州入朝辅政，从范仲淹华池筑城守边到李自成转战陇东，这里曾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活剧。在中国近代史上，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在董志原上留下了历史的辙印。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庆阳又展示了光辉的一页。大革命时期，西北早期共产党员、甘肃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王孝锡，回到家乡宁县太昌镇建立了甘肃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中共彬宁支部，在陇东播下了革命火种。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又在这里宣传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一座丰碑，在子午岭深处的华池南梁荔园堡巍然耸立。刘志丹、习仲勋所领导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大西北撑起了一块明亮的天空。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后，这里又是陕甘宁边区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陇东人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全中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涌现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特等文教英雄刘志仁、艺术英雄汪庭有、特等民兵英雄王存仁、边区劳动英雄孙万福、高隆清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长李丕福等党政领导干部，受到了毛主席题词嘉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刘伯承、李富春、谢觉哉、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为陇东革命老根据地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陇东革命根据地，虽然偏于中国西北一角，却是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的诞生地，是西北红军发展壮大摇篮，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是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陇东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章

王孝锡洒尽碧血秦陇播星火

陇东革命根据地，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革命活动。1925年10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刘郁芬师进驻甘肃，共产党员宣侠父^①、钱清泉^②受中共北方区执委和李大钊派遣，随国民军到达兰州。他们到达兰州后，很快与早期共产党员、甘肃榆中人张一悟等人取得联系，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活动到1927年2月，因为国民党右派的破坏，钱清泉等人离甘，甘肃特别支部停止活动。

在此前的1926年6月，党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受北方区执委领导；后改归中共陕甘区执委，党员发展到190余名。1927年3月成立中共陕甘区委时，下属7个地执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16个特别支部、4个支部，党员388名。中共陕甘区执委确定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重点首先致力于农民运动。在地域上，首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中共陕甘区执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统一领导陕甘地区的群众组织，包括青年团陕甘区执

① 宣侠父，浙江省诸暨人。1899年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1922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被李大钊派至冯玉祥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0月底随军到达甘肃后，同张一悟、钱清泉组建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支委。1926年底随国民军东征北伐。抗战初期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少将参议。1938年7月31日，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其绑架，并杀害于西安，时年39岁。

② 钱清泉，江苏江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被李大钊派至冯玉祥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0月底随军到达甘肃后，同张一悟、宣侠父组建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支委。1927年3月被捕后，组织营救获释。返回江阴后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特派员，江阴县委书记，苏州、常州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等职。1928年10月被捕，11月被反动派杀害，时年34岁。

行委员会、陕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省青年社等。同时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集中开展陕西工作的同时，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派人到甘肃秘密重建党的组织。

1927年3月，为了恢复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工作，在冯玉祥部工作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刘伯坚，借国民党西北政治委员会决定派人整顿甘肃党务的机会，推荐王孝锡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与胡廷珍、保至善、马凌山等共产党员一起，前往兰州整顿甘肃党务。王孝锡等到达兰州后，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便于开展活动，首先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王孝锡任青年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胡廷珍、马凌山担任委员。并选拔一批国民党左派参加了领导工作，从而加强了省党部的进步力量；同时改组了中共甘肃特支，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王孝锡任组织委员。随后在临夏、平凉、宁夏也建立了特别支部。到1927年6月，中共陕甘区执委的党员达到2000多名。在中共陕甘区执委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开展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斗争，支援国民军联军出关参加北伐战争，镇压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到1927年6月底，仅陕西省的农协组织就遍及60多个县，会员达37万多人，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10万以上，陕西的农民运动成为北方农民运动最高涨的省份之一。在中共兰州特支的领导下，兰州青年社等青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刊物，宣传共产主义，抨击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展青年社员约300人。中共陕甘区执委还创办机关刊物《西北人民》，宣传革命主张。工人运动与农民、妇女、青年学生运动互相配合，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反动当局也大力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西安面临一片恐怖。为了适应突然变化的形势，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完全秘密状态，重要干部秘密离开西安。7月，中共陕甘区执委撤销，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及其反动统治。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却动员和鼓舞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派斗争的斗志，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积累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也为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西北早期共产党

员、甘肃党组织早期领导者之一王孝锡就是在这—时期，先是投身学生运动，宣传革命，唤起民众觉醒。接着，肩负使命整顿甘肃党务，改组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八七会议后，王孝锡奉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宁县太昌镇，建立了甘肃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彬宁支部，并参加和领导了旬邑起义，在陕甘交界的宁县、长武、旬邑、彬县一带播下了革命火种。

一、投身革命唤起民众觉醒

王孝锡，字遂五，1903年2月18日生于甘肃省宁县太昌镇西壕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进入太昌镇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幼天资聪颖，敏而好学，成绩优异，性格刚毅，深受老师赞赏。1918年，15岁的王孝锡在宁县太昌小学毕业后，徒步去平凉考入省立第二中学。

平凉，是古丝绸之路东端的交通要冲和重要商埠，素有“陇东旱码头”之称。这里，西兰公路横贯东西，泾水东注，崆峒西峙，又依六盘山之险，历代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当时，陇东唯一的一所甘肃省立中学就设在这里。这所学校创建于1905年，时称“陇东官立中学堂”，前身是“柳湖书院”。1913年更名为“甘肃省立第二中学”。

在平凉二中，王孝锡埋头书本知识，学习十分刻苦。进校时间不长，他的作文就受到了老师赏识，常常以见解独到、文笔流畅作为“范文”在同学中传阅。这一年的9月30日，王孝锡在一个手抄本上写了如下诗句：

明月不须云点缀，
好山也得树装模。
远山含紫气，
芳树发春辉。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王孝锡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他仿佛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为王孝锡尔后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王孝锡在省立平凉第二中学读书时写的一首感怀诗：



王孝锡

金风飒飒万物愁，
人生韶华不可留，
忽听壁外纵钟声，
树叶乘时飘弥球。

诗中“纵钟声”，乃金属相击声，借欧阳修《秋声赋》“纵纵铮铮，金铁皆鸣”句。可见他从小就喜爱诗词，并以此抒发自己的胸怀和抱负。1920年5月18日，平凉二中借故反对平凉当局“地方特别纪念”，开除了王孝锡学籍。王孝锡惜别了母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学，踏上了回家的归程。当时王孝锡并不气馁，对前途充满着信心。他写了一首题为《秋风歌》的新诗，表达他的胸怀与抱负。

明皎皎天高气清，
音朗朗远来飞鸿。
风过东篱香满座，
黄叶飘落动远人。
志在振去从戎，
黄沙血染，
草木静宁。

1920年9月初，16岁的王孝锡背着行李，又从太昌老家出发，翻山越岭，步行到千里之外的兰州，考入兰州国语讲习所就读。1922年，平凉二中的反动校长被撤换，他又回到母校继续学业。

1924年3月，王孝锡考入国立西北大学。这时，已有不少共产党员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委派，前来西安开展工作。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共产党员，也开始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渴望追求真理的王孝锡，很快结识了以西北大学文科主持和教授身份从事党的活动的刘含初^①，中国共产党西安党团负责人魏

① 刘含初，名翰章，陕西省黄陵县备村人。1895年2月初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史系。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后接受李大钊的教诲，立志革命。1920年，与刘天章、李子洲创办《秦钟》。次年，又创立“共进社”。1920年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开封大学、西北大学任教。1923年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加入共产党。1925年8月，以共产党员身份任陕西省国民党党员俱乐部主任。9月，任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宣传委员，后任常务委员。1927年3月，改组西北大学为中山学院，任院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进行革命宣传，1927年8月15日，在宜君石堡村给群众讲演时，被陕北军阀杨袁枪杀，时年32岁。

野畴^①，以及李应良、吕佑乾等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从他们那里得到并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自觉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的斗争。

1925年5月，担任西北大学学生会会长的王孝锡，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对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黑暗统治和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上街串乡，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和反动军阀卖国媚外的丑恶行径，使更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加入到斗争行列。他还在校内发起组织“青年社”，与社员们一起阅读革命刊物和进步作品，共同探讨人生，认识社会，启发和引导同学们向党组织靠拢。

这年暑假期间，王孝锡与几位同乡同学一起徒步回家，在沿途村镇，利用一切机会发表演说，宣传“五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他的演说情绪激昂，言辞感人，吸引了不少民众。回到家乡宁县太昌后，王孝锡与任鼎昌、王彦圣、王之经等同学一起，建立了甘肃最早的“青年社”组织，发展社员30多名，王孝锡亲自主持青年社成员进行宣誓，并响亮地提出了“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观”的口号。他们利用乡间集日上街宣传，介绍全国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斗争情况，揭露“五卅”惨案真相，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引导乡亲们移风易俗，使新思想、新观念在闭塞落后的陇东农村生根发芽，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回到学校以后，王孝锡又在西北大学发起组织“旅陕青年会”，吸收甘、宁、青等外省同学参加，号召大家在与故乡亲友通讯和交往中，宣传进步思想，扩大革命影响。他还起草发表了《告陇东十七县父老兄弟

① 魏野畴，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原名风标，号明轩。1898年3月生于陕西省兴平县魏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1年他和刘天章、李子洲等同志在陕西旅京学生中创办《共进》半月刊，后又发起组织“共进社”。1922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1923年回陕西，先后在榆林、西安任教，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在西安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团支部，组织青年文学社，出版《青年文学》刊物。1925年8月，创办了党在西北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刊物《西安评论》。大革命失败后，在河南、安徽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春，在皖北组织领导阜阳武装暴动中，不幸牺牲。

书》，以现实启迪民众觉悟，鼓励他们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这年12月下旬的圣诞节前后，他又积极参加西北大学“非基督教运动大同盟”的各项活动，与牧师、传教士进行辩论，揭露他们以宗教为幌子，愚弄、欺骗、侵略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火热的斗争生活，使王孝锡经受了考验与锻炼。1925年6月，由刘含初、魏野畴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26年4月至11月，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心腹刘镇华为陕甘剿匪总司令，率8师之众入潼关，到4月初刘镇华部队兵临西安城下。这时，在进步力量的配合下，杨虎城进驻西安，团结陕军，依靠进步力量，抗击刘镇华部队的围攻，坚守西安古城。这期间，在中共西安党的负责人魏野畴的领导下，王孝锡与吕佑乾、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等共产党员一起，坚持了长达8个月的“反围城”斗争。暑假期间，他们在省立一中办起暑期学校，各校师生参加者千余人。暑期学校设有社会科学班和自然科学班，主要学习人类进化史、唯物史观、马列学说及其他科学知识。王孝锡等人都是暑期学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由于城内军民人口骤然增加，守城时间过长，城内粮食供应极度困难。一切可以食用的动植物、皮革制品、药材、豆渣均搜罗殆尽，只能捕食麻雀、挖野菜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王孝锡组织同学们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直到守城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西安解围后，王孝锡与刘含初、李银连、吕佑乾等人在西北政治会议上提出，改造西北大学为中山学院，以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山学院成立后，首先培训了一批前方急需的政治工作人员，派到冯玉祥部队各军、师中去，加强了党在部队的力量。继之，又设立了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等，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二、肩负使命整顿甘肃党务

1927年，西安围城斗争结束后，中共西安党组织拟派王孝锡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因交涉出国学习费用，常与冯玉祥接触。王孝锡善谈论和冒险能力与尚武精神，深得冯玉祥赏识，冯以其此人有才常与谈论。3月，为了恢复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工作，在冯玉祥部工作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刘伯坚，借国民党西北政治委员会决定派人整顿甘肃党务的

机会,推荐王孝锡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与胡廷珍、保至善、马凌山等共产党员一起,前往兰州整顿甘肃党务。冯玉祥也认为中国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主张王孝锡不要立即出国学习。当时,西北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正处于高潮,需要大量党的优秀骨干去开展工作。于是,王孝锡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与胡廷珍、保至善、马凌山相继到达西北边陲兰州。

王孝锡到达兰州后,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便于开展活动,首先整顿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王孝锡任青年部长,保至善任农工部长,胡廷珍、马凌山担任委员。并选拔一批国民党左派参加了领导工作,从而加强了省党部的进步力量;同时改组了中共甘肃特支,建立了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王孝锡任组织委员。他还担任甘肃省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甘肃政治委员会会长及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等职,以其合法身份,卓有成效地加强和开展了党的工作。为了推动整个兰州地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王孝锡以省督办公署名义主持颁发了《最早宣传大纲》、《党务指导工作方针》、《中山俱乐部设备纲要》等训令,要求突出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各县普遍建立工会、农会及其他人民团体。就在对国民党省党部整顿就绪之后,王孝锡立即着手建立“青年社”的筹备工作,他们相继在兰州一中、师范、女师、工校、农校等10多所学校建立了筹备会,发展社员300多名。4月上旬的一天,兰州“青年社”在甘肃省教育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王孝锡担任大会主席。他郑重宣布青年社正式成立,并作了报告,说明“青年社”的任务是团结一切爱国青年反帝、反封建,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勇斗争。会上,王孝锡被选为“青年社”社长,马凌山为书记。“青年社”在王孝锡的领导下,配合党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创办了《妇女之声》、《醒狮周刊》等报刊,广为发行,使古城兰州呈现出一派生气。随后平凉、临夏等地的“青年社”也相继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青年,扩大了革命影响。对此,国民党右派势力深感不安,他们在《劲报》上撰文惊呼:王孝锡等人“抵甘后,大肆活动,组织CY^①,青年学生参加者甚众,并分布甘肃临近各县。甘肃全境已充满赤色恐怖。”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兰州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车夫、理发、邮

① CY:共青团英文缩写。

电等行业相继建立了工会，七里河、西固等地也建立起农民协会。王孝锡满腔热情地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进行具体指导，鼓励广大工人、农民团结起来，为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而斗争。王孝锡的讲演很有启发性和鼓动性，深受民众欢迎。工人、学生以及军队中下层官兵，纷纷邀请他去演说，王孝锡一时成为兰州地区政治活动中的风云人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兰州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重新抬头，为了打击其反动气焰，王孝锡、胡廷珍等在省政府门前召开了一次反蒋大会。主持会议的王孝锡手持喇叭筒，愤怒声讨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勾结地主资产阶级，破坏国共合作的反革命罪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余位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曾经和王孝锡在西安开展革命活动的李银连也和李大钊一起惨遭杀害。6月7日，王孝锡按照中共兰州特支的决定，在兰州东教场主持召开李大钊烈士追悼会。他向参加追悼会的各界人士介绍了李大钊的革命事迹和遇难经过，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他指示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校报出了一期《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专号》，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遇难情况。并满怀悲愤之情，奋笔写下了《悼北京死难烈士》的长诗，刊登在这期专号上。

霹雳一声，
在阴霾沉沉、妖气弥漫的北京，
现出了霞光万道——
主义的鲜花，
烈士的血星，
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发抖中。
你们的精神，
高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你们的声音，
革命导师，
人类明星。
你们一面引颈，一面高呼：
“枪弹是革命者的饭食，

死是革命者的归宿，
 为了被压迫民族最后胜利。”
 这是何等的悲壮啊！
 你们是为党，
 为国，
 为全人类解放而牺牲。
 这是何等的光荣！
 后死者的我们，
 恨不能列于诸君子林，
 与贼拼命。
 真羞！
 真惭愧！
 可是诸君的鲜血，
 深注在我们的脑中。
 应当怎样努力？
 前进！奋斗！杀贼！
 才能完成你们未竟之功，
 慰你们在天之灵。

这两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会议，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唤起了广大群众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觉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完全投靠了帝国主义，并勾结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彻底执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政策。1927年6月10日郑州会议、6



1927年王孝锡主编的《追悼北京死难烈士专号》

月19日徐州会议和7月15日武汉会议之后，冯玉祥与蒋介石、汪精卫合谋，公开背叛革命，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开始“礼送”共产党。

当时，冯玉祥命令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成立了甘肃省清党委员会，开始搜查中共组织，惩办共产党员，禁止出版、销售进步书刊，禁挂列宁像，禁唱国际歌，停止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团体在甘肃的一切活动。6月22日，冯玉祥电调王孝锡、胡廷珍、马凌山、保至善到郑州、开封开会，实际是“礼送”他们离甘。当天，兰州市各界有关人士共80多人，在五泉山麻尼寺召开欢送会，不明真相的王孝锡等四人就这样离开兰州。

三、千里寻党请示行动方案

6月下旬，王孝锡、胡廷珍一行到达西安，见到了西安党的负责人之一赵葆华。听了赵葆华的介绍，才知道形势有变。经过研究马凌山临时留陕西工作，保至善经平凉回崇信原籍探亲，王孝锡、胡廷珍由先行从兰州到达西安担任西安党地下通讯员的李果陪同，再到洛阳打探消息，然后一起去武汉向党中央请示行动方案。

王孝锡、胡廷珍、李果三人从西安出发，到达洛阳时已经是7月底了。王孝锡一行到达洛阳后，但见洛阳古都满目荒凉，古迹凋零，令人怅然若有所失。在洛阳，王孝锡见到了在冯玉祥部前方慰劳宣传团工作的很多同学，进一步了解到了冯玉祥叛变革命的真相。王孝锡、胡廷珍决定直接去湖北汉口寻找党组织请示行动方案。他们三人乘火车前往武汉途中，火车过黑石关山洞时，煤气袭窗，烟雾滚滚。王孝锡凝视黑雾笼罩下的洞口，吟诗一首，即景咏怀，以寄感慨。

乌烟黑气袭车厢，
若小恶魔竞施狂。
长啸一声出洞去，
光明大现喜非常。

王孝锡、胡廷珍、李果一行到达武汉时，已经是8月上旬了。这时，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刚刚结束。他们本想先到汉口长江书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不料在武汉《民国日报》上看到刊有长江

书店登出的关门停业启事。鉴于长江书店已经停止营业和对外联系，经过多方寻访，王孝锡他们终于见到了参加八七会议的中共陕甘区委组织部长李子洲，李子洲向他们详细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党的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把发动农民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建立根据地，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关于工作问题，李子洲代表组织，决定李果仍留西安担任地下交通员，王孝锡担任中央西北特派员，与胡廷珍一起回陕甘交界的宁（县）、长（武）、旬（邑）、彬（县）一带农村，建立基层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政权，迅速扭转党在西北的被动局面。

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使王孝锡、胡廷珍、李果受到了极大鼓舞，决定立即返回陕甘，很快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在离开武汉的前一天，他们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浩荡长江在三楚大地与其最长的支流汉水交汇，造就了武汉隔两江而三镇互峙的伟姿。这里地处汉江平原东缘，鄂东南丘陵余脉起伏于平野湖沼之间，龟蛇两山相夹，江上舟楫如织，黄鹤楼天造地设于斯。历代文人墨客到此游览，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唐代诗人崔颢一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七律已成为千古绝唱，更使黄鹤楼名声大噪。王孝锡看着门前悬挂的苏轼撰书的“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的11字长联，心想，这真是气吞河岳，笔扫千军之作。他不禁胸怀一畅，俗虑全消，诗兴大发，慨然感怀，信口吟出了《长江》一诗：

大江滚滚浪排空，
革命高潮在望中。
破浪乘风今日事，
疆场纵马建丰功。

当时，王孝锡还不知道就在6个月前的1927年2月，毛泽东考察完湖南农民运动后来到武昌，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登黄鹤楼》：

党的地下交通员，在蓝田、商县一带活动。王孝锡、胡廷珍一同回甘肃宁县太昌镇。

四、首建甘肃农村党的支部

王孝锡、胡廷珍二人离开西安古城，或坐马车，或骑毛驴，搭乘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出咸阳，过礼泉，经乾县，翻越永寿梁，沿西兰公路北行，很快到达陕甘交界的彬县和长武县。在彬县县城，放眼望去，沿泾河两岸的川道河谷里，到处枣树密布，梨林葱葱。在那铁干虬枝上，大红的枣儿、橙黄的酥梨挂满了枝头，压弯了枝丫。彬县、长武、旬邑泾河流域所产大枣和宁县马莲河两岸所产的大枣皆数上品，闻名遐迩。这种大枣色如琥珀，味如甘酪，皮薄肉厚，个大核小，早在《诗经》里就有记载。王孝锡看到穿红挂绿的姑娘，攀树登枝，喜摘丰收果，才意识到已经是满山野菊飘香，遍地谷浪摇金的秋收季节了。他们肩负使命，归心似箭，很快回到了家乡宁县太昌镇。

王孝锡与胡廷珍在太昌镇研究制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胡廷珍回家乡临夏开展工作，王孝锡在宁县坚持革命斗争。在太昌镇，王孝锡同先后回到太昌的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王彦圣、王之经，以及曾在冯玉祥部队慰劳宣传团工作的共产党员任鼎昌，在太昌东岭村王晓时家中，秘密建立了甘肃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彬宁支部，也称宁县支部。王孝锡任支部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太昌区委，下辖宁县、长武、泾河川三个支部，发展党员33名。这是陇东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区委组织。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采访王孝锡五弟王干城时，见到了王孝锡给上级党



王孝锡手迹

组织汇报的手稿，这份汇报残页是陇东地区党组织最早活动的一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自回来，立即召集王 OO 成立临时区委，作暂时指导。待后各支整理有绪时，再行宣举正式区委。在过渡期间，太昌区委我们三人，苟 OO、王 OO 于及我，暂编为第一支，做太昌附近工作，并指导中学。中学有于 OO、王 OO，派王 OO 聘团作团中书记。泾河列第二支，大学十二人，分作四个小组，分住在五村。中学同志三人，系大学同志介绍，尚未编入组织。第三支在长武，共十人分三组，泾河南、骑马沟有同志四人，暂编长支。距一支约十里，但因隔河预备列入第二支，不知可否？（下缺）^①

在这期间，王孝锡还整顿了 1925 年暑期组织起来的“青年社”，并以“读书社”的名义为掩护，利用太昌镇 10 天逢集 4 次的机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草案》，宣讲政治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学习后大家共同讨论，互相提出问题，进行解答。在青年社里，王孝锡亲自讲课，给大家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说、宣传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夺取政权等任务。当年的“青年社”社员于景琪有如下一段回忆：“我和王教读、王孝慈（即王干城）等，夜间在后院楼子上学习共产党革命的三大步骤，组织工农群众，夺取政权等。那时我十六七岁，遂五姑父怎么那样耐烦，听取我们的读书心得，并亲自作记录。他给我起的化名叫于玉。太昌闹学潮时，我和教读上县城直接找县长告太昌小学校长杨蕃昌，我们没带禀状，临时找李发春写了一份。后来成立了学生会并联合和盛小学成立学生联合会。我们在集市上讲演，在 3 月 18 日的庙会上讲演。周子伟老师不让去，我们非去不可，后来还是去了。我们讲的内容是宣传妇女解放，放足、剪发，让学生把路口围起来，直接剪男子的长辫子。那时农民很顺受，也许是我们宣传起了作用。”

当年的中共彬宁支部组织委员王彦圣曾回忆说：“太昌小学校长杨蕃昌，不学无术，是个庸才。学校学生甚为不满，我们就鼓动学生驱杨，亲自草拟了驱杨宣言，并代拟了标语，如：‘打倒烂脏校长杨蕃昌。’学校请来周子伟任教后，我和王之经借向周老师补习古文，经常到学校去向

^① 原件现保存在王维城处，影印件见王干城《不度江河万古流》一书，第 177 页。

进步教师赵灵洲、苟一轩、于心甫，学生于纳言、王教读等散发革命书刊”。

1927年，从3月开始一直没有下雨，旱象十分严重，农民生活异常困难。王孝锡在前面的同一份向上级党组织的汇报中写道：

宁、长、泾、正、合、镇一带，自三月间天雨后，至今未得透雨，今年麦收每亩一斗，较往年减产三分之二，秋禾完全未有。八月以前人民所望的种麦，因天未下雨，完全失望。今年不种，明年不收，要见麦除非十九年^①夏天。所以自八月半至今，十余日间顿呈紧张现象。

自麦收后，农民大受天旱的恐慌，秋季田禾将生将死的待雨，结果一粒无有，农民普通每年食粮即减少一斗。自耕农以上或可维持至明年夏天，贫苦农友尚有揭借的可能。

最近十余日来，麦不能种，有粮者闭仓不出，无粮者呼借无门。总计目下绝食者约十分之三，可以支持年终者约十分之二，至明年春间者约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或可支持至明年夏天。有能食两年者全县不过二十余家，所以各乡之抢案，天天有闻。

在此局面下，很明显的表明了农村经济破产，无产阶级自动的三、五成群，夜间向资产阶级、地主豪绅进攻，杀戮、拐拷。绕泾川、蒲河的两川，有所谓口袋队之称。

凡领取绅豪的食粮者，得出揭约或借约，又非田产基业作为抵押不可。无能暴发的贫农，多藉以图生活。各村中自行预备土枪、刀矛等武器，每夜枪声不绝于耳，其情况颇似西安围城。

兰州面价每元买至三斤，饿死的每日平均百余，其他沿陇海路一下，饥荒特别厉害。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王孝锡开始探索农村革命的路子。他以行医为掩护，深入甘肃宁县、庆阳和陕西长武、旬邑、彬县的农村进行调查，分析当地农村各阶级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在1927年10月写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草案》^②，原文是：

^① 即民国十九年(1930年)。

^② 此原件存甘肃省博物馆，见王维城等编著，《史墨笔浪》，香港华泰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我们认清中国农村之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系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警察、宪兵、保安队、军卫队、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革命之变革，竭全力以抗衡。

我们认清，只有农民最激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我们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制度，组织农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大作用。我们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苦力、雇农之反革命理论（如说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农民文化程度太低……”）。而且要努力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我们要吸收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农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社会制度的。

我们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南、湖北的农民已经在我们指导之下，实行许多英勇的武装斗争。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

我们要组织农民于农协会等类的战斗组织之中，竭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提出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

我们认清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什么减租百分之三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主张，（又如最近自十六年元月一日止，以前欠债在民间者一齐豁免，其实际已收到二十年了）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实行，即实行，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我们要坚决反对国民党欺骗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组织的发展，以及这种组织奋起斗争，也就说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的需要。我们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中之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之成为阶级的真正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应当到这种组织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我们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退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

用票纸卷，并且要竭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我们要组织农民，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斗争，反对军阀拉夫、征款、派粮等。我们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之必要。

我们认为要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办法：

(一)一切地主之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政府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土地之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和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全要按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之富裕能不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我们要更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都会的土地，皇族、族官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由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田租制度应一律取消。

(五)祠田、族产等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我们要先赞助农民根本消灭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没收，实行垦殖政策。所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及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筹措基金，保证无产而失其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业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行之。泉、井、溪、河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十一)我们要努力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义务。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我们要组织低息的农民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业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我们要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工艺产品,贩卖农民的日常必需品及家庭手工艺的原料等。

我们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到现代化新的农具。禁止贩卖肥料和私人垄断,一切贩售肥料归农民合作社办理。我们还要实行农村中修路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取消(废除)。

革命政府重订单一的统一税制度。税收的一部份应当用乡村的公费。一年收获后,只收一次税,确定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维筑道路,奖励农村手工艺艺术,以保障苦力失业的工作。

1926年前后,我党在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又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我党遇到了怎样选择革命依靠力量的难题。王孝锡在甘肃宁县、庆阳和陕西长武、旬邑和彬县的广大农村,又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农村阶级分析》一文。从陕甘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特征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他们的阶级本质特征,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王孝锡在《农村阶级分析》^①一文中写道:

地主——其经济在这个社会上是占着最高地位。每年收入尽为不劳而获的地租。地租利息……比绅士虽无统治政治的特权,但经济势力可以支配政治。

^① 原件保存王维城处,见王维城等编著:《史墨笔浪》,香港华泰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绅士阶级常取联合手段与之联结。互相为用，有可能时，对绅士取而代之，所以地主与绅士立于同等地位，压迫贫农。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一样，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自耕农——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在经济上的外交很少。常取各扫门前雪的独立保守主义，故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之口吻，但其心理常趋向地主方面发展。故努力的发展个人经济，对于社会问题很难注意得到。这种人对于革命持中立态度，在革命洪流高潮，可以看得曙光时，也可参加革命。

半耕农——自己土地很少，常有食料不足之虑，不得不乞求地主的土地。可以得生产一半，以补不足。常受地主的剥削。偶遇天旱水淹等灾，便一无所得，地主勒索地租，常常趋于破产，沦为纯粹的佃户。

所以，他们的经济是常不足的、不保险的、甚至终年劳苦，而有衣服褴褛，食菜茹糠之苦，这一般是有革命本质的。

佃户——社会上最被人剥削受苦的，莫过于佃户。他们土地、生产工具一无所有，完全受之于地主，听地主之指挥驱使，每年劳动的结果，分给一半与地主，仰承地主之剩余，借以维持其生活，每年所得只能维持数月，其他时日，无资本做贩卖生涯，只有以体力劳动受卖于人，糊自己的口，得到少许工资，供奉妻子。但到农暇或青黄不接之时，揭借于人，常借人一斗，须加五升或六、七升的利息，待农作物收获后得到资本收租所余，以偿此债。甚至有倒仓倾圮而不足者，不如此，他日必不能再借得出。所以，佃户的生活无一日不在忍饥受饿，穷迫困苦之中。其子孙万世要做地主的奴隶、牛马，永无见天日之时，社会上具有革命特质，正此人也。

雇工——农业社会之雇工，正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人也。他们无家庭之可言，无幸福、娱乐之可言，只有出卖劳动力于人，维持其不死，社会最痛苦难堪的，莫过于



王孝锡手迹

这一等人。

工人有时在奋斗中要求增加工资,还可以成家娶妻。因为工人有广大的群众,聚集在一起,便于团结相识,所以就有大的力量,去向工厂主罢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而雇工便设此等团结的条件——因为散居各处,不便联合,且无时间去联合。

他们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就要劳动十八、九小时以上。变成了一个能语言的牛马,疾病灾害,无有保障,我们不禁要高呼:最痛苦的农友们,团结起来,向万恶的社会和地主作斗争。

通过调查分析,王孝锡认识到地主、豪绅是革命的敌人,自耕农、半耕农、佃户和雇工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分清了敌我,增强了革命信心。即使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认清敌友,坚持斗争,革命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基于这种认识和已经建立的社会基础,王孝锡在宁县成功领导了“逐杨驱索”斗争。

宁县太昌镇小学校长杨蕃昌是一个顽固守旧、不学无术、贪污学费的腐败人物,一直为进步师生所反对。王孝锡召开支部会议,提出了“打到烂脏校长杨蕃昌”的口号,发动师生揭露杨的丑行,呼吁宁县当局撤其职务。在师生的努力和社会的压力下,杨被迫下台,由青年社社员赵灵洲接任了校长职务。“逐杨”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青年和周围群众,他们在王孝锡和彬宁支部的领导下,又开展了“驱索”斗争。当时,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宁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群众苦不堪言。县长索呈祥勾结地主豪绅,高摊浮派,贪赃枉法,民愤极大。王孝锡、王彦圣等共产党员深入农民中间,揭发索的罪行,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并向国民党省政府具状告索。迫于民众强大压力,省政府不得不撤销索呈祥的县长职务,并勒令退出赃款800银元,索狼狈而去。“逐杨驱索”斗争是陇东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新军阀和黑暗保守势力的第一次交锋。虽然它还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性质,但它的胜利,使王孝锡等共产党人进一步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更加坚信依靠民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

1928年春,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王孝锡派任鼎昌去平凉负责党的地下工作,王之经去陕南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他与王彦圣继续在宁县、长武、旬邑、彬县坚持斗争。在“逐杨驱索”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王孝锡和彬宁支部的其他同志着手开展武装斗争。王孝锡深

入彬县百子沟煤矿,进工棚、下煤窑,同工友们促膝谈心,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为组织工人武装创造条件。同时又和旬邑地下党员许才升等同志一起,调查分析旬邑的革命形势,为组织旬邑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旬邑地处陕西、甘肃交界,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里比较薄弱。这里紧靠子午岭林区,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的贫苦农民与统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他们组织了“红枪会”捣官府、杀豪绅,与地主土豪伺机斗争。早在192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就派吕佑乾化装为“书客”在淳化、旬邑一带调查了解各种情况,随后又派徐经霖(徐铭勋)、吕风岐、王浪波、蒲允升等到旬邑与王孝锡、许才升秘密联系。由于许才升时任旬邑高等小学校长,系西安中山学院农民班毕业,早期共产党员,又是旬邑人,情况熟悉,加之吕风岐也是旬邑高等小学教员,曾毕业于陕西省立一中,共产党员。他们与王孝锡、吕佑乾等共同策划,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发动群众,组织力量。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旬邑地下党研究决定,待时机成熟,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5月9日(农历三月二十日)拂晓,潜伏在旬邑县城内的起义队伍,先缴了警察局及守城警察的枪支,城外由农民组织起来的“红枪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土枪越城而入。城内外武装起义的队伍会合打进旬邑县衙,活捉了旬邑县县长李克选和公安局长、粮秣委员和几个土豪劣绅等共7人,当日公判并进行了处决。同时成立了旬邑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王孝锡在百子沟煤矿准备组织工人同时暴动,配合旬邑暴动,提前离开旬邑县城。后来由于山路陡峭,地形复杂,起义队伍黑夜行军,向导迷失路径,贻误了时间,未能到达彬县百子沟煤矿。而占优势的国民党田金凯师迅速反扑过来,加之叛徒出卖,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遭到破坏,吕佑乾、许才升、吕风岐、王清碧等7位起义领导人被敌人活埋。王孝锡因在百子沟煤矿幸免于难,王晓时遭到追捕,他们先后化装离开旬邑、彬县,返回宁县太昌镇。得知吕佑乾、许才升、吕风岐、王清碧等同志被敌人活埋的消息后,王孝锡悲痛欲绝,奋笔写下《吊故友七人》的诗篇寄托哀思。

其一

议案一决漂冰霜,

红军奋臂赴杀场，
贪官污吏尽丧胆，
绅豪地主如亡羊。

其二

挽救工农登仙阶，
努力实现苏维埃。
生平浩气终难泯，
革命史上第一页。

其三

静夜悲声隐隐扬，
丑贼送君赴杀场。
枪声已息君忧哀，
烈士坑中含土亡。

吊战友七人
挽救工农登仙阶
努力实现苏维埃
生平浩气终难泯
革命史上第一页
其二
红军奋臂赴杀场
贪官污吏尽丧胆
绅豪地主如亡羊

王孝锡手迹

旬邑农民暴动，是继清涧暴动之后，西北又一次农民武装斗争。这次暴动虽然时间很短就失败了，但它为党后来在陕甘边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旬邑农民暴动的失败，并没有使王孝锡灰心，他从旬邑暴动中看到了

农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为广大工农群众谋求解放，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在此期间，王孝锡一直被国民党当局搜捕，他辗转于宁县、长武、彬县一带继续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在《国民党三大责任》一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题为《决心》的诗，这是王孝锡发自肺腑的誓言：

任何力量，不能移我之心。
 任何力量，不堪动我之情。
 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留停。
 我的责任，策励我不能一刻安寝。
 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

五、满腔热血铸就青春颂歌

1928年，陕甘一带遭受特大旱灾，粮食绝收。秋夏之交，宁县南区聚起三支以饥民、逃亡士兵为主的农民武装，人数达到3000多名，并且由最初打击豪绅地主、抢夺粮食，逐渐发展到向正宁、宁县、西峰等镇发起进攻。王孝锡密切注视着这三支农民武装力量，他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对他们的组织成分、武器装备、供给来源、活动范围、斗争方式及周边形势做了详细说明和分析，认为这三支农民武装虽然成分复杂，但绝大多数仍是贫苦农民，只要正确引导，就能改造成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对这三支队伍的头领做了大量工作，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团结作战，互相策应，向敌人斗争。当时，三方都接受了他的建议，达成了初步合作。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收买离间、分化瓦解和残酷镇压，三支农民武装终归溃散，王孝锡组织、改造农民武装的计划没有实现。

王孝锡在宁县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惊恐和不安。国民党中央命令甘肃省党部以“煽动暴动罪”很快逮捕王孝锡。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也发出捉拿王孝锡的通缉令。差人、衙役不时临门，骑兵、警察经常寻踪。王孝锡在宁县新庄小户石家躲藏时，得知他的同学、战友、西北特派员保至善被捕遇害时，在小户石家山神庙的墙壁上写下了《吊战友》诗一首，表现了他对战友的追念和对敌人的无比愤恨。

一缕清风半轮月，
 深山幽处暗举哀。
 回忆往事肠欲断，
 追荐惟有眼中血。

王孝锡手迹

1928年11月，国民党陕甘青“剿匪”总司令部派法官杨天枢潜往宁县，勾结宁县县长效维国，经过密谋策划，乘王孝锡不备，11月26日将王孝锡在家中抓捕。面对强暴凶残的敌人，王孝锡大义凛然，从容不迫。临走时他挥笔写下了《别家有感》一首诗：

丑贼剪何急，
皂隶临门催。
双亲堂上悲，
儿女牵衣涕。
断袖出门去，
天空任鸟飞。

写毕，王孝锡诀别亲人，昂首挺胸，大步出门。当他走到街坊一个面馆时，众乡亲们闻讯赶来要求释放。王孝锡挥笔在这家面馆的墙壁上写下了诗二首：

(一)

慷慨歌太平，
从容作楚囚。
暴刀逞一快，
何惜少年头。

(二)

书剑漂流二十年，
国事无端尚依然。
革命未成身先捕，
普罗①自在人世间。

① 普罗：法语“无产阶级”简称。

在此之前，王孝锡还在悲愤之中疾书了《离别难》一诗：

别时一刻值千金，
花无情香月无影。
堂上嘱咐声凄凄，
闺中叮咛音咽咽。
大陆沉沉人有宅，
沧海茫茫我无家。

王彦圣得知王孝锡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王孝锡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指示传递消息的同志取消营救活动。他先被敌人押往宁县城，王孝锡母亲送去棉裤一件，内藏一把短刀和两块银元。随后被押往平凉。在平凉，国民党反动当局召开了庆祝大会。他们叫嚣说：“抓了西北共产党的头子，这下西北就安定了。”王孝锡被押解到兰州后，国民党《新秦日报》刊登了题为“冯电奖甘肃省破获共党”的消息。消息是这样写的：“兰州十八日电：刘郁芬接冯副^①电云，军法处长刘泾洋督飭军法人员破获共党机关，并捕获要犯王孝锡一名，殊堪嘉奖，着记大功一次，以资矜式，嗣后关于共党事件须严密侦缉，以弭隐患。”

兰州监狱分为“见、善、思、迁、知、过、必、改”8个字号。由于王孝锡为重要的政治犯，被押在“改”字号里。敌人梦想从王孝锡嘴里获得西北地下党组织情况，斩尽杀绝西北的共产党员，甘肃国民党的几个党头子亲自审问。王孝锡怒不可遏，他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反对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径。在敌人法庭上，王孝锡面对酷刑拷打，毫无惧色，他极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党的机密一字不吐，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尽管身陷囹圄，王孝锡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希望，写下了《铁窗朝霞》一诗：

静坐铁窗月影斜，
献身革命不还家，
朝阳翌日红光艳，
胜利预兆出彩霞。

① 冯副：冯，即冯玉祥，副，15日。

王孝锡自知凶残的敌人不会放过自己，在狱中，他已经做好了与亲人诀别的准备。

永 别

我非木石人，能无手足情？
死则为正义，生乃为人人；
从今成永别，心唯双亲萦。
堂前代尽孝，虽死也安心！

寄 妻

献身革命不还家，
卿奉双亲务桑麻；
更嘱贤妻一件事，
还当培育革命花。

反动派在王孝锡嘴里得不到半点有用的东西，就决意杀害他。国民党甘肃指导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的电报中称：“近期在宁县捕获的在甘共党首领王孝锡一名，……绝无悔改之心。”12月29日深夜，当王孝锡得知敌人要杀害他时，便向狱吏要来笔墨，给父母写下了《诀别诗》，连同在宁县母亲给的两块银元，一同交给了曾在冯玉祥部慰劳宣传团工作过的监狱看守。

12月30日清晨，古城兰州寒风凛冽，阴云低垂，寒凝大地。从市内三圣庙通往安定门外萧家坪刑场的路上，戒备森严。当一辆囚车在武装士兵的押解下，经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时，突然响起“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的呼喊声。行人不顾军警驱赶，纷纷驻足观看。只见刑车上一名青年奋力挣开4个刽子手的揪押，放声高呼。惊慌失措的刽子手举起马刀以背朝他身上乱砍，仍然制止不了他的喊声，便将一团毛巾硬塞进他的口中。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王孝锡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王孝锡给父母的《诀别诗》是这样写的：

纵有垂天翼，
难脱今夜险，
问苍天，

何不行方便？

驭飞云，

驾慧船，

搬我直到日月边，

取来烈火千万炬，

这黑暗世界，

化作尘烟。

出铁笼，

看满腔热血，

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

把家园骨肉齐抛闪，

自古英雄多患难，

岂独我今然。

望爹娘，

休把儿挂念，

养玉体，

度残年，

尚有一兄三弟，

足供欢颜，

儿去也，

莫牵连！

在吟诵这首《诀别诗》的时候，我们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革命者的形象。他怀念人间，怀念亲人，但又不畏惧死亡。诗中有对残年父母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也有慷慨赴死不怕牺牲的浩然正气。这首《诀别诗》至今读起来，仍然使我们能够触摸到一个早期共产党员的铁血诗魂。其实，王孝锡烈士短暂的一生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王孝锡烈士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操守以及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动鬼神的伟大诗篇。多少年来，一直激荡着我们的心与他的诗情一起澎湃。

第二章

刘志丹、谢子长出生入死搞兵运

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甘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地方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到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这里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招兵买马。这些都表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都是全中国失业的工人，大部分是失业的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受了军阀的雇佣，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受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要使这部分群众不要成为敌对阶级利用的工具，我们要做活动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同年3月6日，中共

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提到,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变”等。^①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上,通过了《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②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胞书》中,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③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④。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一、军阀土匪乱陇东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陕甘边地区同全国一样,处于军事局势变迁极为激烈,政治形势极为动荡的时代。到处都陷入了大小军阀互争军政大权、扩充力量、扩大地盘的混乱局面。

1928年12月底,国民党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后,继之而起的是蒋、冯、阎、桂各派军阀先后爆发的为争夺中央权力而进行的战争。甘肃地区在冯玉祥国民军开赴反蒋前线后,各地大小军阀乘机而起,盘踞平凉的陈珪璋,盘踞固原的黄得贵,盘踞陇西的鲁大昌,盘踞天水的孔繁锦等军阀之间为争夺权力,相互混战。甘肃地方军阀陇东镇守使张兆铨和天水镇守使孔繁锦联合黄得贵、刘富生、韩有禄、常连如、谢有胜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版,第133页。

② 同上,第326页。

③ 同上,第700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等陇东民团势力进攻兰州国民军势力,双方激战达数月之久。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甘肃全省宣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但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忙于内战而无暇西顾。由于经历了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地方政权由服从北洋政府到听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变迁,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过程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造成了新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由于陇东地区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界处,偏离中心城市和交通主干道,加之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就为陇东一带地方军阀土匪的滋生发展、扩充军备、横征暴敛和土豪劣绅残酷剥削农民创造了条件。张兆钾镇守陇东期间,以拥戴陆洪涛有功,坐镇平凉,控制陇东17县,任免官吏,截留税收,残酷盘剥,为所欲为,群众称其为“张狼”。据《甘肃近代史》载,张兆钾曾一次向陇东17县商会征借白银2.7万两,另向平凉商会征借白银3万两,向各地农民按地丁征借白银3万两,以购买新式枪械。同时开放烟禁,征收“烟亩罚款”,增征田赋,开征路捐,肆意坑害农民。同时,又向陇东各县派款60万元,在平凉设立陇东官银号,私铸铜元,滥发纸币,掠夺人民。为了收款出动大量军警,鞭打绳拴,横行乡里,百姓苦不堪言。张兆钾用勒索来的巨款不仅换来一顶“厚威将军”的头衔,而且在平凉大兴土木,修建私邸,挥霍享受。1926年8月,张兆钾败退后,国民党军姜宏谟部进驻西峰,从宁县太昌到肖金三不同一带,市镇村庄被抢劫一空。

据《庆阳地区志》记载,1927年至1935年间驻防庆阳的军阀部队主要有:1927年甘军黄得贵部驻庆阳县药王洞和元城镇(今属华池县),同年,冯玉祥国民军进驻陇东并驱逐了黄部;1931年地方军阀陈珪璋接受蒋介石改编,驻防平凉和庆阳,陈部十三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早胜镇,第五旅蒋云台部驻庆阳县西峰镇;1932年陕军石英秀旅驻防陇东,旅部先驻西峰,后移庆阳县城,部队分驻庆阳、合水和西华池;1933年,国民党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冶成章旅进驻环县木钵、曲子、洪德、环城一带;1934年10月,蒋介石嫡系六十一师三六一团驻防西峰镇。军阀统治庆阳期间,征兵派饷,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点从当时陇东军阀陈珪璋给蒋介石的呈文中可以看到:“自民国十五年冯军盘踞甘肃,谋窥中原,征兵派饷,民苦更甚,弱者死亡,强者为匪,因与乡人组织自卫团共谋自卫”。

军阀统治的嬗递,形成了当时政治无序、社会失范的危机局面。民团、帮会、土匪等各类地方军事武装相继而起,造成庆阳境内混乱的军

事政治格局。军阀统治的瞬息起落,给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各县地方地主豪绅以维持当地社会秩序为借口,支持组建的民团武装应运而生。到1931年前后,合水有民团20多股,正宁有民团10多股。一般的民团武装组织为20人至30人,大的民团武装有上百人。其武器装备或为大刀长矛,或为现代化的步枪。庆城县的民团武装于1927年成立,设区团、乡团,统辖乡村武装,有官佐20多人,士兵300多人,步枪280多支。庆阳境内的帮会武装主要是红枪会,他们从1925年由陕西传入陇东各县,以烧香敬神,结拜兄弟等形式秘密组织武装,练武防身,抗击土匪,使用大刀长矛,后因思想迷信,武器落后,大部分被官兵和土匪击溃。由于兵灾饥荒不断,庆阳境内土匪蜂起,股多名杂,危害极大,仅见诸史志记载的就有10多股。这些土匪武装规模不等,小股武装仅有数人,大的武装团伙有数千人众。有些土匪武装乘军阀相互混战的机会,发展为后来称霸一方的军阀豪强,20世纪30年代初控制平凉和庆阳的陈珪璋军阀武装就是由土匪武装发展而来。

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给地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散兵、土匪、帮会、民团等各类地方军事武装并起,他们相互倾轧,肆虐地方,使得社会秩序彻底失范。加之民国初期的陇东各县,自然灾害频繁,旱灾、水灾、冰雹、瘟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或死于饥荒,或外出逃荒。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地方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芜。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富农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中。有的地主有地数千亩,有的甚至达到数万亩,各类大型农具一应俱全,粮食囤积十分严重。庆城县的大部分耕地主要为所谓的“八大家”占有。据记载,庆阳县八大家之一的李子良,字号恒义兴,占有耕地多达7万多亩,拥有耕牛1000多头,从庆阳县到陕北定边都有其土地,每年收租子达到4000至5000石。土地的日益集中,造成绝大部分自耕农沦为佃农和雇农。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突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严重的自然灾害、残破的社会经济以及军阀混战的社会局面,使得陇东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一个公正有力的政权来维持社会正义,领导他们改善生活,进行生产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适应了当地民众求生存求稳定的需要,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内部腐败成风,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士兵的生活极其恶劣,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

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这些都为刘志丹、谢子长打入国民党部队,培植革命力量,开展兵运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挂名建军在敌营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2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受革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秋入团,1925年春转为共产党员。1926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同年秋毕业,随军东征。这年冬,刘志丹奉命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1928年5月,刘志丹领导了渭华起义。刘志丹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西北人民的红军领袖,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牺牲后被毛泽东称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在刘志丹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兵运工作无疑是他颇具传奇而又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化装潜入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陕北工作。刘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和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的曹力如一起,筹建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永宁支部,刘志丹任书记。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红石峡召开会议,决定刘志丹担任特委军委书记,



刘志丹

主持特委工作,谢子长为军委委员。会议提出了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主要利用地方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打入军阀部队内部,从事士兵运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学习军事,培训干部,伺机建立革命武装。不久,刘志丹回到家乡陕北保安,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利用社会关系激化了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与政界的矛盾,挤走路仰之,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并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9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西北国民党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谢子长和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立果(赵文蔚)、马云泽、阎红彦、雷恩钧等到宜川后九天山寨的杨庚武部开展工作,意欲将这支绿林武装改造为完全的革命队伍。

1930年1月,驻宁夏的国民党军苏雨生骑兵第十四师扩充势力,刘志丹、谢子长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刘志丹、谢子长不但在陕北、陕甘边人民中有崇高威望,而且在敌人营垒中也享有盛名。苏雨生以“小庙得大神”,偶得英雄的仰慕心情,款留刘志丹和谢子长。苏雨生为了扩大势力,把刘、谢所带人马编为一个旅,谢子长任该骑兵师第十旅旅长,率部驻防银川以北的李岗堡,后移驻盐池县。刘志丹奉命打入苏雨生部队后,任第九旅第十六团副团长。在谢子长、刘志丹领导下,在苏雨生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委,张东蛟任书记。中共陕北特委还派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贺晋年、郝怀仁等一批共产党员,随谢子长、刘志丹打入苏雨生部队。同时,由陕北地方党组织选送以中共党员为主的近300名学生兵,到第十旅组建学兵队,扩大革命力量,培训军事干部。打入苏雨生部队不久,谢子长、刘志丹在志丹所在第九旅的驻地附近,召开了曹又参、张东蛟、牛化东、高岗、刘约三等33人参加的党员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苏雨生与马鸿逵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决定苏、马一旦开战,受共产党控制的各部队即回转陕北和庆阳一带,以扩兵为名,发展壮大革命武装。

1930年2月,马鸿逵向苏雨生开战,苏雨生溃败,带领第七旅,退往陕西彬县。石英秀(又名子俊)带第八、第九旅,退至宁夏南部下马关一带。谢子长则脱离苏雨生部队,带第十旅部属数十人转移到陕北保安金汤镇,与刘志丹共谋前往庆阳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同时,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收拢逃避敌人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者,争取民团、哥老会和民间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的盛夏农历六月,谢子长派去宜川县后九天杨庚武部活动的阎红彦、雷恩钧,带领他们拉出的周维祺营(三营)抵达金汤镇附近。得知消息的谢子长,亲自迎接带领他们至金汤镇,与其部属及刘志丹任副官的张廷芝、张廷祥部会合。随后,谢子长、刘志丹带领这几支部队,一同开赴与陕西吴起交界处的甘肃庆阳三道川,欲在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会聚三道川后,谢子长出任谭世麟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

第三团团长，刘志丹任三团第一营营长。周维祺营改编为直属三团第二营，周维祺任营长。老土匪高双成属下骑兵团长张鸿儒的长子，曾在石英秀部下任过团长的张廷芝，担任由其部属改编的直属第二团团长。

聚义三道川，部队整编后，应谭世麟请求，刘志丹带杨树荣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庆阳城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帮助”谭世麟整训民团军。谢子长则率领新组建的部队在三道川加紧整训，准备发动起义，建立工农红军。

土匪出身的张廷芝，和其父张鸿儒一样，是个反复无常、心毒手狠的家伙。在金汤镇一看见周维祺人多枪好的三营，便起了吞并这支武装的坏心眼。于是父子狼狈为奸，对周维祺快马，美女，金钱三条绳索齐下，很快把神魂颠倒、晕头转向的周维祺，死死绑在了覆灭的战车上。

农历闰六月，周维祺不顾对张廷芝父子吞并周部的险恶阴谋有所察觉的谢子长等人的反对，执意带领部属和阎红彦等15名骑兵，随张廷芝前去宁夏下马关，帮其收罗旧部。结果，折返途经三边安边堡时，张氏父子以庆功洗尘为名，合谋上演“鸿门宴”，酒席间翻脸下了阎红彦及其所带骑兵的枪械，并予扣押。随后，张氏父子派百余骑兵直扑三道川，将周维祺营（70多人枪）全部缴械，突袭冲散猝不及防的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的第一营，并搜捕谢子长、刘志丹。谢子长因穿着朴素似百姓，未被敌兵认出而巧妙脱险，回到保安与从庆阳返回的刘志丹结伴前往绥德、米脂一带，寻找中共陕北特委。

“三道川事件”并未使刘志丹、谢子长气馁，反而愈挫愈奋。他们在总结“三道川事件”深刻教训时，认识到搞武装斗争，不直接掌握军队是不行的。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三道川事件”坚定了刘志丹、谢子长独立建军的决心。

三、太白镇起义成功

1929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陕北爆发了由中共陕北特委发动的轰轰烈烈的饥民斗争。这场斗争，很快也波及到了陇东华池南梁地区，赵连璧和杨培胜等人，在南梁、太白一带组织饥民“吃大户”，打富济贫，开仓分粮，并拉起了一支饥民武装。

1930年前后,刘志丹曾多次来到南梁一带,积极团结、改造这支饥民武装,并对南梁的地理、民情和政治、经济及其阶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在此之前,刘志丹就从渭华起义和陕甘地区多次兵变失败的教训中体会到,要发展革命斗争,必须走毛泽东、朱德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建立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了选择一块合适的地点,他走遍了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南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具备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是一块理想的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陕、甘两省四县边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这里的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手里,劳动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这里地广人稀,有粮有草,有利于屯军养马,养精蓄锐;这里有绵延几百里的大梢山,山大沟深,森林蔽日,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分析,刘志丹当时高兴地说:“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咱们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在大西北撑起一块明亮的天空。”

1930年9月,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仍请刘志丹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并指示合水县太白镇的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给以协助。刘志丹决定寻找机会收缴二十四营的武器,消灭这股反动势力,拉起自己的武装。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9月28日,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高头大马,身着陇东民团军军官的服装,率领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旗帜的29人的骑兵队伍,从白沙川出发,沿葫芦河前进,当天下午顺利开进太白镇。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位于合水县境内,是葫芦河与苗村河的交汇处。这座满目苍凉的小镇,其城池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屯军戍边时所筑。这个小镇的周围,子午岭青山环绕,山中涓涓清溪从城边流过,明代嘉靖年间陈霏曾题“碧落霞天”四个大字刻于不远的山岩之上,形容太白山水的雄壮和秀丽。太白镇东南,有一处烧酒作坊,掌柜的名叫李绪增,为人刚直仗义,刘志丹早就和此人相识。进入太白镇以后,刘志丹把队伍安顿在李绪增的烧酒作坊里。当晚,在第二十四营中当兵的赵连璧以喝酒为名,来到烧酒作坊向刘志丹报告敌营内部情况。

赵连璧也是保安县人,曾当长工多年,因逃避地主逼债,到太白镇

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当兵，后任班长。他和刘志丹很早就有交往。刘志丹听了赵连璧的报告，大体上掌握了太白民团军的布防情况：二十四营有三个连，第一连驻守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第二连驻守河东岸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守在离太白镇几十里外的林锦庙，兵力比较分散，便于各个击破。为了麻痹、迷惑敌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情况，刘志丹安排队伍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官兵开展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30日晚，刘志丹详细分析了两天来掌握的情报，认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他果断决定分头行动，智取强敌：由自己和杨树荣出面，以商筹粮草为由去找黄毓麟、王凤珠，伺机活捉他们，迫其令部队缴械，如果不成，就打死这两个反动军官；由卢仲祥负责带十余名战士与敌第一连官兵在李绪增烧酒坊“联欢”，伺机收枪，消灭敌人；由刘约三和魏佑民率领骑兵在河边监视驻河东岸黄家砭敌第二连的动向。

10月1日早晨，刘志丹、杨树荣按照作战计划，来到二十四营副营长王凤珠的住处“商借粮草”，王凤珠即刻派人请来黄毓麟商议此事。结果，两名反动军官当即被刘志丹、杨树荣双双击毙。这时，在李绪增烧酒作坊里，卢仲祥等已将二十四营第一连的官兵用酒灌得东倒西歪。卢仲祥听到枪声，把酒壶一丢，大喊一声：“缴枪不杀！”十余名战士把枪口一齐对准了敌人，除第一连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外，第一连的其余官兵乖乖当了俘虏。驻黄家砭的第二连，听到枪声，都冲出来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立即率领20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第二连，又缴获了一些马匹、枪支。中午时分，太白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黄毓麟、王凤珠及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的罪恶。广大群众听到平时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匪军已被消灭，欣喜万分。当刘志丹率队离开太白镇时，镇里的男女老幼欢天喜地齐来送行。当天夜晚，刘志丹率部奔袭林锦庙，途中又巧妙活捉了林锦庙的二十四营第三连连长马建有。二更时分，队伍包围了林锦庙之敌，迫令第三连交出了全部枪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被全部消灭。

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第一枪，毙伤敌营长黄毓麟以下10余人，歼敌数百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这次起义后，刘志丹很快组建起了一支40余人的南梁游击队，群众称他们是“刘志丹游击队”，也称“南梁游击队”。

四、倒水湾整编武装

太白起义成功以后，为了隐蔽起见，刘志丹把游击队员分成三部分：赵连璧带一部分在合水太白一带活动，同守孝带一部分在华池县南梁一带活动，刘志丹自带一部分在保安、安塞边界打游击。两个月内，刘志丹带领的游击队就扩充到 150 多人。他们先后消灭了黄毓麟民团残部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的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劣绅。由于声势渐大，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在保安县境内受到敌高双城部高雨亭营的“围剿”。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军事活动受挫。

1931 年 2 月，刘志丹率部向陇东转移，在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会合，这时，贾生财也从陇东民团拉出 40 多人前来参加，部队很快增加到 400 多人。之后，在固城麻峪村进行了整编，游击队共编成 4 个连，卢仲祥、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分任连长，刘志丹任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整编后，向南行至宁县盘克张皮原，被陈珪璋部谢绍安骑兵旅包围，由于敌我悬殊太大，恶战一场，损失严重。一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同守孝、赵连璧又折回南梁、太白一带。刘志丹带一部分骨干力量突围到宁县麻子掌。刘志丹军事活动再次受挫。



倒水湾整编旧址

为了保存力量,刘志丹派游击队支部书记杨树荣去陕西省委联系,省委指示再次与苏雨生合作,积蓄力量,待机起义。1930年冬季苏雨生在宁夏失败后,接受了杨虎城的改编,当上了旅长,驻防彬县。当刘志丹再次率部投入苏雨生部后,苏雨生把刘志丹的部队改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利用这个时机,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一面招收革命青年,积极扩大部队,准备起义。这时,地主豪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串通,密谋捕杀刘志丹。苏雨生与反动当局合谋,假以开会为名,诱骗刘志丹到彬县,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将刘志丹逮捕,关押于彬县监狱,并决定判处死刑。同时调动两个团围攻职田。部队与敌血战两昼夜,后经连排长会议决议,为营救刘志丹出狱,全军放下武器。部队被缴械后,编为徒手运输连,驻彬县东关村娘娘庙。刘志丹入狱后,恰遇陕西进步人士杜斌丞因公入甘,途经彬县。经由杜先生与南汉宸多方营救,刘志丹得以释放。第三次起兵又失败了。

刘志丹出狱后,在彬县巧遇同乡李勤甫。李勤甫系陇东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的副官处长,他为陈珪璋在天津购买驳壳枪行至彬县,便与刘志丹一起去平凉晤见陈珪璋。陈珪璋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敬佩,鉴于陈苏之间的尖锐矛盾,陈珪璋愿与刘志丹协力抗击苏雨生,并委任刘志丹为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防地划为宁县、正宁两地。这时,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通令陈珪璋执行。于是,消灭苏雨生部的作战计划便产生了:驻早胜镇陇东十三师直辖骑兵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正宁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刘志丹部为攻歼部队;陇东十三师刘宝堂旅为追歼部队。不料,高广仁与苏雨生、张廷芝早有勾结,高、苏、张三部计划退往宁夏称霸一方。在这一阴谋之下,1931年6月29日,高广仁突然行动,将刘志丹旅打垮,与此同时刘宝堂旅也被高军缴械,并将排长以上干部绑架,向北窜逃。高广仁军行至庆阳,被陈珪璋西峰镇驻军蒋云台旅打散,陈珪璋部两个旅因而得救。高广仁残军退往宁夏后完全失败。而这时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在这种形势下,刘志丹留张秀山、王世泰、张景儒、张尔凯、刘约三等人于陈珪璋部继续隐蔽,以待时机。他偕马锡五离队,进入南梁地区。刘志丹兵运工作又遭到第四次失败。

一次又一次挫折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在陕甘边开展

革命斗争,必须走独立自主发展革命武装的道路,陕甘武装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刘志丹在总结“兵运”工作教训时说:几年来,陕甘边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在吸取兵运工作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刘志丹决心创建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为了保存力量,刘志丹又通过只身从谭世麟部逃出来的马锡五,与苏雨生部联合,部队被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马锡五任军需,驻防陕西职田镇。在职田镇因打土豪,刘志丹被产生疑心的苏雨生下狱。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后,他按照陕西省委指示,又通过陈珪璋的警卫团团团长刘宝堂引荐,打入平凉陈珪璋部,任暂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他自带100多人驻早胜镇,其任务是协助投靠陈珪璋的河套土匪高广仁部(十三旅)阻击苏雨生。

1931年9月,刘志丹和马锡五一起来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游击队的驻地,并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前来会合。部队会合后共有400多人,整编为3个大队:赵连璧任第一大队长,刘景范任副大队长;杨培盛任第二大队长,白冠五任副大队长;贾生财任第三大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至此,被苏雨生、高广仁等反动军阀扼杀了的南梁游击队再次恢复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陇东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开启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序幕,史称倒水湾整编。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一个骑兵团,缴枪20多支,战马40多匹,旗开得胜,士气高涨。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之后,部队坚持在山多林密的南梁一带打游击,扩充兵源,不但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政治上也扩大了影响。刘志丹数年来奔走陕甘各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创建了这支独立的革命武装,为创建陕甘边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当地的贫苦农民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队伍到南梁。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
咱们的游击队势力壮。

五、林锦庙三军会师

1931年10月下旬，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和杨琪、师储杰的商贩队，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千里艰苦转战，终于来到南梁林锦庙（今华池县林镇），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战友相逢，分外喜悦，阎红彦把自己一把心爱的手枪送给刘志丹，以表情谊。陕、甘、晋的三支革命武装力量在南梁山区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揭开了桥山中段革命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序幕。

晋西游击队，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利用蒋、冯、阎军阀混战之后，山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加剧的时机，在反动统治薄弱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吕梁山区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中共山西省委先后派出曹鸿弼、拓克芳、黄子文等共产党员，与中共陕北特委派来的杨仲远、吴岱峰、胡庭俊、阎红彦、白锡龄等同志一起，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于1931年4月在山西的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大麦郊楼底村辛庄，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又称晋西游击队。由拓克芳、阎红彦先后任大队长，杨仲远、吴岱峰、胡庭俊、白锡龄先后任副大队长，黄子文、杨仲远先后任政委，在吕梁山区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在此前后，晋陕之间的烟商武装（即商贩队）也竞相称雄。仅陕北清涧、安定等县往返陕北、晋西，武装保护贩运鸦片的商贩队伍，就有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七股，共约1000余人。在这些烟商武装中，有些人是与陕北的共产党员阎红彦、杨仲远、强龙光、强世清、白锡龄、白雪山、李宗白、马云泽等有着亲戚或朋友关系，经常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刘志丹、谢子长还先后派遣雷恩钧、杨竹箴等共产党员到这些商贩队伍中进行了一系列争取改造工作，使他们同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的也打起红旗，先后进入吕梁山区，配合晋西游击队作战，给了山西反动统治者沉重的打击。

晋西游击队和商贩武装的崛起,使革命武装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山西的反动统治者极为惊恐。1931年秋,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了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共万余兵力,采取山山设卡、步步为营、四面包围、节节逼近的战术,向晋西游击队和商贩武装发动了大举“围剿”。晋西游击队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只留下骨干30多人。这时,中共山西省委又遭敌破坏,使游击队失去了依靠,粉碎敌人“围剿”已无可能。1931年9月13日,晋西游击队在辛关附近的五龙店西渡黄河,转战陕北。

在晋西游击队渡河入陕前后,曾经进入吕梁山区活动的师储杰、肖永胜、杨琪、杨鼎等烟商武装在反动派的重兵“围剿”逼迫下,由在这些队伍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引导,也先后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在安定县北部的岭峪岔,肖永胜、师储杰部与晋西游击队会合,随后通过共产党员、谢子长的大哥谢德惠和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特委即派遣强龙光、马云泽等一批共产党员,充实加强了晋西游击队的领导和战斗力,并将晋西游击队和师储杰、肖永胜的烟商武装整编为一个游击支队,由师储杰任支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为了维护军纪,支队还成立了执法队,由雷恩钧任队长。这个支队整编成立的第二天,就在玉家湾附近的贺建祠,消灭了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钟宝卿团的一个骑兵排,缴获了敌人30多支枪和30多匹马,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瓦窑堡战斗后,部队在永坪镇稍事休整,就抵达延长、延川交界处的雁门关,又和杨琪、杨鼎的商贩队伍相遇。此后在与陕北军阀部队高双城部的激战中,共产党员杨竹箴和英勇善战的神枪手肖永胜不幸牺牲,全军为之失声痛哭。杨鼎遂继任一大队长,杨琪担任副大队长;三大队长呼成章叛变,由雷恩钧继任。接着,游击队抵达宁条梁的红土沟,又与张廷芝部遭遇。在击溃敌人以后,游击队便向陕甘边界的子午岭方向移动,寻找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至此,这支部队转战陕北,经历大小15次战斗,发展到了500多人。刘志丹得知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前来南梁的消息后,一边派刘景范前去联络,迎接他们到南梁会合;一边又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会师部队的准备。随后,刘志丹率全军冒雨进抵南梁集结并主动出击,牵制敌人,使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顺利到达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

林锦庙会师后,三支部队共达1000余人,声威大震。他们举行了隆

重的联欢大会,当地群众为游击队表演了小演唱。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和刘志丹一起领导会师部队,并进行了整编。晋西游击队、商贩队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但是,在关于会师部队的活动区域、革命斗争的策略等问题上,他们与陕西省委的主张有一定分歧。刘志丹认为,在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南梁会师部队的主要任务仍是积蓄力量,部队应在南梁一带活动,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使游击战争有所依托,方能持久进行。同时应利用陕甘军阀混战的矛盾,因势利导,使会师部队站稳脚跟,并争取一段时间进行休整,积蓄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的正确主张得到了谢子长等多数同志的支持,并报告了陕西省委。

六、借水养鱼腾蛟龙

为了摆脱游击队给养没有来源的困境,并为组建陕甘红军创造条件,谢子长、刘志丹立即率领部队经华池二将川、城壕川,移驻庆阳县新堡地区进行休整。谢子长率一支队驻扎悦乐川新堡一带,刘志丹率二支队驻扎城壕川张家沟门、王洼子一带,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他们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并积极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冬衣、供给等困难。这时,处在驻镇原的毕梅轩部、固原的杨万靖部、静宁的张应坤部、陕北三边的张廷芝父子兵以及杨虎城、苏雨生的军阀部队四面包围之中的陇东军阀陈珪璋,在平凉为谋其生存和扩大地盘,正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拉势力,遂派人商谈收编南梁会师部队。经过认真讨论研究,队委会成员一致同意谢子长和刘志丹提出的借军阀陈珪璋扩充实力之机“借水养鱼”的建议,决定在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暂时接受陈珪璋收编,济急军需,生息力量。谢子长和刘志丹从麻痹敌人、利用矛盾、争取时机、休整部队的策略出发,即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在保持南梁会师部队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同陈珪璋进行了谈判,达成如下协议:(1)南梁会师部队的番号定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暂住庆阳新堡一带;(2)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杨仲远任参谋主任,马锡五任军需主任;(3)拨给过冬军衣鞋冒1000余套,军饷3000余元;(4)拨给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5)拨给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6)派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前往新堡验会

师部队。

挂名建军搞兵运，借水养鱼腾蛟龙。这次整编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的。只把会师部队原来的支队、大队、中队建制，改成了团、营、连的编制。在团的中共支部之下，营设有教导员，连设有指导员，部队仍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着坚强的政治工作体系。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马锡五等组成的旅部，形成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其下辖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党支部书记马云泽；第二团团长由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刘约三。第一团所辖第一营营长阎红彦，教导员阎润平；第二营营长杨鼎，教导员胡庭俊；第三营营长雷恩钧，教导员程玉清；第四营营长白锡龄，教导员党永亮。第二团所辖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教导员白冠武；第二营营长杨培胜，教导员杨冀叔；第三营营长唐青山；第四营营长贾生财，教导员邵德章。每营辖四个连。刘宝堂草草例行了一下典验程序，即宣告整编结束，部队遂投入了紧张的训练。由于陈珪璋送来了40余大车军需物资，缺乏军装、军费等困难迎刃而解，士气更加旺盛。

新堡整编结束后，谢子长和刘志丹为了加强会师部队的内部团结，灵活运用党的联合一切反蒋力量的统战政策，借庆祝整编大会餐的机会，举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换帖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刘约三、雷恩钧、白锡龄、程玉清、师储杰、杨琪、杨培胜等18人。刘志丹亲笔写的“金兰谱”说：“我弟兄志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盟叛离等情，天诛地灭。”这个“金兰谱”言简意明，既包含个人感情，又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斗争方向。这次拜把子香堂大会对增强会师部队的团结是十分有利的，对团结改造率部投向革命的商队、民团和饥民武装首领人物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18人中间，除个别人外，多数人实践了“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的誓言，有的为党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英勇捐躯，有的数十年为革命艰苦奋斗屡建功勋。

南梁会师部队经过在新堡地区的一个多月的休整，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此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部队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抗租，还打了几家土豪，给穷人分了粮食、浮财，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这样，就完全保持了这支革命武装的独立自主和革命性质，使陈珪璋企图将南梁

会师部队变成军阀统治工具的阴谋未能实现。于是,在刘宝堂返回平凉后不久,陈珪璋即调集一个营的兵力,向新堡周围集结,妄图“围剿”瓦解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对陈珪璋的反革命阴谋早有警惕。他们当机立断,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乘敌没有完成包围部署之际,率部从新堡出发,在庆阳柳村原歼敌两个连,彻底粉碎了陈珪璋先是“收编”继而“围剿”的阴谋。之后,谢子长、刘志丹率领一团的一、二、四营,沿子午岭西侧迅速转移到正宁县柴桥子村,与先期南下部队会合。会合后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形势和陕西省委的决定,于1932年初将南梁会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第三章

陕甘游击队浴血战陕甘

1931年12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在正宁县月明原北柴桥子村，中共陕西省委派代表宣布把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接着，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锦章村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在三嘉原上打起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它标志着陇东的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的隐蔽状态转向了公开化。

一、三嘉原上打红旗

在庆阳新堡休整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派省军委委员荣子卿和游击队派去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阎红彦等人来到部队，传达了省委指示，要求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并指示部队学习毛泽东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和有关游击战争问题的文件。白天，谢子长、刘志丹同游击队员一块在雪地里滚爬摸打，进行操练；晚上，他们在昏暗的麻油灯下，一块儿辨认着刻印在本贡纸上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2年初，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正式成立陕甘边人民武装的指示精神，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杨仲远担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习惯仍简称队委会），谢子长任党委书记，刘志丹、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雷恩钧、白锡林、胡廷俊等十几人为委员。同盟军指战员共700余人，编为两个支队，一个直属警卫大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师储杰，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杨鼎，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第三大队大队

长雷恩钧。第二支队司令员刘志丹兼任，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胜，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即转移到湫头、三嘉，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进行整训。队委会遵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组织指战员着重学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展加强革命纪律性教育，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组织整顿。谢子长一贯非常重视革命队伍的军纪教育，不断以严重破坏革命军纪的具体典型事例，对指战员们进行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老百姓、坚定革命信念的教育。谢子长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穷人的队伍，我们闹革命，就要讲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根针、一根线。”刘志丹也严肃指出：“我们来自老百姓，再去伤害老百姓，那这个队伍就会不战自垮的！”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反帝同盟军纯洁了队伍，严肃了军纪，坚定了信心，增强了斗志，提高了作战能力，密切了军民关系，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奠定了良好基础。

整训其间，平凉军阀陇东第十三师警备司令陈珪璋，为了对抗兰州军阀孙蔚如，指派属下刘宝堂团的史方成团副，前往正宁三嘉原游说，妄图收编吞并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陈珪璋还委托史方成代表他，向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旧址

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雷恩钧、白锡林等同盟军总指挥部五名成员，各赠送了一枚在平凉已经刻好名字，上面还装有小指南针的骨质私人印章。陈珪璋的伎俩，非但没能实现他的图谋，反而使谢子长等同盟军领导成员更加清楚地看到，陇东军阀与兰州军阀间的混战对抗，正是发展革命武装的有利时机，更加坚定了拒绝收编，彻底摆脱军阀纠缠，立即打出红旗，组建正规红军的决心。

1932年春节前夕，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斗争需要，再次指示同盟军党委应尽快打出红旗，迅速建立红军游击队。意见分歧的常委会和指挥部领导成员，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执行省委指示，立即打出红旗，农历正月初六举行改编誓师大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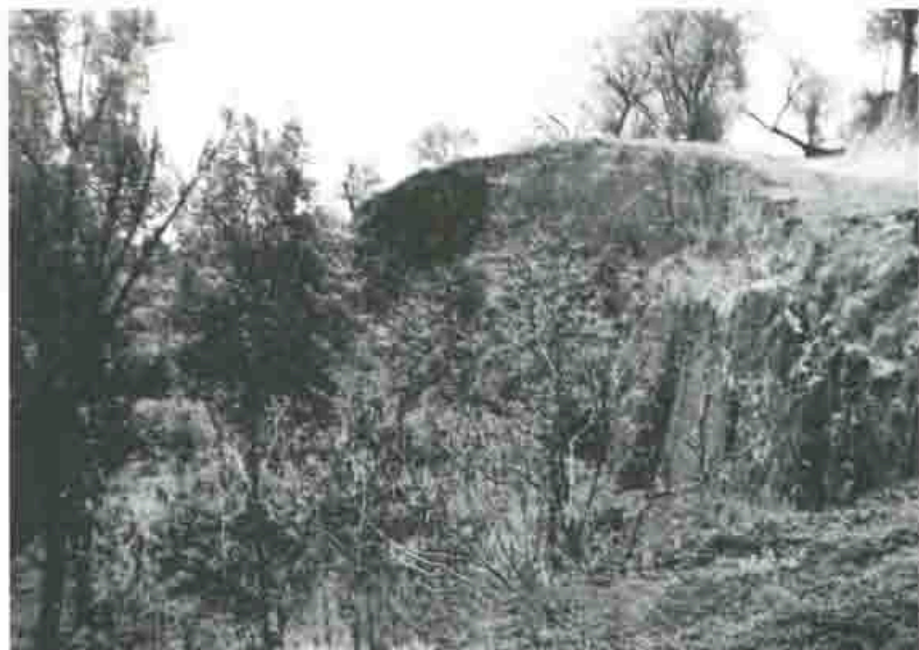
2月11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细嘴子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锦章村的一个打麦场上隆重举行。在一棵大柳树下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上端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的红布会标，两旁，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迎着高原的寒风飘扬。吃过早饭，附近的群众像赶集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新整编的4个大队400多名游击队员，脖子上都系着红色“牺牲带”，进行了庄严的宣誓。

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决定，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后叛变），杨仲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和骑兵队、警卫队，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分别任队长。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李杰夫任书记。各队成立了党支部，还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形成了党的核心力量 and 比较严密的组织。接着，旬邑县委负责人第五伯昌代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了总指挥谢子长。这面大旗的中间是一个黄色五角星，五星正中是镰刀斧头，旗的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与旗杆平行的一行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谢子长举起红旗的时候，全场群情振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正宁、旬邑的老百姓成群结队，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自此，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人们向往已久的西北红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诞生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新时期。游击队一成立，就按照毛泽东

在井冈山创立的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谢子长等还专门给指战员讲解“十六字方针”,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短期训练后,部队军政素质显著提高,指战员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陕甘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使正宁县三嘉原和紧挨着的陕西旬邑县职田原上的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穷人自己的队伍,他们喜笑颜开,十分高兴。当天大会后,职田镇附近墙下村的几十个农民就找谢子长,控诉他们村一个姓董的土豪的罪行,请求红军替他们申冤报仇。谢子长根据群众要求,召集队委会研究,决定当晚攻占职田镇。

职田镇距离三嘉原 40 多华里,是方圆比较大的一个集镇。驻有敌人的区公所和数十人的民团。2 月 13 日,攻占职田镇的决定做出后,谢子长当即命令骑兵大队出发包围职田镇,封锁各路口。当晚,大部队进占职田镇,至拂晓,敌职田镇区长、团总全部就擒,还逮捕了唐碧武等 8



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

个恶霸地主。第二天职田镇逢集，游击队当场烧毁了区公所的文书、账本及逮捕的豪绅的账债契约，并开仓分粮。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红军占领职田镇的消息，使西北军阀极为震惊，他们立即调动驻旬邑县境内的警卫团和附近民团共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一举歼灭我陕甘游击队。2月15日，敌人在樊营长的督促下刚到阳坡头，就遭到谢子长率领的游击队的伏击，一举歼灭围剿之敌300多人，缴获枪支300多支，还有弹药及许多物资。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后，经过短期整训，接连取得旬邑县职田镇、阳坡头战斗胜利，歼敌300余人后，即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下陕西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转战月余，歼灭旬邑、彬县、长武、宜君、耀县等地民团武装共约1000余人，力量不断发展，影响迅速扩大。

二、首次建政寺村原

1932年3月18日，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回师正宁县北柴桥子。当时，正值湫头农民赵锁手持三节鞭赶跑正宁县政府前来催款的“马师爷”，县政府扬言要血洗南原。为了预防官府镇压，群众已经自发组织起200多人的民团商讨对敌之计。游击队闻讯后，决定立即就地发动群众，围攻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夜，三嘉原、寺村原群众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同时，游击队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的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夹击未成，第一次围攻正宁山河城遂告失败。

围攻山河城失利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圪哒，队委会召开会议重新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决定：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南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将群众自行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配合红军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以寺村原为中心，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会后，陕甘游击队移驻正宁寺村原。

寺村原又叫永河原或南原，是正宁南部一条比较大的原，由湫头原、五顷原等小原组成。南接旬邑，东靠子午岭大梢山。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分驻寺村原的新庄子、西城、碾庄子等村。陕甘游

击队移驻寺村原后,立即将群众自行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于3月24日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谢子长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土豪、恶霸,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几天后,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全面展开。

他们以游击大队为单位分区域活动,包干负责,分兵发动群众。游击队深入到各村后,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号召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税斗争,打土豪、斗地主,分土地。很快,这里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碾庄子、双佛堂、苟仁、张村、巩家斜、苜宿岭、车家沟等村群众也发动起来了。

1932年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原,西至永和原,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以内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原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那天,谢子长亲自主持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是在新庄子村的岳王庙场里召开的,周围村子的五六百名群众参加了大会。主要议程有5项:宣布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



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旧址

决议和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建立赤卫队；号召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会上经选举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成立地点在寺村原，群众习惯上称其为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15人组成，农民委员10人，游击队委员5人；其中常务委员7人，正副主席3人。李杰夫任主席，张进元（车家沟村贫农）、唐贵荣（西城村中农）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4个委员会。寺村原革命委员会驻在新庄子村西洼。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没收所有地主富农的粮食，一部分分给贫农、雇农、中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1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1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正副队长各1人，参谋1人。并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均属革命委员会领导。

长工出身的车家沟贫苦农民张进元，家里很穷，弟兄5个，父子6人，常年给人拉长工，一家光棍。张进元排行老大，这年27岁，他胆子大，大小场合都不怯火。虽然不识字，但是记性好，口才也好，声音洪亮，能说会道。游击队来后，他就参加了赤卫队，积极参加活动，大家就选他当了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张进元当选后，上台讲了话。这位新当选的副主席，用土话讲了他对革命的认识，他说：“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财狗日的命，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红军共产党打的是地主老财狗日的，爱的是咱穷苦老百姓，是穷人百姓的救命恩人！有了红军共产党，我这个穷光蛋今天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席。我们穷人要翻身，就要起来闹革命！”最后，他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他的讲话，虽然简短几句，可是热情洋溢，精神振奋，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寺村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诞生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开辟了西北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建立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先河，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分配土地。谢子长住在新庄子村，他亲自领导群众没收了西城村大地主刘西昆和于家庄的大豪绅赵元亨的土地、粮食、牛羊等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长期受压迫的穷苦农民，打倒了骑在头上的恶霸地主，分到了

粮食、牛羊，欢天喜地用当地的地方小调唱道：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原。

谢浩如、刘志丹，
领导穷人把身翻。

东靠黄河西靠山，
锦章、细咀子扎营盘。

枪声一响震四方，
好像猛虎追恶狼。

打土豪，分田产，
打开仓，把粮散。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都是红军来的好，
世道翻了个底朝天。

4月13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群众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城。他们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将陈珪璋部增援的一个骑兵营击溃。但由于缺乏攻城经验，山河城仍然没有攻克。战后，游击队和赤卫军撤回寺村原休整。4月20日，游击队接到旬邑地下党组织报告说，敌旬邑县城防守不严。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转而奔袭旬邑县城，大获全胜，一共歼灭守敌300余人。攻占旬邑县城是陕甘游击队建队以来打开的第一座县城，影响很大。这时红军声威大振，很快发展到近千人。

三、平原喋血重整军

正当谢子长领导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创建根据地的时候，1932年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认为，第一次攻打山河城失利是“逃跑主义”，并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职务，派

其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命令游击队到旬邑县马家堡集结,他把陕甘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即行消失。随后,三支队进入陕西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游击;五支队进入渭北地区活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也因为游击队南下失去依靠而夭折。

5月10日,国民党部队分路“围剿”陕甘游击队。为了统一指挥,便于反“围剿”斗争,中共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原,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队委会也相继恢复,刘志丹任书记。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陕甘游击队半月内转战于陕西富县、洛川、中部和宜君等地,历经9次战斗,8胜1负,共歼敌14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就在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剿”,损失严重。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刘志丹遂率部越过子午岭重返陇东。

6月下旬,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多人。由于韩城战斗失利,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之间在行动方向上也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陕北的分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陕甘游击队在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会上讨论是南下三原,还是依托桥山山脉打游击,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南北分家,各自行动。正在这时,阎红彦带领百余人到距麻子掌不远的梁掌堡。两人见面后交换看法,阎红彦同意刘志丹的意见,主张不能南下,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部队领导人在梁掌堡召开了会议。由于阎红彦在会前分别做了工作,会议决定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而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会上推选阎红彦为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高山堡、刘志丹、强龙光分任大队长,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梁掌会议重新整军,避免了游击队的分裂,使游击队行动的决策符合当时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情况,对这支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后来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

四、西华池再次起义

西华池位于庆阳县城通往宁县乃至陕西的要道上,因古时城南有一

池塘生长荷花而得名。古时“花”与“华”二字相通，故称“华池”。因合水县境东部亦有一华池，故加“西”字以示区别。西华池是合水县的一个重镇。1932年春，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一旅进入陇东，旅部驻庆阳城，编制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分驻庆阳、合水、西华池一带。特务营一、二连驻合水县政府所在地西华池，由副营长潘立廷指挥。从192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这支军队中的兵运工作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秘密在这个部队工作。地下党员主要有李树林、高鹏飞、胡立亭、冯世光、曹化民、吴启昌等。高鹏飞当时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

1930年春，西北早期共产党员杨林、贺晋年、张秀山等人和谢子长到国民党杂牌军队王子元旅做兵运工作。不久，谢子长离开这个军队，回陕甘边地区和刘志丹一起，领导和创建红军与根据地的工作。杨林、贺晋年、张秀山等人一直留在这支部队里搞兵运工作。1932年初，王子元旅驻在甘肃靖远县。党派谢子长重新回到这支部队领导兵暴。谢子长到这个部队后，很快组织和领导了一次兵暴，这就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靖远兵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失败了。这时，杨林和高昆山、郝维新等经海原、固原等地来到平凉，找王世泰。当时，王世泰在杨虎城部下杨子恒旅以当兵为掩护，做兵运工作。在这里，杨林等人又遇见了高照璧等几个革命青年，他们几个人决定到兰州参加孙蔚如部的教导团，开展兵运工作。

杨林一行数人，离开平凉步行向兰州进发，到隆德县城，正巧碰上从兰州返回西安途中的谢子长。杨林、苏杰儒、高照璧等人把去兰州开展工作的想法向谢子长讲明后，谢子长沉思片刻，然后直截了当地说，靖远、河口兵暴以后，兰州形势紧迫，暂不宜去。谢子长动员他们到陇东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一旅开展兵运活动，并给该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李树林、高鹏飞写了亲笔信。杨林、苏杰儒、高照璧等人直奔庆阳。

到庆阳后，杨林等找了一家客店住下，当即到十一旅旅部去找该旅参谋主任王子庄。当时，王子庄还不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同情者，思想比较进步，与杨林早有交情，关系较深。找到王子庄，杨林说明来意，希望他给予照顾。王子庄对杨林等4人热情接待，使杨林等了解到十一旅很多情况。回到旅店后，杨林等研究后决定分两路行动。苏杰儒和高照璧两人，带上谢子长给高鹏飞的信，到十一旅特务营驻地西华池镇去联系。杨林和郝维新，带上谢子长给李树林的信，到十一旅第一团驻地合水县城去联

系。当时还商定,杨林和郝维新到第一团后,如果那里条件成熟,就立即通知西华池,可以举行起义。如果不行,就立即回西华池,另做打算。杨林和郝维新到合水老城后,把谢子长写的信交给李树林。李树林看信后说:“不久前,十一旅旅长石英秀对部队进行了一次严格整肃,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被清洗,换上了他的亲信人员,这些人思想落后,政治反动。”李树林介绍情况后,杨林和郝维新经过仔细分析,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随后,很快返回西华池,马上见到了共产党员高鹏飞。当时,高鹏飞是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的连长,又是共产党在特务营的党支部书记。杨林把靖远兵暴,谢子长的意见以及合水老城那边的情况向高鹏飞讲了一遍,高鹏飞也详细介绍了特务营和一连的情况及他所了解的红军的消息,表示同意举行起义。遂派共产党员宋廷璧到宁县盘克原找陕甘游击队联系。经刘志丹、阎红彦同意后,决定于7月9日举事。

西华池举行起义正是当地群众搭镰割麦的时候。这天,万里晴空,红日炎炎,刚吃过早饭,正要开始部署行动时,忽然潘副营长派人邀请高鹏飞去打麻将,高鹏飞沉思片刻对来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来人走后,高鹏飞急切地问杨林怎么办,杨林说:“你去吧,一切照计划办,由我负责。在打麻将时,你的勤务兵朱万才带枪进入营部,你就动手。若不带枪,千万不要行动。”

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曹胜勇准备武器弹药和行动部署,杨林和苏杰儒等负责写标语口号,司务长到街上订购了几百斤大饼,买了许多手电筒、电池、红绿纸张、笔墨颜料等物。随后,杨林和曹胜勇、苏杰儒再次研究,利用下午二连出操的机会收缴武器等细节问题。

下午饭后,照例到操场出操,第一连有意推迟半小时,利用这个机会,曹胜勇、苏杰儒把全连集合在一个大房里,向士兵做了宣传动员,讲解了举行起义后参加红军的意义,宣布了行动计划。他们的讲话得到全连士兵的拥护。接着,曹胜勇和司务长在前,苏杰儒、高照璧在后,率领全连,冲出营房,突入操场。这时,二连已操演完毕,把枪支架在操场一边,大刀放在地上,正在投弹打拳,一连上去迅速收缴了二连的武器,并命令二连全体官兵,集合待命,不许走动。杨林和郝维新率领勤务兵朱万才、号兵康健民以及连部其他士兵共10余人飞奔营部,朱万才首先持枪闯入,高鹏飞知道起义成功,忽的站起来,推倒麻将桌,掏出手枪,对准潘营副高声喊道:“不许动。”潘营副以及和他一起打麻将的营部副

官、军需等人，吓得不知所措，束手就擒。杨林和其他起义士兵，猛扑上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进入房内，把营部所有枪支弹药收了。这时，杨林建议高鹏飞立即集合队伍讲话，以安定人心，巩固起义成果。他在讲话中郑重宣布：“特务营第一、二连全体官兵，武装起义胜利了。”接着他历数了国民党反共罪行，揭露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人民以及反动军阀压迫士兵、克扣军饷，不顾士兵死活的黑暗统治，宣传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投奔红军闹革命的意义。他最后说：“我们从现在起，是革命的军队，要纪律严明，不准扰害老百姓。”并宣布了几条军纪。高鹏飞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讲话，得到全体官兵一致拥护，大家热烈鼓掌，尽情欢呼，原来一些不明情况的士兵，顿时打消了疑虑，个个拍手称快，表现了官兵们向往革命、弃暗投明的强烈愿望。起义部队作了临时编队，共约 170 多人，天黑后开往宁县盘克原。次日上午，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前来接应的强光龙、杨森带领的骑兵在盘克武洛相遇，晚间和陕甘游击队正式会合，开往正宁县的湫头、南邑一带休整。西华池起义部队被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阎润平任政委。12 日，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原召开军民大会，祝贺西华池起义成功。

西华池起义是陕甘军运史上成功的一例，它削弱了西北军阀在陇东的势力，发展了人民革命武装，扩大了游击队的政治影响。西华池起义的成功，也促使大批农民踊跃参军，陕甘游击队很快发展到步兵、骑兵共 500 多人，休整后再图发展。

五、“左”倾丧失根据地

1932 年 7 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亦名愚痴）来到陕甘游击队，传达省委“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改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和二十六军”的指示。李艮在游击队期间，不顾敌人的军事威胁，放弃游击队的根本任务，在正宁县南邑连续召开了六七天干部会议，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空谈创建北方新苏区问题，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限令 20 天内将五顷原土地分配完毕；在队委会外又成立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以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

就在李艮整天泡在会议之中批判“机会主义领导”的时候，敌人从

容地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在敌发起进攻以后,李良又命令游击队硬攻和死守。8月13日,硬攻王郎坡失利,部队损失50多人。18日经三嘉原撤到五顷原,又迎敌死守,结果再伤亡30多人。部队当晚退至三嘉原。19日晨敌又包抄上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巧早晨太阳出来后山岭沟壑上大雾腾起,借此掩护,部队奋力突围,在宜君县马栏聚齐时只剩下200多人。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部队损失过半,队委会解散,根据地丧失。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李良回省委汇报。陕西省委对李良本人作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12日在照金歼敌获胜后,向西北转移,在淳化县安子洼、正宁县刘家店两次与敌遭遇,战斗失利。为了解决部队给养,9月25日奔袭保安县城,再次失利。不得已又退至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又遭敌高双成重兵袭击,部队再次受挫。面对敌人追击和部队粮食、服装、经费无着的困难,谢子长鼓励指战员们:“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勇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同时,与刘志丹一起召开队委会议,商量决定带领游击队进入子午岭的梢山地带,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筹集军需、壮大力量。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的拓儿原一带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耀县、宜君一带游击,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黄子文、杨森带部分人,回三原武字区活动。谢子长带吴岱峰、高鹏飞等30多名老战士、伤病员,留在豹子川、平定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指挥各路红军游击队,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护理调养伤病员。

时值秋冬之际,天气渐寒,伤病员大增,部队衣食无着,士气低落。陕甘游击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缺吃少穿、无医无药、居无定所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谢子长一面积极做思想工作,坚定乐观地对同志们说:“现在树叶落了,明年春天又会长出来。现在我们遇到了挫折,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熬过冬天,春天就会到来!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同时又和同志们一起,站岗放哨,烧火做饭,抬运伤病员,给伤员洗伤口、敷草药或用烟锅油、南瓜瓢给伤员治疗枪伤,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采草药、摘野果、挖野菜,

筹集被褥、棉衣等御寒物品。筹集到的少量被褥、棉衣，谢子长总是让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边铺一条毛口袋，穿着破棉袄过夜。谢子长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和爱兵如子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指战员们，大家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

经过近两个月的分头活动，红军陕甘游击队渡过了难关，转危为安，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谢子长等亲自护理下，高鹏飞、强龙光等大部分伤病员病情好转。阎红彦、杨仲远率领骑兵大队，从耀县返回平定川，带回了许多打土豪所得的现洋、衣物、药品，解了游击队燃眉之急。随后，谢子长又带领骑兵大队，到安塞真武洞东、西营一带打土豪，缴获30多匹骡马，筹集了大批经费，还扩充了80多名骑兵。解决红军游击队自身给养困难的同时，谢子长还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携带一大批现款，送给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央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2年12月初，红军陕甘游击队各路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在合水县拓儿原会合。近两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渡难关，使指战员们历经艰苦磨炼，精神更加焕发，士气更为高涨，红军游击队元气恢复。陕甘游击队在艰难的征程中，又一次军威重振，他们再出桥山，南下渭北，将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

六、民族英雄谢子长



谢子长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李家寺枣树坪村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时年38岁。

学生时代，谢子长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思想影响，未及中学毕业，即于1919年末回到家乡安定县任教办学。然而，两年的办学历程，使他深切感悟到，仅靠笔杆子和温和的斗争方式，解救不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要改

革黑暗腐朽社会,救国为民,只有拿起枪杆子,组建革命队伍,以武装打垮旧世界。于是1922年春天,他辞去教务,投笔从戎,胸怀“救国为民,以武装打垮旧世界”夙愿,前往山西太原,投考了阎锡山办的山西陆军学兵团。

1923年,谢子长以阎锡山折服的优异成绩从太原陆军学兵团毕业,赴河南进行社会考察后,曾奔赴京津地区参加反帝斗争、探寻革命真理。后于1924年春天返回家乡安定,联络吸纳一批进步青年,于同年8月创办由他任团总的安定县民团。同时,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由此踏上创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征程。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积极投身于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1927年至1928年上半年,谢子长、唐澍等人,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及相关指示,于1927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十五)在陕北清涧发动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清涧起义失败后,唐澍、谢子长、白乐亭、阎揆要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翌年农历腊月初九率部在陕西韩城西庄镇举行二次起义,组建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总指挥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北上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沿井冈山道路开辟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在强大敌人前堵后追下,战斗屡屡受挫,给养极端困难,转战到南梁豹子川时,所剩指战员仅有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雷恩钧、郝怀仁等29人。面对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为保存革命火种,唐澍、谢子长果断决定就地遣散部队,要求指战员们各自分散隐蔽到群众中去,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至此,历时三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暂告失败。忍痛分离时,谢子长对指战员们说:“革命没有一帆风顺的,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相信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此后,谢子长便在西北地区从事兵运工作和农民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10月下旬,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晋西游击队和杨琪、师储杰的商队,千里艰苦转战,终于来到南梁林锦庙(今华池县林镇),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同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把会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

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

谢子长和刘志丹从渭华起义就在一起了。从此，他们在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艰苦曲折的斗争中，虽然有时分开，大部分时间都共同领导着陕甘边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为革命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他们都在革命战争中捐躯，为党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32年，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他与刘志丹一起，按照古田会议和中央红军的一些政治制度，建设这支游击队，使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陕甘游击队活动于旬邑、耀县、宜君、正宁、宁县一带，打了不少胜仗。他们乘陕军与甘军混战陇东之机，率领陕甘游击队进入正宁县山河镇寺村原，建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给这支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带来了灾难。他不仅排挤打击谢子长，而且竟污蔑谢子长和刘志丹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撤掉了谢子长和刘志丹的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谢子长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一再要求将刘志丹留在红军队伍中工作。杜衡宣布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后，自己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他虽然同意刘志丹留在红军，但却将他降职使用。谢子长和一批老同志则被迫离开亲手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即刚刚改编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到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河北，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并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遭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双重围攻失败后，谢子长秘密回到北平，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取得联系。11月，谢子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西北的军事领导工作。

1934年1月22日，农历腊月初八，谢子长由北平经太原西渡黄河，秘密回到家乡安定县。

谢子长和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后，在中共安定县委协助下，经过

艰苦努力,很快于1934年3月8日,恢复重建了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陕北的武装革命斗争又出现了新局面。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岭宣告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共600余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为组建红二十七军奠定了基础。7月17日,谢子长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的策应下,一举攻克安定县城,救出被敌人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

陕甘边、陕北红军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调集重兵“围剿”。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粉碎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领红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根据地,于1934年7月25日,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议着重分析研究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形势,商讨了反“围剿”大计,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议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跟随谢子长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井岳秀部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会议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为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一首陕北“信天游”,赞颂谢子长和刘志丹的战友情谊: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
“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
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
欢迎歇^①几天。

1934年8月15日,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回师安定。之后,接连取得安定武家塌、绥德张

① 歇,陕东方言,即休息的意思。

家屹台、清涧河口及董家寺等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谢子长在指挥清涧河口战斗时，被罪恶的子弹击中前胸，负了重伤。誓死如归的谢子长，却对身边的指挥员们说：“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打仗总是有伤亡，我这点伤不要紧。”坚持带伤继续亲自率领红军游击队东打西杀，南征北战，为创建西北红军、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仍进行顽强战斗。

1934年9月18日，谢子长不顾伤痛，根据中共陕北特委佳县神堂沟会议精神，在安定县崖窑沟亲自主持，将红一支队与红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并向团长贺晋年授了军旗。翌年，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陕北红一、二、三团合编组建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相继于1月25日、30日，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宣告成立。至此，经过无数次胜利和挫折，谢子长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实现了在陕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想。

谢子长伤势加重离队养伤前，高瞻远瞩，认为把陕北与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统一领导，统一步调，势在必行，首先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建立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养伤期间，他强忍伤痛，与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并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约请刘志丹带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共同商讨陕甘边、陕北苏区军事统一指挥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

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及陕甘边的红五、红六支队，如约抵达陕北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后，数次探望伤病中的谢子长。1935年1月20日，赴灯盏湾再次探望时，谢子长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就建立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特别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反“围剿”等问题，与刘志丹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谈。上述所有问题，两位战友取得完全一致意见，唯有在军委主席问题上各执己见，相互谦让。谢子长说：“我不行了，军委主席你就担当起来。”刘志丹说：“那不行，你是老大哥，只要你在一天，就还要你当。”最后，子长严肃地说：“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名义，指定你为西北军委主席！”战友情谊，感人肺腑。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统一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

军。选举军委主席时，刘志丹坚决地说：“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威望比我高，应当选他当主席。目前他不能工作，也应当选他，我可以协助他完成任务。”会议选举谢子长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谢子长因伤势严重未到职，军委实际工作由刘志丹负责主持。

1935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八）晚上9点多，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赤源县灯盏湾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8岁。红星陨落，白雪纷飞，天地、百姓哀痛！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为稳定根据地军民情绪，防止敌人乘隙进犯袭击苏区，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封锁消息，秘密安葬，行文、布告仍签署谢子长职衔姓名。直到1935年5月马家坪战斗告捷后，才逐渐解除保密，用继任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名字签署行文，发布布告。

谢子长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胜不矜功，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无比热爱，无限忠诚，为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谢子长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8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谢子长遗骨移葬于故乡枣树坪村，并修建子长烈士墓。毛泽东1939年6月29日和7月9日，两次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撰写了碑文。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织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资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在瓦窑堡修建子长陵园,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柩公祭仪式,凭吊者逾20000人。同月28日,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朱德题词:“谢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中共中央西北局送了“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的挽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开国元勋们,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彭真、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也题了词。党和人民,对谢子长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建立的重大历史贡献和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第 四 章

红二十六军西北擎战旗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于1930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到华池南梁一带组织革命武装,到1935年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成一块,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斗争。在这一斗争的后半期,是以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失败、恢复、发展、壮大的过程为其主线的。也正是由于发展壮大了的红二十六军,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区域,才使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得以成熟。

一、转角镇正式建军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陇东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4月20日,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中共陕西省委迅速编制红军一个师或两个师,“首先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红军的番号是第二十六军。“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也相应地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6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陕西省委派省委书记杜衡参加。会议中心是讨论建立北方新苏区,最后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建北方苏区的决议》。会议在研究陕西工作时,重申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并确定立即将陕甘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十六军，杜衡为军政委，另派曹长清（孟坚）来陕西接任杜衡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职务。会后，杜衡、曹长清回到陕西。8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正规团，争取在近期内编成一个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团（后改为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并通过了《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军决议案》。9月17日，省委又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以及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决定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北方会议的主导方面，是贯彻在中共临时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北方落后论’，‘特殊论’，富农路线及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通令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听候改编。随后，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22日，队委会召开党员大会，杜衡在会上宣布了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杜衡给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戴上“上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大帽子，并且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的领导职务，欲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开除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杨仲远留在部队。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立即离队，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22日，红二团召开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

12月24日，部队开往宜君县转角镇。在这里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特务连和青年连（后改称少年先锋队），共200多人，长短枪150余支。由军政委杜衡兼任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由于杜衡的“左”倾偏见，刘志丹被排斥在领导者之外，只任团政治处处长。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衡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产生，由政委任命。这一规定，其实是将陕甘游击队排以上干部集体撤职，把干部的任免权抓在自己的手中。

广大指战员对于杜衡的这些做法是有疑惑的。面对这种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团长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协助团长、参谋长指挥战斗。由于刘志丹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肩负着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又踏上了南下的新征程。

二、二次建政在照金

照金,位于耀县西北,是桥山南端的一个小镇。周围与陕西淳化、旬邑、宜君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梢林密布,河溪纵横。地势十分险峻,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是陕甘游击队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农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加之以习仲勋、李妙斋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这里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开展游击战争比较理想的地方。

1932年12月26日,红二团迅猛歼灭焦坪守敌60多人,接着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个部,部队发展到300多人,并帮助地方党先后建起了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5支游击队。后在庙湾与夏玉山民团作战中失利,部队撤离照金苏区,刘志丹接替郑毅任参谋长。

1933年2月上旬,红二团转移到陇东正宁县的三嘉、湫头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在湫头王郎坡设计伏击赵世坤民团,将敌全歼于石炭沟,赵世坤被活捉后拉到三嘉狼牙洼处决。随后,红二团又回到了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就是选调者之一。1933年3月初,习仲勋由三原奉调到西安,随后,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到红二十六军工作。此时,红二团在东进同关攻战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于心字区北原西马道两旁设伏,歼灭敌人驻候家堡一个骑兵排。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即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正式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师克寿任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任团特委书记,李妙哉、周冬至、王满堂、张秀山任特委委员。习仲勋到照金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旬邑、耀县一带群众进行分粮斗争。这时,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阶段”。3月15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共产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和经济委员会。至此,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都相继建立了基层革命委员会组织。地跨耀县、旬邑、淳化3县边界的照金根据地基本形成。

三、红军饮恨终南山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的胜利,使苏区人民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了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4个正规团和6个县的民团约8000余人的兵力进犯照金根据地。红二团转入外线作战,习仲勋等率领游击队坚持斗争。经过20多天机动作战,歼灭了一大批敌人,部队发展到500多人,进犯之敌也撤出照金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上,围绕红二团今后动向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被暂时性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杜衡等人,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他们的理由主要是照金周围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

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而渭华情况正好相反,故红二团应立即南下渭华地区,开辟渭华、华县、蓝田、洛南新苏区。

以刘志丹、金理科等人,主张继续坚持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他们认为,只要依托桥山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就可以不断巩固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明确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

然而,杜衡不仅拒绝了刘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而且还给他们扣上“一贯右倾”等大帽子,凭借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渭华地处关中平原,既无险可凭,又有敌人重兵驻扎,非常不利于部队游击作战。当时,在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决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什么。由于杜衡的威逼,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300多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原,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80多人。次日到达三原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的负责人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此时,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政委交汪锋代理。6月24日,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率红二团从高陵渡过渭河。

6月25日,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等率部一日五战,冲破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三旅的围追堵截,行军百余里到达蓝田流峪口。7月中旬,红二团与警三旅及地方民团在蓝田张家坪激战数日,伤亡惨重。刘志丹遂同其他领导商议,决定丢掉辎重,分路突围,在秦岭山中与敌周旋,找准时机,返回照金。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秦岭山中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几乎覆没,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刘志丹带领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困在深山老林里,靠采集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刘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这些都没有动摇刘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大家的士气和革命斗志。他率领大家突围时,又遭敌人袭击,大部

分同志壮烈牺牲，刘志丹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深山里，昼伏夜出。后来遇见红二团战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等会合。接着，在渭南、华县党组织及黄子文夫妻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担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爬山越岭，奔向陕甘根据地。待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历尽艰险返回照金时，已经是10月4日夜晩。

党组织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陕甘红军部队，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伤病中的习仲勋得到红二团兵败终南山的消息，更是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好像在未愈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

中共陕西省委于同年7月底遭到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朴衡被捕叛变，西安和关中、陕南地区的中共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陕甘边根据地遇到了空前危机。

四、陈家坡挽救红军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失去了坚强的支柱。陕甘边区特委继续领导着地方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他们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行整顿，在三原武字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杨虎城部骑兵团千余人在耀县通电起义。习仲勋热情地赞扬说：“这一消息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起到了重大作用。”^①王泰吉，字仲祥，1906年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早在学生时期，他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24年5月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到1928年春，他先后进入国民党胡景翼、甄寿山部任职，以合法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春夏，他先后发动和参加了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在起义屡遭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遭敌逮捕，被押往南京。此后，经杨虎城将军营救出狱，旋即担任了杨虎城部

^① 习仲勋：《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3月3日。

骑兵团长。1933年夏天,王泰吉率骑兵团由陕西三原移住耀县。这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遭到惨重失败。在这严重关头,王泰吉毅然率领骑兵团起义。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将王泰吉骑兵团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司令。

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到了照金地区,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根据地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产生了右倾悲观失望情绪。他们认为红军在陕甘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边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四团。主张红四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陕甘特委军委主席习仲勋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根据地就能恢复和发展。红军队伍要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苏区。

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恢复、巩固根据地和红军建设,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习仲勋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张秀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等。高岗是以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的。红四团与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会合起来的三支部队的今后行动方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人选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议激烈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支红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有些同志不同意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行动,提出红四团应回到三原地区去打游击。他们认为:现在陕西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渭北苏区又退了出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所剩下来的人也不多了,就目前这点力量,还是分散开打游击好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仍然留恋渭北地区,希望将渭北地区恢复起来。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事情。

张秀山在渭北游击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渭北根据地的情况是了解的。他在会上说:渭北根据地各方面条件的确很好,但是因为它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西安才100多里,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20多里,敌人是决不会让我们在那存在的。再说,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弱,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后,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即使回去了,敌人打来,我们

能坚持住吗？游击队打游击能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如果将三支力量分散作战打游击，那只会被敌人逐个消灭，不可能形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根据地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形势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有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的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多数同志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该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同意把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组成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的人选问题。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有的同志则认为，由王泰吉来任总指挥，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他们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并且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起义时，部队的成分是比较复杂，决心参加革命的人不多，但经过三原鏖战把战斗，耀县小邱战斗及照金战斗之后，抗日义勇军剩下了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这时的抗日义勇军已和红军一样，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来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决定王泰吉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

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会上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在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贾拓夫派高岗任军事特派员来领导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特委开会决定高岗担任抗日义勇军政委。一些同志反对高岗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理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在会上，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都证明高岗来的时候，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经过争论，最后还是决定由高岗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军、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各路游击队，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决定组建陕甘红军的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

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陈家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他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红军主力在陕甘边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阵容展开游击战争。

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满圆的月亮,把大地照得光明如昼,照金根据地一片静谧。这时,刘志丹和王世泰历尽艰险,回到了照金。他们一进薛家寨山门,就被激动的人群围了起来。习仲勋望着刘志丹,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刘志丹关切地询问习仲勋的伤情,并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召开陈家坡会议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陈家坡会议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通过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其周旋,要粉碎进攻,必须转移到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照金地区还有不少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第一、五、七、九、十一支队仍留在照金地区,作为地方部队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开展游击战争,保卫照金根据地。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红军的胜利,使国民党陕西当局十分惊慌,急调4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6个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10月12日,刘志丹和王世泰率主力红军北上。主力红军北上后,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杨虎城部特务团攻克薛家寨,照金苏区陷落。

照金根据地虽然仅仅存在了5个月时间,但是却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经验。此后,照金地区始终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廊外沿的游击区。

五、包家寨战略决策

10月16日照金根据地失陷后,红军主力在遭到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北向子午岭进发。18日深夜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合水县城,毙伤俘敌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处决了合水土豪“杜老爷”、盐税局长李德胜和谭世麟的招兵营营副梁邦栋。

红军开仓分粮，赈济穷苦百姓；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打开监狱，解救出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

合水战斗后，王泰吉、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主力，在子午岭山麓，牵着尾追不放的敌军赵文治团800余人兜圈子，伺机歼灭他们。10月下旬，红军在城壕川消灭了当地一个民团。26日，在庆阳三十里铺，又歼灭谭世麟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些药品器械，拉了两个外国神甫，向东进发。28日，敌赵文治团突袭红军宿营地华池李良子毛家沟门，王泰吉指挥红军迅速占领河东岸山头，300多名战士英勇反击，于山底毙俘敌人200多名，缴获枪械200余支以及弹药等。敌人溃军狼狈逃窜，赵文治团从此一蹶不振。三战三捷，重创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接连获得胜利。

离开照金革命根据地后，红军主力在反“围剿”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嘴铺包家寨子召开了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无立足之地的最困难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刘志丹、张秀山、高岗、王泰吉、秦武山等党政军负责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照金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了主力红军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先后回来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把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兵配合作战的需要。会议鉴于红军撤离照金根据地以来，部队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建立三路游击区，开辟三个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

第一路游击区，是以先前派出的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强世卿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



包家寨会议旧址

第二路游击区，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杨琪任总指挥，开始没有政委。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任务是建立南梁根据地。

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第一任总指挥为张明吾，出任不久被叛徒暗杀，第二任是王安民，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是以照金为中心。

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因为留守照金，继而又身患重病，没有参加包家寨子会议。当他知道会议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作出了正确决议并使陕甘边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时，从内心更加敬佩在革命战火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刘志丹，同时也为陕甘边区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感到欣慰。

包家寨子会议，使陕甘边党的组织和红军在全国率先彻底摆脱了“左”倾错误的影响，正确制定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政方略，是西北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包家寨子会议的最大功绩，是明确决定

了陕甘边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在此之前,根据地的中心已经两易其地点,一次为正宁的寺村原,一次为耀县的照金,而且都建立了革命的临时政权,但是,都被“左”倾路线一齐葬送了。包家寨子会议把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选择在南梁,这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问题所做出的正确决策,是摆脱杜衡等人把持的中共陕西省委“左”的干扰,把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到了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产党人手里的结果。它为陕甘边区未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六、革命烈火再燎原

根据包家寨子会议决定,由刘志丹、王泰吉等主持,于1933年11月8日,在葫芦河川的合水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红四团两个团。红三团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红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两团人数共500多人,战马五六十匹。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师、团、连层层建立了党组织,师党委书记由杨森担任。1934年元月,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不久牺牲,改由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

红军部队整编之后,派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到平定川一带组建地方游击队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派习仲勋、张策以红军后方特派员身份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南梁地区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正位甘肃华池、合水、陕西富县、志丹4县交界之处,其范围在葫芦河上游,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荔园堡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风川等,以荔园堡为中心,周围达百余里。这里山峦起伏,梢林密布,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很好,是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区。由于这批干部的全力工作,11月至12月在南梁小河沟一带相继成立了由杨培盛任队长的庆阳游击队,由张振东任队长的合水游击队,由刘约三任队长的保安游击队,以及安塞游击队等。1934年1月,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正式成立,杨

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革命武装迅速发展，至1935年6月，庆北、定边、华池、环县、柔远游击队和华池保卫队陆续建立。他们在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或消灭地主民团武装，或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或参加反“围剿”战斗，为创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路游击指挥部于1934年2月成立，总指挥为张明吾，不久换为王安民，政委为黄子文，后换为张仲良；秋季，陈学鼎任总指挥，张邦英兼政委。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统一指挥南区的平子游击队、回民游击队以及宁县三支队、宁县一支队、新正县五支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和警卫队、特务队等。宁县三支队是在平子半坡村贫苦农民刘永培、刘玉才、杨兴才、王占义等组织暴动的基础上组建的。这支游击队曾大闹平子镇，处决了敌3名情报人员，摧毁了敌碉堡；与新正四支队配合，攻克梁掌堡，消灭敌民团60余人，在柴桥子、上畛子、鸭子梁一带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很有影响。宁县一支队7任队长中有4人都先后牺牲，游击队损失惨重。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组织派19岁的新宁县委组织部长王秉祥出任队长，他与指导员乔占才领导这支队伍越战越强，一年内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民团闻之胆寒。一支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南区的这些地方武装在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曾参加过上百次战斗。他们的战史，是陇东根据地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自身兵员得到很大补充，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后季，以陕甘边区特委和直属特务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十二师一团；以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红四十二师二团。红二团于11月初在南梁阎家洼子正式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1935年2月，红一团正式成立，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第二路游击区遂发展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

1934年夏，刘志丹、习仲勋派黄罗武、马锡五上黄龙山做郭宝珊的工作，并派人送去慰问信和马匹等。郭宝珊被刘志丹、习仲勋的诚意所感动，毅然于10月20日在新堡宣布起义，率部120多人进入庆北苏区。习仲勋等接到报告后，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前往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敲锣打鼓召开欢迎大会，并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郭宝珊以后入党，这支起义部队也屡建战功。之

后，一些占山为王的群众武装也因此接受红军改编，壮大了红军队伍。

革命解放了人民，人民向往着革命。陇东、陕北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投入革命的怀抱，正如一首《信天游》唱的那样：

过了河来上山冈，
一夜投奔到南梁。
头包毛巾手拿枪，
要和财主算细账。

至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拥有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义勇军共5个团的建制，兵力1000多人，游击队也发展到了1500多人，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周围，形成了一块稳定的战略区域。在陕甘边苏区，也涌现出了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领导核心，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根据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有益贡献。

第五章

习仲勋署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主要目的,加强政权建设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在开辟和建设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工作。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政权建设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陕甘边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照亮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①南梁政府的成立,在大西北撑起了一块明亮的天空。

一、南梁建立政权条件成熟

横跨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县的子午岭天然林区,峰峦起伏,逶迤连绵。虽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沧桑,而依然一派轩昂气势,鲜俊本色。在陇东黄土高原,保留下来这样一大片天然森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子午岭是桥山山脉的一条支脉,它西挽宁庆,东接延安,南连耀州,北抵盐边,绵延400公里,总面积800多万亩。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曾经创

^① 习仲勋:《历史的回顾》,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造过华夏文明，为民族昌盛、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南梁地区，就位于子午岭林区深处葫芦河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马店川、玉皇庙川、林锦庙川、豹子川、大风川、二将川、白马庙川等方圆几百里的林区地带。因为位于桥山山脉的大梁山南麓，而得名南梁。这里是陇东华池、合水和陕北志丹、甘泉四县的交界地段。在这里的中心山梁上，有一座当地群众在清朝末年修筑的堡子，叫荔园堡。

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弱小，在当时被称作“三不管”的地方。它回旋余地大，进可直取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除南梁当地十二三户趁火打劫的土豪恶霸，随意霸占大片山林、良田和剥削佃户、雇工外，远在200多里外的庆阳“八大家”的韩子高、李子良两家大地主，也把魔爪伸进了南梁，霸占了南梁几道川的绝大部分良田和几百里山林，用“驴打滚”的地租和高利贷，残酷盘剥穷苦农民。同时，官府、军阀、土匪蜂起，兵灾不断。这种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官、兵、匪祸的纷至沓来，进一步加深了南梁人民的苦难，南梁一带贫苦农民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愿望，并形成了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这里武装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早在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在面临无立足之地的时候，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就思考过，在那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战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当大家苦无良策的时候，转战途中的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在桥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他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

1933年11月，合水县包家寨子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进入南梁，便兵分两路，师部带红三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发展。先后在荔园堡、阎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了一些据点，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刘志丹和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第二路游击工作。同

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置伤员到平定川、豹子川治疗休养。

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山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培胜组织义勇军。张策在他的《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一文中,谈到和习仲勋一起工作的情形时很有兴味地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勋来后,我们一同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1934年春,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保安、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中部等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同时,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东西400里、南北约700里的战略区域,在南梁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



二将川农民联合会赤卫队队旗

大队。

经历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了由衷感叹：真是来之不易啊！这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红四十二师党委坚持正确军事路线的结果。习仲勋以这样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933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①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关系的极其困难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1934年1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放弃中央根据地的严重后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以后，在一段时间里，曾五次成立起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但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代表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7月决议”。七月决议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第二部分检查总结了陕甘边党政军的工作，集中批评了陕甘边党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不深入等问题。第三部分全面部署了边区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9个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1日。

方面的任务,即党的建设、政权问题、扩大巩固部队、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七月决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所提出的战略性措施,是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是陕甘边乃至西北根据地全面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7月下旬,刘志丹、习仲勋和张秀山等陕甘边领导人,在阎家洼子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他们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欢,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的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7月28日,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3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议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勋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

两封指示信和个别人发言,虽然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但是习仲勋和许多同志认为,阎家洼子会议对于统一两支兄弟红军的步调,团结协作、共同对敌,特别是决定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革



阎家洼子会议旧址

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对与边区没有直接联系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的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吓人的五顶大帽子产生极大反感和诸多疑虑。习仲勋反复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习仲勋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作祟，但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空洞议论而已。因而，他还是从大局出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会后，陕甘边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100余支步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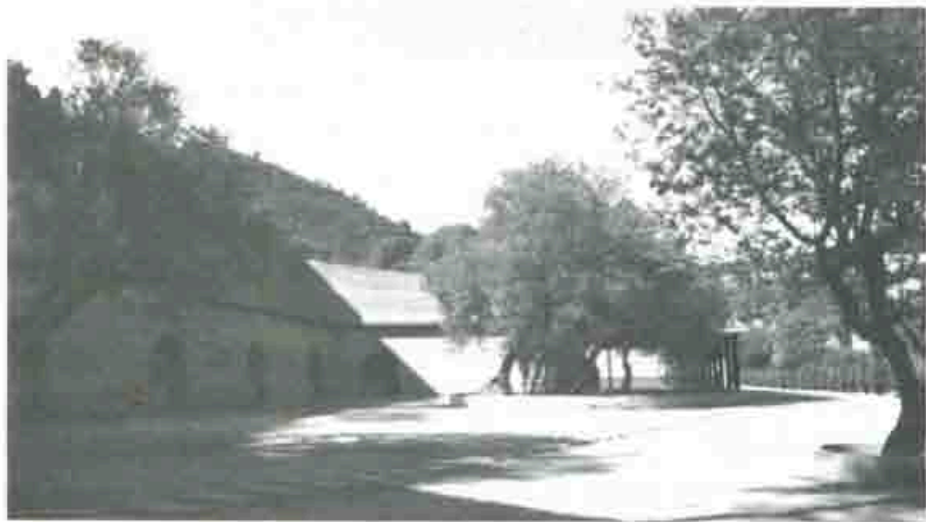
阎家洼子会议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顾全大局下，会议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它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这也为以后两支红军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阎家洼子会议以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即根据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与边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着手筹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作,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向正式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责任。

习仲勋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的代表工作。他就这次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革委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这就是按照选举地区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

在这段时间里,习仲勋、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等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蔡子伟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蔡子伟

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和其他一些文件。

1934年11月1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根据地荔园堡召开,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次代表大会,前后共开了7天。荔园堡的一座关帝庙,作为大会的会场。11月1日(农历9月25日),从陕甘边界贫苦农民、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选出的100多名代表,欢聚一堂,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等许多重大问题。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黄子文、张策、吴岱峰、杨森等同志,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黄子文等同志还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情况,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报告和讲话。许多代表听着刘志丹等同志讲述的“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坐天下”等革命道理,听着关于巩固、发展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太政方针,高兴得热泪盈眶,连声说道:“好!好!”他们怀着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和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一起,认真商讨了有关陕甘边区根据地的许多重大问题,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接着,代表们充分酝酿、讨论了有关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事宜和人选,推举出了自己满意的候选人。第六天,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阎洼子村苏维埃代表武海潮,因为不识字,请刘志丹为自己代笔写选票。当武海潮提出先写上刘志丹的名字时,他很诚恳地说:“先写你最满意的同志吧!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直到武海潮把自己要选的其他人都提完了,再三坚持要写上刘志丹时,他才在最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经过投票选举,选出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雇农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边区政府军事委员长,雇农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雇农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雇农胡志禄任粮食委员长,雇农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惠子俊任工农检查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张景文任妇女委员长,张文华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由雇农朱志清任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责任副总指挥。在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了华池、赤安两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华池县辖原庆阳县北部和合水县一部分红色区域,由贾生秀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赤安县辖

原庆阳县、保安县和靖边县红色区域，由边金山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代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把一颗用红布包裹着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四方大印，授给了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从此，陕甘边界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了。

11月7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南梁地区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阵阵暖意。在荔园堡河西的川台上，举行了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除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外，还有从陕甘边区根据地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贫苦农民、红军指战员，庆阳、合水、保安、靖边、安塞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以及从游击区赶来的群众三四千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习仲勋和工农兵各界代表先后讲话。当宣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时，300余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铲除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坐天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震荡山林，经久不息。接着，举行了阅兵式。在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下，红军骑兵战士、各县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阅兵台，精神抖擞，英姿矫健，步枪、大刀、红缨枪银光闪闪，显示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战争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在偏僻荒凉的陕甘边界，人们头一回见到了这么威武雄壮的阵势。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之后发表了施政讲话。他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搬回了距荔园堡10多里路的南梁堡附近的寨子湾，仍然驻在过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办公的那座旧庄院。



南梁荔园堡

因此群众习惯性地称为“南梁政府”。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驻寨子湾的东腰岘。这里，几座大山梁相交，周围是遮天蔽日的大森林，地势险峻，进退相得。当时，边区政府和特委、军委分别驻在隔沟相望的两处旧庄的窑洞里办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和政治保卫大队担任警卫。虽然边区政府和特委、军委驻地在寨子湾，但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党、政、军主要领导并不经常住在这里，他们经常在人民群众中间生活、工作，同南梁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至今，在南梁一带还流传着习仲勋、刘志丹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前后，县以下的各级地方政权也相继建立。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贾生秀兼任；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巨德；赤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飞；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富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富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主任刘永培；南区革命委员会驻正宁办事处，主任郭廷藩。县以下是乡与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乡、村设立了乡革命委员会。乡设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人，文书一人。下面管理行政村革命委员会，各行政村下面又管辖有若干自然村。

三、第一任政府主席习仲勋

在陇东老区，提起习仲勋的名字，同刘志丹的名字一样，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是华池、环县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新正、新宁县的老百姓，虽经几代人的口传，现在，大家都能讲出习仲勋在陇东革命根据的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

(一)

习仲勋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年仅15岁的习仲勋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狱中他毫不畏惧，团结狱友，坚持斗争，被狱中党组织接收为中共党员。出狱后，他接受组织委派，打入国民党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成功组织发

动了“两当起义”，从此开始了他职业革命的生涯。1933年3月，习仲勋来到照金，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接着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革命陷入低潮。8月，在习仲勋的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召开陈家坡会议，确定统一领导陕甘边红军，坚持陕甘边区斗争的方针。同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向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照金苏区陷落后，习仲勋与南下失败、辗转返回照金的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把重心转移到陇东地区的南梁一带，并于同年11月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认真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战略和方针，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划分三个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向南北发展，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略。包家寨子会议，正确制定了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政方略，是西北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包家寨子会议以后，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南梁地区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建党建政工作。

习仲勋认为，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深入群众、组织动员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为此，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在华池、合水等地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组建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5个赤卫队1000余人，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发展壮大南梁根据地。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恢复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此后，南梁这块红色根据地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先后解放了边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敌人保甲组织，建立了工农政权。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



习仲勋

(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不仅标志

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确立,而且标志着陕甘边党和红军的成熟与壮大。但是,习仲勋思想并不轻松。他想,诞生于战争年代的红色政权,一定要行使好职能,努力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更好地保障游击战争的节节胜利。

习仲勋自1933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为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他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勋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上组织学员进行训练,当习仲勋走过来时,刘志丹举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当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

自此以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习仲勋主席的署理下,很快制订发布了《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土匪的政策、对地方民团的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俘虏政策和发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府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从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

南梁政府成立后,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量发给,使党和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就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为此,南梁政府在“暂行

条令十八条”中规定：党政军干部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正是有了这样的法令，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军政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错误，就曾受到过撤职处分。

南梁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习仲勋组织南梁政府所属各委员会，在组建了南梁地区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整顿和加强工会、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的同时，又成立了青年、妇女、儿童等组织。1934年冬，又先后成立了庆北、安塞、甘洛县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各县还选举成立了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工会、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和青年、妇女、儿童等组织也先后建立了起来。在全面建政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各县、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每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员。他们带领群众斗争地主、恶霸，烧毁地契、债约，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房屋、窑洞和其他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川台地按人分配，每人可分10亩左右；山地按户划地块，能种多少分给多少；对家在苏区的所有红军战士，都保证分给一份土地。这样，在陕甘边区十几县的广大农村，燃起了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

为了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陕甘边特委、军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开办了“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当地群众称为“红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负责教学工作。校址先设在荔园堡，后迁至豹子川里的张家岔。开设的政治课程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还开设有文化、群众工作等课程。从1934年秋到1935年春，先后共开办了三期训练班，培训了从陕甘边区农村和红军部队中选派来的200多名军政干部。学员毕业以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区、乡苏维埃政权工作。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有的成长为很有才干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

习仲勋非常关心南梁和陕甘边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亲自发动群众兴办学校。在荔园堡附近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由从西安投奔陕甘边根据地的女知识分子张景文（时任南梁政府妇女委员长）和霍建德担任教师，动员六七十名贫苦农民的子弟上了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

道理。以后，又在太白、川口等地陆续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群众扫盲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发展革命教育事业。在习仲勋的重视下，南梁政府还创办了不定期的油印报纸《红色西北》，经常刊登特委和南梁政府的文件，宣传和教育群众。南梁政府同时颁发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和禁止赌博活动、戒除鸦片等法规。还依靠工、农、青、妇等组织，在根据地开展了劝不迷信、劝不赌博，劝不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劝戒鸦片烟的“六劝”活动，引导人民群众破除陋俗恶习，移风易俗。并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努力把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范。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婆姨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了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

为了促进陕甘边区的经济建设和贸易事业发展，习仲勋会同财经委员会研究决定，在边区苏维埃银行发行布制货币，当地群众称为“苏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习仲勋指示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背上打土豪筹集的银元去赶集，与部分对“苏票”有顾虑的群众进行兑换，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当时，在国民党的钞票时时贬值的情况下，边区的布币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由于南梁政府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欢迎的政策，坚决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每逢荔园堡集日，除南梁根据地方圆数 10 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外，许多白区的客商也赶来进行公平交易，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习仲勋、蔡子伟等同志还经常利用荔园堡集日，登上荔园堡的戏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随着贸易事业的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习仲勋主政南梁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南梁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发展，使这里成了一个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当时，穷苦农民纷纷投奔南梁；一些追求真理的有志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了南梁；就连当时还身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妇女，也唱出了“长枪短枪马拐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的革命心声。1935 年春，南梁地区的人口由革命前的 290 多户增加到 1000 多户 6000 多人。南梁，以它强烈的感召力，号召和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闹翻身、求解放。1934 年秋到 1935 年春，陕甘边区的“扩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到处是投奔南梁当红军、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情景，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了起来。许多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游击队、赤卫军，使革命武装力量

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发展。

(四)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习仲勋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党性,不顾个人荣辱得失,正确对待干部,对待同志,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1935年9月,在陕北错误的肃反中,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立即为他们平反,恢复工作。对此莫大的冤屈和无端的迫害,他冷静对待,始终顾全大局。他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红军指战员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针对个别人关于“陕北救了中央”的错误言论,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是“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就没有陕甘根据地。毛主席如果晚到几天,就没我和刘志丹同志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足迹踏遍了陇东正宁、宁县的沟沟岔岔。同年6月,他随红军西征,负责地方建党建政工作,先后成立并担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当时,红军一开拔,国民党军和当地土匪就伺机袭击和抓捕我工作人员,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随时迁移,因此,在环县曾被用作县委、县政府办公的地方就有洪德、河连湾的杏儿铺和南街等多处地方。一次,习仲勋连夜赶往魏前掌村。时序进入10月,天气已很冷了,加上夜黑路陡,习仲勋在途中跑丢了鞋,到魏前掌时,已是鸡叫时分,冻坏了双脚。房东魏老汉用被子包住习仲勋的双腿,经过一个多时辰,才使双脚恢复知觉。在洪德期间,他以强烈的革命热情,感召着周围每一个人,使他们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认识革命、支持革命、投身革命,先后发展耿荣昌、耿荣华、杨满川、杨富川等8位进步农民成为环县的第一批农民党员,并且建立了6个区党委、39个乡党委。1936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关中特委及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贾拓夫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关中特区的党政机关驻新正县南邑村。

(五)

抗战爆发以后，党中央派习仲勋担任关中分区区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关中警备司令部政委，先后住新正县马家堡和马栏等地。当时，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形成插入国统区的“囊形地带”，斗争形势极为复杂，国民党先后在关中地区多次发动反共摩擦，习仲勋领导边区人民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瓦解反共顽固势力，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向边区多次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关中分区专员公署合署办公，专署各科代行县政府各科职权。习仲勋兼任了新正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习仲勋同志在担任关中分区主要领导职务及兼任新正县县长期间，革命意志坚定，处事智勇双全，工作雷厉风行，作风朴实无华，深受群众爱戴。

1939年后，驻新正县边境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奉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有意制造摩擦，挑起事端，蚕食新正地区。为反击顽军的蚕食，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



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遗址

“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习仲勋采取积极果断的措施，组织和扩大新正县地方武装，整顿抗日自卫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新正县边境合理布兵，严阵以待，密切监视顽军，对来犯的顽军迎头痛击。同时发动群众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送消息，打击顽军破坏活动。还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揭露顽军破坏抗日的阴谋和反动本质。从而制止了顽军的蚕食活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了新正县抗日政权。

新正县龙嘴子、孟家河、西渠一带是回汉族群众聚居的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激化了民族矛盾。习仲勋主持、领导新正县革命活动以后，各级党、政、军组织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实行回汉一律平等，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习惯，积极发动和领导回民群众参加革命活动，使回汉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为民族解放事业共同奋斗。1941年3月下旬，陕甘边区抗日救国会派共产党员、国民干部金浪白、郑毅等到新正县西渠、龙嘴子指导成立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习仲勋亲临会议并讲了话。对回民群众为抗日工作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积极投身革命，为抗日工作多做有益贡献。会议选举思想进步的阿匄蔡登霄为关中回民抗日救国分会会长。会议期间，为了助兴，习仲勋调关中分区剧团前来演出祝贺，演出的剧目有秦腔《血泪仇》、《石达开》等。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抗日，习仲勋亲自主持制定了《新正县各级“三三制”选举大纲》。出席了1941年7月25日在新正县阳坡头召开的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并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他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1941年，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习仲勋同志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实行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垦荒开办农场，每年产粮80余石，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新正县在原有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共有股金21万元边币，其中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当年纺的纱、织的布解决了关中分区三分之一人的穿衣问题。超额完成救国公粮和救国公草任务。习仲勋还十分重视农民

扫盲和农民文化工作。当年新正县办起夜校 63 处,学员 1769 人。办起妇女半日班 19 处,识字组 27 个,参加学习的妇女 655 人。

习仲勋在领导新正县革命活动中,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新正县二区雷庄村张治平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名医。习仲勋在开辟新正县革命根据地时,就和他有了交往,以后通过不断的接触,他俩成为朋友。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张治平认识到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而后他在行医过程中积极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款,掩护革命干部,暗中长期和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以后张治平被选为新正县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他的侄子张清益大办“义仓”在边区出了名,荣获“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光荣称号。1945 年 12 月 5 日张治平逝世后,习仲勋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送了挽联,高度评价他的革命功绩。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习仲勋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他都能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忠心耿耿,毫不动摇。1943 年 10 月,毛泽东为他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

四、南梁政府经济社会政策

南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开始着手新政权各项制度的建立。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政策、财经、金融政策、商业政策,社会政策方面主要是对土匪、会道门和革除社会陋习如缠足、赌博、吸食鸦片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南梁苏维埃政府设有土地委员会,专门负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第一,土地政策。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1931 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土地法草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就实行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政策。1933 年 3 月 15 日《陕西省委给红二

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要求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该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考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从政策内容来看，这一政策完全符合苏维埃土地法的精神。指示同时要求：“二十六军、游击队、农民联合会及党与青年团作最广泛的群众鼓动，动员群众自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分土地，不要成为二十六军的分土地。”1934年南梁地区也进行了土地分配的斗争，陕西省委给陕甘边特委的指示中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①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土地分配方案：（1）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边境区因苏区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4）田、苗一齐分，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5）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6）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7）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8）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② 这些基本的土地政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适合陕甘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分川地不分山地”的原因是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他们对前原的租子收得紧，后山有时顾不过来。因此，群众有比较宽余的土地，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原来红军

①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甲7，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398页。

② 《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9页。

打到那里,在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根据南梁政府的土地政策,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中心区都进行了土地分配。

土地分配工作由南梁政府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他家比较富,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于是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了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他们把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的,而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1934年6月,庆阳游击队没收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家粮食500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元1000枚,大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庆阳大地主所开的“恒义和”商号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通过土地革命和分地工作,陕甘边区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第二,财政、金融政策。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源是什么?这是南梁政府成立后实行的经济政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并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陕甘边根据地地处经济落后的陇东北部山区,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政府一成立即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主要是:(1)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解决。(2)经营红军公田。就是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的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3)兴办小牧场。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4)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南梁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

多元。(5)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通过这些措施,节省了财政支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陕甘边苏区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他们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财政、粮食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解决粮食和穿衣问题。

在金融方面,南梁政府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为确保苏区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制币厂设在南梁的油坊沟,只有3名工人,完全靠手工刻版,印在布上后又刷上桐油。布币票面精致,美观耐用,分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四种。起初,有部分群众对使用“苏票”交易有疑虑。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每逢荔园堡集日,就背上打土豪筹集的银元去赶集,与部分对“苏票”有顾虑的群众进行兑换,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当时,在国民党的钞票时时贬值的情况下,边区的布币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

第三,商业政策。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中国共产党采取保护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①因此,南梁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为了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经济,满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调剂余缺,促进流通,南梁苏维埃政府开设了集市。每月阴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生机。有炸麻花、卖蒸馍和荞麦面饴饴的,还有卖牲畜、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几乎每逢集日,习仲勋等人都要去集市上转一转,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对国民党统治区到根据地做生意的商人,南梁苏维埃政府采取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还通过各种办法同一些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苏区集市刚设立时,由于白区小商贩不了解苏区的商业政策,到苏

^①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184页。

区赶集做生意的白区商人比较少。为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把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棉花、布匹、盐和其他物资运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因为受到了革命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给陕甘边苏区输送货物。他们来时,驮的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然后在集市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白洋。集市贸易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南梁政府和红军所需的必需品也是从集市贸易中换来的。蔡子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南梁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繁荣的,说明根据地商业贸易政策是正确的。

第四,文化教育政策。陕甘边区南梁苏维埃政府开办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开办了列宁小学,以后又在太白等地陆续办起列宁小学。与此同时,在一些村庄开办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帮助他们识字学文化。边区特委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党内刊物,南梁政府创办了《红色西北》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边区各方面建设情况,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红军干部学校创办于1934年10月,校址先在荔园堡,后迁往豹子川张家岔。学习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前后共办了3期,培训干部200余人,对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边区苏维埃政府信任并培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制定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财富,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因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苏区,对苏区事业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第五,社会政策。在陕甘边苏区建立前,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基层社会大多由各种会道门控制。南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不仅消灭了旧政权,而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改造。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包括:(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苏区参加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期的交往,对红军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

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3)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传不要要赌、不吸大烟,好好参加生产;(4)在劳资政策上,最初规定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偏重于雇农方面,但一些雇农好吃懒做,于是政府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参加劳动;(5)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政策。^① 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根据地还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雇农工会由雇农组成,全根据地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村设村会;贫农团在各区设区团,乡设乡团,村设村团。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受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是根据地乡村社会新建立的基层群众组织,成员都是根据地政权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在分配地主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梁苏维埃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陇东创建的第一个颇有规模的苏维埃政权。从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来看,它完全是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南梁政权所颁布的土地政策,商业政策都有利于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土地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所要求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根据地的农业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根据地商业的发展,便利了群众的生活。社会政策,改革了一些社会陋习,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新社会。

五、南梁政府的宣传教育工作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在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做好组织群众的重要工作,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启发群众觉悟,进一步巩固红色政权的革命基础。

(一)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红军的革命干部就深入南梁地区,向群

^①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10—411 页。

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地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在农民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领导南梁地区村村组织农民联合会,组成了赤卫队,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

根据地领导人亲自参加宣传教育工作,他们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了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推进了革命工作的发展。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甚至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且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先后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二将川以及保安的五保川、义正川等地建立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后又逐步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整个边区的革命政权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群众全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南梁政府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文化委员会,由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每逢传统节日或庆祝战斗胜利,文化委员会充分利用陇东秦腔、眉户、道情、民歌、小调等文艺形式,组织军民演出“闹红”节目,宣传革命。另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如给荔园堡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呼嗨,穷人能过好光景”!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

做好妇女宣传教育工作是南梁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南梁苏维埃政府首任妇女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去。她亲自编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带领开展妇女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开展妇女放脚,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姑娘、婆姨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二)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革命活动开展过程

中,高度关注军队中的宣传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做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于军事教育在扩大和巩固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加军事教育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艰苦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知识,又扫盲识字。1934年3月,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营学校在南梁改办为红军干部学校,后学校迁址豹子川张岔乌鸦寺,改名“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一所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军政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



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旧址

①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陕西省档案馆1992年7月,第307页。

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为教员。学校“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材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作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的很愉快”。^①学校开设政治、军事、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当时军事课由刘志丹亲自讲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水平。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等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学校共办三期,第一期1个月,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先后共培训军政干部200多名,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边区政府工作,都成了陕甘红军和南梁根据地的中坚,有效地加强了军队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

在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部队收编了部分当地武装,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改造这些部队非常重要。为了改造这些部队,红军领导和战士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计划地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的反动、卖国行为。军队中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提高这些人员的觉悟,坚定他们的立场,起了重要作用。

(三)

陕甘边区党政军组织在发布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和法令的同时,也发布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法令,明确规定陕甘边苏区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指出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明确了边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南梁政府十分重视以列宁小学为代表的根据地普通教育和群众教育。事实上早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初期,根据地领导

①:《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第50页。

人为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就着眼于培养下一代，促进群众教育的工作。刘志丹精辟地论述了知识的重要性，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总结了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起义总是失败”，“人无知识就变得愚昧狭隘”。^①



列宁小学课本

为办好普通教育，当时担任南梁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亲自发动群众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并派张景文、贺建德担任列宁小学教师。

南梁办起了学校，上学不要钱，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学，这在南梁是一件破天荒的喜事。在土地革命中翻了身的南梁人民，用红布给孩子们缝书包，把孩子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高高兴兴地送他们到学校去上学。当他们看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进学校，听着张景文老师给孩子们朗读“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的课文时，不禁热泪滚滚，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苏维埃政府。

当时，列宁小学的条件是很艰苦的，只有两栋房子和一孔窑洞做教室。张景文就带领 60 多个学生，自己动手垒土台，支木板，解决没有桌凳的困难。为了使教材通俗易懂，张景文和贺建德就自己编写。他们采取诗歌或顺口溜的形式，使教材朗朗上口，好学好记。比如政治教材有一段开头两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课本不足，张景文就替学生抄。纸张、笔墨困难，她组织学生把大地当纸，用一根削尖了的山椽柳木棍在地上写字。当张景文看到学生们有的在念“我爸爸是农民，在地里种地；我哥哥比我大，拿刀杀敌人”，有的伏在地上用木棍一笔一画地写着“拿刀杀土豪，拿枪打白军”，有的拿着红缨枪、木刀练习格斗、劈刀，准备练好本领，长大参加红军的时候，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一天，张景文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取出里面夹着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2 页。

的一张照片来,对学生们说:“你们来看。”学生们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个小娃娃。就问张老师:“这是谁家的娃娃?真乖。”“我的呀。”张景文对孩子们亲切地说:“我的小孩再过几年就会像你们这样大了,也可以上学了。我也和你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想着孩子长大了能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你们说从小不学好行吗?”学生们齐声回答:“老师,我们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成为对革命有用的人。”张景文洪亮的嗓门,和蔼的面容,通俗易懂的讲解,深深地吸引了深山沟里的穷孩子。那时候,在列宁小学的还有红二十六军三团的12名先锋队员,他们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娃娃。张景文对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很关心,衣裳破了她亲手一针一线给补好,手脸脏了她一把一把给孩子们洗净,甚至娃娃身上有虱子,她晚上坐在油灯下一个一个给抓掉。孩子们都喜欢她,敬重她。

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根据地的领导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学校讲课、作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元送给列宁小学作经费,习仲勋又从边区政府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以解决学校教学的需要。列宁小学在张景文、贺建德、高敏珍、胡兆阳等学校领导和教员的努力下,在南梁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校学生由1934年3月最初的10多名增加到了1935年春的60多人。从



新建的列宁小学里文楼

1934年3月至1949年9月建国前的15年时间里,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初级小学,共培养毕业生210多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建设培养了有用人才。

作为南梁政府的教育单位,列宁小学将教授学生知识与宣传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培养莘莘学子与唤醒群众的革命觉悟密切地统一起来。学校通过给同学们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这样的内容,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传播了革命思想,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列宁小学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为培养学生保卫革命成果的军事能力,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军事课程。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学校除教学生文化外,还带领他们参加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舞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陕甘边苏区。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起来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他乡、村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陆续创办了列宁小学,推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传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

为全面提高陕甘边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党和政府非常注重发展成人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增加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各个地方相继成立了成年人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如华池县各区还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在南梁、刘坪、白马庙、柔远等地办起了16处扫盲识字班和夜校。在教学内容上,成人教育在识字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这些举措最大程度上使农民和战士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大力发展了革命教育事业。

(四)

通过出版红色刊物来推动党的宣传工作,既体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对利用新传媒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体现了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能够得心应手利用新传媒方式开创宣传文化工作的新局面,又表明了根据地文化建设,乃至整个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激

励人民群众,1934年秋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创办了机关报《红色西北》,为八开二版,不定期出版。1935年1月20日,陕甘边特委又在南梁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的《红色西北》,以黑、红、蓝三色油墨套印,编排精巧,图文并茂,表现了根据地在刊物印刷和出版方面的力量。主要刊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一些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对于《红色西北》的出版工作,根据地领导倾注了心血,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蔡子伟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经常为《红色西北》撰稿,他们还派人设法搞来油印机和质地较好的有光纸、蜡纸和油墨,保证了刊物的印刷质量,使这个刊物受到党政工作者、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欢迎。领导人的关注和根据地建设成果共同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陕甘边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宣传事业。正如《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宗旨所说“为了使广大党员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把握上铁一般的团结起来,

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提高每一位党员的政治水平,传达党的经验教训,交换党的工作方法,并转达一切政治及群众斗争的消息,以引起党员的工作积极性”,“英勇的来领导千百万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争取西北以至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陕甘边特委和南梁政府创办革命报刊的初衷就是要利用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党的报刊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些报刊及时宣传、指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土地斗争,指导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使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它的最初阶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梁政府创办的刊物《红色西北》

六、南梁政府不朽的历史功绩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处于最黑暗的低潮时期,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在远离党中央以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西北革命的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的成功实践。南梁苏维埃政府以全新的姿态雄踞于国民党重兵把守下的陇东,不仅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西北红色根据地的领导核心,而且它的执政理论和政策法令,也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培养了人才。

第一,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广泛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存在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最后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执行了一整套符合人民利益要求的政策,因此被人民所拥护,为历史所选择。从南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发展,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脉络以及南梁政府作为一个局部执政范例



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

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南梁政府的全部政策、法令无不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维护。以土地政策为例,就充分体现了边区政府无产阶级政权性质,解决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保证了边区的党政军的供给,初步消灭了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陕甘边苏区土地比较集中。南梁一带69.2%的土地是地主的,67.1%的农户是佃户。这里出租土地1.8万多亩,每年收取租粮多达四五千石。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广大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发展的不同时期,土地政策始终是政权建设的关键环节,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及时颁布了《土地决议案》,其根本宗旨就是要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有地同耕,有饭同吃。同时又结合当地实际,首先废除债务,烧毁契约,然后是分配财产,诸如粮食、牛、羊等,最后分配土地,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民的根本问题,满足了其迫切需要,因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以后陕甘宁边区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为最终获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正是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的真理。

第二,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南梁政府成立后,为发展社会经济颁布的一系列政策,是陕甘边苏区领导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对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进行的初步探索,显示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萌芽。

南梁苏维埃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为着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而开展起来的。在艰难的实践过程中,以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主的领导集体,结合陕甘边革命的实际情况,紧紧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独立解决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开始;《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及《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其实践与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截然不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一切为了人民,体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萌芽。在分配制度上,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没有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

南梁苏维埃政府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积极鼓励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对农民实行免征粮和不派款的政策,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不足部分通过市场向农民购买。对红军,烈士家属和残疾孤寡老人实行政府救济,对“二流子”进行改造,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苏维埃政府还要求机关、部队兴办农场,开展种植养殖,自力更生,解决困难。通过努力不但解决了苏区军民的吃饭问题,而且粮食自给有余,经济有一定发展,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一成功经验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被推广,为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三,为最终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实现全面执政选对了道路,奠定了基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共产党人正确理解、践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成功体现。在如何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曾一度迷信“城市中心论”,想在一个或者数个大中城市获得政权,赢得革命胜利,进一步扩散到全国。实践表明,“城市中心论”的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诸多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相继因攻打大城市而失败的背景下,毛泽东依然选择了井冈山,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也是在不断克服错误路线,在不断的失败中自觉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历了渭北、寺村原、照金、南梁根据地的创建,最终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合并为西北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一成功实践从理论上证明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性,是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南梁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地方政权，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局部的成功执政和发挥了关键的历史作用，用实践回答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问题，廓清了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不当认识，为最终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实现全面执政选对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第四，为党后来成功实现全国执政积累了经验。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直到以南昌起义为开端，以八七会议为转折，开始独立领导革命。之前，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理解，缺乏独立领导革命的经验，结果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挫折和失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南梁政府的成立，就是立足陕甘实际，对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成功实践，基本思想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他们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局部执政的地位，实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政策的同时，不断克服“左”倾和右的错误，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政策，特别是南梁苏维埃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传承、发展，这无疑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虽然说陕甘边区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农村的政权，但是它的成功经验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对于实现全国范围的执政奠定了基础。

第五，为党后来实现全面执政锻炼了一批干部、培养了人才。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工作、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人的比比皆是。除了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许多人以后都成为党政军高级干部或国家领导人。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共七大时，陕甘宁边区代表团144名代表中，就有30多人在陕甘边根据地和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工作过。如习仲勋、阎红彦、高岗、马文瑞、杨森、杨琪、汪锋、张秀山、陈国栋、张仲良、吴岱峰、王世泰、贺晋年、张策、黄罗斌、张邦英、刘景范、高锦纯、马锡五、龚逢春、朱理治、郭洪涛、郭述申、唐洪澄、高长久、崔田夫、张达志、赵伯平、白如冰、蔡子伟、高朗亭、高峰、魏怀礼、白茜、慕纯农、王季龙、白炳忻、马明芳、白坚、范子文、李培

福、李子厚、李赤然、王兆相等人，他们不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梁苏维埃政府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锻炼、培养的干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这些干部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风范，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已经永载史册。他们披着一身陇东老区的黄土，汇入到解放全国的革命洪流中以后，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最后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乃至于为改革开放新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七、反“围剿”打出西北根据地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的中心向南梁转移之际，国民党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多次举兵进攻南梁地区。

（一）

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对南方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开始了向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在1934年内，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共有3次，全部以红军胜利而告终。由于红军转入外线作战，全胜后才回到南梁地区，所以在陇东革命斗争史上总称其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春，陕甘边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在蒋介石的指令下，陕甘反动军队仇良明团、王子义团、民团团总谭世麟部，直接以南梁地区红军为目标分兵“进剿”。耀县干部团、特务团、旬邑何高侯团、洛川冯钦哉部一个团及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以上共8个团、万余兵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一举扑灭陇东

革命的熊熊火焰。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 1300 多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刘志丹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决定由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南线之敌，他亲自率领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转入外线消灭正面之敌。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在陕西境内的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打击敌人，接着进入保安县衙家砭、崖窑歼敌一个营；突袭陇东境内的高桥、元城、赵家梁子民团获胜。接着，又抓住有利战机，在合水县西华池消灭“围剿”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歼敌 700 余人。此后，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作战，连获三里原、和尚原、瓦子川战斗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反“围剿”斗争。

(二)

1934 年 5 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军仇良明团一个骑兵团与谭世麟地方保安队互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形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区指挥机关。习仲勋等边区领导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附近群众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

杨子恒部的仇良明、谭世麟部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掠，烧毁房屋 40 余间，毁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没有转移的牛羊牲口、粮食、财物抢劫一空。在阎家洼、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捕捉乡村苏维埃政权干部、共产党员 30 多人，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习仲勋带领南梁人民团结对敌，保护干部，进行了英勇斗争。

红军部队依然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在淳耀之间的三里原，全歼敌何高候部两个连；于正宁湫头王郎坡，端掉敌民团老窝，活捉团总赵世坤并处死；激战五顷原高凤坡，冲破敌骑兵马弓章部而突围；在保安县的瓦子川，与国民党有“铁军”之称的高雨亭营组成的“敢死队”交锋，伤毙敌四五十名，缴枪一批，树立了红三团的声威。骑兵团回师途中，巧扮延安民团团总，入寨突袭，全歼高桥山寨的安寨民团 30 多人，缴获大批

军用物资。

夏末,骑兵团又在洛川交道镇追歼国民党四十二师一个连,对所俘三四十名敌兵经教育后释放。这几次战斗,其中陇东境内的高风坡战斗打得最为壮烈。三里原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就一直被敌马弓章的骑兵咬住,部队一夜北撤100多华里。到正宁的五顷原刚要埋锅造饭,敌骑兵追来,四十二师骑兵团与敌骑兵拼杀混战,王世泰率红三团一个排奋勇阻击,掩护大部队转移。在弹药将尽的情况下,红军钻进了茂密的梢林,留少年先锋队在高风坡阻击掩护。少先队临危受命,死战不退,30多人英勇牺牲,20多名红军战士被俘后被敌人拉到山河镇的老爷庙内活埋。战后,当地群众把牺牲的战士埋葬在高风坡上,并到梢林里寻找负伤战士,治愈伤口,送他们归队,表现出了军民鱼水深情。

10月间,敌人又纠集三十五师骑兵团、陕军警骑旅二团张廷芝部、三团张廷祥部、二五六旅五一二团、甘军警二旅六团,采取分兵蚕食、逐步向中心区推进的办法开始这一年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在刘志丹率领下,在吴堡川打了一个伏击战,接着奔袭曲子镇,攻打楼坊坪,回师南梁,取得胜利。当时国民党环县政府设在曲子镇,驻环县民团100余人,县保安队10余人,团头李恒泰、队长敬崇义无恶不作,民愤极大。陕甘边军委派骑兵团在庆阳游击队配合下,长途奔袭,于11月16日天亮发起猛攻,仅半个小时结束战斗。李恒泰、敬崇义被活捉,国民党区长朱文成被击毙,俘敌近百人,缴获长短枪近60支,我军无一伤亡。战后在曲子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李恒泰、敬崇义等3人。当晚红军撤离。经过长达一年的英勇奋战,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了习仲勋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爷庙的后庙,隐蔽在浓密的杜李树、杨树之中。当时发给部队的食品主要是“炒面”,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上一袋,以备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众多,军粮供应显得特别困难。为保证军粮供应,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来保证部队及后方人员吃饭问题。

这次反“围剿”斗争是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广大军民不仅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

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三)

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不仅使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而且使蒋介石也焦躁不安。1935年春,蒋介石急调陕、甘、宁、豫、晋5省军阀,计4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敌人的兵力部署是: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3个旅,加上陇东警二旅第六团共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战线,向南梁地区推进;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4个团摆在宜君、黄陵、洛川、富县、甘泉一带,固守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3个团进攻神府苏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进攻陕北苏区,晋军孙楚部3个旅和李生达部两个旅陈兵黄河东岸,堵我东进之路。

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统一的机构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习仲勋任工委委员,刘志丹为军委主席,谢子长、高岗为副主席。谢子长因伤病于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不久,又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周家硷会议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这次会议统一了两个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和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将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四)

2月18日,刘志丹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在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这次“围剿”的规模虽然很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弱点很多。蒋

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驱使非嫡系为先锋，而各派系又各有自己的打算，都以保存实力和地盘为目的，只有高桂滋部冒险进犯。打败高桂滋部队，就能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因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红军的作战计划。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进至耀县柳林地区钳制敌六十二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马鸿宾部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开辟定边、环县新苏区；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一带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五）

1935年1月15日，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向前推进。2月20日前后，陆续占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建立“战略村”，修筑碉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采用疑兵之计迷惑和打击敌人。他们在老爷岭的山头上搭起了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竖起了许多红旗。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活动；夜间，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袭扰，迫使敌人在老爷岭以西滞留达月余。

4月14日，第三十五师占领了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敌500多人紧紧追击转移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4月16日，习仲勋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被敌人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退到乔子川时，才摆脱了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仅有的5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在敌人“围剿”期间，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把粮食、灶具全部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起来。敌人杀害干部，活埋群众，焚烧房屋，企图

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及南梁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根据地人民以生命掩护革命干部和军队，使敌人一无所获。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敌人进行并村，实行法西斯保甲制度，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地主豪绅也乘机反攻倒算。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敌军猖狂地张贴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到习仲勋，赏洋2000块，马2匹；抓到贾生秀，赏洋1000块，马1匹。

在陕甘边党政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移到洛河川时，红军主力在外线向北、西、南三面进军。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南梁政府保卫大队在合水、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于悦乐黄大原的田岷岷消灭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的一个连，毙伤敌100余人。红三团和骑兵团在六寸原围攻马鸿宾二〇五旅几个连失利，红一团在金村原瓦扇子与三十五师马培清骑兵团也发生了一场激战。之后，红一、二团和骑兵团在刘景范等人带领下，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南线之敌。骑兵团东进宜川后，首先于延西川高桥一带在肤施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溃延安守敌李发福部和民团300余人，接着先后在三十里铺和松树林，收缴两处民团枪支100余支，得货物300余驮，随后在云岩俘敌民团兵48人，缴枪50余支、军服200余套。行军途中遇敌民团于绛头原，立即冲锋，压敌于屯石岷岷，聚而全歼国民党宜川民团250余人，当场击毙敌副团长马备三。骑兵团打出了威风，南下黄陵、韩城一带，迫使南线之敌不敢轻举妄动。红一团进军富县、宜君、中部一带开辟根据地之后，又返回陕甘边南区开展游击活动，迅速恢复和扩大了南区根据地。红二团在南梁根据地东北和西北部向敌发起攻势，连战得手后，又南下解放了吴起镇，接着奉命配合主力红军解放了靖边城，开辟了定边、靖边大块根据地。

(六)

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安定县白庙岔与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团，进行反“围剿”作战。在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于1935年5月7日一天之内连打两仗，在陕北杨家园全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营又一个连，毙敌50余人，俘敌450余

人,缴枪500余支,其中轻机枪20余挺。5月9日,又在马家坪毙俘敌人44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0余挺、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单军衣2000余套、银元数万枚,以及大批医药器械。主力红军得到充足补给,士气大振,敌人则丧胆退缩,安定县也遂获解放。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王家湾召开会议,决定主力红军转外线作战,争取“红五月打通陕甘边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会后,主力红军直捣延长守敌高桂滋部骑兵连老窝,29日延长县解放,生俘国民党县长和骑兵连长,毙俘伤敌骑兵、民团兵和矿警队4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5挺,战马100余匹,无线电台一部。延川守敌闻风弃城而逃,延川县获得解放。6月17日,夺取安塞县城。28日,主力红军向靖边城的井岳秀部一个营及县警队、民团军发起总攻,经过五六个小时的激战,大获全胜,生俘国民党县长、民团总指挥等,解放了靖边县城。保安守敌眼见大势已去,星夜逃窜。30日,保安县城回到人民手中。同年8月中旬,红一、二、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联合作战,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歼灭西渡黄河来犯的晋军孙楚、李生达部,毙俘伤敌2000余人,缴获轻机枪69挺、迫击炮6门、枪械1900余支,首开西北红军战史上一战歼灭敌一个整团又一个旅直属队、一个营的辉煌战例。西北主力红军在刘志丹等人的指挥下,连战获胜,所向披靡,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共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多人、民团武装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并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也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9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苏区范围扩大到北起神府、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区域,人口约有100万,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北线敌人彻底失败,南线敌人亦龟缩回去,敌马鸿宾部也从南梁退出。9月,红军胜利回到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此时,连成一片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即为西北根据地。其中已经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正、新宁、永红、赤安、安塞、淳耀、赤水、甘洛等;建立县级临时革命政权的有合水、靖边、富西、富甘、肤甘、肤施、中宜、红泉、赤川等。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其游击区包括陕甘两省30个县,总人口超过100多万。

9月15日,长征到达陕甘的红二十五军进入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赶到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9月17日,“西北代表团”在永坪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陕西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师部和两个团,俘敌37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苏区。同年11月,经过长征落脚到陕甘的中共中央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为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苏维埃运动,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秦邦宪)任主任;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闻天任书记;成立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周恩来兼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成立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刘志丹、肖劲光、阎红彦分别任军长;撤销陕甘晋省、陕甘边区、陕甘边南区党政机构,成立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至此,统一后的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得到了健全和完善。

陇东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东土地革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统一后的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最完整、最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成为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成为党中央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第六章

张闻天著文阐述红军落脚点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000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向西突围的征途。直至1935年9月，近一年时间，红军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频繁作战，往返奔波，没有得到丝毫休整，红军大量减员。因此，为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不利局面，寻找一个稳定的落脚点和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5年9月17日拂晓，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8000余人，突破天险腊子口，于20日下午到达哈达铺。张闻天依据红一军团二师在哈达铺缴获的敌人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于9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哈达铺会议之际，撰写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及时向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介绍了包括陇东根据地在内的陕甘边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为党中央确立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移动的红军急需落脚点

自从红军从瑞金出发以来，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着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部队减员十分严重，革命力量受到重创。直至榜罗镇会议最终决定到陕甘根据地落脚之前，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究竟上哪儿去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开始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二、六军

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根据当时情况又予改变,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①红军的战略目的地曾经过七次大的抉择和变更。特别是张国焘同党中央分道扬镳,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一个紧迫的问题提到了决策者的面前:张国焘南下是逃跑,我们北上是为了抗日,那么到哪里去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呢?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境内,刚刚走出草地、又面临国民党重重封锁的不利境地的红军,再次把寻找一个长期稳定的落脚点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中央先后召开了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对红军今后的去向进行了讨论、研究。

红一、三军团1935年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的俄界。为克服张国焘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机局面,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俄界会议继续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毛儿盖会议的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北上红军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域。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5人小组,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俄界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北上的方针,将陕北提到了红军行动的议事日程中。但仅仅提出了经过甘肃东北或陕北,没有具体确定将这里作为红军的落脚点,而是提出了在靠近苏联的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没有明确提出革命根据地的具体位置,对今后的行动方向、目标和任务也没有进行详细部署。

1935年9月17日凌晨,中央红军一军二师四团一举攻克位于迭部县境内的天险腊子口。20日全部经岷县漩渦、大草滩到达哈达铺。^②在哈达铺期间,先头部队找来一些报纸送给毛泽东、张闻天阅读,主要有七、八月份的《大公报》、《晋阳日报》、《山西日报》等。这些报纸中有一

①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张刊登着所谓的《“匪区”略图》，并且报道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山西日报》上面刊登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讲话，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 20 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张闻天将报纸上披露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作了简要摘引并作了分析，写出了《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书笔记，得出了“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的结论，并提出了“同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和领导”的前进方向和任务。据此，他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开会商议，改变此前于 12 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即认为“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

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了国民党报纸刊登的消息，比较具体地掌握了陕北苏区的现状和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已到陕北的情况，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到陕甘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巩固陕甘苏区，建立根据地。

二、陕甘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

张闻天，化名洛甫、洛夫，笔名刘云、平江等。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1900 年 8 月生，上海市浦东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31 年 2 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职。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中负总责，长征途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35年1月20日下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毛泽东与张闻天同住在镇上“义和昌”药店后院一座幽静的平房里。第二天,两位共产党的首脑人物,在这家弥漫着药香的中药铺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从鲁大昌少校副官那里弄来的国民党报纸,寻找中国革命的动态和去向。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人说是从一张《山西日报》上发现陕甘苏区的,有人说是天津的《大公报》,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但是,张闻天依据红一军团二师在哈达铺缴获的敌人报纸有关报道,于9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哈达铺会议之际,撰写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书笔记确是言之凿凿,毋庸置疑的真实存在。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研究长征落脚点问题之后,这篇文章即于翌日全文刊载于在榜罗镇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署名洛甫。这篇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在长征红军中普遍开展的进军陕甘苏区的政治动员。张闻天《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①全文是:

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之,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23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5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命运,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7月29日社论《论陕乱》)

① 高文、巩世锋编:《陇东老解放区通讯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山西老军阀阎锡山于7月23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上也说：“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势。”“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编为赤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见7月23日《大公报》）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师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猴小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慑，以防范徐海东部匪部，官兵之力量削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20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见8月1日《大公报》）

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该报同日有这样的记载：“徐海东于7月中旬率匪3000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蓝田，出雒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

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未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从反动报纸上来看，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尤其在庆阳五属（即庆阳、环县、合水、宁县、正宁5县）“该地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面辽阔，人烟稀少，山脉起伏，桐林密茂，昔在升平之际，犹复跳梁出没，近年国家多故，共匪乃据险发展其意志。于是时而猖獗，时而敛迹，行动诡秘，声东击西，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击此则彼窜，击彼则此逃。遇大军则化整为零，隐匿深山，遇小军则啸聚猛扑，施其淫威。”

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普遍地发展着。这种发展使所有反动统治的领袖张惶失措，拼着性命动员

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同苏维埃与红军作斗争。7月27日起在西安所召集的“西北剿匪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然而一切这些是徒然的，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间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8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补充决定》）。这将大大地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

反动统治消灭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切企图都是徒然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

普遍的水灾，国民经济的崩溃与破灭，帝国主义者、豪绅地主与官僚军阀的残酷统治剥削，是造成陕甘以至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

《大公报》的统计：“陕西全省92县，灾区约占三分之二，灾民约达200余万，均辗转流离无法谋生，减为空前浩劫。”（7月7日）今年陕西省水灾的惨状是我们不能用言语形容的。

在邻近陕西省之山西省情形也不见佳，阎锡山在7月29日纪念周报告中曾叹息地说：“山西自身，为国民经济崩溃之身。山西国民经济已成破产之势，十室九空，十村九困。在此情形下，邪说流言最易煽惑，此尚为肤皮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谓心腹之患者为何？即土地私有是也……土地制度给共党露下一个大空隙，故共党与国家独制枪炮军火之下而犹能突占城镇，组织政府，抵抗国军。且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数十倍以上的民力，数百倍以上的财力，数千倍以上的械弹补充，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究其所以然乎？今日山西共祸业已临头，确非16年之景象可比。”

“现社会对于共产党露有大空隙，已如上述。山西除露有此大空隙以外，而有十室九空农村破产之坏现状，再加上左倾学说及失了统驭的教育，大家思想虽无外来之赤化势力，就是本省的赤化势力，是不是要一天大于一天。无论何人不敢说不是一天大于一天。既是一天大于一天，总有发生危险之一日，今更加以邻省既有赤化的武力，影响于共产

党之火焰甚大，共产党之火焰愈高，而坏人之火焰亦愈高，若陕乱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即不堪设想矣。”（7月31日《大公报》）

事实即是如此明显，就是反动统治中最顽固最封建的代表阎锡山也不能不有如此悲痛的自白。

反革命的头子蒋介石对于全中国革命运动也不能不有这样的估计。他在给各省军阀的电报中公开地说：“现在国步维艰，欲救危亡而剿匪实为当务之急。凡为军人均应激发天良迅完任务，乃查数月以来，各方剿匪成绩，不但毫无进展，致贼势益张，零匪蜂起，潜滋极大，隐患堪虞。”（这是△△△于7月28日转给他的部下的蒋介石的“剿△△参蓉电”，这次我们在缴获敌人材料中捡得的。）

这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自白证明：不论敌人怎样拼命，然而他们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

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基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

刊登张闻天《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的《前进》报，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机关报。1935年6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创刊于四川西部地区。油印，32开，不定期出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期间创办的重要报刊之一。目前仅发现4期。第1、2期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编，第3、4期由陕甘支队政治部主编，先后在四川、甘肃境内出版、散发。

三、榜罗镇一篇文章定乾坤

陕甘红军的消息，使苦苦探索长征去向的中央领导人眼前豁然开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榜罗镇会议上，张闻天撰写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及时向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介绍了包括陇东根据地在内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为党中央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边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2日上午，在毛泽东住处“义和昌”药铺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研究行动计划，拟乘敌

人兵力空虚之机，突破渭河北上。同日下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和改编红一方面军的决定。将红一方面军7000余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史称“哈达铺整编”。

9月26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成功突破渭河封锁线，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甘肃榜罗镇。榜罗镇位于通渭县南部，地处通渭、陇西、武山、甘谷四县交界地域，四周群山环抱，居住着几百户人家。历史上曾是通渭四大镇之一。毛泽东住在了榜罗镇小学。

9月27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在榜罗镇小学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等五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审时度势，反复研究，改变了俄界会议上决定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在哈达铺会议的基础上，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到陕北去的决策，明确决定与陕甘边红军会师，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

榜罗镇会议也由此成为我党历史上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的过程中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党的建设、红军的发展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28日上午，陕甘支队连以上军政干部集结在镇上一个打麦场，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毛泽东指出了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严重性，讲解了陕甘边根据地红军的情况，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和北上抗日的意义，要求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注意扩大新战士等。提出要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迅速到达陕甘边根据地集中。毛泽东宣布，到陕甘边根据地去，会合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弟兄们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会议从凌晨五点开始直到中午结束。各连队随即召开支部会和大会，向每个士兵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9月2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大队占领通渭县城，这是红军自进入翻过雪山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县城。29日，陕甘支队主力进驻县城。鉴于当时敌情不十分严重，党中央决定在通渭休息三天，以恢复体力，继续穿越西兰大道，并从政治上、物质上做好进入陕甘苏区的准备。毛

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日晚在县城文庙小学接见了一纵队第一大队先锋连的指战员，毛泽东朗诵了新作《七律·长征》。

30日下午，毛泽东在国民党县政府大厅里主持了领导干部会议，再次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出了部队进入陕甘苏区的注意事项。支队政治部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陕甘支队在通渭期间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党的战略方针和陕甘支队的行动计划，充分认识到陕甘边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各部队还购置了布匹，添置了衣服和鞋袜，做了干粮；同时，鉴于六盘山区驻有敌骑兵的情况，各部队还进行了打骑兵训练，从精神和物质上为跨越西兰线，胜利到达陕甘，做了充分的准备。10月2日凌晨二时，经过休整的陕甘支队从通渭县城出发，踏上了进入陕甘苏区的最后征程。

榜罗镇会议是中共中央长征后期召开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把陕甘苏区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新局面的出发点。使红军尽快结束了一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为北上抗日奠定了坚实基础和可靠的根据地。

四、陕甘苏区成为红军落脚点

陕甘根据地原有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等革命武装，到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使红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蒋介石武力“剿共”的企图难以实现。1935年10月，红军十五军团又胜利地进行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军事条件。

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还因为其具备红军立足的经济条件和地理条件。陕甘根据地虽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落后的地区，但它当时已有1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100多万人口，又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可耕地多，发展农业潜力大，丰富的地下石油、煤炭已有所开采，盐的储量也十分丰富。这些经济条件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有一定基础和余地。在地理和地形条件方面，陕甘根据地北

面和毛乌素沙漠相连,南面延伸到渭河流域,西面紧接着六盘山麓,东面则以黄河与山西分界。这一地理位置对红军来说,北望华北,南接关中,又处在抗日的前哨,回旋余地大;且北面的无垠沙漠,使敌难于用兵,东面的黄河天险隔断了华北之敌,使红军避开了四面受敌的窘境。根据地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国民党军队的机动性大受限制,而红军惯用的游击战、运动战却可大显身手。这无疑为红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地形地理条件。

陕甘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他们在外有庞大的敌人进攻,内有“左”倾错误危害的严酷环境中,孤军奋战,忍辱负重,终于成功地创建并完好保存了这块根据地,创造了长征落脚点的地域条件。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后得以保存的“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

有人说,陕甘根据地之所以会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由于“这里的党组织和红军距离当时‘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较远,错误的东西难以较快影响到这里”^①,因而受到“左”的错误危害较轻。这种认识是不符合陕甘边区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当在1933年夏季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时,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遭到了灭顶之灾。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的强迫命令下,脱离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几乎全军覆没;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杜衡等人叛变,陕甘一带的党组织和党员受到严重损失;8月,渭北游击区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陷落;10月中旬,照金根据地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陷落。这就是说,早在红军长征前,陕甘边区的根据地和红军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受到的挫折和失败一点也不比别的根据地少。因此,创建“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一个可靠的落脚点的任务在当时也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

面对一连串的失败,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红军和革命群众毫不气馁,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在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排除“左”倾错误干扰,克服了超乎想象的困难,正

^① 《陕甘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第39页。

确制定了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三路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的战略决策,使南梁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自从南梁革命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8个县的农村,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陕甘边区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认真开展扎实细致的群众工作,提出并施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促进了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建设的深入开展,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利地支援了前线,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武装斗争得到了广泛开展,主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5000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平方公里。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4万大军对陕甘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经过5个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终于实现了为长征红军提供一块落脚点的目标。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向西北实施战略转移时,陕甘根据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余万大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疯狂“围剿”。正当反“围剿”战斗处于紧要关头,“左”倾错误的阴霾又开始笼罩在陕甘边苏区的上空,刘志丹、习仲勋身陷囹圄。在生死考验的危急关头,刘志丹、习仲勋想到最多的问题还是保存这块根据地,保住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正如1980年10月11日,李维汉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时指出的那样: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由此可见,刘志丹、习仲勋为创建和保存陕甘苏区这块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无私的牺牲。*

与此同时,陕甘边苏区及时自觉地用各种方式给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送陕甘边根据地的信息。1933年后,陕甘边区的上级党组织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陕甘边区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负责干部曾多次派人去西安、上海试图用各种方式建立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的联系渠道。据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策回忆,仅他

见到过的就有两次：一次在1933年打合水前，红军在黑慕原时，师党委曾派秦武山到关中国民党统治区找陕西省委。另一次是1934年三四月间，在荔园堡的呼志录（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粮食委员长）家中，由张策执笔，在纸烟盒里的那一张很薄的纸上，用很小的字写明陕甘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简要情况，派了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解放后张策与金海旺一起工作时，张策曾听金海旺谈到那时有个陕甘同志找党中央，但因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紧张，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这个同志就在上海拉人力车维持生活。总之，因各方面因素限制，在很长的时间内，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寻找上级党和中央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扩大红军的活动范围，形成一定的声势，制造令人震惊的舆论效应，不失为一种间接地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沟通信息的有效方法，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造成了信息上的有利条件。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二十六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向敌人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势。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敌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会合。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见城内外一起响枪，不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曲子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

不久，红军主力又长途奔袭长武县城。1935年1月，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

插涇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道原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装成敌军,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战士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进行了不到1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100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1000多元及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涇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团趁胜消灭了窑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原又抓获了3名劣绅,浩浩荡荡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响甚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西北的交通要道西兰公路,对陕甘两省造成极大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上说,陕甘边区的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几次战斗客观上起到了沟通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联系的作用。1935年以后,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活动成为全国新闻关注的焦点。由于各地报纸对陕甘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才为张闻天著文阐述落脚点提供了信息资源,才有了《前进》报上署名洛浦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文章。

中央红军长征入甘后,党中央明确做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对于还在艰苦转战,寻找立足点的红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陕甘大片的苏区和众多红军的存在,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从另一方面来讲,红军长征已历时12个月,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5个省,其兵员补充,伤病员医治,武器弹药、粮秣补给都十分困难,部队也已十分疲劳,急需一个根据地使部队得到休整,而陕甘根据地就适应了红军的这一要求。所以,把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当时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也是红军当时的迫切愿望。

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正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江南移至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中坚力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

解放运动的迅速到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第七章

铁流万里到达陕甘苏区

万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创举。在历时两年的艰苦岁月中，红军历尽千难万险，长驱 25000 里，纵横 15 个省，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到达了陕甘苏区，形成了铁流万里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壮丽画卷。

一、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苏区

红二十五军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张国焘擅自率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向川陕边界转移后留下的一支地方武装。1935 年 7 月 7 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的消灭整批敌人”。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批示。同时希望中央派一些得力的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并确定以后永久保持往来的方法。

当红二十五军领导从“六月十三，红军出山”的民谣里知道红二十六军于7月中旬曾西出过秦岭，并从一张《大公报》上发现红军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出发。他们一口气向西走了30多公里，停在一个叫沔峪口的地方。这时，他们从收到的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文件中，知道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向北行动的消息。于是，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沔峪口召开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红二十五军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3000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战略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并为中央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在陕甘苏区落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沔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从这里出发，8月3日经陕西凤县穿过省界进入甘肃两当县。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在泾川又全歼马开基团，并击毙马开基，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在红二十五军官兵的心中，身先士卒的吴焕先永远是一面大旗。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河，找了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安葬了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部队带着悲愤的心情由平凉四十里铺渡过泾河，上草峰原进入陇东镇原县。部队到达镇原后袭击了新城、平泉国民党镇公所。

9月1日清晨，红二十五军从平泉出发，至姚川分为两路。一路沿洪河东下，经桃园、张毛，翻过原郑，下茹河川，北上临泾原，经毛家铺、唐家洼，过太平，绕西峰镇向合水板桥进发。另一路翻过申家原，下茹河川，经路家坡，西绕县城，继上临泾原，越交河口，过孟坝到驿马关奔合水板桥东行。3日上午，在庆阳赤城原畔与尾追的马培清部交战，毙敌10余人，击退敌兵。下午翻越太乐沟，晚上进入合水板桥镇宿营。军

部驻板桥西南面清凉寺的窑洞中，二二五团在紧靠军部的村落中驻扎，二二三团在曹家原山梁的板桥堡一带宿营。徐海东副军长走进军部驻地的窑洞就打开地图仔细研究起来，并请来几位老乡询问当地乡俗和敌情，此后，同戴季英参谋长带领各团、营、连长上山查看地形，一起商定了第二天的行军方案。

9月4日凌晨2时，二二三团指战员就起床打扫村头、院落卫生，清点归还借老百姓的东西。凌晨3时许，徐海东带领二二三团先行出发，戴季英带领军部及二二五团集合后，派出二二五团三营担任警戒。他正在向部队讲话，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骑兵团蹿过马莲河尾追而来，直扑红军集结的板桥镇，遭到在锦坪原头警戒的二二五团三营的顽强阻击。马家军骑兵团长马培清命令骑兵一、三营顺川冲击，骑补充营向北进攻锦坪原头二二五团三营，步兵马维麟营向南进攻，骑二营作机动兵力待命。

这时，戴季英讲话还没有结束，在军长程子华的催促下部队才紧急出发。二二五团兵力还没有展开，就遭到马家军骑兵的猛烈袭击。在这危急时刻，戴季英指挥军部带领二二五团一营先行撤出战斗，留下第三营掩护撤退。



板桥战斗遗址

徐海东副军长在带领二二三团东去的路上,听到板桥方向枪声越来越密集,立即骑大白马返回板桥镇北山梁察看敌情。军医院院长钱忠也带领卫生队的15名医护人员随徐海东赶到前沿阵地抢救伤员。二二五团三营由于多半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被马家军骑兵一冲就溃散了,面临被动挨打的危险。徐海东看到形势危急,急忙让警卫员王文峰赶去传达命令,让二二三团停止前进,二二五团一营折回来投入战斗。锦坪原全是开阔地带,二二五团二、三营被马家军骑兵团几面围攻,伤亡惨重,团长方炳仁阵亡。面对险恶形势,二营营长陈彦启劝徐海东快走,徐海东坚决不走,继续指挥3挺重机枪和警卫人员一起打击敌人。马家军骑兵反复冲击,致使红二十五军一时难以撤离险境。徐海东命令三营何教导员带领部分战士守住原边的一个墙圈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其余战士转移。但是马家军不去攻墙圈却直奔徐海东而来,攻上了锦坪原。徐海东的马夫看到情况危急,强行拉他上马,又在马屁股后狠抽几鞭,大白马飞奔而去。这时,马家军骑兵团长马培清上到锦坪原头督战,看到一骑大白马的军官带一卫兵向高粱地边奔去,急令身边3名传令兵去追,随即又命令一股马家军骑兵追击。马家军骑兵嚎叫着“活捉徐海东”蜂拥而上,谁也没有开枪。

二二五团在营政委刘震随军部往曹家原山梁撤退时,通讯员传来徐海东命令:一营赶快占据左面山头,掩护三营撤退,刘震一面派人通知韩先楚,一面带一连奔往左面山头。这时三营已开始撤退,刘震在望远镜中见到徐海东被马家军骑兵追赶,追骑距徐海东仅四五十米,在这种情况下,他立即命令一连向马家军骑兵猛烈射击,掩护徐海东脱离了险境。徐海东看到军部已安全撤出,后卫也很巩固,这才上马离去。板桥战斗是“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在陇东所经历的一场最为惨烈的战斗。全体指战员英勇抗击强敌,共歼敌300多人,红军也损失惨重,二二五团团长方炳仁壮烈牺牲。板桥战斗以后,为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五军决定急行军,经合水老城、张举原、蒿嘴铺到达东华池,进入豹子川和南梁一带。

红二十五军到达陇东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发动根据地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的群众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送羊,热情慰劳,到处洋溢着“围定亲人热炕上坐,滚滚米酒捧给亲人喝”的动人情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

仲勋和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到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习仲勋主持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和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与边区军民一道参加会议。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眉户剧,款待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徐海东看后连声称赞说:“好戏!好戏!”^①在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热心照料下,红二十五军将士很快恢复了体力。

9月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华池县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副军长徐海东任军长,军长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兼省委书记。9月8日,红二十五军离开豹子川向陕北挺进。9月15日,胜利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在陇东行军共11天,途经镇原、庆阳、合水、华池4县的16个乡镇,行程约230公里。

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个高峰六盘山,由宁夏固原踏上了挺进陇东的征程。在庆阳市境内经过镇原、环县、华池三个县的12个乡镇,40多个行政村,110多个自然村,给庆阳人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0月9日,红军到达镇原县武沟乡的孟庄时,天已擦黑,战士们就地宿营。刚刚吃过饭,忽然附近堡子城头上有人朝营地放冷枪,一打听,原来是孟庄的恶霸地主刘杰、刘继元父子。刘杰父子听红军要来,躲进了一个土堡子,想凭此骚扰,偷袭红军。这个堡子三面临沟,一面挖有4丈多深的沟壕,是过去群众躲避土匪的地方。红军摸清底细后,派出战士击毙了刘继元,活捉了刘杰,为当地群众除了一害,并没收100多只羊,几十石粮食。红军在村子里张贴了“唯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等许多标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10月10日,当红军主力部队行至唐家原、塌儿洼一带时,国民党马

^① 张文华:《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

鸿宾的一队骑兵追了上来，红军立即予以阻击，打死打伤敌军300多人。这次战斗中，红军中有两个中年女兵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兵，因长时间行军脚烂腿肿难以行走而掉了队，农民虎全州把她们接到家里养伤。不几天尾追的敌人就进了村，挨门挨户搜查红军掉队的士兵。虎全州临危不惧，就在敌人将要搜到他家的时候，他机智地把三个红军安全转移。敌人走后，女红军战士怕连累了他们，要求动身赶队伍，虎全州见她们伤没有痊愈，死也不让走，三个女战士只好又留了下来。虎全州每天爬到山崖上采集草药精心护理，三个女红军的伤在虎全州的照料下日见好转。她们也闲不着，和村里群众聊天，给人们讲革命道理，教孩子们唱歌。她们教的歌是：“当兵要当我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长官士兵饷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兵要当我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打倒土豪分田地，我们穷人得翻身。”三个女红军的伤在虎全州的照料下全好了，她们含着热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虎全州家和唐家原村，她们教唱的歌至今还在群众中传唱。

三岔是镇原县的一个小镇，因北有马家河，西有米家川河，两河相汇又成为向南而去的蒲河，故取名三岔。这里依山带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宋代杨家将修建的城堡、紫禁城等遗址。



毛泽东在三岔镇住过的天主教堂

镇上有20多家私人杂货店,其中有两家是洋杂货店,还有一处不大的天主教堂。红军的先遣队进入三岔,了解到距三岔5华里的南山湾堡子驻有敌人的保安队,一共有23个人。这个堡子一面靠山,三面临沟,地形险要,能攻能守,堡子里的敌人也已经有了准备。如果不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过来后就要受到骚扰,特别是毛泽东主席还要在这里住宿。先遣队立即组织围袭,很快摧毁了敌人的工事,活捉了敌保安队营长白家惠和所有的敌军,并当即处决了白家惠和豪绅杨邦俊、白秀海、李三茂等,没收地主李藩青羊130多只、牛7头、粮食20多石,补充了部队给养。随后,红军主力部队到达三岔后,安全地住了一天,没有受到敌人骚扰。当晚,毛泽东住在那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彭德怀和叶剑英等住在河对面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红军兵分两路离开三岔北上。一纵队到达玄城沟的赵家湾,根据掌握的敌情,先后在连家川、陈家坝和前台活捉了固原民团团团长武双德及环县民团团团长张文杰,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弹药,把没收来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还没收了敌虎洞分区区长黄天俊的200多只羊,当晚军民一起进餐。据说,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郑家沟的张永印家里。

玄城沟是个长90多华里的峡谷,沟底有小溪,弯弯曲曲,泥泞漫道,十分难走。当地有一首民谣说:“玄城沟、峡谷口,弯弯曲曲水长流,七十二道脚不干,人人到此都发愁。”可是英雄的红军踏着泥沟走过来了。据说红军过后,沟底的溪水和泥泞都被沾干了。

10月14日下午,红军到达玄城沟口,靠近了环县河连湾和史称中原四关之一的北萧关洪德城。自古以来,萧关是庆阳、环县通往宁寨的必由之路,民谚说:“提起洪德城,天下都有名,一人把住关,万将难通行。”从汉代起这里就一直有重兵镇守。当时国民党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就驻守在河连湾、洪德城一带,筑有坚固的碉堡土楼,据险扼守,妄图拦击红军。红军到达后分析了敌情,兵分两路,神速合击,经过3小时激战,击溃了驻守在萧关古道上的顽敌,歼敌近百人,打通了北上的道路。

10月15日,红军横刀跃马,纵横驰骋,一举突破敌人西兰、平固公路两道防线后,分兵急行。一纵队经万家湾、曹家湾至耿湾宿营,16日经无量山、慕家油坊进入陕西定边县木瓜城到吴起镇。二、三纵队经齐

家原、许家原，连夜赶到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环县兴隆山宿营。这里又称老爷山。从山底到山顶高达10余里，山上有始建于明清之际的一座古庙，计有大小庙宇楼阁70余座，依山而筑，逐级升至顶巅。这座飞檐翘壁、巍峨壮观的古建筑群，规模宏伟，古朴庄重，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那天晚上，红军司令部和电台工作人员的办公地方就设在这座庙里，叶剑英、邓发、蔡树藩、张经武等领导同志就宿营在神台脚下。为了不打扰寺院内的和尚，广大红军指战员都露宿在寺外，红军尊重宗教，露宿野外，不擅入寺院的行为在当地群众中一直被传为佳话。

10月16日，红军部队离开了兴隆山，他们通过环县的天桥、华池的艾蒿掌、铁角城，19日进入陕北吴旗县，结束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在庆阳境内一共行军8天，行程260多公里。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险的远征，不怕牺牲的远征，传播理想的远征，红军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这种革命理想，给陇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后来进一步发展、扩大和巩固陇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兴隆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三、党中央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千里雷声万里闪，
中央红军到陕甘。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

1935年9月，正当中央红军挺进陕甘根据地的时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决定更加猛烈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根据地大搞“肃反”。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他们开始则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继之则干脆给他带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原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苏区县委书记及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遭严刑逼供，被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200多名干部。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虽经多次严刑拷打，仍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10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刘志丹骗离前线。刘志丹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遇见从瓦窑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所在地）来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具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给通信员，说：“你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扬鞭，过家门而不入，毫不犹豫地直奔瓦窑堡，打算向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能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投入监狱。“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

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和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刘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随着刘志丹、高岗的先后被捕，“肃反”大网向习仲勋、杨森、黄罗斌、刘景范、马文瑞等人撒来。他们毕竟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中有较高威望，所以对他们也采取了诱捕的方式。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和年仅5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株连入狱。在狱中，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坚决不承认刘志丹以及陕甘苏区的战友们有什么“右倾取消主义错误”。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戴季英说，张秀山是“粪坑里的石头”，连续提审张秀山，张秀山几度昏死后仍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罢！”张秀山的哭声，连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震动不已^①。

从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红二十六军及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60多人几乎悉数遭到清洗。甚至连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长王兆卿是著名的“无定河畔六烈士”之一，像这样的红色革命家庭也没有躲过“肃反”的屠刀^②。

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被关押在王家坪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备受煎熬，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杨森、黄罗斌遭到诱捕后也被押到王家坪保卫局驻地，习仲勋仅仅是冲着杨森、黄罗斌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卫局看管人员的毒打。10月的西北已经进入初冬，夜晚十分寒冷，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被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殴打^③。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被昼夜不停地殴打。刘景范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

①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② 朱元石：《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③ 习仲勋：《红日照陕甘》，载《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坚定地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①

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同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在这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喜讯传来,军民振奋。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了解到西北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于11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陷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西北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刘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亲切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接着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他们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正确处理,并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的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不但及时纠正了西北根据地“肃反”错误,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退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配合,取得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振,根据地空前发展。在直罗镇战役中,刘志丹指挥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牵制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直罗镇战役。之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西北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新的西北革命委员会,统一管辖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刘志丹先后

①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自对王明及其“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义愤,多次要求刘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要求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胸怀坦荡,一再解释说服,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另一方面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刘志丹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但是“当时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1936年初,刘志丹让习仲勋转告受迫害的同志:“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全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没有彻底平反、职务上安排不公的现状,仍然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直到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才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194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根据十月(1942)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中央认为在一九三五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198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西北党史问题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刘志丹同志是一个胸怀大局、具有崇高

品德的领袖人物。”

四、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决策^①

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前的政治形势和亟待解决的军事战略问题急剧变化，极为复杂。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攫取华北，妄图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险；而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进行反共内战，阻止和镇压各界人民团体和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军事方面，当时红一方面军刚结束了万里长征，补给困难，地处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只有向外发展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但是，向哪里发展呢？当时在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内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

(一)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②。

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提出了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提出：红军应趁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于12月25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

^① 本节取材于李红喜，《建立以庆阳洪德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一文。《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集》（内部资料），第258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同时还指出，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开始东征。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先后取得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的胜利。同时，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彭德怀于3月10日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这时，对红军东渡入晋深为不安的蒋介石，为了达到消灭红军，并乘机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的目的，应阎锡山的要求，先后抽调驻河南、湖南等中央军约10个师，并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4月20日，红军在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和围攻后，集中于晋西地区。这时，国民党军也跟踪围拢过来，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

两天后，毛泽东在各路国民党军逼近晋西、即将发动进攻的情况下，致电林彪等各军团首长并告周恩来，指示“暂时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①。对晋陕甘的敌情作了全面分析后，毛泽东于28日决定暂时撤出山西返回陕北。

(二)

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渡河命令，到5月5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陕北苏区。5月5日，毛泽东、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7页。

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①

红军东征,历时75天,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枪。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20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这次东征中,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刘志丹同志,于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左胸中弹牺牲,时年34岁。整理遗物时,刘志丹的衣袋里只有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他的俭朴作风感人至深。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致悼词,亲扶灵柩安葬,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三)

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然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共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其首要目标是夺取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苏区的东北地区。面对新的军事形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分析当时军事形势后,提出在甘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527页。

经济观点着眼不应该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也是这样;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必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来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构筑堡垒,不能出东方。这样不能选择陕南、陕北、宁夏,因此“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①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次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出动。

为了进一步研究军事行动问题,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以陇东洪德城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战略设想。他说,我们在6、7、8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以30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与东北军隔开,与苏联隔开,在西北大干“剿共”。现在不能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矛盾消失,西北军阀派别多,于我们有利。我们的阵势在西,而蒋介石集中兵力在东。

因此,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最好是在白龙山及神木地区,变“太平世界”为“不太平世界”,方式以小游击队活动为最好,短小精悍,在每区中应有一大的游击队。

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做东北军的工作,为6、7、8月之三大基本任务。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以洪德城作为新的根据地的中心,其原因有三。

^① 《毛泽东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一是重要的地理位置。洪德城所属的庆阳地区即陇东，地处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依托，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从这里南攻关中腹地较易，而关中腹地向北仰攻较难，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心。同时，自陇东地区向西，是进入甘肃西部的重要通道。二是良好的群众基础。陇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部分，早在1927年就在这里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彬宁支部。后来，刘志丹、谢子长等在这里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在华池南梁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为陕甘苏区革命的中心。第三，经济条件较好，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带。

(四)

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为保卫陕北苏区，支援西方野战军作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同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战斗。

6月中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一〇五师主力按照蒋介石命令，由延安地区分3路向北进攻，企图进占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5日，分别进至安塞、蟠龙和永坪一线。这时，早已进至绥德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三军，也有从东北面配合行动的迹象。瓦窑堡危在旦夕。

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到瓦窑堡迟早必失，为争取主动，同时避免与东北军发生直接战斗，于15日决定中央及军委各机关撤离瓦窑堡，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

为了顺利完成中央机关的迁移，毛泽东进行了非常周到的安排。他在15日致彭德怀、林彪等各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命令彭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包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于16日开始。

为顺利进行中央机关的迁移，毛泽东责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委宋任穷以两连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之线以北的掩护，并肃清该地带的团匪。肖劲光以一团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之线的掩护，并肃清保安附近团匪。要求至少集中200只牲口，从16日起驮粮来杨家

园子,以便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并于吴起镇附近布置窑舍及粮食。

为防止因中央迁都洪德而在政治上产生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强调指出,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要求彭德怀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反攻。”^①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迁都的意义之所在,就是为了巩固以洪德城为中心的新的更大西北根据地,是为了便于领导当时正在进行的西征战役和东方开展的游击战争,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向东发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

在决定撤离瓦窑堡的同时,为了扼止国民党军对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方面同东北军领导人进行交涉,促其遵守互不侵犯协议,停止进攻行动;另一方面,作了抗击敌人进攻的部署。17日,东北军后撤。但是,在20日黄昏,驻石湾之国民党军八十六师一部,由北面乘隙袭入瓦窑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红军大学学员队的掩护下,安全撤离,至7月10日前后迁到保安、吴起镇等地。

中央为何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西撤到陇东洪德城、河连湾一带,这与当时的形势变化有关。第一,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自4月延安会谈后,中共加紧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6月底,刘鼎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央也觉得“东北军工作有新的进步”^②,特别是7月初,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在安塞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后,更是认为“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③。第二,虽然与东北军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就在中央机关西撤的6月底7月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乘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指挥东北军大举进攻红军,特别是第一〇六、一〇八师由庆阳地区向北进攻曲子镇,对洪德城一带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中央机关驻在处于陕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547页。

②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页。

宁根据地腹地的保安,更有利于指挥红军和开展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1936年春夏,毛泽东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和当时战场形势的变化,毅然改变原来自己极力主张的军事战略主要方向,转向战略次要方向,指挥红军从东征转向西征,从向东发展革命根据地转而向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取得预期的战略结果,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术思想,也彰显了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巨大威力。西征战役,在毛泽东军事指挥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五、红军西征开辟新的苏区

1936年的红军西征战役,是在党中央与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围剿”,在首先取得东征战役胜利后,为继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建并扩大陕甘宁新苏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而发起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军事行动。

1936年5月,党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后,蒋介石不但不响应,反而又调胡宗南部集结在陕甘大道,拦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遣马鸿逵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防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以“二马”防堵我军西进。同时命东北军第五十七、六十七军、西北军第三十八军进攻陕甘苏区。以嫡系汤恩伯部和晋军西渡黄河,协同进攻陕北苏区。

为了打破国民党新的“围剿”,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决定陕甘苏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形成广大的陕甘宁苏区,并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争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及其他爱国武装;广泛开展陕甘苏区的游击战争。因而,必须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为此,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党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发起西征战役。

此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积极协助毛泽东决策部署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并具体谋划红军西征战役。1936年5月

1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作了报告。同时为配合西征,开辟新苏区,提议将中共陕甘省委改为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成立中共陕豫鄂省委(简称陕南省委),贾拓夫任书记。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提议。随后,周恩来负责起草制定了《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

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决定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组成红军西征野战军,分左路(红一军团)、右路(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西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战线的形成”。5月28日,习仲勋随集结于吴起镇的西方野战军左路红一军团,在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直向陇东曲子、环县方向隐蔽前进。5月30日,习仲勋也随部队到达华池元城地区待机,部队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南北一线,“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

6月1日,先头部队到达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要隘,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方圆一公里左右,四周筑有两丈多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达丈许。由于曲子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西征红军要夺取的第一目标。当时,镇内驻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一〇五旅一部和环县保安大队王占英部共300多人。一〇五旅长冶成章十分剽悍野蛮,群众叫他“野骡子”,在完成堵截红军部署后,冶成章带骑兵于前一天晚上回到镇内宿营。当天,第一师进至曲子以北,对木钵方向警戒;第二师向冶成章及其所率之特务连发动进攻。很快在城的东南角打开了一个缺口,战士迅速往进冲杀。由于缺口太小部队施展不开,战斗进展缓慢。经过左权、聂荣臻亲临指挥,调整战斗部署,红军很快攻了进去。经短时间激战和政治攻势后,迫使冶成章等150余人投降,马鸿逵部最能打仗的骑兵旅旅长冶成章被活捉。战斗结束后,我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对被俘的冶成章等敌军官一面给其治伤,一面进行教育,最后相继放回宁夏。据习仲勋在一份谈话记录中说:“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带伤以后,给予优待,从河连湾用乐队欢送,由老百姓用担架抬回宁夏。他此后便脱离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月3日,左路军第四师在控制曲子的同时,又在马岭、阜城歼灭敌三十五师步兵6个营,击溃骑兵两个营,俘敌1100余人,内有营副、连长多名。第一、二师乘胜北上,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城、洪德等城镇,从而控制了南北大道,打开了西北大门,迫使宁夏“二马”困守区内,轻易不敢再和红军列阵较量。

曲子被西方野战军解放后,中共曲环工委即告成立,习仲勋任书记。他在曲子停留非常短暂。西征红军解放环县后,习仲勋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担任环县县委书记。

随后,红军西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地区,大力开展建立人民政权和争取东北军何柱国骑兵部队。开始他们无视红军力量,曾派骑六师向红军挑衅,红军不得已打掉了他们4个骑兵连,并向被俘官兵宣传抗日道理,何柱国部才趋于友好。冶成章的释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红军与东北军骑兵师签订停战协定,使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趋于稳固。在左路军西进的同时,右路红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进入三边、预旺、同心一带打击敌人,宣传抗日,团结回民,建立政权,从而使红军西征战役计划胜利实现。

整个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时间,红军一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又一个营,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筹款4.5万元,扩大了红军队伍,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预旺、同心、盐池等许多城镇和镇原北部一些地方,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开辟了陕甘宁边界纵横400多里的新苏区。红军还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广大回民群众,点燃了宁夏回族地区抗日救亡之火。这次战役很好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为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用近3000字的篇幅描述了刘志丹的生平和功绩,其中有这样一段:“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上天的神鞭。”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共产党员,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2年他到榆林中学上学后,就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热情参加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活动,

积极投入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1924年冬,刘志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抱定“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奋斗到死”的决心,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不懈奋斗的革命道路。无论在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中,还是在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难里程中;无论是自己陷入饥寒交迫之中,还是家庭饱受敌人摧残,他都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从不后退,最后以自己英勇牺牲的壮烈行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刘志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岁月里,青少年时期就具有正义感的刘志丹目睹了军阀豪绅势力的残酷统治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他看到“长城内外破碎”,“只觉得黑暗!只觉得愤恨!”于是立志要“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改造不合理的黑暗社会,“救我中华万万岁”。入党后,他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且在黄埔军校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至此,他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抱负有了精神家园和实现的可能。刘志丹放弃了优裕、安定的生活,全心全意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了“使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他不辞艰险,带领劳苦群众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人民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在广袤雄浑而又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缔造了英勇善战的西北红军,创建北抵长城沿线,南抵淳耀边缘,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包括陕西和甘肃陇东30个县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策源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志丹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能够实事求是地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一生基本是在动荡的革命斗争中度过的,但他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因此,他虽“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政策,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这是党对刘志丹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最好评价。

与刘志丹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样突出的是他具有很强的组织领

导才能。他思想敏锐,文化修养好,讲话写文章简练生动,很有说服力,并经常亲自动手拟订作战文书和命令;他沉着勇敢,细致周密,善于及时了解和掌握情况;他身先士卒,经常站在第一线作战;他民主作风好,决定重大问题,总是广泛听取意见,让人畅所欲言,从不以权压人;他知人善任,平等待人,尊重上级更尊重下级,能够发挥每个干部的长处,但决不姑息迁就;他谦虚和蔼,爱护战士,处理问题合情合理;因此,深受指战员的信任、热爱和敬仰。所有这些,既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部队具有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刘志丹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充分体现了军事家的气魄,成为西北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从陕甘屡起屡仆的革命起义中刘志丹看到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意义,从古田会议决议中进一步领会到支部建在连上的极端重要性;他十分注重军事民主,制定战略战术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他在实际斗争中深刻体会到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的精妙之处,更能结合每次战斗的实际情况,灵活应用,创造发展,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根据西北的具体环境,他认为游击战中红军的作战任务必须是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应该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其不意、攻其不备、诱而歼之、以计取之,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术,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在运动战中,围点打援,首先消灭孤立无援之敌。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使西北红军取得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多次重大胜利,留下了宝贵的军史资料。

刘志丹是一位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和优秀共产党员。他热爱人民,处处维护人民利益,想着人民的疾苦,时时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关系,因此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知有党而不



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

知有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极强的大局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一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与“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胸怀高远，光明磊落，朴实真诚，善于团结各方面力量共同革命；他意志坚强，立场坚定，艰苦奋斗，百折不回；他作风民主，多谋善断，勇于探索。刘志丹正是以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优秀品德，团结广大党员、群众，不断开创革命斗争新局面，才取得了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

刘志丹虽然只走过了34年短暂的人生里程，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光耀千古，传颂万世。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西北高原为之悲哀，万里黄河顿失滔滔。1936年4月24日，中央机关和瓦窑堡市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誉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1年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6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次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万余人在延安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移灵、公祭大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致辞。5月2日，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为其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

上下五千年英雄梦，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一九四三年 川军朱德言

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

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均到志丹陵园题词。绥德范亭因病未能参加葬礼，也遥寄哀

诗：“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多痛未能亲执纛，西望云天吊将军。”深切地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对刘志丹的真挚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用刘志丹的光辉事迹教育党员群众，多次修缮陵园，组织纪念大会。1993年，江泽民在纪念刘志丹将军诞辰90周年之际亲笔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6年，刘志丹被中央军委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由于戎马倥偬，刘志丹没能留下多少文字，但在陇东乃至陕北流传的刘志丹的革命故事和歌谣，虽经几代人口授和传唱，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1930年至1935年，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转战陇东的华池、合水、宁县、正宁、庆阳、环县等地，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深受陇东人民的爱戴。至今，我们从一些报刊以及《中国民歌选》、《陕北民歌选》、《甘肃歌谣》、《陇东革命歌谣》等书籍中看到和在群众传唱中听到的歌颂刘志丹的歌谣多达近百首。在新宁县广泛流传的民歌《刘志丹》，采用打宁夏调，分12个月来唱，每段5句，其中有几段歌词是这样写道：

正月里，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二月里，刮春风，
刘志丹来真英勇，
靖边白军都打光，
缴来快枪无其数，
散给老百姓。

五月里，麦儿黄，
刘志丹来好主张，
粮食款子都不要，
土地分给穷人了，
家家享安康。

七月里，刮秋风，
梁占魁^①土匪胡行凶；
刘志丹来本事大，
他把土匪连根挖，
百姓都安宁。

.....

这首流行于华池一带的陇东信天游《咱们的红军到南梁》，唱出了刘志丹带领红军打土豪分牛羊，受苦人翻身喜悦的心情：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队伍到南梁。
长枪短枪红缨子枪，
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满天的云彩风吹散，
红军来了晴了天。
打倒了土豪分牛羊，
分了那田地又分粮。
千年的枯树还了阳，
受苦人翻身喜洋洋。

.....

在《刘志丹打麻鞋》这首陇东民歌里，有几段表现了刘志丹与红军官兵同甘共苦、亲如兄弟的动人场面：

.....

夜住麻地台，
士兵没鞋穿，
刘志丹坐灯下呀，
连夜打麻鞋。

^① 梁占魁，当时活动在陇东华池、合水、正宁一带的土匪头子。曾被刘志丹收编，后又叛变。

麻鞋打成了，
老刘忙做饭，
士兵睡醒来呀，
热饭摆面前。

官兵同甘苦，
好比亲弟兄，
失败不灰心呀，
齐心杀敌人。

流行于华池、合水一带的陇东民歌《拥护刘志丹》，表现了红军和老百姓亲如一家和人民群众拥护刘志丹，热爱刘志丹的又一动人情景。

半夜来叫门，
问你是那部分，
只要说是老刘的，
赶快迎进门。

哪里有老刘，
哪里人最稠，
男女老少都围满，
话儿拉不够。

喂马有咱们，
放哨有咱们，
老刘的队伍快缓^①好，
打仗有精神。

哪里有白军，
女人乱逃奔；
老刘的队伍开到了，
妇女来欢迎。

送来大西瓜，

① 缓好，陇东方言，即休息好的意思。

送来鞋和袜。
 还有一捧捧大红枣，
 亲人请收下。

请吃猪羊肉，
 请吃热蒸馍，
 老刘喜欢吃荞面，
 赶快压饅饅。

红军要离开，
 人人都挽留，
 拉住老刘的左右手，
 左右^①不让走。

老刘呀大恩人，
 老刘呀救命星，
 全凭你领导闹革命，
 穷人才翻身。

还有陇东人民广泛传唱的《刘志丹闹革命》、《南梁来了刘志丹》、《新正来了刘志丹》、《刘志丹是好汉》、《葫芦河水映红天》、《刘志丹领导闹翻身》、《红旗插上寨子湾》、《打老谭》等许许多多的歌颂刘志丹的歌谣，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刘志丹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和领导者的公正评价吗？刘志丹将军永远活在陇东人民的心中。

七、陕甘宁省府入驻河连湾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画卷，拂去岁月的尘埃，才发现从环县县城到甜水堡的公路，就是历史上关中通往塞北的萧关古道。这条古道在洪德城南穿过一个山村，这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和其他山村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它却是一颗闪闪红星，万众瞩目。这就是第

^① 左右，这里是说什么也不行的意思。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的所在地河连湾。

河连湾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村里有一座简朴的四合小院,庄院临街是7间铺面。小院分前后两进,中间用开有月门的墙隔开,后院三间上房,青瓦楠扇,屋脊上还装有五鸡六兽,上房两侧有两间耳房,房后有两棵高大的柳树,给人一种“杨柳荫后檐”的幽雅之感。在穷乡僻壤的环县北部山区,这座四合院还算富丽堂皇。当年,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光辉的足迹。

1936年7月初,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从陕西甘泉的下寺湾迁到了河连湾。从此,河连湾这个荒凉的、偏僻的山乡村庄,揭开了光荣历史的新篇章。陕甘宁省以李富春为省委书记、马锡五为省政府主席;组织部长罗梓铭、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蔡畅、军事部长肖劲光、副部长赖传珠等,下辖华池、赤安、曲子、赤庆、环县、固北、预旺、预海、安边、定边、盐池等11个县。陕甘宁省委和省政府领导这里的广大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剿匪反霸,发展生产,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1936年8至9月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两次来到河连湾,将这个山村的面貌,写进了著名的



河连湾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旧址

《西行漫记》。据书里说,当时的后勤部设在一个回民粮商的大院里,还说河连湾有一些手工业工厂,生产的商品供合作社销售。同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也移住河连湾,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这里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山城堡战斗,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使中国革命又进入了第三阶段的辉煌征程。

1937年9月,党中央鉴于国共合作局面已经形成,决定撤销陕甘宁省,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将陕甘宁省所辖的各县,分别组建成2个分区,即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与此同时,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陇东所属新宁、新正县仍属其管辖。庆环分区管辖固北、赤庆、曲子、环县、华池五县,分区领导由书记马文瑞,专员公署专员马锡五、副专员朱开铨、军事部长王世泰等人组成,领导这里的人民群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坚韧不拔、前赴后继的战斗。

陕甘宁省随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又随革命形势的需要而撤销。虽然,它只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它像明亮的北斗星,照耀着陇东和全中国,给陇东老区人民指明了胜利的光明前景,极大地增强了庆阳人民革命战斗的凝聚力。许许多多优秀的中华儿女曾仰望星空,投入她的怀抱,使庆阳这块鲜为人知的地方和全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八、结束长征的山城堡战役

顶天地,夜色朦胧群山隐,
志凌云,三军奋勇杀敌人。
山城堡,火光万道迎空舞,
军威振,霹雳一声动地鸣,
兄弟并肩显身手,
会师献礼载功勋。

这是肖华在《长征组歌》中赞扬山城堡战役的诗句。山城堡坐落在环县城北约百余里的山城梁上,海拔1600多米。这里沟涧辐辏,梁岭起伏,北控羌胡,南辖关陕,历来为兵家要塞。明成化年间戍边名将马文升为了防止落荒而逃的元朝后裔瓦剌部卷土重来,在这里构筑了一座

城堡，名叫“山城堡”，以此梁为依托，构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屏障。1936年，当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又进行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著名的山城堡战役。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长征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静宁胜利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围追堵截政策的彻底破产，极大地增强了爱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但是，蒋介石不顾民族危机，坚持反共政策，急忙调集260个团的优势兵力，总共20万大军分四路向红军进击。当时敌我力量极为悬殊，为了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红军能立足于大西北，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一方面对愿意抗日，不愿意打内战的东北军积极地进行统战工作，一方面集中兵力对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红军作战的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11月15日，中央命令红一、四方面军主力移至预旺县以东地区，向山城堡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红二方面军到环县西南地区，准备作为打第二仗的主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豫旺堡以东的萌城地区。而国民党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



环县山城堡地貌

军,王钧部军长病逝,到达同心城后便停止了推进,东北军王以哲在胡宗南部右翼向豫旺县缓慢推进,只有胡宗南部兵分三路,孤军深入,在向豫旺堡方向展开。打击胡宗南的时机就这样出现了。11月15日,中革军委向红军总部下达指示,要求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部兵力,遏制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只有这样,长征红军才能彻底结束移动状态,才能获得一个相对稳固的陕甘边根据地,才能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17日胡宗南为了控制战略要点,命令部队急促前进。第二天,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设伏,击溃胡宗南中路部队的第二旅,毙伤其团以下官兵600多人。受到伏击的胡宗南立即命令撤退休整,由第四十三师接替继续前进。18日胡宗南右路部队的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向山城堡方向突进,红军等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签发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指出:“当前的这一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号召三个方面军英勇作战,获取全胜。担任这场战斗的总指挥是彭德怀,战斗前夕,党中央派周恩来、林育英专程从陕北赶到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环县河连湾,协同指挥部的同志拟定了作战部署。

11月19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第四、第三十一军先后集结隐蔽于环县山城堡的东、南、北的有利地区,待命出击。红一师师长陈赓、红二师师长刘亚楼、红四师师长李天佑等都到附近指挥。红二方面军和第八十一师等部集结于洪德城、环县及其以西地区,担任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第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第一旅,在红军完成部署之时,国民党军追击甚急,认为红军不堪一击。胡宗南的七十八师孤军深入,于11月20日侵占山城堡,并派出二三二旅的两个连,沿山城堡至洪德城大道方向侦察,主力沿大道两侧的高山搜索前进。敌人刚越过八里铺,红军就给以当头一击,将敌人赶回山城堡。11月21日下午,红军完成了对山城堡敌人的包围。当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行进时,预伏在山城堡周围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一部、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一部,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截断了敌军西逃的退路,尔后由东、南、北展开三面进攻。战斗从下午5时左右开始,红军全体指战员群情激昂,命令一发出,个个如离弦之箭,英勇地扑向敌人。空中虽有敌机盘旋扫射,但战士们冲锋陷阵,毫无顾忌。他们凭借夜战本

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个个像一头雄狮，呐喊着冲入敌阵，把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把手榴弹投向敌人的阵地。红一师十三团、四师十二团首先攻克前沿阵地的马掌子山，随后很快攻占了山城堡，敌人边退边抵抗，但已混乱不堪。国民党二二三旅旅长见败局已定，放弃指挥，带着直属队摸黑向嘶马峁峁方向攀山逃窜，还有少部分敌人抢占了哨马营旧寨堡，企图进行顽抗。红军遂以一部分兵力追歼逃敌，一部分兵力攻打哨马营，最后将溃乱之敌压在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之中，全部消灭。整个战斗于11月22日上午9时结束。经过一昼夜激烈的战斗，胡宗南部七十八师基本被全歼。胡宗南遭到沉重打击，其部队纷纷向西撤退，蒋介石妄图在陕甘边区消灭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6年11月23日，雪花纷飞，大地银装素裹。尽管天寒地冻，但山城堡却沉浸在欢乐沸腾的气氛之中。当天午后，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山城堡的一个旧庙里集会，庆祝山城堡决战伟大胜利。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由杨尚昆主持，朱德、彭德怀、贺龙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不仅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红军有了立足之地，获得了休整的时机，而且大灭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威风，大振了红军的军威，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国民党的一些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识到内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在山城堡战役后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随之进一步展开。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仗，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作为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场战斗，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它将永远被载入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炳耀千秋，启迪和激励后人。

第八章

红军从陇东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炎黄子孙的心，全国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红军将士们捶胸顿足，义愤填膺，请战书、保证书、决心书雪片似的飞向延安，飞向指挥员的手里。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3日，延安召开抗日急救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7月14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命令抗日红军做好政治思想准备，加强军事训练，准备立即开赴前线，消灭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三项主张，并重申2月提出的四项诺言。7月17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等去庐山，督促国民党实行抗战。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红军改编的条件。随后，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援西军、红军教导师从陇东出发，到陕西三原等地接受改编。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第一一五、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每师辖两个旅，每旅辖两个团，每师编制定额为1.5万人，列入第2战区战斗序列。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抗

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了只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改编后的八路军共4.2万多人。同日，八路军总指挥部发表就职通电，表示“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随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于8月22日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征，第一二〇师主力和第一二九师主力先后于9月3日和30日，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八路军总部于9月6日由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出征，几天后，八路军三个师主力全部开上了抗日战场，在8年抗战中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撑起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半壁江山。

一、红军驻防陇东和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边区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中心。1936年春，陇东人民的大批子弟跟随红军东征，为推动抗日救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接着，红军挥师西征，解放了曲子、环县等地，并积极协同驻环县河连湾的中共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五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陇东包括庆阳、合水、曲子、环县、华池、镇原、宁县、正宁等县。从此，陇东老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红军各部均在陕甘宁边境的盐池、定边、环县一带休整待命。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以“讨伐叛逆”为名，调集重兵开往西安，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面对国内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由第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和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钳制敌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一带警戒宁夏马鸿宾、马鸿逵部队，红八十一师去延安。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南下陕

西蓝田、商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初,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率领的红一军团进驻陇东正宁、宁县一带。军团司令部驻正宁县宫河镇,政治部驻王录村,后勤部驻核桃峪;红一师驻罗川春场,所辖一团驻山河镇,三团驻罗川高家台,十三团驻代家店;红二师驻宁县早胜镇,所辖五团驻中村,六团驻新庄。其余都驻旬邑县。接着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驻守在庆阳驿马关周围,直属骑兵团驻桐川,七十三师驻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军团部驻驿马镇。同时,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在镇原驻扎,红军教导师也驻进了庆阳城。

红一军团团在正宁、宁县驻防期间,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中共宫河支部、早胜支部、纪纲支部;公开成立了许多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等民众抗日团体和武装,开展了宣传、筹粮、防奸和参军等各种活动,仅宁县参军青年就达300多人,筹粮数千石。部队还在早胜成立“戒烟所”,教育烟民,改弃恶习。先后在宁县早胜、正宁罗川、宫河举行军事体育运动会,振奋民族精神。同时,普遍开展了扩红和练兵活动,形成了高涨的抗日气氛。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开赴庆阳驿马关驻防期间,发动群众组织了地方抗日救国会及各界抗日群众团体。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积极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把没收到的地主恶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为了统一领导地方工作,十五军团民运部按上级指示,于1937年5月,协助地方成立了中共驿马关县委,对外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

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在镇原驻扎期间,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7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共镇原县委,随后又建立了南三镇中心区委和屯字、开边、临泾、马渠、孟坝等区委。与此同时,援西军开展了地方统战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和国民党镇原县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协助地方建立了镇原县和区乡级的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军,并发动驻地群众为部队捐献粮食和其他物资。红军在屯字镇整训期间,当地民众向部队捐献小麦2000多石,糜子1000多石。由于援西军大力宣传抗日,纪律严明,为群众做了许多好事,赢得了镇原社会各界一致的赞扬。

红军教导师,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又称步兵学校,于

1936年7月迁驻环县木钵镇,12月27日,教导师移驻庆阳县城。1937年,红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并入教导师,教导师又称抗大二校,学员增加到2000余人。当时,红军教导师主要任务一是学习、训练;二是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是防止南线东北军进犯,并与之逐步接触,开展统战工作。红军教导师进驻庆城后,除了完成自身的教学训练任务,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陇东根据地和统战区分别设立党政领导机构。1937年秋,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撤销后,即在曲子镇建立庆环分区党委和专员公署,领导华池、环县、曲子等老区县的工作。此后,又从红军教导师抽调袁国平、段德彰等一批干部,在庆阳县建立了中共陇东特委,领导陇东统战区庆阳、合水、镇原、驿马关四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委的工作。在这期间,由王维舟、耿飏等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也进驻陇东,肩负起了留守陇东的重任。为了广泛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陇东特委创办了《救亡日报》,后改为《救亡报》,庆阳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了《庆阳人民》,八路军三八五旅也创办了《民众先锋》;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行政中心西峰镇,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5月,陇东特委与庆环分区党委合并,中共庆环分委统战部即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庆阳办事处”的名义,仍在庆阳县城继续领导着西峰、合水、镇原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那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岁月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陇东人民的斗争给予了亲切的关怀。1938年10月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党中央派王若飞来到庆阳,及时纠正了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陇东统战区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使陇东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沿着党的正确路线不断前进。1939年夏到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又派王观澜、谢觉哉来到庆阳,领导陇东军民取得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胜利,建立了庆阳、合水、镇原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8月下旬,中共陇东特委、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曲子镇迁到庆城。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呈现出更加令人振奋的新局面。

二、红一军团从正宁、宁县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军政部长、亲日派头子何应钦为主调遣重兵开往西安讨伐“叛逆”,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为了策应西安事变,阻止内战再起,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御敌。红一军团行至淳化、耀县、三原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

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进驻正宁、宁县一带。红一军团团部驻宫河镇北头村大地窑,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以及政治部驻宫河王录村,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住在农民王振元家里。军团警备连、后勤部、工兵连、通信队、电台、炮兵连、随军学校、医院等分别驻在宫河周围。属部第一师师部及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等驻正宁罗川和旬邑麻园村。第二师师部及师长黄永胜、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华驻宁县早胜,所属部队驻中村、新城、政平、新庄。

由于正宁、宁县一带屡遭兵灾匪患,加之国民党地方官府残酷压



红一军团团部驻地旧址

榨,许多群众深受其苦,生活极度困难。当红一军团前哨部队到达正宁宫河、罗川时,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人心惶惶,不少青壮年及富户逃离家园,躲在山沟梢林里。时值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在还没有做通群众工作之前,身为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教育部队露天宿营,不进农户,不进庙院,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并安排四处张贴安民告示,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稳定形势,安定民心。通过宣传教育,群众很快对红军有了了解,他们主动腾出地方,打扫卫生,让部队居住。

当时正宁地瘠民贫,农村房厦极少。绝大多数群众住在地坑院或沟边的窑洞里,而且比较分散。为了便于住宿,又不影响群众,部队因地制宜,化整为零,分散驻扎,能住一个班就住一个班,能住一个排就住一个排,小户人家一般不住人,保持部队相对集中。在农户家里一律打麦草地铺,统一居住。军民同用一个灶,群众先做先吃,部队后做后吃,都有统一的时间要求。部队所用的柴、米、油、盐及蔬菜由专人管理,绝不占住户人家的便宜。军民同用一个水缸,通常都是由部队负责挑水。群众的打麦场,就是部队的操练场地。部队对老年人十分尊重,对小孩十分疼爱。灶上做下好吃的东西都要给老人、小孩送去一碗。平时借东西有借有还,损坏东西照价赔偿,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部队特别讲卫生,平时把各家各户院落、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军医十分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经常为群众治病。南方籍的战士都会打草鞋,织麻鞋,他们耐心地把自已的手艺传给住家户。罗川红军驻地一房东喜得男孩,住在这家的红军战士纷纷向孩子的曾祖母祝贺“四世同堂”之喜,并给孩子送去了军用被单、军衣和小洋瓷碗,群众深受感动。红军严明的军纪,优良的作风,在群众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老少妇孺无不交口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

(一)

根据梁必业将军的回忆,毛毛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这样记述邓小平在王录村:

一军团于1937年1月8日进至东里堡,2月22日,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录村。为了进一步为开赴抗日战场作好准备,红军开展了较为集中的军政训练。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

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由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20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部长印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在王录村，我们住一个小院子（王度家），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在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五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向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实为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官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紫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1937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官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录村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

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地点就在我们王录村。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小平同志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有两年时间，他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对问题抓得住、放得下。原则问题抓得很紧，其他问题放得开。

一军团政治部共有100多人，其中干部七八十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破坏部和总务处。其中设有一个干部巡视团，是储备干部的地方，这里的干部可高可低，人数可多可少。

当时红一军团还由政治部负责编办报纸，用石印机印刷。印刷车间在距王录村二三里之遥的核桃峪村。邓小平经常徒步到印刷车间去审看报纸校样。4月17日至20日，红二方面军政委、红军前敌总指挥



王宁富村邓小平驻地旧址

部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任弼时，在宫河镇召开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援西军、庆阳步兵学校团以上干部会议，代表党中央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邓小平和刘伯承、李富春、林育英、袁国平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负责组织干部学习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二)

1937年2月，红一军团所属部队初到宫河、罗川、山河等地时，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从中作梗，部队粮草供给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政治部所属民运部依靠地下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募捐抗日军粮。当时的政策是有余粮者多捐，没余粮者不捐，绝不动用群众的口粮。为了抗日救国，群众热情很高，纷纷慷慨解囊，有捐几斗的，也有捐几石或几十石的。在宫河、长乐、罗川等地设有收粮专库，由部队派人过秤、管理，地方地下党组织或抗日救国会派员积极协助。凡是捐粮的群众，部队都打给收条。民主人士、原国民党正宁县商务会会长张振襄自愿捐献抗日军粮25石。在他的带动下，宫河富户王立轩，山河一带富户王培兰、刘运昌、刘耀奎、张成祥、李胜义、王天笔、杨俊才等给红军募集了大量的抗日救国粮。红军撤离后，大部分群众担心国民党政府搜查支持红军的凭据，都把捐粮收据烧毁，也有丢失了的。唯有穆平辉先生的借据保存了下来。这张借粮借据是2月29日，邓小平与时任国民党正宁县县长的朱门共同向长乐珍庄村穆平辉先生借粮时出具的借据，借据是这样写的：

穆平辉先生：

本军此次驻扎正宁一带，整理训练，需要粮食，在本军军费未解到以前，块向先生借粮二十六石，将来按时价由本军政府负责归还，抗日胜利之礼。

人民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

正宁县县长朱门

二月二十九日

此借据一直由穆平辉先生保存，时隔40多年后，其子穆长青拿出借据。经逐级上报研究，甘肃省财政厅按照有关规定，于1994年12月6

日给穆家付借粮款 80680.6 元,其中小麦 26 石,折合 6500 公斤,每公斤时价 1.40 元,共折价 9100 元。折价粮款按当时银行存款 8 年到期利率 17.1% 计付利息,46 年共 71580.60 元。本息总计付给穆家 80680.6 元。这件事不仅维护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声誉,而且在当地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得民心,广泛传颂。这也是邓小平驻防正宁县宫河王录村留下的一段佳话。

(三)

红一军团刚到正宁,邓小平就和国民党正宁县县长朱门进行商谈,向朱门和县政府工作人员讲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抗日救国的伟大意义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并转达了国民党甘肃省府关于同意红军接防的电报。宣传抗日政策,陈述利害,与国民党正宁县政府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红一军团政治部所属民运部组织群众演讲,张贴“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及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释放爱国“七君子”等内容的标语,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儿童教唱抗日歌曲。当时流行最广泛



战士剧社在王录村演出节目

的一首歌曲是：“打东洋，上战场，前方打，后方帮，男女老幼一齐上。往战场，送子弹，抬担架，救护忙，抗击日寇保家乡！”全县各乡村普遍建立抗日救国会，正宁县抗日救国会是在红一师政委邓华主持下首先在罗川成立的。接着，宫河地区抗日救国会、长乐地区抗日救国会、山河地区抗日救国会等也相继成立。

根据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的指示，各级抗日救国会还开展了禁止买卖和吸食大烟活动，成立戒烟所，采取有力措施，强迫烟民戒烟。在妇女群众中，提倡放足，破除陈规陋习，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随军学校组织宣传队，走村串户宣讲戒烟和放足的好处，尤其是女战士通过具体事例，现身说法，对倡导和带动妇女放足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在组建抗日救国会的同时，在驻地群众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下党组织。先后在周家、上冯坳、牛家沟圈、康家、燕家、东里、西里、东山羊头、南北堡子、岳家堡子等村庄发展了40多名党员。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的关系，直接受部队党组织领导。1937年四五月间，宫河地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周富选任支部书记。不久，纪纲支部成立，樊振贤任支部书记。从此，宫河国统区有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两个支部最初受红一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领导，红一军团撤离后，归属中共新宁县县委领导。这批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星星之火渐渐形成燎原之势。

(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8月上旬，红一军团奉命从正宁、宁县出发，开往陕西三原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作战。第一师在罗川城举行了抗日誓师动员大会，部队和当地群众有数千人参加。师长杨成武作了重要讲话，他声音洪亮，慷慨陈词，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军民同仇敌忾，抗日激情十分高涨。会场上“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山川里久久回响。邱立山代表正宁人民在会上表示了抗日决心，并把一面绣有“抗日先锋”大字的锦旗赠送红一师。部队撤离宫河的前一天，军民共同会餐。许多群众拿出自家的猪肉、鸡蛋、粉条、黄酒等食品慰劳红军将士，依依不舍地话别。抗日救国会还动员妇女群众为部队捐赠了军鞋。

部队奉命出发奔赴抗日前线的当天，群众主动送行。青壮年们为了尽一分抗日的心意，或肩挑或畜驮，为部队运送辐重物资，一直送到旬邑县土桥镇，被红军再三谢绝，送行人员才挥手告别。

邓小平在王录村住了将近5个月时间，他精干练达，平易近人，生活十分简朴，宣讲革命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群众很爱听。宫河抗日救国会主任王龙月是王录村人，家距政治部很近，又因工作关系，曾多次聆听过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诲，彼此很熟悉。据王龙月的儿子王浩文说：当年邓小平曾为他父亲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出言须防开口错”，下联是“交人只要到头真”，被当做珍品长期保存，可惜毁于解放前夕的一次战火之中。

三、援西军从镇原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带陷入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以及骑兵一团组成了援西军。3月，援西军到达甘肃省镇原县屯字镇时，西路军西征最后失败，援西军奉命就地驻扎。援西军在镇原驻扎的半年时间里，以严明的军纪、乐于助人的精神和融洽的军民关系，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党组织，整训地方武装，组建抗日自卫军，深入推动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共产党在镇原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为镇原地区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初，援西军奉命从镇原出发到三原整编后，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了抗日战争。

(一)

1937年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为增援解救西路军组建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抗日人民红军援西军。3月初，援西军所部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二军陆续到达镇原。这时，西路军已经失败，援西军遂驻扎镇原地区待命，其主要任务是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准备和统战工作。

援西军在镇原驻扎期间,注重宣传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同时,帮助群众伸张正义,铲除不平,打击国民党不法官吏和劣绅,为民做主,替民申冤,并提倡减租减息。群众思想活跃,革命热情高涨,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军民团结,关系融洽。

援西军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和为群众做好事的大公无私精神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援西军吃的、用的东西都是掏钱购买,买卖公平。据当地一些老年人回忆,当年红四军刚进驻上肖、屯字、曙光时,部分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还不甚了解,妇女和青年人隐蔽在附近的山沟里,留下年长者应付部队,有些存粮多的人也不向部队卖粮。但红军干部战士不抢东西,不打人骂人,并经常宣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专门惩治坏人、帮助穷人闹翻身的,是老百姓的军队。红军的一言一行,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群众很快消除了顾虑,主动帮助红军做饭、烧水。尽管红军的生活艰苦,但真正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一定归还,损坏东西就赔偿。凡事都不麻烦群众,自己动手生豆芽菜、磨面、挑水、推油。谁家有了病人,红军卫生部医生就立刻上门治病送药。部队还经常与当地有影响有名望的人聚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红军和群众的关系就融洽起来了。当地群众主动向红军捐献粮食和草料等物资。红四军十一师驻屯字镇四殿马家村时,修操场占用了马文联、马廷玺家的7亩地,按当时亩产粮食计算付了钱。湫池、小寨、白村凡住了红军的人家吃水多数是红军挑的,屋内庭院的卫生也常常是红军战士打扫的。

农忙季节红军经常帮助农民收割打碾。据当时任“远足割麦队”政委的卢仁灿回忆,驻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不但帮助驻地群众割麦子、锄草、送肥、挑水、劈柴,还抽调干部、战士及军政治部宣传队共百余人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路以外国民党统治的平凉草峰等地区帮助群众割麦。这里的群众长期受乡、保、甲长的控制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了解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起初不敢接近红军,不相信红军会毫无条件地帮助农民割麦,甚至害怕红军把割下的麦子拿走,不敢让战士们割麦。为了消除群众的疑虑,红军战士分散住进群众家里,先帮助一些缺劳力的农民割麦、挑运。割麦队一面劳动,一面解释红军为什么要帮助群众。他们还在劳作之余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抗日政策,演出文艺节目。部队白天劳动,晚上除了站岗放哨,还派人进行

家访和调查,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战士们割麦不要工钱,也不吃群众的饭,不喝群众的水。这样过了几天,军民相处得像一家人了。割麦结束后,部队归还了所借用的东西,还把驻地及周围的环境打扫干净。告别时,各村的男女老少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有些小伙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此后,乡亲们给红军送来了一封封感谢信,还不断地来部队做客。援西军以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高尚的品格和为群众谋福利的诚心赢得了镇原人民的支持,镇原人民从更深层面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部队,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从思想深处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赖、更加拥护。这一切,都为镇原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

镇原县党的组织基本上是援西军发展建立起来的。虽然早在1930年,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良在镇原发展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但只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工作,没有开展地方工作。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北部地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也只覆盖了镇原的一部分。援西军进驻镇原后,陇东地区一下新成立了5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的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就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解放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利用参加地方劳动和帮助群众治病等机会,在与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在屯字原的屯字、曙光、上肖等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据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耿飏回忆:“我在红四军任参谋长,也分管民运工作。民运部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政策,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当时,民运部在屯字原一带发展了100多名党员。这些党员素质很好,和我们建立了很好的感情。”镇原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使许多在外求学、谋生的有志之士返回家乡,参加革命。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一些进步人士。1937年6月,平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员、甘肃省立二中镇原籍学生张敦仁带领同学

张格言、罗云章、李俊昌等人，来到镇原参加了援西军，在援西军宣传部工作，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留守处（即镇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回忆，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太平、孟坝、屯字、开边等10多个区委，还有一个中心区委。甚至一些边远山区也有党组织的活动，镇原北部解放区建立起了两个秘密区委和几个党支部，有党员近50名。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在镇原，凡是援西军驻扎过的地方，党的力量最坚强，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

1937年6月，援西军和红十五军团将要开赴抗日前线，镇原地方工作需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为了巩固和发展镇原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宁省委派固原工委书记李廷序和马渠区委书记王平水来到镇原县城接收援西军民运部开创的地方工作，正式成立了中共镇原县委，对外称“抗日人民红军援西军留守处”（后改称“一二九师留守处驻镇原办事处”），驻地镇原县城东操场北山根。李廷序任县委书记。县委直属陇东特委领导，下辖马渠、孟坝、太平、屯字、开边、临泾6个区委和南三镇中心区委，并仍担负三岔工作委员会所辖地区的工作。中共镇原县委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镇原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援西军的进驻及其在镇原的活动为中共镇原县委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是援西军在镇原进行革命斗争和镇原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镇原县委的成立，使镇原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翻身求解放的历史重任有了完全可以依靠的党的中坚组织，从而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

援西军部在镇原期间，从维护中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与国民党政府和睦相处，合作共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援西军进驻镇原初期，驻守在陇东的国民党东北军向东撤到西安附近，各县只有国民党少量保安部队，没有驻正规军，镇原县城也只有300多人的国民党保安队。援西军进驻后，遍布镇原的城乡各地。此时，正值国共合作谈判之际，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政策做了适当调整，发布了《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地方工作的初步指示》，广泛争取和团结了一切国防力量，一致抗日；把陕甘宁工农

民主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特别政府(简称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援西军在镇原驻扎期间,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基本形成。镇原县属于统战区,共产党在镇原的地方政权尚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援西军由民运工作部出面,代行中共地方政权的职责,与国民党镇原县上层军政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成功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那时,援西军和红十五军团云集陇东和镇原县,大军压境,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共产党顾全大局、不计前嫌的政策,加上援西军大量细致的统战工作,使全县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上对共产党、援西军都有过不少帮助和支持。据曾任南三镇中心区委书记的曾川回忆,平泉镇乡绅杨国相、国民党平泉镇联保主任刘某等对三十一军军长萧克和民运部部长赖际发十分称赞。《宋任穷回忆录》中说:“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经过做工作,积极同我们合作,支持抗日,为我军筹集粮食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受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援西军开进镇原时,邹介民率众出城迎接并召开欢迎大会。以后还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延安烽火剧团等文艺团体也曾来镇原演出。一些重要事件互相通报联系,双方派员参加。1937年4月1日(国民政府植树节),刘伯承司令员和邹介民给援西军直属队作动员讲话,号召每人至少植一棵树。镇原县抗日青年队成立后,在4月20日的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张浩和邹介民也一同出席讲话。5月30日,援西军司令部和国民党镇原县政府在县城召开军民大会,纪念“五卅”惨案12周年,并举行了红军与国民党自卫队的军事体育竞赛。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邹介民被红军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深深折服,尤其对刘伯承、张浩等红军



刘伯承、李达等在镇原

高级将领的为人、学识、风采和红军与镇原军民的血肉关系，大为钦佩，便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等援西军首长在国民党镇原县政府门口合了影。时值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际，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邹介民在职权范围内帮助红军，动员殷实富户捐献粮、物、款和草料等，支援红军给养，主动接近红军，建立友好关系，并支持援西军民运部维护社会治安，开展抗日民众运动，配合协调各方关系。当时，在镇原形成了共产党驻军和国民党政权并存、合作共事的局面，大大推动了镇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

援西军与镇原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建立友好关系，丰富和扩大了镇原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和范围。援西军首长还与镇原民主人士祁尚诚、刘慕黎等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民主人士为共产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时任国民党镇原县政府督学的刘慕黎奉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的指示，利用自己在杨虎城部队中的关系，经常前往西安，为援西军购买军用物资和弹药。援西军还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开展统战工作。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对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共产党支持者和忠实朋友。红三十一军军长萧克经常去平凉与国民党平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胡公冕谈判西路军伤病员过境等有关事宜。援西军还将国民党特务机关调统室的祁基和国民党镇原县党部秘书慕宏发展成为共产党的情报人员。

援西军在镇原新区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开创了镇原统一战线区，使镇原成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的组成部分。1937年7月，中共中央从中央教导师抽调部分干部成立了中共陇东特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专门管辖西安事变后开辟的新区。在特委辖区内不搞打土豪、分田地，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合理分担，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日；允许辖区内国民党政权机构存在，促使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正常工作，为我所用。新区实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也叫统一战线区，政权是国民党的，驻军是共产党的。初期，共产党既没有在此建立政权机构，也不参加国民党政府。援西军政治部民运部派出工作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建立了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界抗日救国会及抗日自卫军，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很多基层党组织，创立了镇原统一战线区，与镇原北部地区连成一片，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

(四)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对部队和西路军失散回归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加紧对红军部队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援西军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各界群众抗日团体,积极组建各地抗日自卫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镇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

援西军民运部为了发动群众,尽快建立地方抗日武装,开始在群众中大力宣传中共党的政策,做好前期的动员工作。据曾川回忆:“援西军做了许多宣传组织工作,使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镇原各界群众中有了新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我党我军在镇原人民中的威信。”通过援西军的宣传教育,使镇原民众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有了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抗日热情。民运工作队和镇原地方中共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积极推动民众抗日运动,迅速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在各乡镇建立抗日自卫军,维持社会治安,保护群众利益,基本上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青壮年大部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自卫军,开展保家卫国活动。平泉、中原、新城、电字、上肖、开边、孟坝等镇成立自卫军营,各乡有自卫军大队或自卫军连,村有自卫队。自卫军队员分为基干和普通两种,18岁至25岁人员编入基干队,25岁至45岁人员编入普通队。援西军给自卫军配备了部分枪支武器,并选派军事素质过硬的官兵担任教练,对自卫军进行了集中训练,教他们学习掌握一些军事常识、战术运用和简单武器的使用方法。自卫军队员农忙回家生产,农闲组织训练。南三镇、电字镇和县城周围地区抗日自卫军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打开了镇原抗日救亡工作的新局面。平泉镇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兼阴坡村党支部书记王天林和南川乡罗湾村农民自卫队队长共产党员康希业等,分别带领当地自卫军主动担负起了为部队筹粮捐款、运送粮草、送信传递情报等繁忙的战勤工作,同时还组织自卫军张贴标语、巡逻放哨、开会学习、出操训练。他们在农田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粮食,支援抗战”等牌子,在村里的墙上、树上贴着“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还我江山”等醒目的彩色纸标语,

本部因抗日軍需之急，特借到
馬獲先生 漆石書斗 正除由抗
日政府負責還條，備還外特給此証并
表謝忱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人民抗日軍第二十五軍政治部
駐慶人馬道奇 謹啟

援西軍借糧凭证

并散发传单进行宣传。他们还经常和部队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这时的镇原地区到处充满革命、战斗的气息。抗日自卫军的组建和发展，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为壮大镇原地方武装、开展自卫反击斗争打下了基础。

虽然援西军在镇原只有150多天的时间，没有发动过一次战斗，但她在镇原这段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对镇原地区乃至陇东和陕甘宁根据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以后镇原成为陕甘宁边区的西南门户和“模范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四、红十五军团从驿马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1935年9月15日，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边苏区。9月17日，中共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西北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与鄂豫陕红军第二十五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军团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和交通队、手枪团。下辖3个师，即第七十五师（原红二十五军），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陵波；第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崔田民；第八十一师（原红二十七军），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明山。全军团共约7000多人。9月18日，在永坪镇干部学校操场上，举行了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徐海东和刘志丹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两支红军加强团结，并肩战斗，为粉碎敌人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消灭更多的敌人而英勇斗争。

1935年7月，随着中央红军北上，国民党当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

到西北。这年9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蒋介石调集10多万军队，以东北军为主力，分五路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企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之前，消灭西北红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经过吴堡慕家原、绥德定仙焉等战斗，将入侵的晋军大部赶到黄河以东，取得了东线反“围剿”的胜利。

10月初，红十五军团挥师南下，相继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和羊泉原两次战斗的胜利，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和一个团，毙伤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俘团长杨德新以下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和电台1部。

11月初，红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与长征到达陕甘边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合后，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辖第一、第十五军团。20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1个团，俘5300余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报告中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团结，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2月，红十五军团随中国工农红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进行东征。5月，为创建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新的根据地，又挥师西征，重返陇东。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南下陕西蓝田、商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御敌。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十五军团返回陇东驿马关周围驻防，直属骑兵团驻桐川，七十三师驻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军团部驻驿马镇。

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在驿马关驻防期间，首先由军团民运部出面，发动群众组织了地方抗日救国会及各界抗日群众团体。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他们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把没收到的地主恶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为了统一领导地方工作，红十五军团民运部按上级指示，于1937年5月，协助地方成立了中共驿马关县委（对外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1937年8月上旬，红十五军团离开驿马关，从陇东老解放区出发，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

五、红军教导师从庆阳出发改编奔赴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爆发后，驻扎陇东的东北军相继撤离，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即“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城。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等率领的工作团，也随军来到庆阳，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一)

红军教导师，又称步兵学校，于1936年7月迁驻环县木钵镇，校长周珉，政委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教导师的任务，一方面进行文化学习和军政训练，一方面维护社会治安，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并开展统战工作。12月27日，教导师移驻庆阳县城。1937年，红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并入教导师，教导师又称抗大二校，学员增加到2000余人。

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不久，蔡畅率领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也来到了庆阳。红军教导师除了完成自身的教学训练任务外与省委工作团相互配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庆阳古城，四面环山，两水环绕，深沟辐辏，形成了一个天然屏障。周先祖不窋率族人在这里“削阜为城，聚而成居”。因城池酷似凤凰展翅，所以又称“凤城”，她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这里有古柏森森的周祖遗陵，有山环水抱的文笔对峙，有古姿古色的普照寺大殿，也有建筑精巧的“周旧邦”牌坊。庆阳城是陇东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古老城镇。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这里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广大人民群众不但从经济上深受以“八大家”为首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百般压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权利和热情。当时，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原在庆阳的国民党县政府逃到了西峰镇，这里只留下区政府，后来又由县政府派民政科长在这里进行所谓的指导工作。由于他们百般诋毁人民军队，群众一时还不敢接近教导师和省委工作团。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教导师首先做深入细致的民情调查和群众宣传发动工作。建立问事处，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和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开展反霸斗争。1937年1

月，庆城建立了“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蔡畅任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串连，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起“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当地进步人士陆为公当选为主任，下设贫民、工人、商人、江湖、青年、妇女等各界分会。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开展办黑板报、办夜校、办识字班等活动，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以庆城为中心，遍及各地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起来。

(二)

为了打击封建势力，从政治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国热潮，1937年4月至5月，红军教导师与陕甘宁省委工作团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在庆城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动省府的“反冯灭霸”斗争。

当时，庆阳有“八大家”、“七小家”、“二十四个股实家”之说。他们都是依靠地租敛财的地主。八大家之首“庆盛堂”冯家，其掌柜名叫冯翊清，人称冯大绅士。他家一共占有四乡的2000多亩土地，开设了许多商店铺面，就连庆阳的邮电业务也由他家经营。冯家有六处豪华大院，百十间青砖瓦房，并在四个乡建有冯绅士巡视的住宅。其弟冯老五为国民党甘肃省常驻北京参议员。冯翊清长期以来，依仗官府，勾结土匪，抢劫绅商，强占良田，包揽诉讼，惨杀无辜，贪污赈款，勒索饥民。他曾保举谭世麟当了营长，与谭狼狈为奸，鱼肉百姓，群众十分痛恨。1929年庆阳大灾，国民党甘肃省府曾拨赈灾款4万元，身为赈灾委员会主任的冯翊清，以修城补路、办火柴公司为名将款私吞。红军进驻庆阳后，他又造谣惑众，离间团结，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扣押红军退给群众的粮食，勾引红军战士开小差。教导师民运科和工作团决定抓住冯翊清贪污赈款的罪行，进行有理有节的合法斗争。

红军教导师安排救国会组织群众向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专员公署控告冯的罪行，迫使专署与教导师政治部联合成立了19人的“冯案检查委员会”，教导师民运科长任质斌为主任委员。4月7日，教导师按照群众要求，将冯翊清父子等6人逮捕，并通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庆阳群众和乡下百姓听到消息，纷纷涌向城关，大街小巷人声鼎沸，反冯风潮非常强烈。14日在红军教导师民运科和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庆阳各界群众3000多人在关帝庙大院召开了对冯翊清的斗争大会，

群众愤怒声讨了冯翊清的罪行,要求冯案“组织会审,就地结案”,严惩冯氏父子。

5月6日,各方代表齐聚新街口,正式审判冯家父子。会场悬挂国共两党党旗,审判会由代区长蔡用之主持,检查委员会主任任质斌宣读起诉书,一个个原告出庭作证,冯翊清在铁的事实面前和人民群众斗争的威力下不得不低头认罪。检查委员会在核实冯翊清罪行的基础上,分别判处冯翊清、冯荣、冯渠父子3人15年、10年、7年徒刑,并追回贪污款1.3万元、公费2000元;赔偿勒索他人款583元、粮食11.2石。“反冯灭霸”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增强了团结抗日的信心。

(三)

在蔡畅的直接领导和红军教导师女战士的带动下,庆阳妇女的解放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她们组织妇女加入妇救会,走上街头刷标语、搞宣传,接管并改造了原庆阳女子学校,贫苦的女孩子冲破封建势力入校学习,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蔡畅和红军女战士积极倡导妇女放足和婚姻自主。教导师和省委工作团办起的“庆阳县民教馆”,设有图书室、阅览室,收有图书几千册。他们还开办了夜校和识字班,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宣传革命道理和抗日主张,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开始后,步兵学校在庆阳的建制随之撤销。红军教导师学员相继毕业后从陇东出发,随部队奔赴抗日前线。部分干部进入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抗日前线山西八路军总部继续办学。

六、改编后的八路军三八五旅留守陇东

1937年8月,援西军奉命从镇原出发赴陕西省三原整编。9月6日援西军在三原县石桥镇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为刘伯承,副师长为徐向前,参谋长为倪志亮(后为李达),政训处主任为张浩,副主任为宋任穷。10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部制度后,张浩为政委(1938年1月邓小平接任),宋任穷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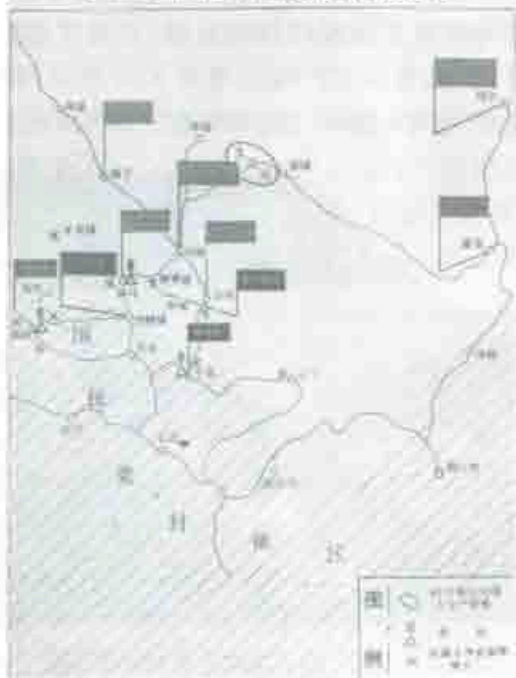
一二九师辖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及教导团、骑兵团、辎重营、工兵营、炮兵营、特务营。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第十一师和十二师，分别改编为第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和七七〇团。改编后，部队经过一段时间政治思想教育，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开赴山西、河北抗日前线，三八五旅旅部及七七〇团留守陇东革命根据地。

(一)

1937年9月中旬，三八五旅旅部和七七〇团奉命从陕西省三原县出发，途经旬邑县到达甘肃省正宁县暂住一周后，旅部和七七〇团分两路行军，于10月下旬到达各自留守地点。三八五旅旅部驻防庆阳，共400多人，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谢扶民。1939年冬，王宏坤奉命去抗日前线担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王维舟继任旅长，耿飏任副旅长兼参谋长，1942年秋耿飏调延安抗大学习，副旅长由陈伯钧接任，1942年冬甘渭汉同志调任三八五旅任政委兼参谋长。旅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警备连、卫生处、特务连、通讯连等机构。

七七〇团团部驻防庆阳驿马关，团部约350人，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胡奇才调延安抗大学习后，由卜万科接任，卜万科调任延安抗大研究班主任后，由陈洪发接任，1942年陈洪发调离由宋景华接任，参谋长为袁渊。团部下设政治处、团参谋处、供给处、特务连、通讯队、电话排、机枪连、卫生队等。团部共辖3个营，一营500多人，营长卜万科，教导员陈生绶。一营开始驻防宁县，1938年11月，在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的不断寻衅闹事下，全营主动撤出了

八路军留守陇东示意图



宁县城,在白马铺暂住不久,奉命驻防镇原孟坝镇,1939年9月下旬奉命撤回驿马关驻防。二营400多人,营长张学文,教导员王厚安。起初同团部一起驻守驿马关,1939年9月下旬奉命接防三营驻进镇原县,12月底,镇原第二次摩擦事件后被迫撤回白马铺、夏涝池、驿马关一线留守。三营开始驻防镇原县,1939年9月下旬,与五营换防后奉命进驻孟坝镇,从孟坝镇撤回驿马关后奉命去定边捞盐。1942年秋,七七〇团全体指战员先后奉命开往大风川开荒屯田。

(二)

三八五旅留守陇东期间,集生产、训练、战斗于一体,垦荒屯田,固守城防,与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1月,国民党中央制定并实行“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国民党陇东驻军与地方保安队勾结,先后两次向八路军留守部队三八五旅进攻,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摩擦事件。在反摩擦斗争中,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飏指挥部队给予顽军以有力回击,迫使其坐下来,与我方谈判,维护了统一战线,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在紧张的部队训练和反摩擦斗争的间隙,三八五旅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王维舟、耿飏的带领下,旅部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先后办起了光华制造厂、造纸厂、新华毛制品厂、光华印刷厂等13处工厂,解决了部队吃粮和日常供



三八五旅战士开挖的密洞

应。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奉命开赴大风川开荒,仅1941年至1943年短短3年时间里,全团共开垦荒地34000多亩,生产粮食2500多石,蔬菜、肉食全部自给。不仅保障了部队供应,还把多余的粮食交给延安,送往抗日前线。

(三)

王维舟带领三八五旅驻防陇东期间,为保卫、建设陇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对王维舟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高度评价,1943年亲笔书赠了“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题词。王维舟,本名王天祯,四川省宣汉县清溪镇人。1887年6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军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王维舟在留守陇东的9年时间里,密切联系群众,勤政爱民,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在庆阳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记在心中,每当农忙时节,他都要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春种、夏耘、秋收。在老百姓婚嫁丧葬时,他分别给以庆贺或吊唁。他经常走乡串户,访贫问苦,了解和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当他得知有些群众缺少柴火时,就派战士上山为群众砍柴。看到群众吃的多是粗粮,就动员部队以细粮换粗粮。逢年过节,他总要到老百姓家里串门子,在庆阳一带,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没有不认识他的。有一天,他下河担水,发现一名妇女领着孩子在城墙下挖“观音土”吃,经询问,她是莲池民兵营长史华的家属,因丈夫去延安集训,生活无着落,只得挖“观音土”和野菜充饥。王旅长听后非常难过,他把母子俩带到旅部,给孩子馍馍和一些衣服,并亲自写信给县政府,解决了五斗米和一些钱。这名妇女逢人便说王旅长是个“大善人”。从此,“王善人”之名不胫而走,传遍了陇东。此外,庆阳还流传着王维舟给一位老太太治“瘦瓜瓜”的故事。庆城西街有一个老太太,脖子上长了个“瘦瓜瓜”,转脖子都有困难。她没钱看病,找到王旅长帮忙治疗。王旅长看见老太太痛苦的模样,十分同情,立即把老太太送到旅部医院,并指示免费治疗。经旅部医院诊断,治疗这种病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当时旅部医院还不具备条件。王旅长没有把病人打发走,他立即给延安中央医院发电报,请求援助。很快延安中央医院派来两名医生,其中一名是苏联外科医生。经过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摘除了“瘦瓜瓜”,治好了老太太的病。不久,王旅长指示三八五旅卫生院开办“利民医院”专门为当地老百姓防病治病。

王维舟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有阶级友爱精神和团结同学、爱护

穷人，孩子深受影响。一次，他和妻子发现孩子吃饭时只喝稀饭不吃馍馍，一问，才知道孩子是把馍馍省下来，带到学校里给那些没有馍吃的同学。1945年，王维舟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2月，王维舟奉命调离。离任那天，庆阳城3华里的街道两旁摆桌设茶，站满了送行的群众，争着和他握手话别，依依不舍。从早上走到下午，才从北城门走到南城门。由于误了计划行程，只得返回旅部，第二天清晨才在群众欢送的掌声中离去。晚清廪生张祥麟先生当天赋诗赠王维舟曰：

镇守庆阳已九春，
训兵有法爱平民；
万方多事频遭劫，
四野欢腾欣得人；
敬老尊贤不挟贵，
奉公洁己又怜贫；
骊歌载唱行旌动，
无计挽留只颂仁。

(四)

在三八五旅留守陇东期间，还留下了副旅长耿飏与庆城姑娘赵兰香结为伉俪的一段佳话。1940年夏天，30刚出头的耿飏在视察庆阳女子学校的时候，与庆城姑娘赵兰香相识。赵兰香看到耿飏英俊潇洒，身材魁伟，谈吐不凡，虽为八路军首长，但待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架子。尽管军装已经洗得发白，却风纪紧扣，严实得体，她顿生爱慕之意。赵兰香出生庆城殷实之家，端庄文静，聪明大方，耿飏一见钟情。两人随着交往的加深，遂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结婚。赵兰香的父亲赵占海，得知女儿要和一个南方当兵的结婚，死活不同意。他想给女儿找一个家庭富裕，有文化的本地人当女婿，他怕在外当兵的整天枪林弹雨，随时都会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后来在蔡畅的劝说下，赵占海终于同意了这门亲事。

1941年7月5日，耿飏与赵兰香在庆阳女子学校，按照陇东习俗，举行了简朴婚礼。王维舟、蔡畅以及庆阳知名人士纷纷前来祝贺，一时

在庆阳传为美谈。婚后，耿飏与赵兰香相互体贴，恩爱有加。他们借来了全套中学课本一起学习，共同提高。在耿飏的帮助下，赵兰香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她积极配合蔡畅组织妇教会，走街串巷，走村串户向妇女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抗日主张，鼓励妇女参加反封建、争自由、求解放的革命斗争。

耿飏和赵兰香的结合对庆城青年妇女影响很大，她们一个个走出家门，投身革命，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进步女学生樊惠兰、刘文英就在这时与时任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团长张才干、供给部部长汪运祖结为革命伴侣的。

第九章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老解放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相对和平的后方环境。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下，为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使陇东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

1937年秋，庆环分区所辖的华池、曲子、环县和时属关中分区所辖的新宁、新正县相继选举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与此同时，中共陇东特委在庆城成立，后并入中共庆环分区委员会，领导庆阳、合水、镇原、宁县等统战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春，在彻底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地区掀起的反共摩擦事件后，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的陇东分区专员公署，领导华池、曲子、环县、庆阳、镇原、合水等6县人民，与时属关中分区所辖的新宁、新正县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努力开展大生产运动，把陇东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建设事业，推向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涌现出了大批闻名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英雄模范人物，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生产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模范县、模范区、模范乡、模范村。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廉洁作风等优良传统，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更加深入人心。

一、陇东两起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主政权不断巩固，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边

区的合法地位,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把陕甘宁边区看作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在利用社会舆论攻击、诬蔑共产党的同时,还动用武力侵夺八路军防区,骚扰蚕食边区,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流血冲突。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和策略,最终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使国民党顽固派以失败而告终。

(一)

1937年10月17日,毛泽东、肖劲光发布命令,指出包括陇东宁县、镇原、环县、合水、正宁等在内的陕甘宁边区20多个县,经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批准,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域,“以上各县任何友军及行政机关不得抽拨一人一枪,即是上述各县统一战线区域的保安大队亦不得补充其他各友军或他调改编”。明确规定在八路军募补区域,任何国民党军队不能抽掉一人一枪,上述各县统一战线区域的保安大队也不得补充国民党军队调动改编。但是,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有计划、有预谋地在陇东根据地挑起了一次次摩擦事件。

1938年2月,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通令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11月,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朱绍良向陇东派员“严密监视”,诬蔑我抗日群众团体为“流痞之结合”,企图制止抗日活动,解散抗日组织。他给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发出指示,对八路军派员赴该县进行民运工作提出种种限制,明确指出如果违反“县政府得制止或解散之”。邹介民对此忠实执行,迅速命令各区一起行动,先后解散了平泉、新城、中原、屯字等地的抗日后援会、农会等民众团体。庆阳的赤城、彭原、蒲川等地群众抗日组织也被解散。国民党宁县县长取消各保救国会,不准人民成立“保后援会”,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接到报告后立即给予嘉奖,说“该县长所陈限制其活动范围,以免扩大赤化一节,颇有见地”。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

防共、反共文件，文件严格限制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制裁一切进步分子言论和行动，甚至要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政组织。同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又决定由“政治限共”到“军事反共”。在这种反动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在全国先后掀起了多次反共高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是陕甘宁边区。1939年5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数千里，妄图置陕甘宁边区于死地。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中，目的是要切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分割围而歼之。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两次反共高潮遭到粉碎后，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和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蒋介石的美梦就破灭了。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所遵循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即自卫的原则，“有利”即胜利的原则，“有节”即休战的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保持独立自主，不放弃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策略原则，是对统一战线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对制止顽固派的反共逆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甘肃省府秉承国民党五中、六中全会的宗旨，把“防共”、“反共”列入施政首要任务，公开在陇东建立“防共线”，并在陕甘宁边区制造了大小几十起摩擦事件，其中在陇东根据地有两起摩擦事件是比较严重的。

(二)

1938年底至1939年6月，陇东根据地发生了第一次摩擦事件。1938年12月20日，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专员钟竞成亲赴庆城，向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要求交还庆阳县，并下令改编自卫军为国民自卫队。遭到王维舟严正拒绝后，钟又转赴合水，企图强制改组合水抗敌后援会，亦遭拒绝。扫兴而归的钟竞成即指使专署的秘书人员写出反共言论，发表在国民党的《新陇东报》上。中共《救亡报》当即撰文予以

批驳,局势骤然紧张。接着,驻防陇东的国民党一六五师鲁敏部突然侵入八路军七七〇团在白马铺、赤城一带防地,扬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公然挑起了陇东摩擦事件。1939年元月,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召集群众大会,威吓说“接近八路军者就是汉奸”,并捕押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多人。3月,朱绍良密电蒋介石,提出先由驻军协同保安队挑起摩擦事端,事态扩大后,由国民党中央出面将八路军调离陇东,如不服从,“则以武力制裁”等等。对于这个具体策划,蒋介石复电称其“应付八路军机宜甚妥,仍希飭体会力行”。4月8日,国民党三区专署派遣保安队一中队在屯字镇,南三镇绑走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7名,缴去枪7支,三八五旅当即向三区专署质询,并电告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在无结果的情况下,三八五旅派人将国民党太平镇区署人员9名和南三镇义勇警察队队长以及马渠镇十二保保长等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安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捕押我方人员,于是,形势更趋紧张。18日,朱绍良密电驻西峰镇的一六五师师长王治岐派兵前往镇原“驻防”。该师随即派兵会同保安队900余人,向七七〇团三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包围了镇原县城。县长邹介民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纪三带领县政府大小官员秘密出城,在屯字镇坐镇指挥。驻扎在城内的保安队为使围城部队混入城内,以“打野外”为名出城。当时镇原城内仅有七七〇团一个营的兵力。在识破这一阴谋后,为避免暗算,随即关闭城门,严密防守,力图以谈判来解决争端。不料国民党方面继续调兵,围城者达3个团之多。25日,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20余人伙同常备队60余人,响应城外进攻,实行夹击,企图消灭七七〇团三营,八路军不得已进行反击,将其大部俘虏,缴获长短枪42支,镇原事件正式爆发。这时钟竟成、邹介民置八路军方面抗议于不顾,不断发动进攻,一六五师及平凉驻军九十七师亦继续增兵镇原,形势异常严重。

在镇原事件发生的同时,又爆发了宁县事件。1937年初夏,西北办事处及关中特区先后派关中特委组织部长杨载泉、新正县委书记郭廷藩及红二师政治部主任邓华与正宁县长朱门等在山河镇谈判;派红二师代表王子宜、杨载泉、新宁县组织部长王秉祥与宁县县长王序宾、保安中队长庞明胜等在宁县城辑宁楼谈判,就新正、新宁苏区和正宁、宁县国统区的划界问题达成了协议。新正县、新宁县和正宁、宁县地界划定后,八路军方面严格遵守协议,而国民党宁县政府却一再越界制造

事端。到1938年底,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公然胁迫当时驻军八路军警七团一营撤走,并要接管所有抗日救国团体。对此,八路军予以坚决拒绝。1939年春,国民党一六五师的3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200余人及壮丁队500余人,突袭警七团一营。一营奋起自卫,经过一夜激战,敌被击溃,毙敌6人,伤12人,俘虏400余人,缴枪械400余支,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围在县城辑宁楼上。预先布置在城外的敌骑兵连乘势攻城,一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

镇原、宁县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为制止摩擦,团结抗战,通电蒋介石、朱绍良等人,要求派代表商谈处理,朱绍良回电同意谈判。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留守兵团谈判代表王观澜、国民党甘肃省参议长谭季纯先后到达驿马关举行初谈。初谈决定撤围启城,但是国民党三区专署不仅“延不履行”,反而向八路军实施炮轰,致使商谈无效。经八路军方面再次要求,双方又在庆阳县城继续谈判。1939年6月29日,双方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不久,王维舟与耿飏又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之意见》。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一六五师及其他部队相继撤回原地驻防,西峰及各县保安队亦同时撤回,镇原、宁县遂恢复原状,保持相对稳定。7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朱绍良发电,望朱对达成的意见“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利团结,是为至幸”。为缓和气氛,10月,八路军警七团三营接替一营驻防宁县城。

(三)

镇原、宁县事件初步解决后,国民党顽固派仍不甘心,经常策划小摩擦,使得陇东局势一直不能缓和。1939年11月19日,镇原县南三镇千余名群众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要求民主和自由。县长孙宗灏被迫接见,表面答应条件,暗中调兵镇压。事后,多数共产党员撤离南三镇,没有撤离的王三林、陈三省、康希业、赵崇玉、罗建章、徐万恩6人被捕。后来,除罗建章死于西峰狱中外,其余都被国民党当局枪杀或活埋。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和全国一系列摩擦流血事件的出现,陇东根据地形势再度紧张。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首先于1939年12月在宁县爆发,并很快扩大到镇原、合水、庆阳、环县4个县,其后果较第一次摩擦事件更为严重。

警三营接替一营在宁县驻防后,国民党宁县政府继续预谋起事。方振武加紧修固辑宁楼、文庙、县府和北城各据点,胡宗南部九十七师秘密占领宁县城北、南山阵地。1939年12月10日夜,方振武指挥保安队突袭驻城八路军,仅北城碉堡就投出手榴弹800多枚。警三营坚守阵地,与敌奋战。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纠合钟竟成所派的保安队,星夜开赴宁县,介入战斗。警三营战士们与敌展开殊死搏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12日突围出城,据守东山高地。13日,警七团一营从合水赶来增援,接应三营撤离东山,退驻春荣,国民党占领了宁县城。

1939年12月12日,合水县也爆发了类似事件。国民党合水县长霍大勋率保安队150余人,袭击城内驻军警七团特务连。在八路军狠狠打击下,顽军大部分缴械,霍大勋被俘,国民党在合水的势力被“礼送”出境,合水即告解放。宁县事件发生时,钟竟成伙同国民党庆阳县县长王致云企图将事件扩大到庆阳。为避免顽固分子的捣乱和袭击,三八五旅于12月13日接管了国民党在庆阳县城的办事处,并且捣毁其庆城区、三十里铺区署,办事处主任辛怀廉与联保主任、保甲长被拘捕,驱除了国民党在庆阳三、四区的势力,解放了庆阳县城。

12月14日晚,国民党镇原县县长指挥保安大队400余人,突然向新驻进镇原县城的三八五旅七七〇团二营发动袭击。二营指挥员沉着应战,很快控制了西城门,消灭了大量顽军,其余守军全部缴械。15日,国民党九十七师步兵营和炮兵连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全部进城围攻,二营退守玉皇山。因力量悬殊,二营和县委工作人员于16日晚突围出城,后击溃国民党政府军一个连,驻孟坝镇,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占领。随后钟竟成派中统特务吉清源带中共叛徒2人,率“动员工作队员”来镇原南三镇策反,中共镇原县委宣传部长赖辉煌、新城区委书记陈贵起等40余人叛变,使镇原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

1939年除夕夜,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土匪头子赵思忠,又名赵老五率部150余人并迫使壮丁数百名侵入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3个乡,残杀地方干部数名。赵匪在奔袭环城途经洪德河连湾时,抓去小学教员王佑,逼其投降反共。王佑死不投降,坚贞不屈,敌人用刺刀戳穿其双手,用绳子拴住拖在马后狂奔,直至拖得肢离骨碎。接着,赵匪窜至环县欲袭击抗日民主政府,被我保安队及警卫队迎头痛击,击毙7人,赵匪受伤逃窜。赵匪败退后,窜到洪德、毛井、虎洞、耿湾等区乡,肆无

忌憚地残杀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肆虐达一月之久，环县人民恨之入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策反，1940年元月，耿湾、车道、洪德、虎洞、环城等5区自卫军相继叛变，先后有5个区、21个乡政府遭到破坏，区乡级干部47人被杀害，20余人被抓走，4所学校被捣毁，5处合作社被抢劫，抢去公粮130余石，造成惨重损失。这就是“环县事变”。

为巩固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八路军警备二团、独立五营奉命先后出动进剿赵匪，环县、华池动员200名群众配合作战。2月16日开始进攻，20日攻克保牛堡，27日解放甜水堡。国民党环县县长逃往中卫，赵匪带百余人钻入一地窖子。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捣毁，赵老五率匪徒12人逃脱后，窜到宁夏下马关一个山洞病饿而死，其余尽皆毙伤俘获。与此同时，警二团击溃了暗藏于车道区的反革命分子张廷杰煽动哗变的一伙匪徒，受张廷杰蒙蔽的大部分自卫军反戈相向，只有少数惯匪随张廷杰西窜固原。这样，经过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宁县、镇原县城，八路军方面解放了庆阳、合水县城。至1940年2月，庆阳、合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朱开铨、高朗亭分别担任县长。3月，镇原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马渠镇成立，冯治国任县长。

(四)

两次陇东根据地摩擦事件，都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地挑起来的。其目的就是妄图驱逐共产党和八路军出陇东，占领陇东根据地，实现其独裁统治。在这两次陇东摩擦事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谢觉哉和肖劲光等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1940年1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高级将领为陇东一系列摩擦事件通电全国，痛切陈词，呼吁其停止摩擦，互派代表谈判，和平解决争端。2月12日，八路军留守处谢觉哉同国民党甘肃省府所派的保安处参谋长李学漠在西峰谈判，最后商定了临时解决办法，即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维持现状，释放被捕人员等。虽然这次谈判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基本上缓和了陇东根据地的局势。在陇东的两次反摩擦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原则立场，对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的顽固派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定方针，最后，使国民

党顽固派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得到了壮大。正规军约增加 3000 多人，地方武装约增加 1000 多人，总计兵力比摩擦事件前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庆阳、合水、镇原建立政权之外，正式成立了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实施了更为有效的行政管理。陇东摩擦事件使人民真正认识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反共的真面目，对中国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边区政府更加热爱和信赖，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三三制”与民主政权建设

1940 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地位，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政策。并要求“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这些民主建政的政策，使陇东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空前团结，各级民主政权的建设不断巩固和加强，有力地推动陇东老解放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同时对抗日民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

陇东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早在 1934 年前后，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苏区，就民主选举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当时国内革命战争的特点所决定，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所限制，这个时期的民主选举还没有真正达到普遍、广泛和高度民主的程度。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大，随着区内各阶级的关系逐步得到调整，真正“确立并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制度”，使“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成为陇东根据地民主建政的一个重要特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陕甘宁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就正式宣布“把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改为一般的抗日民主政制”，以建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各阶层人民的各级参议会来代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

兵代表会,确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把“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作为边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施政纲领之一。1937年5月,边区政府正式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恢复了地主、富农、绅士、资本家等的公民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给予了各抗日党派竞选和参政的自由,从法律上确定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之后,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又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等一系列有关民主选举的法规、法令和方针、政策,使民主选举的原则日臻完善。这些原则的确立,有效地保障了边区各阶层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推动边区的民主选举迅速走向了正规化、制度化,使它不断健全和成熟起来。

“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确立之后,陇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和各阶层人民认真实施,积极投身于民主选举的活动,真正履行和享受了主人翁的权利。每当《选举条例》规定的乡每年一次、县两年一次、边区三年一次的改选到来的时候,特别是在三级同时进行的普选运动中,陇东老解放区境内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民主选举景象。不论大村小镇都贴起了红榜,榜上写着选民的名字。许多村镇都有黑板报、墙报,刊登着选举的消息,秧歌队在街上唱歌跳舞,宣传选举。广大人民群众把实行民主选举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绝大部分投入到选举的浪潮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陇东开始的第三次普选运动中,人民群众参加选举的热情十分高涨。曲子、环县等有87%的选民投了票,最高的达96%。许多农村妇女参加选举的时候,都像出门作客一样梳头洗脸,穿上新衣服。关中分区新正县许多老年妇女,冒着大雨,骑着毛驴,从十几里路外赶来投票。镇原三岔的回民乡,全乡59个男选民和51个女选民,100%投了票。在投票选举时,选民对选什么人当自己的代表和领路人,极为郑重和关切。当时由于陇东乡村文化还很落后,选民中文盲占绝大多数,所以历次选举都采取机关、学校、城镇实行写选票和农村实行“投豆豆”方式,进行无记名投票(豆)选举。在陇东城乡曾经广泛流行着两首《选举歌》。第一首唱道:

金豆豆，银豆豆，
颗颗不能随便丢，
选好人呀办好事，
步步引咱走正路。^①

另一首唱道：

满洼稻秫^②哪一笨子高？
人里头挑人数谁好？
思量又思量，
比较又比较，
把那好人的名字，
写上了选举票。^③

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陇东人民真正懂得自由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善于充分运用无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自由地选举出自己所信任的人，实现自己的要求和愿望。

(二)

为了巩固团结，动员抗战，发扬民主，克服困难，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信。信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在各级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就是“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根据指示精神，陇东分区在1940年9月召开了临时参议会，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各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绅士议员共50多人参加了会议。庆阳县开明绅士刘仲邠当选为参议长，段德彰当选为副议长。王维舟、马锡五分别作了报告，通过了“三七减租”和《1939年底以前所欠

① 高文、巩世锋编：《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

② 稻秫，即高粱俗称。

③ 高文、巩世锋编：《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页。

租一律豁免》的决议。陇东各县也先后召开了县参议会,贯彻执行了“三三制”民主建政的原则。

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大普选。陇东根据地全面进行乡选,具体贯彻落实“三三制”政策。“三三制”选举的程序是:以村或居民小组为单位,由选民酝酿提出乡参议员候选人;以乡为单位召开选民大会,选举乡长和县、乡参议员;县召开参议员会议选举正副议长、县长和县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

“三三制”的选举方法有五种:一是举手表决。首先通过酝酿提出候选人,再由选民或议员举手表决。在乡、村选举中多采用此法。二是投豆豆。将写有候选人名字的字条贴在碗上,由选举人将豆豆投在自己同意的当选人的碗内,谁得豆豆最多谁当选,乡级选举,特别是选乡长时比较慎重,多采用这种方法。三是烧孔。由选举人持点燃的香在被选举人名下的纸上穿孔,谁的孔多谁当选。四是票选。县参议会选举,一般都采用投票的形式。五是聘请。有的乡长或议员被罢免,因工作调动自然减员,或者上级物色的人选落选,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临时聘请的办法予以补充。

陇东各县在这次普选中,严格执行“三三制”政策,受到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拥护。选举一开始,由于能够和人民同甘共苦,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和作风也深得民心,加之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特定环境,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所以人民在选举各级参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时,都极愿意多选共产党员。这样共产党员当选的比例往往超过三分之一的限制。针对这种情况,1942年3月,边区政府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信中规定各县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自动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根据这一精神,陇东各县又进行了改选。环县县政府原来11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占8人,改选时谢正和等5名共产党员主动退出,其他各县政权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也都纷纷提出辞职。这样改选后的县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三分之一,区、乡参议员中共产党员的人数平均占三分之一左右,许多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的人数在三分之一以下。共产党人主动谦让,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极大地促进了陇东根据地民主政治的贯彻落实,与国民党统治区独裁专制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并为此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新时期,陇东根据地进一步加强了政权民主化建设,带头作出好的榜样,积极参加和推动全国和平、民主、团结伟大事业的进程。

1945年10月,陇东各县抗日民主政府进行了第三次改选。这次改选,进一步发扬了民主,“三三制”政策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普遍贯彻执行。陇东分区所属各县共选出乡代表3724人,其中共产党员924人,占25%;合水、曲子、环县、华池共选出县参议员179人,其中115人就是有威望、有才能的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府内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尽职尽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从而大大增强了陇东革命根据地内部各阶层的团结,使陇东革命根据地真正成为民主建政的模范。

1945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决定根据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决议,于10月15日至12月底举行乡、县和边区三级政权的选举。陇东分区于当年8月初,派专署一科科长高伯祥带领6名干部到庆阳县高迎区三乡进行了普选试点,随后,到年底陇东分区所属各县和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县进行了普选。这次选举继续贯彻和完善“三三制”政策,坚持了“普遍、平等、直接、自由”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发动人民彻底检查了政府的工作,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了批评和监督;制止任何操纵行为,保证投票的完全自由;健全民主制度,加强地方自治,各级政府成立选举委员会,在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在选举过程中,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改为人民民主政府,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陇东根据地这次选举,做到了“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选举原则。环县、曲子等地87%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选出的代表具有广泛性,陇东选出的6000多名乡代表中,有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商人以及其他代表。选出的县参议员也是一样。这就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同时,坚持实行“三三制”,共产党的代表在多数乡代表里不到三分之一,在县政府委员里只有三分之一,无党派人士占有充分的比例。结合选举代表们通过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了解了政府工作人员的真实情况,从而淘汰了不好的干部,选举好人进入政府工作。庆阳、合水、镇原、华池、曲子、环县共有58名不胜任工作的

乡长落选,有90名办事公道、能力强、受群众拥护的人当选,保证了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的先进性。陇东根据地的选举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各级政府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三三制”的实行,是“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的一次生动实践。它对于加强各级政府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巩固人民致力于战胜日寇与建设边区的民主团结,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陇东的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

1941年和1942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主要原因一是日本侵略者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批劳力被屠杀或抓走,牲畜、粮食被掠夺,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力;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三是华北地区连续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加重了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困难;四是解放区党政军组织机构过于庞大,根据地经济承受力过重;五是在共产党内部还存在着某些不良作风,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由于上述原因,全国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万,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抗日队伍曾经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地步。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巩固解放区,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包括对敌斗争、“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统一领导、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在十大政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整顿“三风”和大生产运动,这两个中心环节是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精神基础和物质保证。

(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所产生的思想根源,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

发动了整风运动。这次运动先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故称延安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所属分区、各县、区及留守兵团的整风运动随后陆续开始,分别于1942年冬和1943年春季,普遍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要求和任务,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大力从事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然而,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党内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党内的“三股歪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较为突出。同时,抗战以来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大量新党员、新干部加入到党的队伍,他们常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成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

因此,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和更加巩固,这是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战的决定性因素。整风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首先在延安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的。

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准备学习、全党普遍整风、总结历史经验三个阶段。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二)

陇东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演说之后开始的。这年2月下旬,关中分区党委在马栏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边区政府精神,安排开展整风。3月18日,陇东特委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马文瑞作动员报告,陇东分区机关和各县、区干部整顿“三风”运动陆续开始。在整风中,每天集中学习三四个小时,主要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22个文件。为了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陇东特委成立了总学委会,各县委也成立了学委会,两级都办了干部学习班,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陇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许多新党员缺乏革命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这就成为党内不正之风滋长的条件。同时,由于陇东较为封闭,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这就使一些革命历史较长的党员干部认识受到各种限制,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明显存在着。另外,陇东地处抗战后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派遣特务混入根据地和革命队伍内部,用各种方式对革命队伍进行分化瓦解,有的党员在这种新的斗争形势下经不起考验,丧失了革命立场,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由于上述原因,在陇东党组织内,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歪风也严重地存在着,干扰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陇东分区各级党组织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针对党内存在的三股歪风,展开了全面的思想检查和工作检查。整风运动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党中央整风文件的精神来检查党员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查找不正之风存在和滋长的根源。具体方法是学习和教育相结合,反省与批评相结合。在反对主观主义方面,主要批评和纠正了存在于老干部中的经验主义和新干部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反对宗派主义方面,主要批评和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存在着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闹独立性的倾向。同时,还开展了反对党八股的斗争。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陇东分区还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开展了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贪污腐化和落后意识的斗争。对

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进行严肃批评，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

1943年1月，陇东特委改为陇东地委。为了纠正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倾向，地委在深入进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作制度、纪律原则、奖惩条例和政务人员公约，有效地纠正和克服了党内的不良思想。同年5月，陇东地委贯彻延安高干会议精神，安排各县重新集中整风学习，在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反省。9月6日，地委举办整风学习班。由于受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在干部中大抓“特务”，使许多同志受到打击。华池县代理县长第五汉杰被迫自杀，全区105人被迫“坦白交代”，从而使陇东的整风运动一度步入歧途。10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9条方针，及时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通过这次整风运动，陇东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坚持和发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促进陇东分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1941年以后，由于侵华日军的蚕食、扫荡和国民党包围、封锁，敌后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物质供应也发生了很大困难。由于党、政、军、民机构庞大，脱产人员过多，人浮于事，使根据地的供给能力不胜负担。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的产生，也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提出实行精兵主义。随后，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等11人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人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

出后,曾引起争议。一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后非常重视,在旁边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切实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明中共中央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是根本解决庞大机构与战争情况的矛盾,粉碎日军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最后战胜敌人的重要办法。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陇东分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健全,党政干部人员也相应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随着严重经济困难的到来,“鱼大水小”的矛盾就明显地突出起来。因此,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为克服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情况,陇东分区结合整风运动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

为了切实搞好精兵简政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1月发布了《关于各级行政组织区划编制的规定》的通令。通令根据边区各分区人口、地域、自然、经济状况与政治环境等条件,划分了不同等级,并以此编制配备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将超编的人员精减下来,使行政机构真正做到少而精。陇东分区被划分为甲等,关中分区为乙等。两分区对所属各县也划分了等级,庆阳为甲等,华池、新正为丙等,环县、曲子、新宁、镇原、合水县为乙等。各区乡也划分了等级。从而为简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好了准备。

第一次的精简整编工作于1942年2月结束,第二次于1943年5月结束。两次精简整编的内容,主要是裁减不必要的机构,合并性质重叠的机构;下放干部,裁减冗员;按不同等级配备行政机构干部和工作人员。陇东分区专署将下设的处一律改为科;将原来的民政、教育科合并为民教科,财政、经建、粮食科合并为财粮科;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这

样,原来包括秘书室在内的7个科室单位合并缩小为3个科室和一个分处单位。原分区交通运输局和调查站等单位撤销,陇东卫生所与三八五旅部队医院合并,分区税局与庆阳县税局合并。后又根据需要恢复了粮食科,成立了分区邮电局。各县政府机关在精简中将一、三科合并为一科,二、四科合并为二科,取消秘书室,设政务、事务秘书各一人及事务人员若干人,管理各项具体事务。分区专署原有工作人员44人,经过合并精简机构后,配备干部25人,事务人员6人,精简13人;各县行政机构经过精简后共配备干部112人,事务人员35人,精减64人。行政工作人员均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如华池县县级单位精减干部20人;新宁县县府编制25人,区级24人,精减干部22人;合水县县府编制33人,区级28人,精减13人,其中4名送延安学习,7名调动工作,2人到行政村工作。陇东分区在精简各行政机构的同时,对群众团体的专职人员也相应有所减少。陇东分区工会在原有脱产干部60人中减去40人,并取消区工会主任一职。在精减上层的同时,下放干部,加强基层。分区专署于1942年5月专门召开各县一科科长联席会议,决定加强区乡级干部。县级机关编减的人员一律调到区乡去;举办行政人员训练班,训练强有力的区乡干部,提高原有区乡干部素质和工作质量;建立正规而定期的会议、汇报、检查、文件保管等制度,使行政工作逐渐规范化。同时送一些文化较低的年轻干部到学校学习;对回乡务农的干部拨出经费或发放贷款扶持他们安家立业;对一些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不能坚持工作的干部安置休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由于处理慎重,安排适当,编余人员高兴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陇东分区经过精兵简政,既使上级组织变得精干合理,又使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的工作得到了加强,不仅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而且加强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精兵简政,还健全了工作制度,严明了行政纪律,改进了工作作风,使陇东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发挥了效益,政权进一步巩固。

四、廉洁政治换来陇东一片净土

从陕甘边苏区到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认真

贯彻执行南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的干部管理教育制度、依法惩贪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精简机构和俸以养廉制度等一套科学的廉政建设制度,使陇东根据地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一片净土和文明特区。

(一)

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始终把加强党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保证。他们认真学习贯彻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干部管理的规定,并继承发扬南梁苏维埃政府干部管理的经验,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和违规后的处罚。

1934年,苏维埃南梁政府成立后,立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中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一切缴获要归公。”^①正是有了这些规定和法令警戒自己的同志,当时陕甘边根据地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1934年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违法乱纪,1月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对高岗进行严肃批评,并撤其师政委职务。5月28日恢复职务。7月28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联席会议对高岗违纪错误再次进行批评,并准予撤销职务,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1943年4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5月8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上述行政法规明确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所有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健等都由边区民政厅统一管理。同时,对任用干部的标准、对干部的奖励条件和办法、对干部的惩戒和惩戒种类等都有明确规定,规范了公职人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违规后会受到怎样的处罚。《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还规定:“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是,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

^① 《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

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陇东根据地的各分区政府以及县、区、乡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上述规定,使公职人员言有所依,行有所规,起到了极大的预警作用。

在加强干部严格管理的同时,陇东根据地把干部教育、特别是不断净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心灵,抵挡升官发财的诱惑,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防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34年10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扩展为军政干部学校。共有200多名红军干部和南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受到了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政治方针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按照党中央的批示和边区政府开展对广大党员干部教育精神,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广大党员干部和干部着重抓了以下三方面的教育。

革命理想教育。就是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要认清革命前途,懂得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这个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所以,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就决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这就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国民党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面前,部分党员和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产生了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有的甚至沾染了贪污腐化的不良习气。针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及时要求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工作中,应该廉洁奉公、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坚决克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大力提倡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特别是1944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以后,陇东根据地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边区政府对干部的要求和张思德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公仆意识。

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陇东根据地发扬光大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土地革命时期,南梁苏维埃政府干部待遇很低。那时,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分等级。靠打土豪和种公田解决政府和军队供养。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了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陇东根据地所属县、区、乡要求“从节约一张纸,一寸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做起”,“防止浪费腐化习气”。并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公家出账,禁止办高价酒席”,“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有效地防止了奢侈浪费现象的发生,使陇东根据地各级政府党员、干部自觉把艰苦奋斗、廉洁节约视为自觉行动,身体力行。

(二)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组织为了防止失去监督的权力产生腐败,认真贯彻执行边区政府一系列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法规,法令和要求,坚持依法惩治腐败和实行民主监督,取得了明显效果。

1938年8月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试行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正式颁布。《条例》规定:边区所属之机关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论罪。克扣或截留应当发给或缴纳财物者;买卖公物时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捐税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等。并规定了具体惩处标准: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年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追缴其贪污所得财物。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下,谁敢以身试法,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充分表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

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中共西

北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对各级政府机关政务人员工作变动时前后任如何交接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前后任交代时得由其直接上级派员监交”；“收入之款以票据为凭，支出之款以单据为凭；公共财产及物品，以财产目录、财产增损表及前任交代清册为凭；其他解款、划拨款，以解款批回银行票据以及领款机关签收为凭”；“交代不清逾期三个月者，请边区政府视其情节轻重处分之，如涉及司法范围者，得速请司法机关惩办之”。

陇东根据地各级组织，除了认真贯彻、严格执行边区政府的规定外，十分重视所属各级政府的建章立制，健全法制，严明法纪工作。他们依法严肃及时处理违法违纪案件，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其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一视同仁。据1947年5月7日《边区群众报》介绍，在解放战争中，陇东专署财政分处副处长梁某，组织上派他给正在作战的部队筹集粮草，仓库距部队只有四五十里地，他怕吃苦，擅自放下任务没管。二次派出去后，又在后方闲游了4天，中断了前线部队的供给，影响了战斗。合水县保安科长严某，敌人进攻时，惊慌失措，使若干重要文件丢失。对这两个畏怯渎职人员，陇东专署很快呈报边府，予以撤职处分。

实行民主监督，是保持权力廉洁的最有效的途径。为了防止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陇东老区所属各级政府在廉政建设中，始终把权力置于民主党派、专门机构和人民群众严格的监督之下。

依靠民主党派监督。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各级参议会常驻委员和各级政府中，“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的实行，有力地冲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开创了广泛发扬民主的正确途径，为人民直接监督和管理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的共产党员，真诚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决定问题。并自觉接受党外人士的监督，使陇东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廉政建设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

专门机关监督。陕甘边苏区时期,南梁苏维埃政府就设立了工农检察委员会,作为行政监察机关,行使检查监督职责。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政权的监督体制建设。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内,政府主席、县长、乡长及其委员,由各级参议会选举。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提名,经各级参议会批准。上述各种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如有违法失职行为,参议会可以代表人民将其罢免。各级参议会代表民意,承担着监督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责任。在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普选中,人民群众检查政府工作的热情十分高涨。庆阳高迎区六乡,老百姓批评乡政府对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彻底;镇原三岔一乡的女选民批评政府对督促妇女放脚工作做得不认真,以至对大脚妇女歧视等等,这些意见乡政府立刻接受,并很快改正了这些缺点。

人民群众的监督。1943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人员公约》也要求政务人员“要善于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1945年9月,边区政府还专门向各级政府发出了《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指出:“一部分政府人员同人民的关系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人民敢于向政府控告,则是好的现象。”命令还规定:“以后凡遇此种控告,不论是由本府交办的或人民直接呈诉的,你们必须认真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偏袒政务人员的行为。”可见,边区政府对来自人民的监督是非常重视的。人民是政权的真正主人,陇东所属各级组织认真实施上述规定和命令,加强人民群众监督,使抗日民主政权廉洁高效、充满活力。广大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陇东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建设事业,推向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三)

俸以养廉和精兵简政制度,是陇东根据地廉洁政治的两项比较重要的举措,它有效地保证了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各个时期政府的

高效和干部的廉洁。

土地革命时期,南梁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红军待遇很低,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分等级。他们依靠打土豪和种公田解决红军供养。军队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起初衣服、鞋袜自备。到了陕甘宁边区时期,条件仍然十分艰苦,物资极度紧缺。但是,边区政府依然把“俸以养廉”的原则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文化娱乐生活,厉行廉洁政治。当时,边区政府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光荣传统,对公务人员推行略有差别的供给制,并适当发放必要的津贴。并对每位公务人员按月发放一定数额的保健费,对干部子女实行统一供给抚养和教育的制度。据《华池县志》记载,抗日战争初期,陇东根据地所属政府按照《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正、副专员,正、副县长每人津贴为2.5元,区长1.5元,一般工作人员津贴1元至1.5元,勤务员、炊事员为1元。在伙食供给上,除病员、休养员给予适当照顾外,所有公务人员均同等标准。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后,供给即行取消,从1939年起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自给。解放战争中,陇东分区规定的供给标准是:大灶伙食每人每天小米1斤2两,小灶伙食每人每天1斤3两。每人每月大肉2斤,油1斤2两,盐1斤,菜30斤,柴90斤。干部每人每年单衣、衬衣、棉衣各1套(或土布3丈、2丈5尺、6丈和棉花2斤),鞋2至3双,毛巾一条。家属生活由地方包耕或代耕解决。并根据家庭情况酌发小麦1至2石。1948年陇东专署又规定:机关、学校、团体每人每天供小米1斤,要求节约1两。每月盐1斤,肉半斤,菜15斤,柴60斤。

由于物资匮乏,陇东老区实施的“俸以养廉”制度只能维持政府公务人员最低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廉洁奉公,主要还是靠共产主义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支持的,而不是靠俸禄养成的。但是,“俸以养廉”制度毕竟解除了他们生活的后顾之忧。这对政府公务人员的普遍廉洁和防止他们升官发财、钻营禄位、贪污腐化思想的滋生,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必然滋生腐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规定,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于1942年和1943年两次进行精简整编。它的基本要求是,切实整顿各级

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提高工作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促进廉洁政治建设。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经过两次精兵简政,既使上级组织变得精干合理,又使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的工作得到加强,不仅战胜了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而且加强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了工作作风,严明了行政纪律,保持了政府的清廉,形成了勤政效益。

由于陇东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各级党政军组织在不同时期,在建立比较科学、适应各个时期廉政建设制度的基础上,既抓好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等大要案的查处惩办工作,又经常性地开展反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请客送礼、奢侈浪费等腐败现象的斗争。同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陇东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廉洁政治、清廉作风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广大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推动了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中国最文明进步的地方。

五、陇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所受的高利贷剥削,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在此以前,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形成,党的土地政策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以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逐步转变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抗战开始后,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陕甘宁边区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从政治上看,它是党中央所在地和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从军事上看,它地跨陕甘宁三省,与抗日前线的华北毗邻,是保卫西北地区的门户,又是联系华北和西北的战略支点;从经济上看,它担负着改善人民生活 and 占边区人口8%的抗日军政人员的供给,以支持长期抗战的历史重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关系较之其他抗日根据地更为复杂。除曲子、环县、华池3县已经过土地革命,大部分地主的土地已经分配外,庆阳、镇原、合水和环县一个区,以及新宁、新正两县一部分没有分配土地。在这些地区,地主的封建占有土地制度没有受到根本性打击,占农户大多数的贫雇农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贫穷。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对于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主要是调整贫、富、中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对于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则主要是削弱封建剥削关系,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

当时,陇东根据地的土地租佃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租种类,二是伙种类。在租种类中,又分为定租、包山租、活租三种;伙种类分为伙种、安庄稼两种。由于租种类出租人只提供土地,其他一切生产工具都由承租人置借,出租人得到的是纯粹的地租;而伙种类出租人除提供土地外,还供给一部分或全部生产工具,出租人得到的是地租与一部分他所投入的生产工具的利息的总和,因此,这两类租佃关系在性质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没有分配土地的区域,占绝对优势的是定租,也是地主出租土地所采用的主要形式。加上陇东各地的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别,有的地方地广人稀,有的地方人多地少,因而在租额上悬殊也极大。最高与最低可以相差五六倍之多。这些都使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呈现出复杂的情形。

从客观上看,抗战时期陇东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驻有军队,建立了农会,实际上形成了双重政权。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方针是停止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恢复地主、富农、资本家公民法,保护农民和地主土地私有制度。这时,中国共产党集中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并在少数地方开始贯彻。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利用他们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唆使和支持地主阶级进行破坏捣乱。有的地主甚至公开强迫农民交还已被分配的土地、房屋以及生产工具,索取已被废除的旧债;有的公开反对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只要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地方,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就很难贯彻实行。

有些地主进入“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后,不是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利益出发,而是利用这一政权为自己谋私利。其对抗减租的主要手

段有：假佃假卖，倒换佃户；改变租佃形式，将定租改为活租，将租种改为伙种；丈量土地，提高租额；将粗粮租子改为细粮租子，大斗收租；收买干部和佃户；借打官司拖农民下水，迫使农民不敢减租；直接或间接地把持乡村政权，以各种隐蔽方式抗拒破坏党的政策的实行。由于地主阶级的反抗，以及党员干部没有认真发动群众与其进行有效的斗争，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侵犯，造成了陇东根据地减租不彻底或者明减暗不减的现象。

1942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各地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并重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减租减息的政策。

从1937年至1945年，陇东根据地经过几次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揭露了地主阶级抵抗减租减息的种种阴谋，减租运动取得普遍进展。仅据庆阳、环县、合水3县统计，得到减租利益的佃户共计3700多户，减租地亩228万多亩，减租9.3万多石。减租减息激发了陇东人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热情，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根据地减租减息很不彻底。

1945年，合水县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花豹湾不法地主抽回佃农齐祥耕地，并残忍虐杀齐祥妻儿，抵死齐祥家耕牛。1946年8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以《张定芝逞凶花豹湾》为题的报道时，所加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陇东庆、合、镇一带减租很不彻底，边府早就指出。花豹湾的惨案给这个“很不彻底”作了一个具体的刻画。农民的土地被抽回，耕牛被抵死，妻儿被虐杀，而合水县的裁判，却是土地不交回，药钱要分担，地主害死人也不偿命，只是罚两月徒刑。这简直违犯了减租政策和司法原则，更失掉了人民立场。

这件事是农民在不法地主如此欺压下，才被逼得从乡政府、县政府一直到分区法庭控告的。而尚未发现的农民们大大小小的痛苦和冤屈，一定还不少。

应该用这件事作为很宝贵的教训，使各级干部认识清楚：不法地主是如何的阴险毒辣；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将是如何难于逃脱悲惨的遭遇；

而我们干部如果不坚决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我们就不可能使农民翻身;我们的司法干部如果不坚决的站稳立场,就不能保护人民既得利益。

这篇评论在边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投书《解放日报》,要求严惩为非作歹的恶霸地主张定芝。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撤销了合水县初审判决,认定被告张定芝犯伤害致死人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偿付原告齐祥妻子埋葬费和幼子教养生活费共法币28万元,齐祥佃种土地不许张定芝收回。这件事也推动了合水、庆阳、镇原的减租减息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调动广大农民保卫边区的革命热情,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7日发出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其精神是通过清算减租,把地主的土地转化为农民的土地。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开始转变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同年6月到10月,陇东分区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以庆阳、合水、镇原3个新解放县为重点,深入开展了清查减租运动。这次清查一般从1940年算起,1939年以前的欠租一律豁免。1940年至1941年按三七减租,即原租一斗交七升,1942年至1944年按二五减租政策执行,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租25%。1945年陇东普遍受灾,按欠收年交租。凡在此期间,地主都应多收的地租交还给佃户。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清算了地主随意抬高租额、明减暗不减、与佃农对半分成、以债务和畜力剥削佃农等罪行。在农民坚决斗争下,地主纷纷向佃农认罪,退出了1940年以来多占的地租,有的退还粮食,有的用土地和牲畜折算顶替。10月清查工作结束后,11月至12月,又组织干部进行了复查。这次清查减租结果,3个县的地主共向2240余家佃农清退土地55900亩,耕牛54头,羊547只,驴64头。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的租佃关系,确定了新的租额。通过清算减租,庆阳、合水、镇原3县的社会阶级状况也发生了部分变化。根据庆阳县4个乡村的调查,有51户贫农上升为中农,12户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50户佃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减租减息运动,不仅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了全民族抗日斗争的利益。她的实施,不但使地主阶级经济逐渐削弱,农民经济得到加强,而且激发了解放区军民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革命热

情,有力地推动了陇东老解放区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并为以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了必要的准备。

六、陇东根据地的“双拥”活动

陇东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军民关系。正是这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孕育、兴起了“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活动,为陇东根据地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以后,对密切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尤为重视。在陕甘宁边区制定的三个施政纲领中都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到,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拥护军队,部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使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团结。

然而,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放松了边区部队的教育,加之条件艰苦,财政与物资困难,在部分部队中存在着忽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观念,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不够尊重,违犯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在部分政府人员与群众当中,产生了忽视拥护军队的思想,甚至把维护人民利益与拥护军队对立起来;在优待抗属工作中,存在着“重工属轻抗属”的偏向,优待工属比抗属好,甚至还有“人在情在”、“近比远好”、“在比亡好”的现象发生,使许多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得不到解决。这些情况的发生,影响了军民、军政团结。

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政府同时开展拥军拥政运动月活动。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任务,并检讨了政府在拥军优属工作中的缺点。为此,决定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隆重慰问驻军。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

渠指出拥军运动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确定1943年2月5日至3月5日为全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规定每年春节前后,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贺年,增进军民感情。陇东根据地军民热烈响应这一系列决定、指示,迅速掀起了“双拥”运动热潮。

(二)

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的第三天(即1月17日),陇东分区立即召开中共陇东地委、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和所辖庆阳、曲子、环县、华池、合水、镇原县代表及专署各科长参加的扩大会议,对“拥军优属”工作进行了讨论部署。陇东驻军八路军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确定,1943年1月20日至2月19日为陇东分区“拥军优属运动月”;除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慰劳驻军活动外,同时对抗日军人家属(包括参加抗战的国民党部队军人家属)和残废、退伍荣誉军人普遍慰劳和实行优待;并进一步做好抗属登记、动员返乡抗日军人归队等工作。为了推动“拥军优属”活动深入开展,会议还确定成立陇东分区劳军委员会,所辖各县均成立劳军分会。这次会议后,中共陇东地委宣传部及时编印了《劳军宣传提纲》,分发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利用各种形式和场合,在陇东老区掀起了广泛的拥军优属宣传活动。经过紧张筹备,1月22日,由陇东分区党政领导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以及任绍亭、李向荣等民主人士组成的陇东分区劳军委员会即宣告成立。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任主任,陇东分区抗敌后援会主任杨岐山、庆阳市商会会长贺新民任副主任。此后,各县劳军分会也相继成立,并协助各乡成立了劳军小组,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强有力的“拥军优属”领导工作体系。在此同时,陇东驻军八路军三八五旅兼(陇东分区),也对“拥政爱民”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决定1943年2月1日至28日为陇东驻军“拥政爱民运动月”,并制定了包括服从政府法令、爱护群众利益、听取人民意见等9项内容的《拥政爱民公约》,组织各地驻军实施。陇东老区军民就这样并肩携手,掀开了“双拥”活动的新篇章。有资料记载:1946年,仅庆阳县慰劳军队猪肉8035斤、香烟304盒、做军鞋2400双、木炭24.6万斤,捐赠法币50.7万元、食品2980斤,其他

物品 88 件。1947 年春节,庆阳县高迎区 6 乡 80 余户翻身农民发起劳军活动,各村群众手提酒肉纷纷送给驻地战士,军民亲如一家。

(三)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军队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军队的鱼水关系,是陇东根据地军民长期团结奋斗的实践经验。它不仅继承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而且大大丰富了陇东老区精神的内涵。

在陇东根据地,“双拥”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教育、爱护公共财物、减轻人民负担、帮助人民劳作、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向人民宣传、帮助政府工作、执行政府法令、培养拥政爱民典型、爱护军队、帮助军队解决困难、保证军队给养、优待军属、安置退伍军人及抚恤等方面。陇东根据地各区、乡政府和部队据此分别制定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公约,广泛宣传,自觉执行,使家喻户晓的双拥活动逐步走上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双拥”活动内容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形式的灵活多样。陇东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政治要求,使“双拥”活动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府方面,有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座谈访问、纪律检查、军民联防、筹办学校;在经济方面,有助民劳作、捐资救灾、安置难民、劳武结合、拥军义卖、免费为群众治病;在交往方面,有相互走访、互相慰问、互赠锦旗、劳军优抗等等。除了上述经常性的活动形式外,军民双方每年还开展一次“拥爱月”活动,从而使陇东老区军民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促进了军民大团结。

在“双拥”活动中,陇东老区把广泛性和群众性结合起来,激发了军民的参与意识。分区各级党政机关和驻地部队,都把“双拥”活动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参加人员上,“双拥”活动不分男女老幼和职务高低,从分区领导到人民群众,从部队首长到士兵,人人参与,人数之多,实属空前。许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军地各级机关还充分利用《陇东报》、黑板报等媒介和形式,广泛宣传“双拥”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使一大批先进典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军民争相学习,有力地推动了陇东老区“双拥”活动的健康发展。

从 1943 年起,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在陇东根据地全面展开。军队中普遍实行拥政爱民教育,加强了部队纪律,军队自己动手生产,以

减轻群众负担,自己运粮草,以节省民力,并帮助群众耕、耘、收、打;帮助群众砍柴、挑水、治病、办学校、救济难民、训练民兵;春节期间,各地驻军都派干部和战士向附近群众拜年、闹秧歌、开展军民联欢。群众帮助军队运送粮食物资,对驻军伤病员和抗属进行普遍慰问。每年春节前后,全区双拥工作达到高潮。群众自动送猪、羊、鞋、袜、现金,慰问部队;同时给抗属代耕,送年礼、送粮食,上门慰问,赠购物优待证等。在新宁县,有一首《拥军民歌》^①这样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来拥军。
赶上猪羊出了门,
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咳哟咳哟咳哟,
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八路军自家的人,
他和咱们一条心。
坚持抗战有功劳,
赫赫大名天下闻。
咳哟咳哟咳哟,
赫赫大名天下闻。

天下闻名的总司令,
一心爱咱们老百姓,
为咱们日子过的美,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咳哟咳哟咳哟,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八路军呀个个能,
保卫咱边区陕甘宁。
帮咱割麦又帮咱种,

^① 高文、巩世锋编:《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那一个百姓不领情。

咳哟咳哟咳哟，

那一个百姓不领情。

你领情来我领情，

赶上猪羊快快行。

一心爱戴总司令，

一心那拥护八路军。

咳哟咳哟咳哟，

一心那拥护八路军。

华池县是陕甘宁边区的“双拥模范县”，《华池县志》记载了当时全县慰劳军队的情况：1943年春节前，华池县群众冒雪前往大风川慰问驻军。慰劳品有羊55只，猪肉401斤，鸡12只，现金30万元（边币）。1944年华池县慰劳军队的礼品有：猪肉470斤，活羊61只，硬柴10万斤。1945年全县劳军猪肉688斤，活羊60只，蔬菜365斤，木炭2万斤，硬柴28万斤，鞋1300双。1946年上半年全县慰劳军队猪肉477斤，蔬菜1300斤，硬柴24万斤，军鞋1420双，还有袜子、活鸡、鸡蛋、边币等。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极大地加强了陇东老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军爱民，民拥军”，成为保卫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工作之一。

七、马锡五和他的“审判方式”

昨日惊闻噩耗传，

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

风雨同舟十二年。

未及病床谈片语，

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

道马青天不置焉。

1962年4月10日，马锡五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内病逝，享年

63岁。第二天,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惊闻这一噩耗后,当即挥毫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脍炙人口的七律悼念诗。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又无法律背景的马锡五,老百姓叫他“马青天”,董必武称他“法曹英贤”,毛泽东评说“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他扎根陇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传扬天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擎起了人民共和国司法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一)

马锡五,又名马文章,祖籍陕西省延川县马家圪塔。祖父早逝,父亲幼年被他人收养,取名张得元,成家后逃荒来保安县米家砭落户。

马锡五家境贫寒,勉强读完小学,就在家帮父干农活,放牲口。父母见他有心计、识些字,就让他到外面去闯“世界”。他四处奔波,当过记账先生,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兵,参加过哥老会,总不得其所。

1930年春,马锡五找到刘志丹、谢子长,毅然参加革命队伍。他先在部队做军需工作。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与杨仲远、师储杰、杨琪等领导的部队会合,在华南梁建立根据地,马锡五担任军事委员会管理科长,负责军械修理、医疗、商贩等工作。1935年春,红军撤出南梁根据地,转战陕北。马锡五转地方工作,任陕甘省苏维埃粮食部长、国民经济部长等职。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5月,红军西征,苏区扩大,成立陕甘宁省,李富春任书记,马锡五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为了配合西征,马锡五主动请求省委批准,到环县、曲子一带做哥老会的工作。他利用自己在广大人民群众与哥老会中的威望和影响,于1936年8月,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哥老会大爷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发表的《对哥老会宣言》,号召各地哥老会会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抗日救国。会上还决定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和“陕甘宁省哥老会招待所”,作为各地哥老会龙头大爷、江湖好汉聚会联络、商议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心。这次会议,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产生过深远影响,也为开辟陇东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1937年5月15日,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成立,马锡五被选为候补执委委员。1937年8月陕甘宁省改为庆环分区,刘景范任书记,马锡五任专员。当时,分区什么都没有,他带领专署机关人员亲自动手,挖

窑洞，打土坯，油漆门窗，筹建了办公地点。他出身于农民，始终保持了农民的本色。马锡五有个习惯，一有空闲时间，就挎上笼筐走村串户，到农民中间去，一边拾粪一边与群众谈天说地，调查了解情况，掌握群众思想动态。由于他谦虚忠诚，平易近人，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人民群众把他看作地地道道的平民专员。

1940年庆环分区与陇东分区合并为陇东分区，马锡五任专员。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边区开展大规模的运盐活动，将边区特产食盐大量运往外地，换取所需物资。边区政府分配陇东分区22万驮运盐任务，马锡五多次到曲子、环县、合水、华池等县检查运盐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全区统一规定沿途客店管理办法，解决运盐群众食宿，超额完成了运盐任务，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

陇东是陕甘宁边区主要粮食基地，粮食征购任务比较重。马锡五亲自深入各县了解粮食征收工作，发现一些地主、富农拖欠公粮不交，影响征粮。马锡五决定让部队派兵协助，可直接到地主家强行装粮，按量留给收据，让他们和粮食部门结算。这种办法制服了那些顽固的地主，也教育了其他富户，很快交清拖欠的公粮。

(二)

马锡五的司法生涯也颇为传奇。抗日战争时期，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马锡五受命担任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在主持陇东分区行政事务的同时，负责分区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二审判决。其间，他坚持主动到群众中去，深入田间地头，按照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则，灵活机动地审理了许多复杂案件，有效地缓释了民间积怨，化解了社会矛盾，创造性地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融会贯通，探索出一套被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机制。

1939年，环县发生土匪武装叛乱事件。平叛之后，时任陕甘宁边区庆环专区专员的马锡五奉命前去善后。通过深入群众广泛调查，他发现被俘人员中，多数是被叛匪裹胁的农民。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马锡五严惩了匪首和罪恶严重的叛乱分子，果断释放了大批被裹胁的农民，鼓励他们回家努力生产。毛泽东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接见了马锡五，赞扬了

他善于结合实际、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做法。这件事之后,乡亲们便称他为“马青天”。

从1943年3月,马锡五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这段时间里,他经常携卷下乡巡回审判,成功地审理了华池县封胖儿^①婚姻纠纷案,纠正了曲子县错判苏发荣兄弟“谋财杀人”的冤狱案,破获了庆阳县樊滩村张安邦、何爱香奸情杀人案。还审判和调解了许多刑事、民事案件,从中纠正了一些错案,妥善处理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一桩桩、一起起疑难案件,到了马锡五的手中,就奇迹般变得明晰起来。经他审理判决或调解的案件,使违法者受到了制裁,有罪者受到惩罚,无辜者获得释放,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亲自调查处理的封芝琴婚姻纠纷案件,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

(三)

陇东分区所属华池县农民封彦贵,早在1928年就将自己4岁女儿封胖儿许配给远房亲戚张金才之子张柏,两家订了“娃娃亲”。1942年5月,封彦贵因女儿长大成人,当地旧习“彩礼”行情大涨,为了能从女儿婚事上挣得更多的“彩礼”,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买卖婚姻,一面教女儿以婚姻自主为由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暗地托人给女儿另找婆家。先是许给高家,因女儿坚决不同意,他也嫌高家给的“彩礼”少而悔约。随后,封彦贵又将女儿暗地许配给城壕川南原的张宪芝之子为妻,“彩礼”是法币2400元、硬币48元。^②女儿仍然不同意。此事被张金才知道后,便向华池县政府告发。县司法裁判部判处属于包办买卖婚姻,撤销上述婚约。

1943年2月,封胖儿到赵家洼子四奶奶家吃喜酒,碰巧遇上张柏也去了,经人介绍两人正式见面,感觉良好,都表示愿意结婚。封胖儿告诉张柏回去赶紧想办法,说不定哪天爹又要把她卖了就难办了。果然,封彦贵在这年5月又以法币8000元、银元20元、哗叽布4匹,将女儿许配给庆阳县新堡区财主朱寿昌续弦。朱寿昌年龄比封胖儿大11岁,封

① 封胖儿是其乳名,亦写作封棒儿,1955年改用大名封芝琴,是后来文艺作品中刘巧儿的生活原型。

② 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硬币,即当时陇东仍然流通的银元。

胖儿得知后坚决反对，并立即给张柏捎话催其想办法。张家父子召集本家兄弟子侄商议，最后决定“抢婚”。3月13日深夜，张家纠集20多人，手提棍棒，牵一头毛驴，从张湾村抄小路夜奔40里，闯入封家。待撞开院门和窑门，未见封彦贵，只有封胖儿与奶奶、妈妈、妹妹在家。来人催促封胖儿跟他们快走，奶奶见状大骂张金才，并高喊：“土匪抢人啦！”张金才叫张柏赶紧背起封胖儿快跑，到崖背与其他人会合。次日天亮，封彦贵得知此事后，告到华池县司法处。司法处认为聚众抢亲是违法的，当即追捕抢亲人犯，将张金才、张金贵等人先后拘捕。张柏与封胖儿先躲起来，后又投案自首。县司法处就事论事以“抢亲罪”判处主犯张金才6个月徒刑，服劳役，宣布封胖儿与张柏婚姻无效。宣判后，封、张两家都不服判，附近群众也不满意。封彦贵要求上诉，封胖儿更是坚决反对。

这时，正好马锡五来华池县巡视工作。封胖儿在路上碰到马专员，拉住他，在一棵大树下口头告了状。马锡五接案后，与推事石静山一起，深入温台区四乡封家园子，登门拜户，首先向当地乡干部和附近群众全面了解本案的真实情况和一般舆论倾向，接着询问封胖儿本人意见和要求，了解到她不愿嫁给朱家，“死也要与张柏结婚”；同时将张柏放出，听取其意见。案情真相已全面掌握后，便协同县司法处裁判员，在村公所举行群众性的公开审判，将此案有关人员召集起来，当众问明封彦贵屡卖女儿、张金才等纠众抢亲皆为属实，封胖儿也当众表明愿与张柏结婚。然后又听取到场群众对本案的意见，群众一致认为：封彦贵屡次以女儿许配婚姻为由接受彩礼，变相卖女儿，违反婚姻条例，应受处罚；张金才黑夜聚众抢亲，既有伤风化，又妨碍社会治安，闹得四邻以为盗贼临门，惊恐不安，更应受到惩罚。特别是对封胖儿与张柏的婚事，群众极为关注，认为合理合法，不能拆散。在此基础上，陇东分庭于1943年7月1日宣布二审判决：一是原判决撤销。二是张金才犯聚众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三是张金贵实行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四是张德赐附和抢婚罪，判处劳役三个月。五是张仲附和抢婚罪，判处劳役三个月。六是张老五附和抢婚罪，判处劳役三个月。七是封彦贵屡行出卖女儿，包办婚姻，判处劳役三个月。封彦贵出卖女儿的法币没收。八是封胖儿与张柏婚姻为有效。

事后，张金才家属要求减轻处罚，经陇东分庭请示边区高等法院，

同年7月26日高等法院批示：“张金才等率众黄夜抢婚，固属扰乱社会秩序，惟以乡民无知，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婚姻既承认有效，而对其犯罪行为亦可从宽处理。”最后决定，对张金才等“提前假释或宣告缓刑”，并退还朱寿昌的部分财物，免使其损失过大。

这一判决，做到了合法、合情、合理，将聚众抢婚、买卖婚姻、自主婚姻等三重复杂矛盾条分缕析，是非分明，惩罚了违法者，打击了买卖婚姻，保护了自主婚姻，非常有效地化解了涉及多个家庭的矛盾冲突。并且，受到当地群众一致拥护。受罚者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表示服判。一对新人封胖儿和张柏作为胜诉者，更是皆大欢喜。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先后作了长篇报道。陇东中学语文教师袁静以这个案例为题材，编写出了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陕北民间艺人韩起祥又据此案编写出陕北说书唱本《刘巧儿团圆》；解放后，首都文艺工作者又将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改编为评剧《刘巧儿》上演，不久评剧《刘巧儿》被拍成电影搬上银幕。

(四)

马锡五判案，坚持群众路线，不轻信口供，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他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其要点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重证据、不轻信言状；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审判不搞“坐堂式”，采取“座谈式”，诉讼手续简便易行，方便群众。在陇东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马专员灵活机智判案的很多故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传统。

有一次，马专员到镇原县马渠乡寻访，碰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拦路喊冤。马专员赶紧迎上前去，双手扶起老人，并接过老人手上的状子。原来，这是一起家庭婆媳矛盾纠纷案。素来清官难断家务事，马锡五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召集当地10位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先把状子内容念给他们听，然后听老人们发表意见。因为这些当地的老年人最熟悉当地的民情、民俗和民意，也最清楚这户告状人家的婆媳矛盾底细。老人们纷纷提供情况，发表意见，很快理清了是非曲直，调解了家庭矛盾。马锡五用很地道的乡音说：“咱们这里风俗，大小事老年人最明了。我办啥事都要依靠群众，感谢大家帮这个忙！”

合水县五区丁、丑两家土地纠纷案，先后经过两个政权三次审判，最后由马锡五主持进行调解，双方尽释前嫌，重归于好。案情是六乡村民丑怀荣在丑家梁有山地一处，三乡村民丁万福在菜子河及其附近有山地一片，约240亩，两家都企图扩大土地面积。于是，丁家从菜子河山上向北发展，丑家从丑家梁山地向南发展，双方土地接壤后，冲突就发生了。1938年，这里还没有建立革命政权，丁、丑两家向国民党宁县政府告状。丑怀荣通过其侄女婿担任县保安队长的关系，从县政府领取一张“补契承业执照”，不仅丑家梁山地归其所有，而且丁家老业菜子河及其附近山地，也划归所有。丁家不服判决，上诉到国民党平凉高等法院，并在当地杀猪请客，重金贿赂士绅法官，致使法院判决，丁家不仅收回菜子河及其附近土地，而且连丑家梁山地和丑家坟地都一并归其所有。当地群众得悉后，议论纷纷，痛恨官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认为两家都属无理。

1940年，合水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丑怀荣再次起诉。限于政权初设，司法制度尚未健全，两家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943年，马锡五受理此案，组织陇东分庭石推事到当地召集四邻逐个调查询问，再召集干部群众多人进行实地勘察。基本情况全部弄清楚后，组成以石推事、



马锡五审判方式(版画)

区长和群众参加的调解小组,根据《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的有关规定,裁决菜子河及其附近山地归丁家,丑家梁山地归丑家,双方都愿意接受调解,正式划定地界,订立了息讼契据。

如果说判决是一般司法审判程序,那么,调解就是群众路线下司法审判的新形式。“审判是强人服从,调解是自愿服从。审判得好,赢的,输的,都不能不自愿服从。审判与调解是一件事的两面。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①司法路径的改变,带来审判方式和方法的变化。不同于刚性的判决,柔性的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对于乡村邻里矛盾的化解。

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对近代西方司法模式的一种创造性变革,是司法领域里的群众路线。“边区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就是使司法工作成为群众自己的工作,司法机关成为群众自己的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良好习惯,公正负责地为群众解决问题,不拘形式的组织群众的审判,以减少群众的诉讼。”^②减少诉讼,就是把乡村邻里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在陕甘宁边区1943年以后是逐渐成为现实。

边区政府及时总结推广陇东分庭“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计,全边区司法机关,1942年调解结案的民事纠纷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1943年上升为40%,1944年达到48%;轻微刑事案件经调解结案的,1942年占全部刑事案件的0.4%,1943年上升为5.6%,1944年达到12%;与此同时,各级司法机关受理案件逐年减少,1942年全边区民事和刑事案件共计1832件,1943年下降为1544件,1944年上半年为622件。

马锡五所在的陇东分庭调解力度更大,1943年5至12月,调解处理的占全部案件的17%;1944年1至10月,调解结案的上升到55.5%。边区各地涌现出很多调解模范村、乡,以及模范个人。基本上杜绝了群众上访、闹访等恶性事件发生,让群众在自我管理,实现了自我教育,

① 谢觉哉:《关于调解与审判》(1944年5月),见《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页。

② 雷经天:《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1943年12月)。

自我文明素质提高。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干会议上,马锡五和他的战友马文瑞、王维舟都被树立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干部。毛泽东主席为马锡五的题词是:“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五)

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举马锡五为边区政府委员和高等法院院长。他离开陇东到延安,主持高等法院工作。

马锡五十分重视对犯人的教育改造工作,他经常教育司法人员克服简单粗暴作风,改进管教工作。他说:“犯人也是人,他可以变坏,也可以变好,只要我们用党的政策、法律去教育他们,促使他们认罪服法,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会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他要求各级法院组织犯人学习有关材料,开展法律教育;组织犯人参加生产,在劳动中改造。边区法院组织犯人开荒种蔬菜,还办起豆腐坊、粉坊、养猪场。马锡五抽空也和司法人员一块劳动,以司法人员的高大形象教育、感化犯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马锡五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仍然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经常教育司法干部要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体贴群众的困难。1962年4月10日,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司法事业奋斗了一生的马锡五同志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4月15日上午,首都各界人士在北京嘉兴寺为其举行了公祭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公祭大会。

马锡五虽然逝世,但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他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中国司法工作影响十分深远。“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中国法制史和人民司法实践中唯一以人名冠名的审判方式。它从产生伊始,就受到高度赞誉,成为一种审判模式和人民司法的典范。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宣传、推广马锡五的审判经验。1945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柏渠做了《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在关于改善司法工作的部分中说到要“提倡马锡五同志审判方式”。全国解放以后,“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中国的司法工作中继续发挥着作用。195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审

判方式方法及其经验》中专门谈到“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其作为重点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1979年印发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规定》中指出：“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以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也要先经过调解。”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正式把“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及“着重调解”作为民事诉讼和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调解、调研被写入了民事诉讼法，调解结案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方经验”。这种影响直到199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由此可见，“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来源可追溯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由于全国普遍推行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把法庭开到老百姓中间去，在田间地头开庭审案，巡回审判，人民群众反映很好，不仅密切了法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法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法官的形象，人民群众对法官交口称赞。2009年6月，习近平在庆阳视察调研时，看望了“刘巧儿”原型80多岁的封芝琴老人。他说，老人家不容易啊，你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你的故事，才诞生了“马锡五审判方式”，至今还在全国司法系统推广。他还说，这里应该是普法教育基地、婚育新风教育基地。

第十章

大生产带来陇东经济大繁荣

历史常常出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夏后氏政权废弃农业,周族部落首领不窋失去农官职务后,率领部落来到陇东后,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于是,他们在庆阳拓荒垦种,教民稼穡,开创了中国的早期农耕文化。

几千年以后,当中国革命从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中冲杀出来,落脚到陕甘苏区这块土地上以后,首先遇到的还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使人们学会了怎样搞经济。当年,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陇东根据地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着军需民用物资的大量增加,陇东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一大批救亡工厂应运而生,各类公司、商铺、店号遍布各地,陇东根据地经济一片繁荣。

一、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屡屡进犯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经费,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禁止任何粮食、物资流入边区,企图困死、冻死、饿死共产党和边区军民。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陇东分区党政军民贯彻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执行边区政府以农为主,发展经济的生产自救方针,从粮油、贸易和开办手工业方面入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了抗日民

主政权。

(一)

从1941年开始,陇东分区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党政军民一齐出动,上山下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在农业上,各级政府按照“农业第一,提高质量,保证供给”的方针,在以自愿结合为原则的前提下,农村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请牛会^①、伙种队等劳动互助组织遍布各地。他们合理组织劳动力,开展劳动竞赛,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华池、曲子、环县、庆阳、合水、镇原6县参加互助合作的人达到1.4万多人,占总劳力的33%。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陇东分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43年6月,分区所属6县就新开荒地15.8万多亩,超过计划9800亩;驻军开荒1.4万多亩,地方各机关开荒900多亩。加上1942年开垦荒地5万亩,全区共开荒22.6万多亩,使耕地比原来增加了10%,年增产细粮5万石左右。实现了自给有余,不但保证了根据地供应,还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批物资,仅1941年到1946年交救国公粮就达21.4万石,使陇东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

在开荒种粮的同时,陇东分区还发动群众种植棉花和一种可以染布的植物——蓝等经济作物。全区推广了庆阳三十里铺植棉模范王敬唐的种棉技术。庆阳、合水、镇原3县,1943年就织布3.2万多丈。到1944年,全区种棉3万多亩,收棉花30多万斤,蓝1000亩。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同时重视发展畜牧业,全区饲养大牲畜近14万头,养羊68.7万多只。

陇东分区各级民主政府动员妇女开展了纺纱织布竞赛活动。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全分区参与纺织布的妇女有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匹,大大缓解了根据地布匹不足的困难。在纺线织布活动中,涌现出了不少先进的家庭和村庄。1944年8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说:“庆阳高

^① 唐将班子、请牛会,都是当时陇东农村一种互助变工形式的名称。

迎区五乡三村蔡得旺家是一个团结和谐、勤劳纺织的模范大家庭。全家69人、8名家庭妇女都会纺线织布。全家有7把车子、3架机子。他家的纺织带动了全庄，庄里5户妇女都学会了纺线织布，出现了一人带全家，一家带全庄的喜人景象。”

加强了对二流子的改造，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项新任务。二流子是指那些完全没有正当职业而靠不良手段维持生活者，如偷盗、玩赌、吸毒、拐骗和利用迷信活动榨取钱财的人，这些人有的甚至见利忘义，充当汉奸特务，破坏抗日，与人民为敌。据1943年统计，陇东分区共有二流子1100多人。分区各县对他们采取说服引导，督促他们从事劳动生产；以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制定生产计划，解决实际困难；对改邪归正的二流子进行表彰奖励，引导其他二流子向改邪归正的学习；对恶习太深、前面的办法无效者，实施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劳动生产。经过这些措施，共改造二流子700多人。庆阳县共有二流子220名，经过政策感化，改造为务农的80名，经商的70名，有转变没有达到要求的83名，没有转变的37名。改造后的二流子大都能参加生产劳动，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二流子所开垦的荒地达1.3万多亩。大生产运动中改造二流子工作，对发展生产、转变社会风气和锄奸自卫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分区各级机关、部队、学校带头参加，作出表率。1941年分区机关和各县政府机关开垦荒地3000多亩，全分区干部种地6000亩以上。他们种棉、种蓝、养猪、养羊，开设作坊，纺线织布，不仅做到了衣食自给有余，而且解决了大部分机关的办公经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陇东分区专署警卫队，到1943年开荒地共190亩，烧炭两万斤，全年蔬菜自给，每周可吃猪肉一次、吃羊一只，每年发夏衣两套、衬衣一套及新棉衣、棉被、毛毯等。陇东中学在庆城教子川开荒地70亩，仅蔬菜就收了7万斤，可供师生吃一年；自己养猪，每月吃肉4次；女学员缝衣组，15天可以缝衣100套。与此同时，分区各级政府于1943年还安置了难民、移民529户、2200多人。

(二)

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根据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受到了各级党和政府的表彰奖励。1943年1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上，

中共中央西北局对领导生产卓有功绩的王震等 22 名党政军领导干部以隆重奖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县长李培福被授予大生产英雄称号，毛泽东分别为他们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

同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陇东分区在庆阳县城召开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到会军民商学近万人，盛况空前。有 54 名劳动英雄受到表彰奖励，评出甲等劳动模范 5 名，乙等 18 名，丙等 31 名。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的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在陇东尚属第一次。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我们热烈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有党政军民 30 万人的努力，我们今年的生产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的大会就是庆祝生产胜利、检阅生产成绩、总结生产经验的大会。我们自己动手，吃穿住样样都有了。”接着，中央西北局代表李合邦讲话，他说：“以前人们都说西北是地瘠民贫的地方，可是我们边区现在是地肥民富了。这是共产党、八路军建立的民主政权带领大家辛勤劳动的结果。”陇东地委书记段德彰在讲话中号召大家：明年再开荒 18 万亩，增产粮食 30 万石。当曲子县劳动英雄孙万福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激动地说：我做庄稼得到了一个劳动英雄，是响应毛主席大生产号召的结果。常言道：“三人合一心，力量就举千万斤。”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生产就能富足。人人参加生产，都做劳动英雄，你看光荣不光荣！

在陇东首届生产展览会上，各县和单位送来农展品共 1100 多种，工业展品 200 余种，优良牲畜 10 多种，各类艺术品 400 多种。展品有两丈高的麻，7 尺高的糜子，47 斤重的南瓜，5 斤重的萝卜，3 斤重的洋芋，1 尺 5 寸长的谷穗。特别是庆阳县县长苏耀亮种的棉花，每株结棉 30 多朵，而且又大又白。庆阳县驿马关区妇女李怀花织的老布、七七〇团用桦树皮做的笔记本、联合厂生产的毛呢子布、庆兴工厂生产的大花毡以及联合厂生产的各色呢子布、绒大衣、栽绒毯子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6 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在延安举行。参加大会的各条战线的英雄代表 200 余人，其中陇东分区 59 人。华池县的劳模代表、外号“气死牛”的开荒英雄张振财被选入主席团，张振财和新正县创立“义仓”的模范共产党员张清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华池县城壕村被评为大生产模范村。

12月9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举行座谈会,亲切接见了张振财、张清益和改良耕作技术的曲子劳动英雄孙万福等17位代表。在这次展览会上,合水的水稻、镇原的阉鸡、庆阳李怀华的妻子和新正县妇女肖冰婵织的土布获乙等奖。这次大会后,庆阳、新正、合水等县分别召开了群英评奖大会,奖励劳动英雄。这些表彰奖励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

(三)

张振财,1904年出生于华池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3岁时母亲不幸病故,靠父亲拉扯成人。张振财少年时上过四年私塾,17岁成婚,不久妻子抛下一个吃奶的婴儿离开了人世。从此,张振财拖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一边给别人打短工,一边在自家的薄田上辛苦劳作,日子过得十分煎熬。

1934年后季,在堂兄张振兴的影响下,张振财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俩以做小生意为名,走街串巷,为南梁赤卫军搜集情报。他们从敌占区庆阳城一带了解到情况后,立即赶到南梁向习仲勋等领导人汇报,受到表扬、鼓励。在习仲勋等人的教育下,张振财懂得了很多革命真理,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

这年年底,城壕村建立了党支部、乡政府,张振财承担了乡上的通讯联络工作。他把幼小的孩子寄养在亲戚家里,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每隔5天,即前往庆阳、驿马等地搜集情报,并把情报及时送往南梁、二将



张振财

川等地党组织。1937年,他在庆阳城遭到国民党军警逮捕,在狱中,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没有暴露身份。后来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出狱。1939年,城壕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逐渐改善。张振财分得30亩地,两头牲口。不久,又续娶了妻室,家境也逐渐富裕起来。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张振财积极响应,人挖畜耕,起早贪黑,拼命劳作,十天内开荒25亩,加上历年所开荒地,一共种田98亩。

当年收获粮食 27 石,同时与村民办起合作社,利用农闲时间,到盐池驮盐赚钱。他还经常给村上困难户借粮,借农具、借牲畜,帮助邻里种地干活,受到群众称赞。县政府为了表彰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奖给他一头耕牛。县委书记高伯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以《开荒英雄——张振财》为题,撰文介绍了他的模范事迹。1943 年 3 月,张振财被群众选为城壕村变工队队长。他组织大家讨论制定增产计划,又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如在粮食生产上,他当年就抓了三条措施,一是扩大面积,广种多收;二是精耕细作,提高单产;三是节约劳力,提高工效。结果新开荒地 200 多亩,提高生产效率 20% 以上。张振财领导生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身作则,无论生产与工作,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干好的,自己先干好。在他的带领下,变工队各户第一年就收获粮食 280 石,比上年增加 113 石,除过总支出,余粮 81 石,做到了“耕二余一”。其他副业收入也有所增加,各项工作如植树造林、优待抗工属、支前、通讯、站哨、防奸等都干得相当出色,他还帮助教育好了本村的一些懒汉二流子。

1943 年 3 月,张振财被评为县劳动英雄;11 月初,又被评为陇东分区劳动英雄,参加了分区首届生产展览及劳动英雄大会,获彩色木匾奖牌一面,地委书记马文瑞亲笔题写“劳动英雄”四个大字。另获得物质奖:有水红毛呢布一匹、花毛毯一条、毡鞋一双。在万余军民参加的授奖大会上,张振财代表分区 54 名劳动英雄发了言。不久,他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他所在城壕村被选为边区模范村。他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并作为主席团成员与李富春、徐向前、王震、周扬等领导人一起就坐,他的肖像同其他几位劳动英雄的肖像被悬挂在主席台上。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与会英雄。宴会



林伯渠为劳动英雄张振财书写的奖状

发言中,张振财向中央领导人介绍了他领导变工队的经验和成绩,得到了高度重视。之后,毛泽东又专门与17位劳动英雄谈话,其中和张振财主要谈变工扎工问题,谈话从下午持续到深夜。张振财在会议期间,主动向大会递交了《创造模范行政村的计划》,决心将城壕乡第一行政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生产,做到“耕三余一”,力争实现“耕二余一”。在这次会上,张振财获奖状一面和特等奖奖金边币3万元;城壕村获锦旗一面,耕牛一头。

1944年,张振财带领城壕村变工队新开荒地375亩,修水田100亩,并通过改良耕作技术,加强农作物管理等措施,增产细粮93石,实现了“耕一余一”。同时在种植棉花、运盐、发动妇女纺织、发展养羊养猪、栽桑养蚕以及防奸、自卫、通讯、拥军拥政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这年12月,张振财第二次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继续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受到大会奖励。1946年,张振财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有华池县李良子乡马河村的高隆清。他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积极组织互助变工队,开荒种地,解决了当地5个村、30多户贫困农民的吃粮问题,被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称号。

(四)

1943年7月5日,时任新正县委书记史梓铭在延安《解放日报》以“张清益同志首创的义仓”为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1945年6月12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第十一次政府委员会第五次联席会议上,由议员任绍亭、杨正甲、白文焕、高崇珊提出议案并经会议通过,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普遍建立义仓的命令》。于是,由张清益在新正县首倡并创建的义仓,在边区23县中得以普遍建立起来。从此,张清益的名字便永远镌刻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史册之中。

张清益是关中分区新正县长舌头区雷庄乡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1岁时,父亲丢下一大堆欠债,留下他和年仅8岁的妹妹及母亲,弃世而去。为了养家糊口,张清益被寄居在堂兄家里,过着出卖劳动力的雇工生活。14岁时,其堂兄想把他的已许聘给人的妹妹悔婚再卖,名义上说是为了给清益娶上媳妇,但被他坚决拒绝了。从

此,张清益就离开了堂兄的家。当时张清益的光景过得十分艰难,他一面挑卖一些青果之类的东西急解燃眉,一面到附近的尚家塔开荒种地。

1933年,张清益的家乡雷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土改,他除祖上遗留的7亩地外,又分配了30亩。这样就打下了他翻身的基础。他从一个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雇工变而成为一个拥有自己土地的主人,所以从心底里对党和政府抱着无限感激和忠诚之心,积极参加并努力完成党和政府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年就被群众推选为乡苏维埃主席。在工作中,他忠实、积极、勇敢,即便是在蒋介石胡宗南部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对边区的多次“围剿”时,他也从不动摇、消极,始终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工作。经过了严酷斗争的实际锻炼,193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清益自己是苦出身,亲身遭受过许多痛苦。1929年大饥荒,他亲眼看见许多穷人饿死的饿死,流浪的流浪。从那时起他就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在好年头积蓄一些粮食以防备灾荒呢?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关中分区号召人民多开荒、多生产。在这期间,他想防备年荒的事过去在国民党豪绅地主当道的时候很难办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就叫作“义仓”。后来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堂兄,堂兄对他说,这种积蓄粮食防备年荒的储蓄,就叫作“义仓”。从此,他才知道了这个名词。到了春季布置开荒的时候,张清益就急着想创办义仓,他到新正县委去请示,县委书记史梓铭积极赞扬并鼓励他办好这件事情。回来后,他信心十足,首先召集了党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做通了持反对意见的人的思想后,就召集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了创办义仓的决议。当即决定全村开义仓田20亩,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劳动力,每人规定全年出义仓工5天。到了3月,全村32个劳动力一齐出工,就开垦义仓田25亩,全部种上了糜子。全年开荒、锄草、收打共花了200多个工,收获了4石义仓粮。

对于义仓的生产和管理,张清益有一套很切合实际的办法。当开荒耕种的时候,他在乡上组织了一个义仓生产委员会,领导耕种义田,所收粮食全归义仓所有;秋收后即组织义仓管理委员会,管理义仓粮食。具体管理办法有5项:①各村义仓借粮,须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在村民大会上批准,方得借出。②借粮时间,规定为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之

际,秋收后不借出。③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1升;不参加开义田者,借粮1斗,加利3升。移难民借粮,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甚至可以不加利息予以优待。④半年借粮,本利秋收一并归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交,待年头转好交还。⑤不务正业,吃烟要赌,不事生产者,不给借粮。

张清益为了动员群众多办义仓,还到各处去演讲。他曾到长舌头集市上对群众宣讲说:“开义田积义粮,是为了防备荒年,救济我们自己的。虽然我们在边区有吃有穿,但如果有了长余粮食,岂不更好吗?大家不要怕没有多的粮食,常言‘羊毛虽小,积众成毡’,如果各村都有义仓,那不就有很多的粮食吗?”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张清益所在的雷庄乡当年就建立了5处义仓,开垦义仓田65亩,收获义仓粮12石5斗;在长舌头区建立了23处义仓,开垦义仓田400多亩,收获的粮食就更多。

张清益首创义仓的行动,引起新正县委和关中地委的高度重视,县委书记史梓铭亲自总结经验,关中分区在所属各县大力推广,从而掀起了群众性办义仓的运动,对缓解粮荒、安排群众生活起了很大作用。至1944年6月,关中分区所属新宁、新正、赤水、淳耀、中心区四县一区共开垦义田71523亩,是计划数的3.7倍,建义仓153处;其中新正县开义田2176.5亩,是计划总亩数的两倍,建义仓56处,占全关中分区义仓数的36.6%。由于张清益的突出贡献,1943年11月,关中分区评选他为劳动英雄,奖励耕牛1头。同年11月26日,张清益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及第三届生产展览会,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获得奖金边币8万元,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1944年12月22日,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1月,他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获“边区特等劳模”称号,获奖边币8万元。

二、陇东根据地的工商业和金融税收

在大生产运动中,随着军需民用物资的大量增加,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4年,各类公司、商铺、店号遍布陇东各地。陇东分区土产公司、盐业公司以及德丰源、庆

丰源、新丰源等各种字号的商店贸易十分红火。曲子县党政军3个商店组成的曲子联店,1944年全年贸易总额达到2.5亿元边币,获纯利4205万元边币。与此同时,地方手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制药厂、制毡厂、造纸厂、火柴厂、香烟厂、肥皂厂、木炭厂等一大批救亡工厂应运而生,制革、农具、酒坊、染坊、裁缝、砖瓦等军民联合手工业蓬勃发展。一共组织运输队39个,投入运输的牲口达到1400多头,年运销食盐7.2万多驮。在经济工作中,陇东各级政府执行边区政府关于“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经济斗争的基本方针,掌握食盐和土产等外销物资,实行专卖与统销,坚决取缔走私,建立边币、法币^①交换所,禁止在边区流通法币,并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鼓励商人到边区贸易。这样,使陇东老区军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需要得到满足,大大活跃了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

(一)

抗日战争以前,陇东根据地没有像样的工业,商业也十分落后,一切日用品依赖外地输入。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始注意发展工商业生产。起初创办的公营救亡纺织厂、光华商店和供销合作社等,规模都很小,业务活动范围也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陇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严禁棉花、布匹等生活日用品进入边区,妄图把边区军民困死。为了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加强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0年4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零年经济建设计划》;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区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区的指示精神,陇东分区各级政府把大办工业和手工业放在了重要议事日程。逐步建成具有公营工厂、合作社营工厂、群众合营工厂、个体私营工厂和家庭手工业以及手工作坊等工业体系。包括军工、被服、制革、造纸、化工、纺织、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农

^① 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国家信用法定货币,禁止银元流通。1948年8月,法币被金圆券代替。

具制造、食品加工等门类。工厂和工人数量也逐年增加,产品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

1938年,陇东分区各县普遍兴办生产合作社,并以此为基础,发动群众集资入股,开办小型工厂和作坊,逐步形成规模生产。当年,在分区政府倡导下,首先由曲子县政府牵头,在曲子县城创办职业工厂一处,工人14名,这是陇东地区开办的第一个公营工厂。到1941年,由各级政府直接经营的工厂有17家,工人300多名,资金15万多元。同年10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陇东分区已开办工厂10余处》为题报道说:“甲,救亡工厂,这是陇东特委、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集股合办的,股金3.5万元,向边区银行贷款2万元,现有工徒22名,土造织布机100匹,织袜90打。乙,利民工厂,是庆阳县联社开办的,资金7700元,借款5000元,有工人5名,织褐子布机1架,出品有毛褐子布、毛毯、绒鞋等。丙,克己工厂,是专署保安科所办,资金600元,向银行贷款5000元,有工人24名,犯人7名,织褐子布机2架,制毡工具1套,线用手捻。每月制毡130余条,织褐子布4匹。此外,工会还办有口袋工厂,资金5000元,工人12名,土著人造工具3付,每月织口袋150余条,今年赚利1500元。”1942年,留守陇东的驻军三八五旅兴办了益华工厂,有铁木机6台,手拉机6台,年产布最高750匹。1943年,益华工厂与陇东专署办的救亡工厂合并,仍用救亡工厂的厂名,有职工141人,拥有资金740万元,年产大布3600匹、毛毯1920条、毛巾600打、袜子840打、布鞋2.4万双、毛毡1.2万条,年净红利1770万元。1941年春,陇东专署与三八五旅驻军在合水县蒿嘴铺联办起陇东益民造纸厂,建厂初期有29名工人,后来发展到120多人。厂房借用民宅,设备因陋就简,生产全用土法,原料利用当地盛产的马兰草。1942年正式投产后,当年生产纸张3万刀,1943年生产纸张4万刀,到1946年产量达到11万刀。产量逐年增加,技术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生产的对开马兰纸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名优产品。同时,抗大七分枝还创办了东华池肥皂厂,年产肥皂12万条,满足了部队的需要。

(二)

在大办工业、手工业的同时,1942年,在陇东分区所在的庆城设立了盐业分公司、土产分公司、贸易分公司以及光华商店陇东分店。陇东

分区专署下辖的各县大都设立了支公司，基本形成了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和各县“一条龙”的公营商业体系。

当时，整个陇东地区和西安市周围，大部分群众都用的是定边盐和盐池的盐。定边、盐池归陕甘宁边区管辖后，边区政府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成立盐业公司，开展盐业贸易，向陇东分区以南的国统区运销食盐，增加收入，并换回边区军民急需的布匹、棉花、医药等日用品及军用物资。同时，陇东土特产分公司大量收购本地的土特产皮毛、羊毛、中药材等，运往国统区西峰镇以及陕西关中销售。这样不但活跃了陇东根据地的经济，还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光华商店，成立于1938年4月，开始由梁爱民等人创办，是陕甘宁边区银行领导下的商业与金融结合一体的财贸办事机构。1939年7月，在庆环分区专署所在地曲子县城设立了光华商店曲子分店；1940年8月，庆环分区、陇东分区合并陇东分区，陇东分区在庆阳县城设立了光华商店陇东分店（群众习称联合商店）；随后，又在西华池、驿马关、孟坝、三岔等地设立支店7处；到1945年，陇东光华分店已拥有总资金1.3亿元，成为陇东商业贸易的“总龙头”。光华商店主要经销皮毛、甘草、食盐等土特产，兼收土布、棉花，其目的是为部队和机关干部筹集资金，供应给养，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

陇东贸易分公司成立于1941年6月，起初设在庆阳城，后来曾先后转移到曲子、元城、悦乐等地，工作人员100余，各县都设有支公司。贸易公司主要在本地收购土特产和经销日用品，在外购进部队需要的枪支、弹药、药品等。庆阳县支公司还办有毛褐子厂。无论分公司和支公司，收购的物资和收入的现金，都要上交分公司。贸易公司既是银行的坚强柱石，又是部队、机关、学校后勤供应的商贸单位。

在光华分店和陇东贸易分公司、盐业分公司、土特产分公司的带动下，陇东根据地的机关、学校、团体和驻军，纷纷自筹资金，兴办集体性质的商店、铺面。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陇东分区创办的“德丰源”、“庆丰源”，三八五旅驻军开办的“八一商店”，庆阳县政府开办的“万里店”，华池县直机关办的“自足会”商店，合水县政府办的“集合春”商店等等。

（三）

1942年以前，陇东分区就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办事处，各县的区、乡

也大都有供销分社。这种机构是公私联合经营的集体商业。经营的商品主要是日用百货,用以满足群众和部队的需要。据有关记载:曲子、环县、华池供销合作社多创办于1937年10月,合水、镇原、庆阳的供销合作社多创办于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史料选编》记载,1938年底,陇东分区共有民办合作社27个;1942年发展到38个,总资金441.6万元;1943年度发展到47个,总资金7930万元。发展最快的曲子县和庆阳县,1944年猛增到99个。其中庆阳县22个,合水县12个,镇原县4个,曲子县33个,华池县10个,环县18个,总股金6648万元,总资金1.4164亿元,总资金比1943年增加近20倍。

1938年,庆阳县城群众集资入股办起了合作社,1942年扩建为县联社,下辖5个区办合作社和一个运输队。供销合作社的创办与经营,给群众带来许多好处,很受人们的欢迎。一是合作事业的发展,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加快了物资交流;二是合作社的商品价格一般比私商便宜,例如每尺土布合作社卖3元钱,而私商要卖到3.5元至4元钱,一页犁铧合作社卖70元,而私商卖100元;三是合作社对卖给抗日军烈属的货物实行八折优待,大大增进了军民关系;四是合作社按上级指示只收边币,而私商不收边币,对巩固边区金融起了很大作用;五是加入合作社组织,可以分到红利,有的合作社每股红利年可分9元。由于有这些好处,才使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

(四)

在发展公营、合作工商业的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私人独办或者合办工厂、商店,放手让公营、集体、私营三者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繁荣了边区的经济。1938年,陇东分区只有几处民办工厂,民办商业27家,1942年,发展私人工厂20多个,商店40多家,总资金441.6万元。1944年,商店达到99家,总资产1.42亿元。

庆阳县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纺织厂。一处叫民生纺织厂,为独资,掌柜的叫梁鸿桂。他原来是一位往来西安和庆阳的纱布商人,因带着300万元的货物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时被非法扣押,这才弃商在解放区办工厂。他制作了一架纺纱机和两架织布机,开办了民生纺织工厂。另一处叫庆兴纺织厂,是由“七小家”之一的刘宪庭等5个私人股东和3个机关股东合资创办的,拥有资金1300万元,7架织布机和两架轧花

机,以及数架纺线机。厂子主要靠周围40户妇女纺线供应棉纱,很快形成了规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靠收地租而经营手工业,刘宪庭说:在边区开办纺织厂,政府给以很大帮助,在银行里可以减息贷款,织出的布匹不需纳税等。许多绅士商人正是看到了在政府帮助下经营工业的优厚利润,所以他们纷纷转向办手工业。据《甘肃乡土志》载:1942年,庆阳有褐子布纺织厂4家,从业人员98名,拥有资金29万元,年产大件毛织物8300多件,小件毛织物8000多件,毛褐子布2万匹,毛口袋2000条。据当时陇东分区统计:1944年全分区共有各类手工作坊320家,从业517人。

(五)

陕甘宁边区的金融、税收和生产是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经济统一体。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陇东根据地金融与税务事业的发展,对于打破外部封锁、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平抑物价、支持财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6年9月,陕甘宁省分库更名庆环分库,驻地曲子镇,是陕甘宁边区最早设置在陇东境内的金融办事机构。1940年7月,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陇东分行,驻庆阳县城,首任行长周崇德,后为任远之等,并附设分店,代理金库。陇东分行还下设西华池、驿马关、曲子3个办事处,各办事处也附设金库和货币交换所。1942年1月,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和边币、法币兑换业务的开展,陇东分行又在孟坝、三岔两地设立了货币交换所。1944年春,又增设了赤城、环县、苦水三个交换所。至此,陇东分行共下设庆阳、西华池、驿马关、曲子、孟坝、三岔、赤城、环县、苦水9个银行办事处和货币交换所,基本形成了陇东独立的金融网络。

陇东分行及其所属支行办事处刚一成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就显示出了强大生命力。1940年7月成立到年底短短的5个月时间内,收入总额就达到10.14万元,每月平均收入2.2万多元。1941年上半年,总收入达到17.1万多元,月平均收入2.8万多元。

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授权边区银行委员会发行1元、5元和10元的边币,并责令各分、支行义不容辞配合完成发行任务。通令下发后,陇东分行按照分配

的任务,及时开展边币、法币兑换业务,经过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边币发行任务。

在税收方面,陕甘宁边区废除了国民党繁多的苛捐杂税,改革了税制,规定按收入多少纳税,实行合理负担。并明确规定:“在照顾工农利益、不加重其税负的同时,以要团结地主、资本家抗日,不把赋税全部压在他们身上。”当时,陇东根据地同陕甘宁边区一样,税的种类是极少的。陕甘宁边区财政部长南汉宸1944年8月在《边区财经问题》一文中说:“边区的税收只有四种:①货物税(出入品税);②营业税(商业税);③牲畜、斗佣税(畜、粮食手续费);④盐税。前三种税由税局征,后一种是盐的出产税即盐税,在全边区流通只征一次税,由盐务局征收。”而且税率又极低。“第一是工业无税,无论是私营的、公营的与公私合营的;第二是政府奖励的事业免税,如植棉、纺织等;第三是税务事业的经费很少,可从税收中提取4%强,解决自己困难。”

金融与税收事业的发展,使陇东根据地逐步摆脱了困境。从1944年起,基本上达到了财政收支持平,并且略有盈余。当年,陇东分区财政收入14.3亿元,支出14.1亿元。其中:生产自给占68%,国营企业收入占11%,税收和公盐代金占16%,银行垫支占5%,主要用于生产投资。

(六)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陇东根据地还十分重视与根据地以外的各有关行业、商户通商做生意。他们把边区盛产的食盐、肥皂、羊畜、皮毛等土特产,利用各种渠道运出去,然后再将根据地以外的黄金、白银、药品、棉布、枪械等换回来。为了搞活流通,增加根据地的经济收入,陇东分区政府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坝、三岔、苦水、长舌头、湘乐8处关隘乡镇开辟了对外贸易口岸。凡属这些贸易口岸,一般都有重兵把守,同时设有货币兑换所、税卡、贸易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司等机构,专门管理与承办进出口货物的业务。

在设立定点贸易口岸的同时,陇东分区在区内还开设集市,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或骡马交易大会,吸引外商到陇东根据地进行贸易。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陇东大市场计有庆阳、曲子、合水、环县、镇原5个。主导市场以庆阳、曲子为最。庆阳县城是分区专署所

在地,城市商业虽不十分繁荣,但在陇东来说,商人数目占第一位。庆阳的物价升降多受西峰、西安的影响,公司售货多卖给本地坐商,也直接贩运到陕西岐山、凤翔一带。曲子市位于庆阳、定边公路上,为货物集散之地,由陇东西华池、驿马关购进物资发往定边多经过此地。定边食盐南下,也多囤于此地。零售物资较快,市场虽小,但十分繁荣。1942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陇东举行骡马大会”为题的一篇报道中说:“陇东本年骡马大会如期举行,颇为热闹。自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开始,至五月初七结束,会期共10天。万商云集,贸易鼎盛,与会者不仅有边区各县的群众,并有友区人民,包括陕、甘、宁、青、晋、豫等省远近客商。每日从早至暮,市集熙熙攘攘,车马络绎不绝。大会上百货齐全,最多是牛、骡、马,牲畜在5000头(匹)以上,大多被外地客商买去。”足见陇东根据地对外贸易的繁荣。

(七)

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商贸战线上,还有一支闻名遐迩的脚骡运输队,为边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个运输队筹建于国民党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1940年。1939年9月,随着陇东“摩擦”事件升级,庆环、陇东、关中三个分区都开始建立各自分区机关的运输队。1940年春,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陇东分区机关和各县运输队都相继组建起来。1941年前季,陇东分区党委、政府根据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及时作出决定,通令各县扩大运输队,自力更生解决机关干部给养困难。同年8月,全分区的运输队即由原来的7个增加到15个,共有职工200余人,驮畜1100多头。到1943年,随着大生产运动开展,陇东的驮运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到6月底,全分区共有大小不同规模的运输队39个,总计驮畜1400头。与此同时,设置在各交通要道上专为运输队服务的行业也有所增加,有骡马店37处,口袋厂2处,兽药房8处,皮绳坊3处,铁木工铺11处,草料场14处。陇东贸易分公司运输队,共有职工16人,驮骡30余头。上路时,每人赶两头骡子,主要任务是从延安总公司驮上货物,然后向陇东分区的各支公司分发。驮运的货物从延安起程时,全由延安保卫团护送;到陇东各支公司发货时,由三八五旅驻军护送。途经国民党封锁线时,就和当地驻军联系,运输队要多少人,部队就指派多少人护送。运输队还利用统战关系签署有护

照,又有军队当保镖,国民党地方当局一般是不敢贸然阻拦的。运输队每次出发,多是一起行动,领头的骡子背上插一杆红旗,上写“西北贸易总公司陇东分公司”名牌。1946年9月,中原失守,内战爆发,陇东各运输队更加繁忙起来,夜以继日地加紧为战备物资驮运,谁也不甘落后。1947年春,全国解放战争序幕全面拉开,国民党胡宗南军队重点进攻陇东,迫使陇东的所有运输队不得不集中起来,跟随分区和各县党政机关一起转移,并为之服务。1947年6月以后,对运输队实行整编,300多人、1500多头驮骡编为一个总队,下辖3个大队,专为地方部队随军运送物资,承担分区机关和各县机关的物资供应任务。1948年春,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陇东根据地革命形势趋于缓和。3月,陇东地委、专署作出决定,恢复各县贸易公司、供销合作社和运输队,运输队又活跃了起来。

三、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屯田垦荒

王维舟、耿飏所率领的八路军三八五旅进驻陇东后,为了解决当时吃住困难,立即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他们在庆阳等驻地挖修窑洞、开荒种粮、饲养畜禽、伐木烧炭、种棉种蓝、兴办工厂等,一年内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吃住等生活困难。

为了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屯垦”政策,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和副旅长耿飏亲自到子午岭深处察勘地形,并在大风川设立了拓荒生产处,先调去3个营开始垦荒。1943年4月,七七〇团1000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带领下,进入了东华池的大风川、小风川垦区,开始向荒山进军。

(一)

东华池,从南北朝的西魏建置华池县开始,随着历史的变迁,它几经兴废。到了明代,巡抚马文升又重新修复,建筑起依山虎踞的东、西、北三城,以犄角之势屹立于子午岭群峰叠翠之中,成为古代的边防要塞。以这座古城为依托,辐射出去有三条大川,一条大风川,一条豹子川,一条平定川。这里,山深林密,水秀山青,土地肥沃,人烟稀少,是一个极好的农垦地方。

1942年秋，驻防庆阳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的七七〇团由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率领，开赴东华池，屯兵大风川。大风川是葫芦河的一条支流，河床大部分干涸，只有中间有不到一米宽的小溪断断续续地流淌着。河床上长满了野草、灌木，荆棘和杂树；川边沿的山崖上，尽是桦树、栎树、刺槐等高大的落叶乔木。远远看去，河床就像是林海中停泊的一只小船，中心的小溪就像一条银链，把那小船紧紧地系在林海里。整个百里长的川道里兽群出没，很少见到人影。面对这丰饶而又荒凉的林区，七七〇团的战士们唱道：

五丈高的树哟一人多高的草，
百十里宽的大风川呀风光好。
流不断的水哟流出油的地，
咱们屯田垦荒呀一定会夺得大胜利。
鸡在欢呼哟白桦在欢笑，
美丽的大风川呀处处都是宝。

尽管大风川风光美丽，但是，要在这里生活却是极其艰难的，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战士们在这里砍树挖窑，自己修建房屋，把旧庙里的铁钟抬来，自己熔铁打造工具，硬是在这荒山野岭上摆开了屯垦的战场。垦荒种田并不比在疆场上厮杀轻松，战士们常常是赤臂上阵，挥汗如雨，手上打满血泡，腿上被荆棘刺伤。为了争取进度，他们连喝口水、擦把汗也要节省时间。水壶常常背在肩上，想喝时，镢头往地上一扣，人坐到镢把上，顺手拽过水壶，咕咚一气，三五分钟之内，既解了渴，也歇了气。毛巾就系在背心扣子上，擦汗时只需一扬手就行了。他们就这样与荒山抗争，向荒山“要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仅七七〇团就涌现出了邓中华、刘全清、王立友、张永海、王得金、窦喜才、李发习、李长荣等劳动英雄；李发才还创造了一天挖地7.2亩的旷世纪录，还有杨全成、张友成、李三明等同志，竟然把热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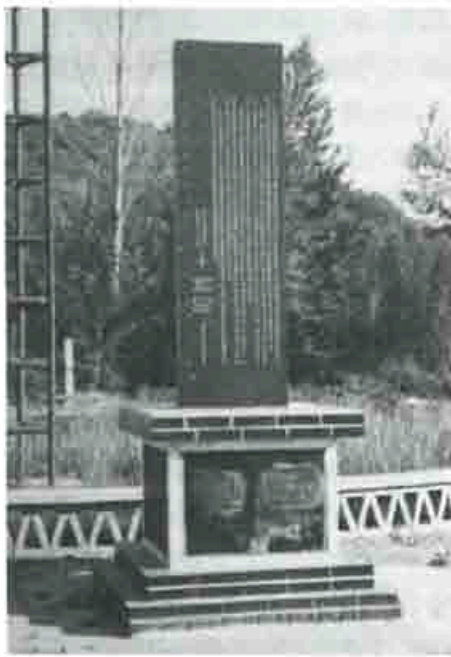
历史上有许多朝代也实行过“屯田”政策，可是有哪一个朝代的屯田，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屯田相比。战士们《开荒》歌里唱道：

你一锄呀，我一锄，
比比谁的力量壮？
你一锄呀，我一锄，
开荒好比上战场。
上战场呀打东洋，
咱们生产为谁忙？
为的是哪打胜仗。
打胜仗，
保家乡。
保家乡啊，
要武装啊，
抗日军民有公粮，
劳动英雄有荣光、有荣光！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才有这样明确的目的：只有革命战士，才能把开荒与人民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只有他们才

能显示出“屯田”政策的巨大威力，取得垦荒的伟大胜利，当1944年11月，他们奉命出征离开大风川时，在大凤川与小凤川交界处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写道：

抗战以来，我团即退守后方，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一面保卫边区，一面生产建设。八年来由于党政军民的帮助和我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得以突破敌顽封锁，渡过抗战难关。为进一步生产建设、积蓄反攻力量，去年四月即奉命开抵大风川。当时大风川是一荒凉地带。野山僻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群遍行，经二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



大风川七七〇团屯田垦荒纪念碑

开地三万四千多亩,修筑窑房四百余间,为便利军民运输,今年又费工四千五百日,修筑凤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里,及小凤川木桥一座,并操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割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满仓,蔬菜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

对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我全体同志莫不争先恐后,克己奉公。如开荒中有的半夜燃火挖地,有的抱病上山。如练兵中人人昼夜苦练,反复操作,精神更为热烈。生产之劳动英雄,学习模范与工作模范者全团以数百计。连长邓中华、刘全清,指导员王立友,排长张永海、朱彦林,班长王德全、吴开祥,战士窦喜才,李长荣更是群英中的出色人物。

此二年中我团牺牲有三人,九连杨全成在建筑中伤亡,张有成在保卫边疆战斗中流血牺牲,五连李三明操劳成疾,病歿于医院。我全体同志誓死完成三人遗志,直抵胜利之前程,完成革命事业,谨此碑文以资纪念。

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第三八五旅七七〇团

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 副团长卜万科

参谋长李迎喜 主任曹传赞

暨全体指战员敬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立

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同志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热情地赞扬七七〇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垦大风川的革命精神:

数代荒山变良田,
屯军积粮依此山,
为国为民皆模范,
白河^①将士古今传。

(三)

当时,有不少外国朋友对中国共产党的“屯垦”政策不甚明了,听说中国共产党在陇东的荒山野岭里大举屯垦,总以为和国民党的一些官兵一样,在种植经济价值高的鸦片烟。为了澄清这些糊涂看法,党中央批准了一批来延安观光的外国人到大凤川参观。一位外国记者看后,难以理解地问道:“你们用汗水打了几十万斤粮,已够苦的了,还修路建

^① 白河部,即三八五旅七七〇团的代称。

桥干什么？要在这里安家吗？真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吗？”当时的七七〇团团团长张才千回答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人民军队不能靠剥削和压迫人民来生存。我们搞大生产，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吃、穿、住、用的问题，解决给前方抗日杀敌的兄弟部队的供给问题。另外，我们这么吃苦，这么为难，完全是国民党逼出来的。他们不给我们供应一切生活物资，想从经济上卡死我们。我们这支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我们能让别人卡死吗？我们一定要坚持活下去。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您说对了，劳动、创造，是我们共产党的本色。我们党旗上用镰刀斧头做图案，正说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得搞生产、搞建设。现在我们进行的抗日救国和大生产运动，修路建桥，你们要说是建设社会主义，从长远意义上说，也行。反正，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双手，去创造新型的社会，建设美好的新生活。”

(四)

三八五旅的屯田垦荒，在陇东又创造了一个“南泥湾”。1944年春，旅长王维舟带领15人的“王维舟生产小组”在庆城周围垦荒种地30亩，当年收烟叶900斤，水靛180斤，干靛150斤，获纯利20多万元。王维舟自己搞了一辆纺车，从工作中抽出时间和利用晚饭后的休息时间纺线，一天可以纺二两线。1944年4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以《王旅长纺线》为题目，生动、具体地报道了王旅长纺线的动人情景，这篇短小精悍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王维舟旅长，他从来也未纺过线，今年搞了一辆纺车开始学纺。起初很慢，后来一天比一天快，现在一天可纺二两。每天他总要从工作中抽出时间来纺线，或利用晚饭休息时间。如果因工作关系不能抽时间，就和勤务员进行变工。

有一天下午，王旅长把车子搬到院子里，戴着眼镜，披着一件边区出产的呢子大衣在纺线，同志们看他纺得满起劲，非常快。大家感觉很惊奇。有一位同志走到他跟前看他纺线，王旅长问道：“你们在纺线吗？”这位同志回答道：“我们没有时间！”王旅长说：“我都可以抽点时间来纺线，你们也应该抽出空余的时间来纺线呀！”当时说得这位同志哑口无言，脸都红了，惭愧地说：“旅长都能抽时间纺线，我们何尝不可抽空余时间来纺线呢？”

陈副旅长^①、贺参谋长^②，每人也搞了一架车子，也在工作中尽量抽出时间纺线，或牺牲游戏时间，有时和勤务员实行变工。现在，他们纺得非常快，“成了老手了”。在旅首长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勇敢”^③部各科长、个别科员也搞了一架车子，积极地纺线。警卫班的同志非常努力，一天除操课外，只要他们一有空就动起手来，似乎变成了一个小纺织厂了。

三八五旅为粉碎蒋介石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加深军民情谊，建设和保卫陇东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深受陇东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群众称他们为“抗日之英雄，生产之好汉”，旅长王维舟和群众亲如骨肉，被群众誉为“王善人”，朱德称他是“我们的好旅长王善人”。

四、延安求学来到陇东豹子川

20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青少年中曾流行的一本《延安求学记》的书，这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八路军某部的一批指战员、根据地的一些学生以及从敌占区逃来的上千名知识青年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求学的事迹。作品以当时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为主线，生动地反映了抗大七分校学员拿起毛泽东交给的“三件宝”，“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战斗生活。当时的抗大七分校就在今华池县的东华池。这批到延安求学的热血青年在延安参观学习了一个月后，来到了陇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

(一)

建军的骨干，
革命的青年，
在豹子川扎下大营盘。

.....

1942年春天，一支约有3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陇东华池

① 即陈伯钧，时任三八五旅副旅长。

② 即贺庆积，时任三八五旅参谋长。

③ 勇敢部，即三八五旅的代称。

一带开来。这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的学员。抗大七分校创建于1941年7月,是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和抗大总校一个大队的基础上,发展兴办起来的,校址在山西兴县李家湾。1942年2月,由于日寇疯狂“扫荡”,七分校奉命西渡黄河。这批学员在延安受到朱总司令和贺龙司令员的亲切接见之后,身背行李,长途跋涉,来到东华池的。

到华池后,校部决定第一大队住大凤川,二大队住豹子川,三大队住平定川,女学员住在东华池东面的小山头上,校部设在东华池,相互距离七十八里。校部管理科就在宋塔下面张怀林老汉的院子里,共盖有13间房子,其中5间作伙房,8间作饭厅。东城洼是供给部。宋塔周围住着文工队,还有一个大车队住在和家窑,共有4辆木轮大车。

抗大七分校的校长是彭绍辉。1933年春季,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他的左臂不幸连中敌人两弹。当时医疗条件差,左臂被锯掉了。到七分校后,他让铁匠给自己打了一把短柄镢头,一只手抡着小镢头,带领学员一起开荒。他还常常用一只手打裹腿、打草鞋,动作相当麻利。七分校还有一位副校长,名叫喻楚杰,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两鬓染霜,精神矍铄,平常很勤谨,脸上老是笑嘻嘻的。

学员们都很年轻,有从部队选送来的战斗英雄,有从解放区和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有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来到延安,来到陇东抗大七分校学习。

(二)

万事开头难。抗大七分校刚刚建校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同治年代以前修建的窑洞,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山脚下。窑洞里杂草丛生,蛛网密布,青苔满壁,人走进去,惊得成群鸟雀横飞,野鼠黄狼乱窜。这些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破窑洞,经过一番打扫,便成了学员们的宿舍。但是,人多窑洞少,很多学员还不得不傍山架棚,荒野露宿。晴天还可以凑合,遇上雨天,外面不停地下,里面不停地漏。深夜,学员们常常被雨水淋醒,他们坐起来把被子顶在头上遮雨。雨点打在被子上,滴滴笃笃像敲鼓,被子也就变成了雨伞。有时候,岩石还会忽然塌下来。二大队有一个叫杨永福的班长,就是晚上睡觉时牺牲在倒塌的岩石下面的。

建校初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粮吃。学员们要到合水的太白、华池的山庄往回打粮。既没有驮畜，又没有口袋，学员们就把被里子缝起来，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自己往回背。顺葫芦河到太白背粮，来回一百八九十里山路。两天跑一趟。路上饿了，他们就烧洋芋吃，或用石板炒小米吃。渴了，河沟里的溪水就是“高级饮料”。

没有蔬菜，学员们就上山采蘑菇、采木耳、寻野菜。后来有人发现野杏可以当菜吃，虽然那野杏味道又酸又涩，却成了学员们的上等菜肴，不管哪个班搞回了野杏，都要给别的班送一些。

为了弥补粮食和蔬菜的不足，学校还组织学员在川道里打野鸡、兔子，上山打野猪、狍子，下河捉鱼摸蟹，改善学员们的生活。一吃起野味，学员们便互相逗趣地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藏的，山珍海味，吃啥有啥，样样俱全，物美价廉，全部奉送，一钱不收。学员们就是这样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不断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

(三)

6月1日，抗大七分校开学了。三个大队驻扎地相距较远，无法集合在一起，只好分别在驻地举行开学典礼。那一天，“独臂勇士”彭绍辉校长参加了二大队的开学典礼。他大声宣布说：“同学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今天开学了。课程表上的第一课是开荒种地。”彭校长第一个举起了短柄镢头。于是，一场披荆斩棘，向森林、荒山要地的战斗打响了。欢快的劳动号子回响在苍莽的林海上空。沉睡多年的大风川、豹子川、平定川沸腾了。在彭校长的带领下，三个大队的学员，同时拿起了第一件宝——镢头，投入了紧张的开荒生产。时间不等人，节令不饶人！上级要求每人每天开荒1亩，总共每人平均开荒地20亩，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重重的荒山被学员们包围了。学员们像打冲锋一样，排成一列，一个挨一个地举起了镢头。只见镢头在空中飞舞，脚下的泥土哗哗翻过。学员们连喊带叫地冲上前去，真是势如破竹，气吞山河。

为了进一步提高开荒进度，学校组织队与队、班与班、山头与山头之间开展竞赛。一个班领了先，另一个班马上赶上来，一转眼又被另一个班超过了。胜利的捷报接连传下来，开荒纪录不断被刷新。

开荒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劳动。尤其这里野草丛生，一镢头下去挖不断土里的植物根，还会把镢头“咬”住。学员们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知的。头一两天开荒回来，学员们腰痛腿酸，两手打了血泡，手指肚压成了平面，四个手指并在一起分不开，手指弯曲着伸不直。脚和腿，腿和腰，腰和膀好像分了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不少学员从山上下来勉强吃点饭，烫烫脚，钻到草棚子里一倒下去就睡着了。

当时，学员们一是不习惯，二是不得法，没有斧子，没有锯子，只好用镢头劈树根，一镢头下去震得虎口发麻，劲越使得大，手越疼。不几天，学员们的双手都垒起了重重迭迭的血泡，一抓镢把钻心地疼。后来，他们开动脑筋，想出了很多巧干的办法，什么对付树根“连根拔”啦，对付丛草“火烧连营”啦。时间长了，大家慢慢地都锻炼出来了。手上的血泡磨平了，“分了家”的脚、腿、腰、膀重新连贯了起来，一天挺着腰板大于十二三个钟头，腰不疼，腿不酸，一个个身强力壮，满面红光。最慢的每人每天挖地都在一亩以上。

学员们通常5点钟就起床上地了，可有的人，还偷偷地加班加点。为了使学员们休息好，学校不得不命令：没有起床号一律不准起床。听不到上工号，不准私自往地里跑。听不到开工号声，不准提前上山劳动。听到收工号响后，要立即停止劳动，不准延长劳动时间。尽管这样，仍有一些学员“不服从”，天不亮就悄悄起来往工地上走。有时被迫回来，批评一顿，当面承认“错误”，可过后仍是“坚决不改”。后来有些班实行工具集中管理，也制止不住偷偷干活的现象发生。领导没办法，只得教育了再教育，劝阻大家不要随便加班干活，并且发动大家订了互相监督合同。谁知“监督合同”却成了“攻守同盟”，订合同以前，是一个

人一个人悄悄干，订合同后，变成了一对一对，一组一组悄悄干。真拿他们没办法。

开荒任务终于完成了。一眼望去，黑黝黝的良田望不到边。地肥得就像能捏出油来。接着，谷子种进去了，糜子种进去了，豌豆种



抗大七分校学员在深山伐木烧炭

进去了……学员们的心也像同种子一起播进了地里，一天几遍到地里去看，恨不得亲眼看着种子抽芽，看着它长出土来。盼呀盼，谷子终于破土出苗了，糜子长耳朵了，豆类分瓣了，最后，荞麦也探头了。学员们的心情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

庄稼长得真好，眼看着它扬花、吐穗，一天一个样子。大风川、豹子川、平定川，千顷碧波，随风起伏，阳光照处，鲜灵灵，光闪闪，满山遍野，油绿油绿，绿得可爱，绿得喜人。

9月，糜子、谷子、荞麦、豆类先后成熟了。千年的荒山，第一次向人们献出了粮食。平均每人收获2石多粮食，合1000多斤。当时，没有装运工具，大家就拿出床单、包袱皮、衣服、裤子，做粮袋。大家整天收呀，运呀，“秋收”变成了“冬收”，直到年底，学员们才从雪地里一袋一袋地把粮食全部背了回来。这第一个年头就打了个大胜仗，一下子就把粮食问题解决了。

(四)

抗大七分校的第二件宝是枪杆子。学员们既是学生，又是战士，既搞生产，也搞练兵和军事训练。练兵内容包括：步兵战术概述，游击战术，排、连、营、团战斗，特种战斗，射击教练，制式教练，体育，刺杀，通讯，爆破，地形学，等等。学员们常常在操场上和山头上练习班进攻、连进攻，营进攻。有的攻，有的守，互相捉俘虏。地形不熟就请老乡做向导，从中学到了真切的实战知识。

抗大七分校的第三宝是笔杆子。那时钢笔很少，一般都用子弹壳做的笔，铅笔也很缺。没有粉笔，他们就用白土做成棒，当粉笔用。练字最简便的办法是每个人面前铺一堆沙子，写满字，抹平了再写。写信一般都用桦树皮，装在翻过来的信封里再邮出去，叫做“纸皮桦信”。那时候，桦树皮成了学员的宝贝，把它的皮剥下来，厚的作菜盆、饭碗、皮带，薄的写信，作笔记本，不薄不厚的做京剧服装上的盔甲等。桦树皮，真成了万用皮，它可帮了学员不少忙呢。

学习的其他条件也很差，支起一块石板就是桌子。凳子也是石头的。尽管条件很艰苦，可是学员们学习的劲头却很大，时间抓得特别紧。一有时间，学员们就三三两两地复习功课，或互相口头测验时事，一分钟都不白过。有的人抽空还给《解放日报》写通讯，写诗歌，写自己

劳动的心得和收获。星期天,业余剧团还自编自演秧歌剧、话剧、京剧,演《逼上梁山》、《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等。缺少服装道具就用床单代替,用桦树皮制做,缺少乐器就敲洗脸盆、小瓷碗。学员们看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他们当时最高的文娱生活。

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政治课主要是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其中,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整顿“三风”的文献是重点精谈的课程。

军事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军事教员向学员辅导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朱总司令的军事著作,并结合讲解战例。在操场上和山头上,学员们从队列一直学到游击战术、集团进攻和带兵打仗的各种艺术。

文化课是最复杂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俄文。学员们的文化程度不同,编班也就不同,教员根据各类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所以学员的进步都很快。特别是原来程度差的学员,学习时间抓得更紧,白天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晚上凑在小小的麻油灯前继续学。一本一本的桦树皮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作文的草稿和数学练习题。他们在学习上也打攻坚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难关。

(五)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们既要种地,又要学习,还要搞建设,白天黑夜、没黑没明地干,他们给东华池人民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现在东华池的30孔石窑,就是当年七分校学员们建的。石窑前面镶有木制圆门圆窗,前有房檐,后有“火墙”。周围还有很多土窑洞,也是学员们修的。有的窑洞直到现在依然完整无损。

七分校学员还盖了一座15间房大的礼堂,能容纳近2000人。礼堂从设计到施工都是学员和教师自己搞的。这座建筑没用钢筋,没用混凝土,全都是土木结构,造型美观大方,坚固耐用。30根大柱子端溜溜的,每根长3丈6尺,还有16根大梁,这些都是学员们从各个山沟里抬回来的,每一根没有三四十人是挪不动的。学员们出了不少力气。礼堂盖得高大雄伟,气势壮观,在当时华池和陕北都是数得着的建筑物。

可惜，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烧毁了。

抗大七分校除了种粮食，还要种蔬菜，栽烟叶子，养猪、养鸡。为了活跃市场，扩大经济来源，七分校各单位还在东华池街上开办了5个饭馆，生意十分兴旺，每天都有很多人进馆子，晚上往往要营业到12点以后。

经济发展了，学员们穿的衣服也变了。第一年刚来的时候，学员们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供给部派人从陕西买回棉花，又抽调一批女学员组成纺织大队，纺线、织布、捻毛线、织袜子、打手套，供给学员穿。从第二年起，学员一律换上了灰衣服，一色的帽子上别有镰刀斧头的帽徽，从仪表到精神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东华池一带群众很快增加到两三百户。可是，不久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有的群众被敌人当做红军杀害，有的逃往他乡，两三百户人家所剩无几。抗大七分校在这里办起来以后，群众有了靠山，外边的人纷纷返回来。同时，还接待了很多从河南逃到边区的难民。七分校学员们帮助他们安家落户，发展生产，人口逐年增加，经济日益繁荣。萧条的东华池街道，白天车水马龙，客商川流不息。一到晚上，满街灯火通明，各种摆摊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东华池一下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小城镇。

“国民党曾经扬言要在冬季困死我们，让反动派白日做梦去吧！”学员们豪迈地说。他们硬是在这荒凉的深山古林里，在边区的前沿阵地，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一座新的城镇，一所全新的大学。昔日那野猪奔走、狐兔乱窜的景象不见了，那令人胆颤心惊的狼嚎豹叫声听不到了。那荒凉寂寞的羊肠小道被改造成为四通八达的马路，车马来来往往，一排排崭新的窑洞和瓦房相互辉映。这里有两层楼的俱乐部，有宽敞宏伟的大礼堂，有会议室、研究室、体育场；有医疗所、中药房；有清洁的厨房、食堂；有仓库、菜窖、马棚、猪栏、羊圈；有酒房、粉房、磨房；还有热闹的商店、邮电所、小饭铺、照相馆等，真可谓样样俱全。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华池一带的老百姓同抗大七分校的师生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建校初，师生缺少住处，他们宁愿在石崖下露宿，也不给群众添一点麻烦。他们宁可用裤子背粮食，也不向群众借口袋。可是，群众家里谁有困难，他们都主动帮助解决。农忙季节，学校就分配学员到劳动力少的群众家里帮忙。

每逢过年过节，学校把上川下川的老百姓都请到校部吃饭，和师生们一起会餐。饭菜非常丰盛，还有自己酿的白酒。学校文工队还经常演戏，每次演戏时，学校总是把老百姓请到前面坐，学员们都坐在后面。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双方的停战协定，又举起了血腥的屠刀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内战。革命形势要求抗大七分校的全体学员迅速开赴前线，投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去。7月1日，抗大七分校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延安联防军政治部还特意派来驮骡电影队前来祝贺，放映了纪录片《延安大生产》和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下午还举行了庆贺毕业的大会餐。历时4个年头的学习、劳动、战斗生活结束了。3000多名学员离开了这个革命熔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在大生产运动中培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庆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十一章

陇东根据地文教事业大发展

陇东革命根据地曾经有过一系列重大创举,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以其卓著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陇东根据地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来到陇东深入生活,同当地人民群众的文艺创作相结合,文化艺术异彩纷呈,教育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仅从1944年到1945年前后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陇东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典型报道,足可以看出陇东根据地文化教育的繁荣景象。这些典型宣传有周扬写的通讯《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艾青写的通讯《汪庭有和他的歌》;马可、清宇写的通讯《刘志仁和南仓社火》;蒋南翔写的通讯《陇东文化运动中的新人物》;穆青写的通讯《我看见战士学文化》以及《旧剧人的改造》、《文化运动在“长江旅”^①》、《庆阳农民的新“社火”》、《“社火头”刘志仁》、《庆阳民教馆庙会工作尝试》、《不识字的农民宣传家》、《牛皮影子》、《榆树湾夜校》、《李俊发“文教班子”》、《新宁县的模范卫生村窠家湾》、《曲子保健药社两年治愈病人万余名》、《庆阳县民教馆文化棚的妇孺卫生宣传》、《再记孙万福》、《私学改造》、《社火的旧形式和新活动》、《陇东冬学识字报道》、《唱曲子要社火教识字》、《三八五旅“影戏团”》、《新闻兵》等。其中有许多通讯被重庆《新华日报》转载。

^① 长江旅,即八路军陇东驻军三八五旅的代称。

一、陇东剧团闻名陕甘宁边区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戏曲是中国文艺的主要形式,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所谓社会教育,其感人最深,普及最广者,莫如戏曲就是对戏曲而言的。而在革命文艺产生以前,戏曲中良者虽多,恶劣淫秽败坏风俗者也有不少。编演新戏的目的就是要补救社会教育的这种缺陷。从陕甘边苏区到陕甘宁边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移风易俗,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文艺工作则要肩负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任,为建设、巩固、发展人民民主政权做出积极的贡献。陇东剧团的成立,为陇东根据地乃至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艺事业开了一个好头。

(一)

陇东剧团是1937年秋成立于曲子的陕甘宁剧社,1938年改为人民抗日剧社庆环分社。1940年8月随庆环分区迁到庆阳县城后,改名为陇东剧团。陇东剧团是陇东根据地的主要文艺团体,它直属于陇东分区党委。

为了进行革命宣传,1939年春,陇东特委在曲子镇举办了一个戏曲训练班,他们先排演了一些秦腔传统戏,很受群众欢迎。这年,陕西民间艺人张云带领皮影戏班的一些艺人流落于曲子镇,他们擅长陇东曲子、道情、秦腔、眉户等戏曲形式,演出过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还编写了一些人们称之为“旧瓶装新醋”的新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了陇东分区党委的重视。在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的支持和关怀下,分区将这几位艺人全都接收了过来与训练班合并,抽调墨遗萍、史虎臣、赵守一负责组织筹建了庆环农村剧校,校长由史虎臣担任。

这个剧校成立后,墨遗萍、赵守一、程秀山、田益荣等一批共产党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开始编写一些新型秦腔现代戏,如《转变》、《送郎上前线》、《钟专员》、《张凤娇》等新戏,这些作品唱词尽管没有出版刊印,也没能流传下来,但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的。1940年,陇东剧校扩建为剧团。

1941年秋,边区政府教育厅为了更好地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提高各分区文艺团体整体水平,陇东剧团有关演职人员被调到延安鲁艺学院受训一年。受训期间,博古、周扬、张庚、彭飞、赵守一、马健翎等中央领导和戏剧界著名人士,分别给他们讲授了政治文艺理论、表演导演艺术和美术音乐等课程。与此同时,剧团还深入到延安的工厂、部队、学校、郊区参加了火热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了延安精神的教育,从而提高了剧团演职人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素质。在延安受训期间,毛泽东为陇东剧团题写了“向前进,勇往直前!”的题词。1942年秋,陇东剧团返回庆阳后,积极参加整风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此后,陇东剧团一直活跃在陇东革命根据地。

(二)

在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剧团编演了许多反映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摩擦、分裂为内容的剧目。这些剧目有《满天飞》、《保卫家乡》和《血泪仇》等。《满天飞》反映的是东北义勇军率领当地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保卫家乡》反映的是陇东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国民党顽固分子赵老五及其帮凶破坏边区建设的罪行,保卫家乡的故事;《血泪仇》描写了河南移民王仁厚一家逃难到边区后,受到妥善安置,其子王友才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并被派到解放区暗杀其父,又险些毒死自己的儿子。后来父子相见,明白了内情,幡然悔悟,杀死了国民党长官而投奔人民。通过国统区与解放区的鲜明对比,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血泪仇》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极富教育和感染力,很受人民群众喜爱,一直到解放后,仍然久演不衰。此外,陇东剧团还上演了《洪承畴》、《联合破曹》、《盗虎符》、《岳飞冤狱》、《反徐州》、《金沙滩》等具有抵御外族侵略,表现民族气节的历史剧目,达到了“古为今用”宣传教育目的。

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剧团排演了《动员起来》、《城壕村》、《神仙怕打》等贴近边区生活的新剧目。《动员起来》以懒汉二流子转变为题材,反映了二流子张拴在边区政府教育下,当上了劳动英雄,胸前戴着大红花,受到了毛泽东、朱德接见并一起吃饭的情景,表现了劳动光荣。这个剧目在环县演出后影响很大,许多懒汉二流子以此为榜样,悔

过自新,积极开荒种地,后来有的成了县上的劳模,有的成了分区的劳模。《城壕村》歌颂了华池县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创造城壕模范村的事迹。《神仙怕打》揭露和批评了算卦求神的封建迷信活动,让所谓的神仙在舞台上当众出丑,使落后愚昧的东西在嬉笑中受到鞭挞。庆阳县一位“巫婆”看了此剧后说:“以后再也不能胡整了!”

(三)

陇东剧团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当属解放战争时期。以前,由于剧团正在创办初期,领导变更频繁,缺少专业人员,对剧团的发展有一定影响。1946年10月,西北局组织部派黄俊耀担任团长,田益荣为副团长,他们坚持以发展地方戏剧为主,使陇东剧团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黄俊耀是陕西人,从小喜爱戏曲,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渭华起义,1932年加入共青团,担任过地下党支部书记,是著名演员,又是剧作家,曾经在关中剧团任过政治协理员、民众剧团宣教处长,对剧团建设和发展方向有一套成熟的思路。田益荣也是陕西富平人,西安高级师范肄业。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干事,三八五旅警七团宣传股长兼团宣传队队长、旅宣传队队长等职。1945年底调陇东剧团任团长。他主张剧团以发展地方戏曲为主,并创作、改编了30多部秦腔历史剧和现代戏,是最早将陇东道情搬上舞台的艺术家。

黄俊耀、田益荣担任陇东剧团领导后,为更好地担负起党所赋予的各项宣传教育任务,他们组织全团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析了陇东剧团的历史和现状,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陇东人民熟悉的秦腔、道情、眉户等戏曲形式为主的路子,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实际,编演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

1947年元旦,陇东剧团在地委礼堂上演了他们自编的大型秦腔现代戏《阎王寨》和新编历史剧《潞安州》。《阎王寨》通过贫苦农民刘德全一家,遭受人称活阎王的“何百万”残酷剥削迫害的悲惨遭遇,有力地鞭笞了地主阶级的残忍无道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使广大劳苦大众明白,只有奋起参加革命,推翻蒋介石的腐朽政权,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为了演出的成功,团长黄俊耀亲自执导排演了这部戏,并扮演

了剧中的恶霸地主“何百万”。

《阎王寨》在庆阳城一上演,就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人们对这部新剧赞不绝口,分区的干部群众都没想到这部戏是如此的感人肺腑。他们认为该剧完全可以与同类的《血泪仇》、《白毛女》相媲美。《阎王寨》一剧的成功演出一下子把陇东根据地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阎王寨》是继马健翎创作的秦腔现代戏《血泪仇》,贺敬之、丁毅合编的歌剧《白毛女》之后陕甘宁边区创作的又一部同类型的戏剧佳作。在陇东根据地,大型秦腔现代剧《阎王寨》成为政治课的一部重要教材,凡是举行大的活动,都要上演这部戏,每次演出,台下的群众、战士、干部都是口号不断,连成一片。1948年入秋,胡宗南派出几千人向环县的木钵进犯,剧团也正好被邀请到那儿给部队演出《阎王寨》。当演到活阎王“何百万”当场打死农民刘德全的时候,一个战士两眼含泪,喷射出愤恨的目光,端起枪对准了扮演活阎王“何百万”的演员就要打,幸好被旁边的排长拦住了,他提醒那个战士说:“这是演戏!”戏演完时,上千名解放军官兵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誓死保卫边区,哪怕敌人来一个军,也要将来犯之敌打成肉泥。

戏演红了,陇东剧团在整个陕甘宁边区也有了名气,陇东分区领导表扬他们,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陇东分区视察工作时也要观看他们的演出。陇东剧团的影响越来越大。

(四)

1947年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在战争中,陇东剧团一面大抓整顿,抓组织纪律和政治学习,一面抓基本功训练和创作,同时还抓军事训练,参加镇反肃特、战后清场,配合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参战,安排群众生产、斗争。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陇东分区党委将剧团又分为两个分队,一队由30多名年轻力壮的演职员组成,由团长黄俊耀亲自率领,并以“兰东支队”为番号,随野战部队执行一些特殊的战地宣传任务;另一队主要是后勤人员和一些年老体弱的演职人员、女同志及家属在后方活动。

1947年4月,“兰东支队”的30多名演职人员在团长黄俊耀的率领下,赴合水县肖咀、店子一带,为驻在那里的骑六师进行慰问演出,同时帮助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

骑六师是一支起义时间不长的部队,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还比较

低。师长胡景铎系陕西富平人，自幼就富有正义感。后来成为国民党驻陕北横山一带保安部队的副总指挥。因不堪忍受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歧视，率领 2100 多国民党官兵，于 1946 年 10 月在陕北横山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接受共产党领导，胡景铎本人也加入了共产党。“兰东支队”到骑六师进行慰问演出的过程中，小分队的同志们与骑六师的官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娱乐，与战士和基层军官谈心、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反动、黑暗，批判旧的封建思想意识，提高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革命热情。每到一个连队，剧团的同志便去刷写标语。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剧团走到哪儿，标语就刷写到哪儿。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兰东支队”在三团各连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官兵关系、士兵生活都有了较大改善，部队在政治上有了民主，士兵有了发言权，纪律性也有了加强。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把他们看作朋友和老师。他们向剧团的同志学文化，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剧团的同志向他们学习射击、投弹，拼刺刀和其他的军事常识。不久，另外两个团的士兵委员会也相继成立，部队的政治素质均有所提高。小分队抓住有利时机，又在各营团有目的地演出了一些他们新编的剧目和传统戏，全师官兵也都很喜欢。

(五)

陇东剧团同志不但坚持为部队和分区驻地及各县城乡巡回演出，还帮助各县剧团和区乡基层编排新剧目，指导他们的业务工作，活跃乡村群众文化生活。他们经常参加农村中的减息减租、土地改革等工作，和群众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和老百姓就如同一家人，谈生产、拉家常，从思想深处与群众建立起了感情。因此，剧团创作的剧目，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戏剧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和地方话，加以提炼后使之既贴近生活，又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

1947 年 5 月中旬，“兰东支队”离开骑六师返回陇东分区途中，经过陕甘交界的一个叫黑水寺的地方，这是富县一个区的所在地，区上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小分队的同志。第二天吃过晌午饭，小分队刚准备着要走的时候，区长林山想让他们帮忙写一个老红军、老八路伤病员重上前线的说唱节目，准备在第二天的群众动员会上演出。这时已过中午，第

二天上午就要用，能拿出一个说唱节目来吗？团领导黄俊耀很为难。但看着区上同志一副副期盼的目光，黄俊耀只好满口答应。他简单地向林山区长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便开始构思、动笔。经过一夜苦熬，终于写出来了一部小戏，剧名就叫《再上前线》，可以演四五十分钟。由于本子写得非常贴近生活，又形象生动，唱词通俗流畅，排演也很顺利，演出后，很受群众喜爱，当下就有不少安置在当地的老红军、老八路和群众要求参军，重上前线。林山区长激动地说：“你们这部戏，比我做10次报告都顶用啊！”

1947年10月，陇东分区进行了一次查思想、查立场、查斗志的“三查”运动。据1948年8月27日《群众日报》介绍，陇东剧团经过三查学习后，结合党的政策写出了不少受群众欢迎的新剧。黄俊耀、程思荣、田禾秀、关保、唐风、高士杰、慕崇科等写出了《小两口》、《二斗粮》、《过年》、《新民兵》、《两支枪》等剧。他们还根据三查学习中揭发的一些材料事例，创作出了中型现代眉户剧《三查》。这部戏是以讽刺喜剧的形式表现的，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滑稽可笑，矛盾集中，唱词近乎于说白话，通俗明了，唱腔流畅，易于上口，也很有教育意义，很受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48年元月，因形势发展需要，陇东剧团更名为“陇东文艺工作团”，业务范围也随之扩大。3月初，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剧团又编排演出了宣传妇女放脚的眉户小戏《大脚好》。这出戏一上演，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广大妇女看着台上的表演，听着她们的演唱，不觉得已将自己融入在剧中，感到那的确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看着这种带有善意讽刺的戏，笑得流出了心酸的眼泪。这出戏演出后，还真有一批妇女放了脚。此后，这出戏成为陇东解放区群众经常观看的主要剧目之一，剧中那一小段女儿的唱腔也成为当时许多农村女孩子一时流行的娱乐唱段。干部群众兴奋地说，陇东剧团来了就有好戏看。

此后，剧团掀起了一个创作的高潮，前后创作出的剧目有：反映混入解放军内部的敌特分子，暗中破坏军民关系，在整军中被查处的中型秦腔现代戏《除奸计》；反映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进行反饥饿的大型秦腔现代戏《反蒋灾》；反映地方游击队破获地主分子暗中成立反动保甲组织的中型眉户现代戏《破奸案》；反映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的小型眉户剧《借粮》，等等，这些戏剧都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六)

在解放战争后期,陇东剧团不但努力用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要随时参加对敌斗争,配合部队牵制敌人。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集结了6个旅的兵力,向陇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避免损失,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庆阳、合水等县的一些剧团都暂时解散,将所有人员疏散回家,只保留了陇东剧团随分区党政机关开展游击战争并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为了确保分区首脑机关的安全,团长带领全团一边撤离,一边派人探查行动路线,随后率全团六七十号人马一路急行军赶到华池县柔远城,与分区机关及时会合。3月6日,西华池战斗结束,剧团配合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及时进行战后清场等工作,他们深入各户,动员群众返乡,安排群众生产,稳定群众的情绪,有力地配合了当地镇反肃特等对敌斗争工作。

最紧张的是1949年1月21日,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也正好逢集,群众热情极高地赶集看戏,一派和平景象。傍晚人们正准备吃晚饭时,剧团侦查人员探回消息说马鸿逵匪军有一支骑兵队伍已将分区机关和剧团的联系切断,并正向剧团驻地袭来,敌人误将剧团当作了分区首脑机关。当时,剧团有七八十人,仅有30多条枪。人员也多是些妇女、老人和小孩。就凭这些人和枪,要明着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巧妙周旋,使敌人摸不着虚实。那时,夜幕降临,针对敌情,剧团领导果断决定扔下锅灶立即撤出。这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全团七八十人马在黑夜里踏着半尺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走,身后不时地传来敌人喊杀声和战马的铁蹄声。为了不被敌人察觉到他们的真实身份,给分区首脑机关的安全带来威胁,团领导镇静自若,带领全团翻山越岭,连续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终于甩掉了敌人,也以剧团利益的牺牲换取了分区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

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和创作实践,不仅促进了剧团的业务建设,提高了演出质量,同时也培养提高了剧团同志的革命斗志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的文艺人才,为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革命现代戏曲的发祥地就在陇东老解放区,而陇东剧团则是为革命现代戏曲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团体之一。这个团体还为革命队伍培养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家,除

黄俊耀之外,还有率先在全国将领袖人物搬上戏剧舞台、创作出优秀话剧《西安事变》的剧作家程士荣,以创作《天山脚下》、《远方青年》等少数民族生活的优秀话剧而闻名的剧作家武玉笑,音乐家易炎、王中才等。解放后,陇东剧团成为一支在全国有影响的省级剧团,这就是甘肃省话剧团。甘肃省省级各剧团都有陇东剧团培养出来的人才。将陇东道情改造发展为陇剧,并创作演出著名戏曲《枫洛池》的甘肃省陇剧团,创作并演出了举世闻名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甘肃省歌舞团等,其主要领导和主创人员都是由陇东剧团培养出来的。

二、红遍陕甘宁的陇东新社火

社火,顾名思义即乡社之火。历史上庆阳人民崇信多神,为表达对神灵的虔诚,经常进行祭神活动。久而久之,这种活动与地方盛典、庙会、节日相联系,内容不断增多,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便成了人们的一种乡村文化娱乐活动。以前,庆阳社火多为对神的崇拜,内容陈旧,格调低俗。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新生活,赋予了庆阳社火的新内容。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极大地影响和丰富了庆阳社火的内容和形式。陇东分区环县曲子农民孙万福,庆阳卅里铺农民黄润,关中分区新宁县南仓农民刘志仁,新正县的汪庭有等,他们都用新内容、新方法改造旧社火,把社火变成了与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近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庆阳民间社火里另一个内容是秧歌。它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不仅出现在戏剧舞台上,而且在节日、庆典时,经常活跃于街头巷尾,成为人们抒发情感、歌颂美好生活最方便的一种方式。由于秧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以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中,人们把秧歌也称为“新社火”。

庆阳的秧歌有两种,一种叫秧歌舞,一种叫秧歌剧。秧歌舞是只舞不歌,俗称“扭秧歌”,自始至终突出一个“扭”字。秧歌剧虽然也以“扭”为表演特征,但它是载舞载歌,而且还有故事情节。秧歌剧的表演轻松自由,剧情单一,可以有矛盾,也可以没有矛盾,人物极少,故事短小精悍。当年陇东解放区流行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就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代表作。秧歌剧的曲调也都是采用当地群众所熟悉的庆阳

民歌和眉户调;唱词和道白简短流畅、通俗有趣。

(一)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分区最吸引群众,博得大家称赞的是卅里铺黄润的社火。黄润原来是个不识字的农民,后来在冬学、夜校中刻苦学习,当上了乡文书。他酷爱耍社火,是卅里铺的社火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每年春节,群众耍社火、扭秧歌的热情很高。边区军民的新生活,又为他们创作社火新内容、新剧目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他们的社火除了表演《旱船》、《推小车》、《走马》、《打花鼓》外,还有新创作的秧歌剧《夫妻开荒》、《黑牛耕地》、《二五减租》、《王麻子变工》、《种棉》、《劝二流子务正》、《懒瘠^①转变》等节目。

《夫妻开荒》是表现生产,拥军与反对汉奸特务的秧歌剧。男的认识打到日本保卫边区,达到丰衣足食,就要加紧生产,一早就扛起锄头上山挖地,唱着“多开荒,多种田,多打粮食做模范”的歌子,愉快劳动;女的一面帮助丈夫挖荒,一面又忙于做劳军鞋子;夫妻唱起“日子过的安,全靠当兵汉”。这场面充分反映了边区人民对自己军队的爱护!特务分子对他两口子说:“不要多开荒,粮食打得多,政府要得多。”夫妻用过去的事实证明他说得不对,并识破他是特务分子,劝他到政府坦白。

《黑牛耕地》是讲述“天黑地黑乌洞黑,吆上黑牛种春麦”的劳动英雄,鸡叫第三次就套牛耕地,实现了“耕二余一”计划。他的妻子也很早起来采桑喂蚕,纺线织布,结果把饭都做迟了。

《二五减租》讲述的是不法地主明减暗不减,他们除了收回应得的租子外,还背地里向佃户要租子,佃户不给,他们就要抽回土地,佃户报告政府,乡长把地主批评了一顿,地主承认了错误,退还了逼交的租子,答应以后遵守边区政府法令彻底减租。

《王麻子变工》赞扬的是“三勤夹一懒,想懒不得懒”的变工形式。天还没亮李四就跑到懒汉王麻子家里叫门,一道去锄棉花;劳动时人多手快,有说有笑,告诉了人们:实行变工队不光能使庄稼务得好,而且还能改变懒汉二流子。

《种棉》是讲述女的要纺线织布,但棉花贵而不容易买到,因此夫妻

^① 懒瘠,陇东方言,即懒汉的意思。

商议,计划今年多种2亩棉花,多上粪,多锄草,多打卡,保证每棵都结大皮棉。

《懒犢转变》是讲述一个转变了的二流子叙述他过去怎样“好吃懒做怕动弹,一天到晚胡球串”,自从“要学个劳动英雄汉”,夫妻和气了,庄稼务上了,光景过好了。一天两口子去锄棉花,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不走大路走小道,盘查他又无路条,夫妻判定他是个坏人,把他逮送到乡政府。

《劝二流子务正》是快板形式,说的是二流子的转变过程。这个快板教育效果最好,演出后过春节连一个“耍花花”^①的都没有了。往年小孩子“打沙钱”,要打到三四月份,当时也没有了,这都是受了这个快板剧影响的缘故。

这些新社火,真实生动,剧情紧凑;开门见山,短小精悍;人物不多,容易出演。它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在新政权下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宣传了边区政府各项重要政策,完全摆脱了过去民间社火的迷信色彩和宣扬低级趣味的不良传统,同时演出的效果也很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中,卅里铺的社火队开创了演出新社火、新秧歌剧的先河,陇东地委、专署授于他们“向前努力”的一面锦旗。1944年10月,黄润率领卅里铺区社火队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会议调演。10月30日上午,黄润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的《文艺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讲话,下午社火队的全体人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受到了物质奖励。

(二)

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根据地在改造旧社火的同时,对旧皮影戏也进行了改造。皮影戏也是庆阳民间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之一。每到秋收过后的农闲季节,那些精于皮影艺术的民间艺人就开始了活动。他们或三五人一伙,或七八人一带,赶一条毛驴驮上戏箱,跋山涉水,走乡串户,为乡亲们演起了皮影戏。当地群众给他们起了个雅号叫“一驴驮”。这“一驴驮”不但行装简单,而且演出也很方便,窑洞里能演,院落里能演,夜晚在灯光下能演,白天借着太阳光线也能演。只要皮影队往那里一坐,撑开“亮幕”,拉响胡弦,邻近的乡亲们便扶老携幼,你争我抢

① 耍花花:陇东农村一种赌博形式。

地朝亮幕跟前涌来观看。一场皮影戏演完，乡亲们怀着观赏后的满足，兴高采烈地评论着戏的内容，走回家去。看了一场皮影戏，似乎比看一场名角的演出还要过瘾得多。

陇东人称皮影戏为“小戏”。人物形象是精制过的、明角板样的老牛皮雕镂、着色而成的，映在白布幕上，美丽精制，栩栩如生。边区时期，“小戏”班子在陇东大都分布在农村，以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山区一带居多。当时，有一个旧艺人有戏箱10余副以上的，足见牛皮影子在山区的普及。以前，这一带地理荒僻，同时比较落后，因而迷信风气十分浓厚，一些民间的艺术宝藏，也正庇荫在这种迷信的习俗之中。皮影戏多是为了“谢神”、“还愿”、“攘灾”、“驱瘟”而演出的。1944年秋天，陇东文教会议决定对牛皮影子戏也进行改造，经过文艺工作者辛勤努力，皮影戏改造获得成功。在演出的剧目中，剔除了宣传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的剧目，保留了反映历代劳动人民扬善惩恶、愤世嫉俗和追求美好愿望的剧目。同时还上演了《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女状元》、《轰炸德国》等新剧目。八路军三八五旅也成立了牛皮影子戏团，他们对陇东牛皮影子戏进行了较大改造。在道具上，他们用透视的方法表现舞台面，制作的牛皮人下颌、嘴巴、面部都能活动；在场面上，也和旧的不同，颇有话剧成分，对白、旁白都采用方言；旧班子大都用白麻纸来做“亮幕”，在表演打仗时容易搞烂，他们改用一块白布做“亮幕”；对灯光也进行了改进，旧式的油碗灯烟特别大，影响演出效果，于是把油碗灯换成罩子灯；在唱腔上，既采用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碗碗腔，又采用陇东民间小调。这样使庆阳皮影戏不仅具有古朴典雅、玲珑剔透的外观美，而且具有浑厚朴实的内在美，特别是演出时配上粗犷而有悠扬的陇东道情，相得益彰，显得极其精美而又情趣盎然，成为中国民间戏苑中难得的艺术珍宝。

三、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刘志仁

南仓社火耍得红，
区里县里真有名，
里头有个刘志仁，
离了刘志仁，
新故事就要不成。

这首民谣，赞扬的是陕甘宁边区特等艺术英雄、新宁县盘克原南仓村（今宁县湘乐镇新庄村）新秧歌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刘志仁。

刘志仁出生在一个小自耕农家里，小时候只上过三年私塾和三个月国语学校，后来因家境贫寒而失学务农。他很喜欢看书读报、编唱歌谣和闹社火，是南仓村社火活动中一名出色的歌手。1937年，南仓村划归陕甘宁边区管辖，刘志仁被群众推选为南仓村第一任村长。从此之后，南仓村的社火在他的领导下，以新的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在边区乡村，搞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名声远扬。

过去，南仓村的社火演唱的都是旧内容，刘志仁和村上几个新秧歌活动积极分子，对这些内容加以积极改造，加进了劳动人民亲身经历的“实事”，使社火成了歌颂新生活的一项文娱活动。他们自编自演的第一个新秧歌是《张九才造反》。以当地群众遭受军阀、土匪、贪官、污吏迫害的事实为内容，唱出了群众的痛苦和仇恨，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群众看了当场就为刘志仁“披红”，请刘志仁吃“暖锅子”。

1939年以后，刘志仁组织编演的新秧歌越来越多，题材也越来越广泛，其中有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救国、反特防奸、保卫边区伟大斗争的《九·一八》、《新三恨》、《反特务》、《保卫边区》；有表现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新开荒》、《大生产》、《桂姐纺线》、《改造二流子》；有歌颂边区政府、领袖和人民子弟兵的《新十绣》、《边区政府好》；有宣传移风易俗和边区建设运动的《放脚》、《读书识字》等等。《桂姐纺线》配的是五更月调，唱词是：

一更啊月儿呀灯花花红，

桂姐儿纺线小窑中，

巧手儿一摇呀，

哎哟，纺车儿吱呀呀。

二更啊月儿呀月照灯，

桂姐儿纺线想亲人，

情郎哥哥去前线呀，

哎哟，当了八路军。

三更啊月儿月当空，

纺车嗡嗡线线匀。

一根线儿穿呀，
 哎哟，军民心连心。
 四更啊月儿呀挂西天，
 桂姐儿纺线心喜欢，
 线儿织成布呀，
 哎哟，缝衣亲人穿。
 五更啊月儿月照明，
 灯花儿开的朵朵红，
 桂姐儿纺线呀，
 哎哟，边区有名声。

人民群众从刘志仁编演的新秧歌中，知道了他们所要知道的事情，看到了他们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听到了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大家高兴地说：“把现在的实情用新秧歌唱出来，真比看大戏还美哩！”由于刘志仁编唱的新秧歌受群众欢迎，因而到处有人下帖子请刘志仁等人去表演，大人、娃娃还拿上纸来找刘志仁抄新秧歌唱词。

陇东传统社火中的新秧歌主要是唱，动作很简单，而流行普遍的“地故事”，却是通过不同人物的各种舞蹈动作来表现情节和内容。刘志仁把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编成了新的“秧歌剧”，既舞又唱，为群众喜闻乐见，大家称之为“新故事”。在他组织下，编演的新秧歌剧有《捉汉奸》、《放脚》、《开荒》、《锄草》等，都深受群众欢迎。刘志仁在创作和演唱新秧歌过程中，能处处为群众着想。为了使自己的作品和演出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为群众所接受，他很注意歌词的口语化。例如1944年初，为了编好《新三恨》，他夜以继日，细心琢磨，斟字酌句，反复修改，直到觉得通俗易唱才定了稿。《新三恨》唱词是：

一恨小日本，
 它进攻咱中国，
 先把东北吞，
 “九一八”炮声响，
 侵占了我东三省。
 侵占了东三省，
 东北的同胞实呀实苦情，

实是苦情，
 满胸亡国恨。
 二恨汪精卫，
 汉奸卖国贼，
 南京当傀儡，
 认日本作干大，
 一心要卖我中华。
 人民不依他呀，
 全国的同胞快呀快起来，
 快呀快起来，
 铲除卖国贼。
 三恨孔祥熙，
 他的二小姐，
 结婚在美国，
 赔嫁妆够几师，
 吃饭又穿衣。
 这都是咱血汗，
 把这些洋奴才喂呀喂的肥，
 思量起呀，
 实叫人生气。

《新十绣》本来是外地流传来的一首民歌，改编时，刘志仁把当地人名、地名加在歌词里，群众听着亲切，看着舒心，非常喜欢。在配曲方面，他既注意曲调和歌词的合韵，又注意选用当地群众最爱听的《珍珠倒卷帘》、《张生戏莺莺》、《绣荷包》等民间曲调，使新秧歌艺术创作深深扎根于民间，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艺术性。

刘志仁创作新秧歌剧，促进了边区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对整个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2年，刘志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1月，他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荣获特等艺术英雄的光荣称号。在这次大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给刘志仁颁发了写着“新秧歌运动的旗帜”的锦旗。毛泽东亲切接见了，还赠送给他一条毛毯。周扬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开展群众



陇甘宁边区政府给刘志仁的奖状

唱幸福生活和火热的斗争。他曾被选为县、省人民代表。1966年，“四清”运动中，刘志仁被错误地定为富农分子，开除了党籍。在“文革”动乱中，他又被强加上所谓“黑线人物”的罪名，惨遭迫害，1970年含冤出走，死在山洞里。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冤案才得到了平反昭雪。

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此后，周扬还几次写信询问过刘志仁文艺创作的情况。

全国解放以后，刘志仁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中，除了积极做好党的工作外，还继续编唱歌谣，歌颂党和领袖，歌

四、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陇东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是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内容的民众教育。土地革命时期，陇东的社会教育事业有了广泛的发展，并且以巨大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在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早在南梁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就十分注意社会教育工作，经常在社会各阶层宣传革命道理。1931年，南梁游击队成立以后，这支在陇东创建的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工农武装，不论走到哪里，都采用张贴布告、演讲、刷写标语、召开会议等形式，把革命道理宣传到哪里。1934年，南梁政府建立以后，就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组织人民群众以唱歌谣为主要形式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刘志丹队伍到南梁”，“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等“信天游”表述了人民群众心向红军，向往革命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听了使人倍受鼓舞。这一时期的歌谣在其思想

内容上各有其特色。像《妇女放脚歌》、《跟上哥哥上南梁》等都以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了人民群众对黑暗世道的仇恨和参加革命的决心,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人民的战斗作用。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陕甘宁省委、省政府、红军教导师、红二师等组织领导和帮助下,陇东的社会教育事业以不同形式日趋发展。

1936年陕甘宁省委帮助曲子县建立了列宁俱乐部,开展了识字扫盲以及文艺活动;1937年红军教导师帮助庆阳县建立了民教馆,充分利用其场所,采用举办演讲会、教唱革命歌曲、办墙报、黑板报等形式,开展了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活动,很有吸引力。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事业,提出了“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这一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为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进行扫盲和识字教育。在“扫除边区文盲”的号召下,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识字教育活动。当时,陇东的社会教育活动,根据农村居住分散的特点,照顾生产习惯和生活利益,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学习形式。冬学、夜校、识字组、民教馆、俱乐部是其主要组织形式。1937年冬首次开办冬学,1938年冬冬学发展到95所(除合水、镇原未统计)有学员1581名。以后随着识字组的建立,以小学为中心建立了半日学校和夜校、组织不脱离生产的男女进行识字扫盲。到1940年社会教育有了广泛的发展。据统计陇东各县有冬学80所,冬学学生1334名;夜校239所,有学生3182名;识字组374处,学生2390名;半日校62处,学生1124名。其中以新正县最多,全县参加学习的人数达到2535人,其中妇女1105人,占总人数的40%。与此同时,各县还相继创办了民教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1939年成立的陇东剧团,是在陇东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最早的一支文艺宣传队,演出了许多反映新生活,服务于抗战和生产,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在当时很有影响。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工作总的发展趋势是蓬勃向上的。但是,从1941年开始,由于机械地执行边区教育厅规定的办学标准等规定,出现了大量合并裁减各种社会教育组织,致使冬学等社会教育组织大为减少,对社教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1942年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结合延安整风运

动,对社会教育工作存在的过分强调正规化偏向进行了纠正,并按照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进行了相应改革。从此,陇东各地的社会教育活动在抗战时期的后4年间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社教组织形式多样。陇东分区认真贯彻边区教育厅关于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以及社会教育“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中,根据陇东的实际情况,各县的民教馆、冬学、夜校、识字组、读报组大量涌现。同时,还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社火、秧歌等民间艺术开展活动,寓教于娱乐之中,掀起了社会教育高潮。在当时众多的社教组织中,以冬学最为突出。从时间、对象、教学内容分: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有男子冬学、妇女冬学;有行业冬学,文武冬学、卫生冬学和一揽子冬学等。这些方便群众的组织形式,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也调动了他们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据1944年统计数字,陇东根据地的庆阳、合水、镇原、环县4个县冬学就由1942年的12所发展到474所,参加冬学的人数也成倍增加,尤以庆阳县最为突出,冬学由1942年的5处增加到148处,学生由112人增加到2800名,特别是一向足不出户的妇女也走出家门参加学习。

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群众的生产、生活利益相结合。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在其教学方法上与抗战初期相比较,有了明显改进,并显得较灵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创造了个别教、互帮互教、家庭互教等多种形式。在时间安排上采用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习的办法。1943年,环县新营湾冬学在办学过程中,女教员叶冷除挨家挨户上门动员群众参加冬学外,她还见缝插针,送教上门,创造了“炕头冬学”,妇女不出家门也可学文化。还有像华池县白马庙石怀玉识字组创造的“字条子教学方法”,就是教师把所教的字写在字条子上,先教会组长,再由组长把字条发给他的组员,识字教学很有效果。

群众迫切需要掌握的东西,也就是社会教育所教的主要内容。通常以识字为主,同时还进行政治、生产技术和卫生教育等。1944年,曲子周湾冬学女教员赵晋英在教学当中为照顾不同对象要求,创造了“一揽子冬学”。就是对一字不识者教扫盲识字;对乡村干部教记账、珠算以及写信等;对妇女教认票子。由于所教内容与群众需要密切相关,他们都乐意参加,后来该村的群众都自愿参加冬学。同时,社会教育在其教学内容上也注意同生活利益紧密相联。像镇原县刘家城冬学,起初

是以识字为主,后来教员李冰珠根据农村妇女疾病多的状况,便将冬学的教学内容改为群众需要掌握卫生常识的“卫生冬学”,参加学习人数就由原来的26人增加到70多人,经过学习全村绝大多数妇女掌握了一定的卫生知识,有效地预防了疾病传染,养成了人人讲卫生的好习惯。

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办社会教育。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开展社会教育工作,这是对以往单纯靠政府办教育事业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陇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除号召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支持办学外,主要是依靠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及各地较有影响的人士出面组织社会教育工作,由他们动员群众,解决经费、设备并进行管理,政府则根据情况予以指导。如当年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他在自己识字的同时,还领导了全村的识字运动,立下了在两年半以内消灭全村文盲的计划。他所在的华池城壕村,除老弱病残和不到学龄的儿童外,其余31人全部参加了识字运动。后来他还把识字组织发展成为相当正规的夜校,用开荒、加入合作的办法,解决了全村的识字运动经费。张振财创办社会教育事业的成功经验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赞誉。教育家蒋南翔曾在1944年10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撰文对张振财领导的识字组给予很高评价。与此同时,在党和政府号召下,曲子、新正等县宗教界著名人士积极组织动员回民利用主麻日在清真寺内读报识字,深受回民拥护,也有力促进了陇东根据地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工作认真贯彻边区政府制定的《战争教育方案》精神,社会教育内容密切联系战争实际,工作实际和生产实际,在组织形式上根据斗争任务和群众需要而决定。

首先,为支援战争服务。教育内容主要是教育群众树立革命观念和战争观念,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拥军、优属、担负战争勤务和加强地方武装。1946年,陇东战役迫近之时,庆阳县把冬学改为文武训练班。每区一处,训练民兵、民夫队。陇东其他各县也同时进行了反奸、防匪、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教育。

陇东战役开始后,陇东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发动各级学校各种社教组织参加多种形式的战时宣传活动,分头下乡,从实际活动中对农民群众进行战时教育工作。镇原县先后从民教馆、镇原完小等单位抽调人

员组成秧歌队、宣传队，分头到孟坝区各乡村进行战备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还采用上门宣传，办黑板报、墙报、散发传单、演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由于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宣传教育，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广大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奔赴前线杀敌。1947年陇东分区各县以及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两县征兵达9580人。其中新宁、新正两个县就征兵4850人，既加强了地方武装，又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优秀战士。

其次，社会教育为土地改革服务。为了配合土地改革运动，陇东分区利用冬学、夜校、识字组等社教组织及时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从政治上武装人民群众，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土改是穷人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大事。广泛地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到土改运动中去，推动土改运动蓬勃发展。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不同的时期，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密切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了灵活多样、方便群众，按照群众“需要”和“自愿”相结合的方式方法，不仅为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移风易俗，促进革命和生产的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说起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不能不提及庆阳县民众教育馆。1936年12月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城后，当时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迷信盛行，加上国民党严密封锁，群众思想禁锢，一些群众对红军也有误解。这种现象引起了红军教导师师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和抗日民众促进会主任蔡畅等人的注意，他们决定成立民众教育馆，把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办馆初期，没人、没钱、没地方，困难重重。在红军教导师和抗日民众促进会的支持下，他们从各机关学校抽调了一批人员，从没收大恶霸地主冯翊清贪污款中抽出2000元作为开办费，在钟楼巷借了学校的12间房子，经过短时间筹备，庆阳民教馆在1937年2月正式挂牌成立并开始活动。

庆阳民众教育馆开设了图书阅览室。除了馆里购置的图书外，还有红军战士、机关学校、群众团体赠送的书籍共5500多册，至1943年增加到1万多册，另外还征订了10多份报纸。阅览室有10多套桌凳，能容纳40多人，由苏任和王枚管理，坚持每天开门，读者络绎不绝。民教

馆还动员干部、工人、社会青年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平时用快板、清唱、讲故事、讲演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并且把秦腔、道情、民歌等旧曲子填上新词，很快排练出了《不当亡国奴》、《爱中华》、《送郎参军》、《钉缸》、《买画》等10多个小剧和歌舞。不但在城里演，而且搭棚设点，深入到乡村集镇进行演出，很受农民群众欢迎。1944年10月庆阳县民教馆的文艺宣传队在延安召开的文教代表大会上受到嘉奖。民教馆还做了3面大黑板，分别挂在南街、北街和中街，黑板上的宣传文字稿由抗日救国会提供，内容多数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文章短小生动，版面图文并茂，群众十分欢迎。民众馆还开设了卫生室，免费给群众打针、取药、宣传防病治病的科学道理。同时开设了游艺室，备有象棋、军棋、乒乓球等，供群众娱乐。

从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9月8日发表的《庆阳民教馆庙会工作尝试》和1944年10月28日发表的《庆阳民教馆文化棚的妇孺卫生宣传》两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庆阳民众教育馆社会教育工作搞得十分出色。《解放日报》在发表《庆阳民教馆庙会工作尝试》一文时，开头加的编者的话说：

前几天本报四版发表了三边几位同志关于美术工作与群众结合的一些新方法，今天我们又登载陇东文教工作同志利用庙会进行图书和讲、唱、卖书、卖药等综合的与老百姓实际生活密切结合的新的宣传方式。我们觉得这是好的，值得提倡；且可把这种形式扩大为“文化货郎担子”，下乡赶庙会和平时“走乡”，到处讲、唱、卖书、卖药，还附带可以了解和帮助乡间的读报、卫生等一切文教卫生工作的建立、交流和巩固。

这篇通讯文内有“画图跟前人最多”、“一种卖书的好方法”、“王书记大讲棉花打卡”等5个小标题。从编者的话和小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春节前后进行的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活动不是当代人的创新，而是边区时期陇东根据地民众教育馆进行社会教育的延续。那时，由于下乡赶集、跟庙会，才真正做到了文化、卫生、科技常下乡。

五、抗日战争中诞生的陇东中学

枪林弹雨没有熄灭熠熠闪光的油灯，也没有中断学生朗朗的读书

声。从土地革命那火红的年代到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艰苦岁月，陇东老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教育蓬勃发展。先后创办了红军干校、列宁小学、陇东中学、鲁迅师范、关中师范以及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陕北公学新正分校等各类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老干部就是披着一身陇东老区的黄土，走向了全中国。

(一)

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南梁成立后，刘志丹、习仲勋等就特别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在合水太白镇和华池南梁政府所在地创办了两所列宁小学。1936年西安事变后，八路军进驻庆阳、镇原、合水等县之后，使小学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到1940年底，陇东根据地（不包括新宁县和新正县）已有11所完全小学，18所模范小学，190所普通小学，在校学生达到6200多名。这些小学生在完成小学学业后的升学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在庆阳周边只有延安中学、关中师范和平凉中学。延安中学和关中师范是解放区的学校，平凉中学在国统区。这些学校距庆阳最近距离都在二三百里以外，按当时的条件，一个小学生要到那么远的地方上学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在陇东解放区创办一所中学就成了当时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另外，1939年国民党在西峰办起了庆阳县立初级中学，解放区的许多小学生都纷纷跑到西峰去上学，再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国统区和解放区无形中就展开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活动。随着陇东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在陇东解放区建立中等教育，不仅成为老区教育事业发展的自身需要，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这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创办陇东中学的原因。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委派陆为公、孙萍前往庆阳县城筹办陇东中学。他们在分区党政机关的领导和支持下，本着边区政府“少花钱，多办事，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在半年开学”的指示精神，利用一座旧文庙，一边修建校舍，一边动员招收学生。在经费不足2000元的困难条件下，费时仅5个多月，就完成了陇东中学的筹建工作。

陇东中学是一所包括师范班在内的普通初级中学，受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直接领导，其办学宗旨是：“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建国人

才”。学生主要来自陇东根据地各县,要求要有完小毕业程度或同等学历,年龄在13至15岁之间,学生入学要进行文化考核,统一录取(第一期困难于动员,未曾考核)。在校学生享受如下待遇:不交学费;师范班学生由学校供给制服、伙食和讲义;中学班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讲义。另外,贫苦学生和边区以外的学生还由学校供给其他一些学习和生活必需品。学校规定,学生修业期满后,经考核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中学班毕业生,可以赴延安升入高级中学或其他学校,不愿升学者,由学校介绍参加工作。师范班毕业生,全部统一分配,从事教育工作。

陇东中学首届招生时,因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造谣破坏,遇到很大困难。他们一方面散布谣言,说陇东中学是兵营,共产党不是为了招生,而是在招兵,去了陇东中学,再也回不来,阻止招生工作;另一方面在边区附近开办学校,肆意鼓吹,许以优厚待遇,吸引拉拢边区青年到国统区上学,以达到瓦解陇东中学的目的。为了消除学生及家长思想上的混乱,校领导孙萍深入到每一个县、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家中,调查了解生源,动员学生报考陇东中学。在分区各级政府的帮助下,一共动员来140名学生,经过分批考试,最后录取了其中的122名,基本上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招生任务。学校将这批学生按文化程度编为师范班、中学班和预备班,学制均为1年。

(二)

1940年9月1日,陇东中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亲笔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也分别题了词。陇东分区特委书记马文瑞,副书记王明月、专员马锡五、副专员兼庆阳县县长朱开铨、特委统战部长段德彰、宣传部长吴铁鸣、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副旅长耿飏莅临学校参加了盛大的开学典礼,马文瑞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创办陇东中学对于巩固新政权、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培养地方干部、搞好边区建设、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陇东中学是陇东根据地的最高学府,作为首批学生,一定要努力学习,为以后来这里的学生带好头,树立一个好榜样。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在办学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希望全体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勇于克服困难,务必把学校办好。陇东



陇东中学旧址

中学的诞生,标志着陇东根据地没有中等学校的历史的结束,文化教育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陇东中学开学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兼任校长,赵长远为副校长,陆为公为教导主任兼总务主任,孙萍为副教导主任。当时,全校仅有教职工8名,经费异常困难,物资也很匮乏,甚至连日常生活所需都难以保证。1940年冬季学校的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将近半年时间,学校只领到了3个月经费,教职工津贴全未发放,不但影响了购置课本、图书和教学设备,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师生的生活。学校既没有钱,也没有粮,有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寒地冻,棉衣也发不下来,学生夜晚冻得睡不着觉,白天有时披着被子上课。因为没钱买柴烧水学生只得每天早晨去河边洗漱。严重的生活困难,考验着陇东中学的生存与发展。分区领导非常重视学校遇到的困难,马文瑞书记和马锡五专员指示学校要以对革命绝对负责的态度,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安排好师生员工的生活,不能出一点儿问题。作为兼任校长,马文瑞更是忧心如焚,他亲自协调,划拨粮食和经费,还让当地政府给每个人发了一件棉背心。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全校师生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学校各项活动得以开展。

同年11月,学校根据边区政府“提高国民教育质量”的指示精神,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首先,确定教育宗旨为“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小学师资和地方干部”。学制改为二年。对教学内容作了重新安排。其次,调整了干部,增设了机构,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使学校的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轨。再次,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初步解决了生活困难和经费不足的问题。1941年春秋两季,学校都招收了新生,增加了教学班,扩充了教职工队伍。据当年9月份统计,学校共有教职员工28人,学生247人,教学班7个,其中含妇女训练班和新文字训练班各1个。为培养各县、区妇女干部,受陇东分区委委托,学校于1941年4月至10月开设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由分区妇联选送,共有学员24人。按照边区教育厅的指示,学校还于8月1日至10月31日开设了新文字训练班,培养新文字冬学教员,全班共有学生84人,其中新招64人,从本校年龄较大学生中转入20人。

(三)

1942年5月至1943年底,陇东中学进行了整风。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学习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件,积极开展讨论,明确认识,提高思想。并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从而为学校工作的全面改革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学校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全校师生一起动手,开垦荒地,种粮种菜,喂猪打柴,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改善了办学条件,使师生受到了深刻的劳动教育,而且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

在此期间,学校对教学工作也作了调整。根据边区教育厅规定,1942年秋,将学制改为三年。1943年3月在考核学生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简整编,取消了预备班。5月接收了陇东地委第十二期干训班,称为陇东中学地方干部训练班,学制两年。当时,全校有5个教学班,其中师范、中学各2个班,还有1个地方干部班。

根据边区政府“确定各中学、师范学校担负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的决定,1944年学校明确提出了把陇东中学办成行政干部学校的口号,取消了师范班,只设中学班和地方干部班,学制为三年,并

依此安排了教学工作。中学任务是培养未来干部与边区知识分子,招收完小毕业生。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工作,少数人考入边区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地方干部班任务是提高现任干部,从基层干部和地方部队战士中招生,文化要求较低,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地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直接选调时任延安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泽如任陇东中学校长。刘泽如青年时期因撰写的一篇论文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而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口工作,接着就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相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从事革命活动。后历任中共山东省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等职。在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时刘少奇发现他在学术理论上有一定造诣,遂调他回延安马列学院工作。后曾任陕北公学师范部主任、延安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延安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职。刘泽如到任后,坚决贯彻边区政府“改变边区中等教育”的方针,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以教学为主,实行民主管理,提高了教学质量,使学校出现了生动活泼、蓬勃兴旺的景象。学校的规模也有较大的发展。1946年,全校教职工达37人,学生发展到330人,教学班增至7个。

(四)

1946年后半年,解放战争即将爆发,学校积极开展战备工作。一面组织师生进行社会宣传,一面加强对本校师生的自卫战争教育和军事训练。

1947年2月18日,国民党反动派进犯庆阳县,陇东中学校舍遭到了严重破坏,刻在校门上的中央领导人的题名、题词均被敌人炮火所毁。学校师生撤离庆阳城,辗转迁徙,先后移驻华池县城壕村、二将川一带。其间政府不断抽调学生参加工作,上课时断时续。1947年5月,陇东中学师生组成了30多人的随军工作队,在副校长冯克箴的率领下,奉命辗转于陕北及陇东的华池、环县、合水一带,为部队动员粮食、担架,协助运送伤员。6月下旬,地委决定,学校保留建制,停止上课。师生在地委直接领导下,全部参加了土改工作。9月,随着战局的好转,地委决定陇东中学复课。学校设在华池二将川,当时有学生74人,教学班3个,教职员24人。因校长刘泽如调往山西,学校工作由副校长冯克箴主持。1948年3

月,遵照上级指示,陇东中学停办,改为陇东分区党校。

陇东中学在革命战争时期坚持办学,历时8年(不含党校、干校阶段),先后培养出毕业生523人(不含中途调出参加工作者)。绝大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陇东中学的建立,是陇东根据地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灵活创新的办学思想,高效务实的学校管理,客观实用的培养目标以及现代人文道德教育,不但为陇东文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为新中国教育制度的确立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打下坚实的基础。

六、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和陕北公学分校

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提起红军干校、列宁小学、陇东中学和抗大七分校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对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和陕北公学新正分校就比较陌生了。其实,鲁迅师范、关中师范和陕北公学新正分校都在陇东根据地的新正、新宁办过学,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一)

鲁迅师范于1937年春创建于陕北延安长城内,是一所培训小学教员及初等教育行政工作人员的学校。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决定将鲁迅师范迁至关中分区新正县。4月1日,鲁迅师范教职员工10余人、学生130多人连同教学设备一起迁至新正县三区八乡,即马家堡乡。校长为林迪生。学校下设教务、训育、总务3个处。

学校初到新正县,什么设备都没有,房子是借老百姓的或利用旧庙宇,寝室也兼作教室。学校买了500个圆凳子,使每个师生都有凳子坐。还在社会上募捐了100多本书。同时,学校组织教职员工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挖了13孔窑洞,初步缓解了校舍困难。

4月3日,鲁迅师范举行编级考试。考后,130多名学生编为3个班:2个为师范班,住昌盛堡;1个班为预备班,住在马家堡。这些学生,70%来自边区各县和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

学校所设的课目有国文,每周授课6小时,选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各种文章学习;算术,每周授课4小时,主要复习高小算术、学习珠算;中国历史,每周授课3小时,主要讲习中国近代史;中国地理,每周授课3

小时,主要讲习抗战急用的地理知识等;社会科学,每周授课4小时,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问题等;政治,每周授课3小时;游击战,每周授课2小时,内容主要包括平原、山地游击战术等;军事知识和自然常识每周分别授课2小时。教员授课多是讲提纲,学习偏重于集体学习,教员讲过的东西,各小组分开讨论,教员也参加讨论。

学生编划为班,班上设班主任,直接领导全班的学习生活。同时每班设正副班长2人,正班长管理学习,副班长管理生活。每班还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均有组长。另外,全校按军事编制成立排、连、营建置。学校还成立了学生俱乐部,由训育处负责,内设3个股,即地方群众股、伙食卫生股、文化娱乐股。主要任务是培养、发扬学生的民主作风与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因为鲁迅师范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友区^①,没有民主生活的习惯,所以训育处通过俱乐部训练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如召开校务、教务、训育、总务各处的会议,都安排各班的学生代表参加讨论。伙食方面则完全交由学生管理。地方群众工作也强调学生多参与,目的就是既要让学生正确认识党和政府的政策,同时也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学校把全校学生分成若干队,每个队指定一定的乡村,放手让他们去发动群众。教职员工也分配到各队里去,每星期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都下乡去搞宣传。同时也搞优抚工作,帮助老百姓收割粮食,给小学教员教唱歌曲。

鲁迅师范在新正办学时期,正是和平环境时期,学生努力学习,教职工积极工作,寒暑假都不放假,每学年足足上了11个月课。鲁迅师范的师范班原来规定上6个月课才准予毕业,但因种种原因,有些只上了3个月甚至1个月就离校了。师范一、二班于1938年8月毕业,三、四班于1939年2月毕业。

1938年4月,为了解决辖区各县小学教员缺乏的问题,鲁迅师范专门从师范班中选了28名文化基础较好的学生,办了一期为时1个月的强化培训班。这个班的学生5月底毕业后就分配到关中下属各县及庆阳等县工作。

1939年3月,鲁迅师范搬到赵庄,校址校舍都比马家堡时强多了。陕北公学送给鲁迅师范许多书籍,连同过去捐募的图书共有1500余册。

^① 友区,即国民党统治区。

班组也增多了,有师范四、六、七3个班,还设有预备班。同时还开办了一个培养县、区级教育行政干部的高级师范班。学校在抓教学的同时,从3月份起也开始了劳动生产,一共开垦荒地600亩,种了200亩糜子。

1939年5月,驻旬邑县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挑起了摩擦事件,为了确保师生的安全和学校的正常办学,学校将女生以及年幼的学生搬往新正三区一乡雷庄乡办学。7月份,随着局势的好转,鲁迅师范根据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又移往安塞,与边区中学合并为延安师范。

鲁迅师范在新正县办学共计16个月时间,毕业了5个班(含1个速成班)的学生,培养了300多名人事教育工作的人才,为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

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在新正县第三区马家堡正式成立。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兼任校长,王伯勋任党支部书记,刘瑞芬任副校长。3月20日,关中分区在马家堡召开“讨伐汪精卫大会”,关中师范全体师生参加了大会。习仲勋在会上向群众作了揭露批判汪精卫投日叛国的工作报告。会议结束后,在关中剧团演出秦腔《三岔口》之际,驻职田镇的国民党军预备第三师,竟从驻地的围墙上向马家堡会场开枪射击,致使戏剧停演。所幸的是,参加会议的干部、师范师生及群众均安然无恙,但预备三师部队不断运动,有侵犯边区的迹象。分区党委领导当即决定,所在地区党政机关和关中师范立即迁移。当天夜里,关中师范全体师生奉命迁到离新正县马家堡约20里的三嘉原索罗村。这个村是一个只有10多户、100多口人的小村,忽然迁来一所100多人的学校,吃饭、住宿都有很大困难。但在当地干部及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下,群众两三家合住一院,腾出院落和窑洞让关中师范的师生居住,有的教师还和群众住在牲口窑里。当时,师范设有附小,高年级的20多名学生也随师范迁到索罗村,而低年级学生都是马家堡村的娃娃,没有来得及搬迁。高年级学生到三嘉原并入南庄初小,并将校名改为关中师范附属小学。

索罗村各方面条件都比马家堡差。没有房屋,用窑洞做教室,没有桌椅,大树底下成了最好的课堂,借用群众门板作黑板,每个学生制作一块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三嘉原没有驻扎边区部队,学校虽然

在后方,但离职田镇国民党驻军比较近,师生的安全仍然受到很大威胁,所以学校师生在村口修了碉堡楼,学生日夜轮流放哨,夜间教职员工轮流查哨值班。

学校的课程参考边区教育厅颁发的《边区师范学校章程》,开设了国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等。依当时战争形势的要求,还增设了军事课,请当地有军事经验的干部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游击战争及一般军事知识,讲怎样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工作。再就是补充课、课外报告,由学校生活指导处根据学校师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拟定项目,由校内教师兼任或请地、县领导讲授。补充课规定安排在每周六的上午,下午为全校的“救亡日”,主要为学生会的活动。当时学校教师少,每个人都是除教课外,还得负责学生的生活管理,工作很辛苦。教导主任刘耿兼代政治,李达教历史、自然并兼总务主任,石大康(黄兢)教国文、音乐并兼一个班的班主任,贺三多教数学兼学校保卫工作,刘瑞芬副校长除负责学校全盘工作兼讲教学法、时事报告而外,还兼做群众工作。除国文外,其他课程都是教员自编教学提纲,经教导会议讨论通过后,教员在课堂上讲,学生记笔记。每周最少还有两次学习讨论会。

根据关中分区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提出“巩固教学,保卫关中”的口号。所谓“巩固教学”,就是使干部师生精诚团结,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认识,把学校办好;所谓“保卫关中”,就是要求学校积极配合当地党、政、军,动员群众参加反“摩擦”的武装斗争。因此,学校成立了一个宣传教育委员会,主任由副校长刘瑞芬兼任,下设三个股,创作诗歌小调,编办宣传墙报,演出小戏,每周组织宣传队去关中分区所在地长舌头集市搞一次宣传活动。并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开荒种地。因为没有劳动工具,就和群众“换工”;学校师生为群众的小麦锄草,群众用牲口为学校开垦荒地。先后开荒150亩,种植蔬菜60亩,糜谷90亩,进一步密切了学校和群众的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队不仅抢占了马家堡,还不时步步紧逼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党委书记习仲勋来校作了时事报告,并传达了分区党委为了学校师生的安全,准备让关中师范迁移的决定,初步决定先迁移到新宁县,再不行,可以向北迁至南梁老家。

不久,由于形势危急,学校奉令于1940年5月24日开始往新宁县

傅家山迁移。同年8月中旬,又由傅家山迁到新宁县三区后掌村。11月24日晚,师生又急行军迁到陕甘交界的蜈蚣洞。关中师范成立后,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形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被迫四次迁移校址。迁址马栏后,关中师范更名为马栏师范,培养了大批战争急需人才,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临着日趋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加快培养政治理论干部,中共中央于9月份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当时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涌向延安,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校舍都不够分配,于是在1938年春,陕北公学在新正县漱坡头区看花宫乡办了一个分校。

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学校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校务处(下设管理科、会计财务科)、教务处(下设考研室、图书室)。校党委书记是申力生。校党委下辖有学生区队党的总支以及学生分队党的支部。

在陕北公学就读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大后方来的,有一部分是从南洋来的,也有少数是从敌占区来的。学生按分队、区队组织起来,设有37、38、39、41四个分队。同时,学校又把学生按全校为营、区队为连、分队为排的形式组织起来,学习军事知识,搞军事演习,防特除奸。当时的38队为女生队,有120多人,张琳(成仿吾夫人)、陈怡任队长。

陕北公学办学分为普通班和较长期的高级研究班。普通班学习期限一般3个月为1期,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限则为1年为1期。学习的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课程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知识。上午上课,上课都是上大课,没有课本,没有讲义,一般是教师讲,学生听记。下午讨论、自习、阅读、作笔记。政治课教师有李凡夫、何干之、陈维实、李惟一、温纪泽、李达等。军事教员是一名长征干部。新正县分校学生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经常举办球类比赛、军事演习;每周定期举办的文娱晚会,参加的人不下千人。此外还组织学生到附近的何家山开荒种地。

学校的生活待遇很艰苦。除麦面、蔬菜、粮油由公家供应外,每人还按月发给少量生活补贴。标准是:学员1元,干部1元5角,教员

5元。

陕北公学新正分校自1938年春开办,至1939年6月搬离,培养出一千名学员。这些学员中1938年毕业的,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有些回到大后方,做了地方工作。女学员大部分上了医科大学。新中国诞生后,大多数学员成为党在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七、曲子保健药社的创办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分区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各地普遍创建保健药社,大力发展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曲子县于1942年上半年因陋就简,创办了曲子保健药社。保健药社成立以后,突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克服了无医生、无药品、无资金、无设备的种种困难,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为支援前线,保障根据地军民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1941年初,陇东分区根据边区指示,要求陇东各县都要创办保健药社。陇东分区青救会为各县训练了120余名青年卫生员;民主政府在曲子、环县、华池、合水等地设立了医药供销处,这就为创办保健药社打下了初步基础。

1942年1月,曲子县决定正式筹办保健药社。首先是解决人员问题。决定由庞克道具体负责,庞克道原来是中央红军某医院的医生,长征路过曲子时留在当地工作。以后又吸收宋柏信、路秉义参加筹建,还联合懂中医的张体智。路秉义、宋柏信、张体智三人都是学徒,起初只会采药抓药。在庞克道热情帮助下,他们刻苦学习,逐渐熟悉了一些中草药药性,掌握了炮制中草药的方法,还学会了处理一些常见病的医疗技术。

其次是筹集资金。那时候,边区各级政府的财政都非常困难,根本无力安排医疗卫生专款。曲子县一科尽最大力量才拿出了光华票子^①。

① 光华票子:是陕甘宁边区银行领导的商业与银行结合一体的财贸机构光华商店发行的货币,也叫“光华商店代价券”,群众习惯称光华币。

850元,其余所缺大部分资金要依靠群众自己筹集。具体办法是动员群众入股,每股确定为三元边币。庞克道一马当先,把他珍藏的价值1300多元的药品,贡献出来作为股金。在庞克道的带动下,通过宣传动员,群众纷纷集资入股。他们以股金在曲子街上典了几间房屋,做了药柜、药架,购置了简单的医疗器械,到元月份药铺门面就开张营业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药社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房屋破了自己修,买不到的器械就自己做,冬天取暖的木炭自己烧。

第三,解决药品奇缺的困难。那时,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边区,不准西药品进入解放区。边区卫生部门千方百计搞到一点,还解决不了抗战前线的急需,哪能顾及到后方。因此,保健药社只能以中草药治病为主。中草药根据季节,也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上山采集。药社几个人除了利用出诊出差途中、节假日休息时间随时随地注意采集外,还每年集中上山采集中草药五六次。在当地采集的中药材主要有蒲公英、甘草、秦艽、茵陈、野枸杞、车前子、麻黄、大黄,还有杏仁、桃仁、花椒等。他们在庞克道的指导下,对采回来的中草药进行晒、筛、炒、碾和加工炮制,制成一些常用的丸、散、膏、丹等中药。如治疗感冒、咳嗽的“麻杏石甘丸”,治疗胃痛的“沙气林丹”,止血的“三七粉”,敷外伤用的“生肌散”,贴疮用的“疥疮膏”等10余种。他们还根据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医疗实践中先后研制成了新的中成药20余种,并配制了消毒碘酒、红药水等。其中,治疗喉病的玉枢草、锡类散,治疗大头瘟的增升散、林树散等效果都很好。

(二)

曲子保健药社的宗旨是依靠群众,面向工农,为边区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兵服务。他们在1942年6月到1944年7月两年多时间里,走乡串户,上门行医,先后治病11400多人次,给群众赠送药品价值62万余元边币。由于服务方向正确,又能团结奋斗,所以曲子保健药社发展得很快,两年时间资金由2000多元边币增加到700万元边币。

曲子保健药社主任庞克道,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他不但没有旧医生那种“同行冤家”的坏习气,而且能积极主动地团结当地乡医,如合道区的马文科、谢四,天池区的李建邦,马岭区的邓正义,木钵区的韩九安,环县洪德区的梁松山等私医,无论自己认识不认识,他都捎话或写

信与之联系。每逢这些人到曲子,他就邀请到药社坐一坐,叙一叙。对于一些认真给群众看病的医生,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给送上一份厚礼。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团结教育旧医生,使他们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对于药社的内部同志,庞克道更是热情关怀,积极帮助,培养他们在实践中迅速提高医疗技术。在为群众防病治病的过程中,药社的同志时时处处为患者着想。他们规定,药社平时卖药的价格要比市价便宜三分之一。如果遇到特别贫困的病人,或者传染病流行的时候,就免费治疗和赠送药品。1944年春天,曲子流行肿脖子病,保健药社赠送治疗药品达到50多万元边币。由于曲子保健药社时时处处为群众防病治病着想,因而在群众中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当时,除曲子保健药社外,当地还有四家私人药铺,而这四家药铺每天的营业额总和还不到该社的三分之一。

庞克道待徒弟热情诚恳,百问不烦;对病人一丝不苟,危重不弃。病人陈邦俊患痲病10余年,久治不愈,1943年病情加重,经他精心医疗,不久痊愈。殷红顺的妻子患鹤膝风10多年,庞克道接诊后,采取手术加服药的办法,仅1个月时间就好了。1944年曲子县急性传染病发作,以喉症、大头瘟尤甚。面对这种恶性传染病,庞克道和药社的同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面不分昼夜在村落庄头巡回治疗,一面动员各区的乡村医生,群策群力,为患者治病,很快消灭了这种急性传染病。据当时统计,仅曲子保健药社治愈这两种急症患者达395人之多。

(三)

1947年春至1948年四五月间的一年时间里,环县和曲子县传染病暴发,主要是出水病、红汗病、天花、斑疹、白喉、黄疸等病症。据曲子县当时调查统计,农村中约50%的户均有传染病患者,共计死亡群众313名、干部6名。曲子县长冯克征、警卫队长颜克芳等人均死于传染病。合道一个区死亡群众(不包括3岁以下儿童)达90多人。王俊邦、王吉祥两户共6口人,因出水病绝了户。猖獗的传染病随时都在威胁着群众生命,村落庄头一片恐怖。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期间,曲子县政府积极部署,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行医治抢救。1947年7月7日至17日,县政府举办了全县

区、乡干部防疫训练班。要求全县干部、曲子保健药社医生及农村的中、西私医，相互帮助，开展群防群治。当地急用药物不足的，千方百计到外地购买；为了防止传染，对病人进行隔离；号召群众讲究卫生，街道路旁、庄前屋后、室内室外，都要勤打扫，被褥、衣服做到勤洗晒，在这次防治传染病的战斗中，曲子保健药社发挥了积极的骨干带头作用。县政府要求药社在发病严重的中心地区木钵四乡王家河设立固定防治点，从外边购进急需的中药材，供给各区乡开展防病治病。曲子药社的医务人员都深入基层协助农村医生防病治病。当时仅合道区就组织了7名农村医生，突击进行扑灭传染病流行暴发的工作，药社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对患者多采用口服中药加针灸的治疗办法，疗效比较显著，先后治好流行病患者550人，胃病患者85人，小儿疳疾患者64人，梅毒患者21人，妇女病患者45人。

曲子保健药社是在战争年代创办起来的，就必然要为革命战争服务。1947年春，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陇东时，马鸿逵、马步芳也疯狂地向曲子、环县扑来。从此，曲子保健药社也就没有了固定地点和正常的工作环境。根据上级指示，药社的几名医务人员携带急需药品和简易器械，跟随县游击队活动。他们同游击队员一起，白天隐蔽，黑夜转移，今日在东山，明日在西山。在转移过程中，甚至在游击战斗的过程中，他们也不怕危险，不辞劳累，抢时间给伤员治伤，为群众治病。这一年，药社为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免费治疗所花的药费都由药社承付。这样的游击生活，他们整整过了两年时间：既是游击队员，又是随军医生，胜利地完成了战地医疗任务。

从1942年成立到1949年秋季8年中，曲子保健药社不仅自身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带动和帮助曲子县的各区、乡先后建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陇东分区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典型。

八、陇东特委机关报《陇东报》

陇东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开始于1934年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华池县南梁创办的机关报刊《布尔什维克生活》和《红色西北》。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和新闻工作者，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相继创办了《救亡日报》、《救亡报》、《民众先锋》、

《陇东报》、《新教育》、《抗大》、《新宁报》、《群众生活》等数十种党政军机关报刊和民众团体报刊,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欣欣向荣,成为人民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陇东根据地的新闻事业,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以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崭新姿态,充分显示出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旺盛生命力和革故鼎新的强大战斗力。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推动下,陇东根据地新闻事业作为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的一部分,率先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深刻、彻底的新闻改革。经过这场新闻改革的洗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陇东根据地新闻事业在内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更加立足实际,旗帜鲜明,贴近群众,充满生机。在这块红色热土上,人民群众是新闻事业的主力军。从边区到分区,从县区到乡村,广泛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和各级以“人民公仆”为天职的领导干部,积极开展写稿和读报活动,从而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生动局面和优良传统。

(一)

《陇东报》诞生于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艰苦岁月,是一张颇具特色,深受陇东根据地军民欢迎的报纸。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陇东报》坚持地方化、大众化、通俗化的优良传统,坚持鲜明、生动、迅速、准确和稿件开门见山,文章短小精悍的业务指导思想,真实反映了陇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和人民政府建设的新鲜经验,全面宣传陇东分区经济建设各项成就,充分发挥了宣传、组织、教育和鼓舞群众的作用,为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和巩固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陇东报》的前身是创办于陕甘宁边区陇东根据地的《救亡日报》和《救亡报》。1937年10月初,在中共陇东特委书记袁国平的领导和关怀下,《救亡日报》以“陇东通讯社”的名义在庆阳县创刊,为八开二版,石



毛泽东为《陇东报》题写的报名

印、油印交替出版。张文华任社长兼主编;编采、编写和发行工作人员仅有4人;并聘请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庆阳办事处主任夏时为顾问。主要发行范围是中共陇东特委所辖

的庆阳、合水、宁县、镇原、固原县等地。每期印行 300 余份。1938 年 3 月下旬,《救亡日报》出版至第 175 期停刊,更名为《救亡报》,并改组为中共陇东特委机关报(1938 年 5 月至 1940 年 3 月,曾为中共庆环分委机关报)。它先后出版三日刊、四日刊、五日刊;初为四开四版、石印,不久即改为四开二版、油印。1943 年 6 月 30 日,《救亡报》出版至第 474 期停刊。在《救亡报》创办期间,中共陇东特委宣传部部长吴铁鸣兼任社长,朱培屏、冯塞夫、田绍锡、蓝钰历任副社长兼主编、副主编;编采、缮写、发行工作人员一直为 5 人左右。在 4 年多的艰苦岁月里,《救亡报》克服重重困难,培育和形成了地方化、大众化、通俗化的优良传统,办得颇具特色,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每期印发 700 份左右。除向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和延安、关中、三边、绥德等地的新闻单位赠阅外,其发行范围主要是陇东分区所辖各县、区、乡、村,亦有少数发往国民党统治区西峰、平凉等地。它的广泛影响,使国民党顽固派日感惶恐,曾被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列为在其统治区域内“严切查禁”的报刊之一。

1942 年 7 月 7 日,由《救亡报》更名的《陇东报》在庆阳出版(未连续《救亡报》期号),仍为中共陇东特委机关报。八开二版、四开二版交替出版,油印,周刊(因此曾一度习称“陇东周报”)。1943 年 1 月,中共陇东特委更名为陇东地委,《陇东报》遂为中共陇东地委机关报。1945 年 2 月,《陇东报》改为五日刊,并改为石印。1947 年 2 月,《陇东报》改为四日刊。此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陇东解放区,陇东报社即跟随陇东分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华池山区的新堡、城壕、悦乐、柔远、二将川、白马庙川、元城、张湾等地。这年 10 月,《陇东报》在华池山区转移途中,又恢复五日刊。在频繁转移的艰苦岁月里,《陇东报》硬是靠人背、驴驮,带着纸张、油墨、印刷机、收报机等,坚持石印、油印交替出版,从未间断。同时,还及时编印《号外》、《捷报》和《新闻简报》,在陇东解放区以及西峰、平凉、兰州等国民党统治区散发,充分发挥了团结、教育、鼓舞、激励人民群众的战斗作用。1949 年 7 月下旬,庆阳全境解放,中共陇东地委更名为庆阳地委,《陇东报》迁回庆阳出版,并改为旬三刊。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中共陇东特委、陇东地委、庆阳地委宣传部部长吴铁鸣、高朗亭、宁养初、徐宗望先后兼任《陇东报》社长;蓝钰、王作易、景昌之、叶滨、薛剑英、刘金绶历任副社长兼主编、副主编。抗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报社工作人员长期为5至6人。1946年前后增加到15人左右。1947年春夏,为适应解放战争环境,曾一度精简为3至5人。1948年恢复到10余人。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报》每期发行数长期稳定在1000份左右。在解放战争的艰险环境里,每期发行数仍保持700余份。它除在陇东根据地各县、区、乡、村发行外,赠阅范围在《救亡报》的基础上不断扩展,最远送到晋绥根据地。

1949年9月中旬,《陇东报》随中共庆阳地委迁至西峰镇出版。1952年6月1日,《陇东报》由石印改为铅印,并由四开二版改为四开四版。这年12月1日,《陇东报》由长期自办发行改为全部移交邮电部门面向全国发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陇东报》继承和发扬地方化、大众化、通俗化的优良传统,深受各界读者欢迎,每期发行量逐年增加。

(二)

从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到全国解放初期,《陇东报》始终受到党和人民以及新闻界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1940年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曾及时纠正了《救亡报》宣传上的失误,并作出了改进报纸工作的重要指示。1942年秋,毛泽东为《陇东报》题写了报名,为它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1946年9月,王震将军率领中原突围部队途经庆阳休整期间,亲自批准将一台收报机赠送给陇东报社,解决了《陇东报》接收和报道外界信息的急需。1947年4月,在陇东解放区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胡乔木同志,为《陇东报》撰写了《论战局》的重要评论,极大地鼓舞了陇东解放区军民和《陇东报》工作人员的斗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缪海棱、张铁夫、李千峰、洪流、马永河、延国民、叶滨、马谦卿、秦时玮、汪星、王炎、张继成等新闻界老前辈,相继从延安、陕北来到陇东根据地,既是《解放日报》、新华社陇东分社(支社)、《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的记者,又是《陇东报》的记者或主要撰稿人,为《陇东报》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50年,在胡乔木的关怀下,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及时给《陇东报》调拨了印刷机、铸字炉、铅字等设备。此后,在《东北日报》、《群众日报》的热情援助下,这些铅印设备从千里之外的天津、沈阳经西安顺利运抵陇东报社;《甘肃日报》和天水地区又及时选派7名印刷工人,支援陇东报社办起了印刷厂,使《陇东报》的面貌焕然一新。

《陇东报》的前辈们，以自己的艰苦拼搏和辛勤努力，使这张报纸曾成为陕甘宁边区乃至西北地区很有影响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1943年2月，《陇东报》刊载的《合水群众热烈劳军》，获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的记者学术奖金。1946年5月和9月，在韬奋基金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延安记者学会和《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部队生活》等联合举办的陕甘宁边区两次优秀新闻作品评选中，《陇东报》刊载的《华池县长白国民领导变工坚持四年》、《曲子县书县长自背行李联袂下乡亲授务棉法》获甲等奖，《环县甜水区谢区长亲自领导一个村》、《镇原检查减租工作》等5篇作品获乙等奖。《边区群众报》主编胡绩伟等新闻界知名人士，还曾在《解放日报》等报刊撰文，对《陇东报》的宣传报道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时，《陇东报》又是革命新闻队伍的摇篮之一。全国解放前后，《陇东报》的前辈们，有的被选调到《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工作；有的随军挺进东北、西北，成为创办《西满日报》、《嫩江日报》、《黑龙江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新平凉报》、《西北铁道报》等报纸的骨干力量，为发展革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20世纪70年代，在翻阅战争年代残存下来的《陇东报》时，发现1949年9月3日出版的第417号《陇东报》，第二版《九一记者节专刊》中有一篇《写稿三字经》赫然入目。它诵读起来，朗朗上口，仔细推敲，文理俱佳，令人拍案叫绝。这里，不妨将全文抄录于后，共同赏析：

写新闻，要记清，

立场稳，观点正。

好表扬，坏批评，

优缺点，分析清，

要真实，要公正。

写经验，写教训，

要加强，指导性。

采访时，细打听，

要深入，找群众，

去体验，实践中。

要动人，抓典型，
 平凡事，不生动。
 将材料，收集定，
 打腹稿，写纲领，
 订中心，要简明；
 五要素，要记清，
 写事实，说过程，
 关键处，须详明；
 设计好，安排定，
 提起笔，一气成。
 写好后，大声诵，
 反复念，找毛病；
 提意见，要倾听，
 可无字，删干净，
 不惋惜，不心疼。
 多修改，多补充，
 加标点，再誊清，
 经审查，手续终。
 写地点，写姓名，
 写日期，送报社，
 时间性，不放松。
 登不出，不灰心，
 多多写，写成功。

这篇用顺口溜形式写成的文章，在时隔 60 多年后的今天，对新闻采写仍有借鉴作用，仍不失为新闻论著的佳作之一。这篇短短的“三字经”，包含着新闻采写原则、采访方法、写稿常识以至投稿注意事项等内容，涉及到新闻采写各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它强调新闻采写要“立场稳，观点正”，充分注意真实性、指导性，这是对新闻工作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也是时至今日仍应坚持的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它倡导的要深入群众、参加实践和注重抓典型等采访经验，是今天新闻采访工作仍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正确途径。它概括的“打腹稿，写纲领”、“五要素，要记清”、“关键处，须详明”，以及用事实说话、一气呵

成等写作要领和方法,无疑也是今天写好新闻的基本步骤和有效方法。特别是“写好后,大声诵,反复念,找毛病”、“可无字,删干净,不惋惜,不心疼”这些文字,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同时,这篇“三字经”中提出的“经审查,手续终”、“时间性,不放松”的要求,以及“登不出,不灰心,多多写,写成功”的希望,对于防止新闻报道失实,增强新闻的时效性,坚持正确的写稿态度,也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第十二章

陇东革命民歌唱响全中国

在漫长的旧社会,陇东歌谣就是陇东人民控诉、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工具之一。它从各个侧面,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愿望和要求,蕴藏着劳动人民强烈的反抗情绪和革命的潜在力量,有较高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赋予了陇东歌谣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到中共中央、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歌总是紧密配合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激励人民的战斗作用,成为陇东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的战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伴随着“革命的势力大发展”,陇东革命歌谣不断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不断得到提高。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新秧歌运动蓬勃发展的,使陇东人民的艺术创造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陕甘宁边区的许多专业文艺工作者来到了陇东,同当地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相结合,使陇东革命歌谣的艺术之花更加光彩照人,鲜艳夺目。

一、血与火熔铸的陇东革命歌谣^①

陇东古老的文化,孕育了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谣;而血与火的革命斗

^① 本节歌谣选自高文、巩世锋编,《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争，又在陇东民间歌谣的基础上产生了血与火熔铸的陇东革命歌谣。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和创建的南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为陇东革命歌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为其繁荣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环境，从此，揭开了陇东革命歌谣新的篇章。

早在1930年前后，当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华池南梁一带宣传革命、组织武装的时候，他们首先运用的就是民歌、民谣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他们说唱着“连年大旱，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若要反，离死不远；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等民谣，号召劳苦大众起来革命。随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的开辟与建立，庆阳人民把自己的爱和恨通过民歌、民谣表现出来。他们颂扬自己爱戴的英雄，歌唱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红军和游击队，抒发翻身解放的喜悦，表达跟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的坚强决心。这首陇东信天游《咱们的红军到南梁》中唱道：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队伍到南梁。
长枪短枪红缨子枪，
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满天的云彩风吹散，
红军来了晴了天。……

信天游《红旗插上寨子湾》中这样唱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
上来些红军闹共产。
共了安边共横山，
南梁川里扎营盘。
红旗插上寨子湾，
刘志丹名声传的远。
打土豪来分田地，
咱们穷人把身翻。

这种充满革命愿望的歌谣，读了无不使人受到鼓舞。小调《妇女放脚歌》唱的又是这样的内容：

开口说一声，
妇女们都来听，
旧社会缠脚害苦了妇女们，
活肉缠成了死肉疔，
缠脚的人多苦情。

小调《封建制度是祸根》中又唱道：

男人女人都是人，
为啥男女不平等，
恨爹恨娘不顶用，
封建制度是祸根。

这情真意切的宣传和对封建制度的揭露，怎么能不激起人们对黑暗旧社会的痛恨和诅咒。

送郎送到五里坡，
手拉手儿叫哥哥；
妹妹常爱红军汉，
等你十年也不多。

这一片纯真执著的情谊和一心为革命的高尚情操，谁又不为之感动呢？！

下面这首《送郎当红军》描述了全家闹革命的动人情景：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
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骑骡子我骑马，
剩下毛驴驮娃娃。

还有一些歌谣反映了当时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如《红军起首月明原》唱道：“一九三二年，红军起首月明原，谢浩如、刘志丹，领导人民把身翻。”它真实地记述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开辟正宁寺村原根据地的斗争。《打老谭》唱道：“半夜打了个闪，来了刘志丹，他带上游击队，一心要打老谭。”它咏唱了1934年冬陕甘红军攻打谭世麟民团的战斗。这些歌谣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陇东革命歌谣的历史价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民众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革命歌谣取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数量之众多,都是前所未有的。群众带着满腔的仇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表达抗战决心:“一恨小日本,它进攻咱中国,先把东北吞,‘九一八’炮声响,侵占了我东三省。侵占了东三省……东北的同胞实呀实苦情,实是苦情,满胸亡国恨。”(小调《新三恨》)“牡丹花开香喷喷,情郎要当八路军。妹织手巾送郎行,知心话儿织不尽……情郎你一心打日本……抗日杀敌当英雄……”(《织手巾》)

他们一方面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满腔热情讴歌陇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新生活和新变化。当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时,他们唱得更多,有著名的《毛主席号召大生产》、《纺线线》、《生产谣》、《闹变工》、《吆号子》、《大风川》等等。小调《桂姐纺线》又是这样声情并茂、情景交融、感人至深:“一更啊月儿呀灯花花红,桂姐儿纺线小窑中,巧手儿一摇呀,哎哟,纺车儿吱咿咿。……五更啊月儿月照明,灯花儿开的朵朵红,桂姐儿纺线呀,哎哟,边区有名声。”当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时,他们又唱出了《八路军真正好》、《军民合作心一条》、《劳军歌》等情深意长的歌谣。在《做军鞋》中唱道:

一更子月儿月初升,
剥下青麻搓绳绳,
搓好绳绳做军鞋,
慰劳咱们八路军。

三更子月儿月当空,
千针万线情儿深,
做起军鞋想亲人,
好光景全靠八路军。

五更子月儿鸡叫鸣,
再把军鞋做几针,
做成军鞋送前线,
八路军穿上打日本。

这首情深意浓的歌谣,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活灵活现的拥军画卷。当新秧歌运动和文化建设运动开展的时候,他们唱得更红

火,你听:“正月里来正月正,曲子社火闹得凶,群众热心一齐办,为了拥政和爱军。”“不识字、真麻达,活人成了睁眼瞎,……毛主席想办法,号召咱们学文化,冬学夜校识字班,咱们大家来参加。”诸如此类的还有《不求神靠自己》、《放脚》、《边区的姑娘人人爱》、《建设边区运动歌》等。民众通过这一首首歌谣,把一个陇东老区唱得闪闪发光,唱得人人喜爱。在他们眼里,“石榴树上开红花,边区就是咱的家;谁敢动它一星土,咱拿性命保卫它”。边区就是庆阳人民的命根子。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陇东根据地的人民又唱着歌谣,把支前的物资和自己的儿女送上前线,《送夫参军》、《做军鞋》、《送公粮》、《送棉衣》、《准备打胜仗》等越唱越多。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唱着《毛主席真英明》、《解放小调》、《革命成了功》等歌谣,把胜利的喜悦和对新中国的展望,尽情地抒发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陇东根据地蓬勃发展,为陇东革命歌谣的产生创造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和革命基础。从此,数以千百计的类似“千里雷声万里闪,上来些红军闹共产”等红色歌谣,以鲜明的阶级性、高昂的战斗性、史诗般的纪实性,显示出了强烈的时代特色,为巩固和发展陇东根据地,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成为庆阳乃至全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由于周扬、贺敬之、艾青等文坛前辈的热情关注和扶持,经过柯中平、张寒晖、马可、李焕之等边区文艺工作者与庆阳人民一起挖掘创造,使陇东革命歌谣的思想性、艺术性都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产生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唱毛主席》、《十绣金匾》、《军民大生产》、《桂姐儿纺线》、《织手巾》、《做军鞋》和《十盏灯》等一大批声震全国的革命歌谣。这些革命歌谣,是中国民间艺术宝库里的珍品,又是革命斗争的史诗,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陇东人民革命斗争的辉煌历程。特别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和《军民大生产》等陇东民歌,唱遍了陕甘宁边区,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至今脍炙人口、传唱不绝,使陇东歌谣以其崭新的面容和强烈感人的魅力,成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瑰宝。

新中国诞生后,甘肃省及庆阳地区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工作者,又多次对庆阳歌谣进行了搜集整理。1981年以来,庆阳地区

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化馆对庆阳民歌、民谣进行了全面调查,使数以千计的歌谣迈进了文海书林、电影银幕、电视荧屏,真正成了传世之作。解放初期出版的《抗日歌谣》、《红色歌谣》、《陕北民歌》和60年代出版的《甘肃歌谣》以及70年代出版的《中国歌谣选》,都收录了大量的庆阳革命歌谣。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庆阳地区第一部歌谣集——《陇东革命歌谣》。在60年代摄制的《东方红》和80年代摄制的《中国革命之歌》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等优秀的陇东革命民歌,重现了那难忘的年代,震撼着亿万观众的心弦。《红河激浪》、《北斗》等故事影片和电视剧《解放》、《岁月不流逝》中,也都伴有陇东革命民歌的歌声。

“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控制和影响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播出中,只有8个“样板戏”。文艺节目内容的“贫乏”,引起了广大听众的困惑和反感。经过革命群众的多次呼吁,再加上电台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周总理批准,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中央台文艺部采录组长王敬之和音乐编辑王惊涛,于1971年5月下旬到达西安。在陕西省广播事业局领导的陪同下,中央和陕西省的文艺工作者到达延安。经过他们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凝结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这五首革命民歌包括《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翻身道情》。在陕西省歌舞剧院排练并录音后,上报“中央文化组”审查并批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播出。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一经播出,那热烈、雄壮、悠扬的旋律,打破了“样板戏”的一统天下,给那沉闷、窒息的年代带来了希望和生机。而这五首革命民歌中,其中有三首民歌就诞生于庆阳这块热土。这些凝集着老一代词曲家心血的《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犹如子午岭漫山遍野的山丹花越来越红艳,也成为流芳百代的传世佳作。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和民歌演唱新秀的脱颖而出,陇东民歌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它不仅像战争年代那样在戏曲舞台上重现风采,而且还从大众传媒广播走向中央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它以质朴、纯厚、优美、清新的艺术魅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隆隆脚步声,不断绽开着新的花朵,激荡着神州大地。

二、孙万福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

每当我们听到这首熟悉的陇东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它那真挚的感情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总会激起人们对毛泽东的无限怀念和崇敬。这首优秀的陇东民歌就是原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著名的民间歌手孙万福创作的。

孙万福，1883年出生在陇东环县曲子镇刘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一直务农，一个字都不认识，但聪慧过人，擅长吟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每逢新春佳节，乡间闹秧歌，耍社火，他都能编出许多顺口溜、快板、唱词来。从青年时期起，他就是一个闻名方圆几十里的民间歌手和诗人。

1936年，工农红军西征的时候解放了他的家乡曲子镇。这位翻身农民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带头组织变工队，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为抗日救国和边区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1943年，他年已花甲，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当时的《解放日报》曾记载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在毛泽东接见有突出贡献的17位劳动英雄的一个座谈会上，“一位老英雄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主席，用双手紧紧抱着毛主席的肩膀。他粘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有些颤动。他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这位劳动英雄就是孙万福。

在这次劳动英雄大会上，正是这种对党对领袖的深厚感情和对边区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孙万福心头的诗情歌意一齐迸发了出来，他的艺术创造升华到了全新的高度。《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陇东民歌的歌词就是他在这次大会上即兴创作的。他创作的原词是：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天上三光日月星，
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
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为咱们能过好光景，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
丰衣足食吃饱饭。

边区人民要一心，
枯树开花耀眼红，
千年枯树盘了根，
开花结籽靠山稳。

这首歌词，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极大重视。诗人贺敬之对这首歌词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艺术润色。帮助孙万福完成了这首优秀民歌的全部创作。数十年来，这首民歌从陇东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唱到了全中国，广泛流传，脍炙人口，深受人们喜爱。在这次劳动英雄大会期间，孙万福还即兴创作了一首又一首诗歌，尽情抒发人民对共产党、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和感激，尽情歌颂边区美好的生活和如火如荼的斗争，表现出了他惊人的艺术创造才能。

从此，“劳动诗人”、“才慧过人”等对他的赞誉，到处传扬了开来。周扬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对这位优秀的农民诗人和他的诗歌，进行了详



高岗为孙万福书写的奖状

尽介绍和高度评价。他这样写道：“这个老头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他的讲话就像诗一样，简直是很出色的朗诵啊，比某些职业的朗诵诗人还高明呢！”他又写道：“孙万福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在他更善于把这些思想和情绪化为活泼的、带有丰富多彩的语言。不但个别句子带有诗意，而且通篇带有诗的结构和风格的语言。”“他时常在语言里用着一些成语、形象和比喻，而且有时用得那样恰当，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内容和生命。这些成语原来很多是有韵的句子，但是不管有韵没韵，他讲出来都纯然是自然的节奏，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周扬还称赞说：“孙万福算得一个优秀的诗人。”

陕甘宁边区幸福、美好的生活，艰苦创业的劳动和斗争，尤其是蓬勃兴起的秧歌运动，给孙万福的诗歌创作开拓了广阔的天地，赋予了丰富的内容。在这次劳动英雄大会以后，孙万福又创作了许多抒情言志的诗歌。他创作的《歌唱毛主席》，尽情颂扬了毛泽东创建陕甘宁边区的丰功伟绩：

南京到北京，
哪一个不闻名，
中国的领袖，
就是毛泽东，
领导咱们大翻身，
咱们的大救星。

毛主席他一来，
衙门大敞开，
谁有苦来谁有冤，
一起吐出来，
打倒土豪大恶霸，
穷人把头抬。

毛主席好领导。
天下尽清官，
他一心为百姓，
赛过活神仙，
边区办的呱呱叫，
一片好河山。

在《边区人民要一心》的诗歌中，他热情地颂扬了边区的美好生活：

延安府里地气宽，
八路军占的米粮川，
毛主席领导老百姓，
丰衣足食不困难。

在《我们边区团结的像铁桶》这首诗里，他又生动地表达了边区人民万众一心、不可战胜的革命意志：

我们边区，
团结的像铁桶，
那些像老鼠一样的，
汉奸和特务分子，
找不到一个窟窿。

当时，马锡五担任陇东分区专员。他积极组织领导陇东分区庆阳、环县、华池、合水、曲子、镇原六县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一个座谈会上，孙万福即席创作了《马专员》这首诗。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马锡五专员的爱戴：

陇东分区六县，
马专员挂了牌，
组织六县人民发了财。
赛过周朝的姜太公，
稳坐钓鱼台。
组织得土里生金，
万物都能来。

抗日战争时期，王维舟领导的八路军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分区，军民建立了鱼水深情。孙万福又创作了《王旅长》，赞美亲人子弟兵：

陇东分区六县人民广，
头一个英雄，
是咱三八五旅王旅长，
第一个兵多将又广，
保卫我们六县的人民，
大人生产娃娃长。

在轰轰烈烈的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曲子县县长赵耀先、县委书记刘国升，组织群众努力生产，实现了“丰衣足食”。孙万福创作的《赵县长》，生动地描写了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

人人上世要富贵，
农民庄稼先学会，
才选举劳动英雄，
到延安去开会。
大礼堂里把话讲，
换来我们一个赵县长，
未曾挂了榜，
大家人民都夸奖，
赛过三国时候诸葛亮；
诸葛亮，
他的组织还不如我们赵县长。

自卫军是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一支民兵性质的革命武装组织。孙万福创作的诗歌《自卫军》，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赞扬了自卫军在保卫边区中的重要作用：

照亮了，看清了，
看清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咱们边区的自卫军。
咱们自卫军把武器，
锈的磨它个明的，
烂的打它个新的，
老的磨它个快的，
短的安它个长的。
把他特务顽固分子，
比作个老鼠，
咱们边区没有一个窟窿，
满墙根里跑，
它就是不得进去。

孙万福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使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惊叹不已，

他们把孙万福的这些诗歌记录下来，广为宣传，并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

孙万福在边区的各项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中，还运用自己的诗歌，热情宣传边区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路线。1944年春，在曲子县劳动英雄大会上，孙万福为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的号召，配合边区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创作了《二流子要转变》：

二流子，馋又懒，
东游西浪吃洋烟，
把好人吃成瘦人，
瘦人吃成病人，
病人吃成坏人，
吃得腿长脖子细，
家里没有二亩地。
公家听着要反对，
邻家骂你没脸皮，
又没米，又没面，
娃娃扯住你的衣。
因此一心要转变，
葫芦烟灯一齐拌，
受奖励，勤生产，
多开荒地多种田。

现在，从陇东民间和当时一些报刊上，我们能够搜集到孙万福创作的诗歌仅有20多首，而且这些诗歌只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创作的。从这些有幸保存下来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孙万福的诗歌创作，取材丰富，内容广泛，具有浓郁的庆阳农村乡土气息。这些诗歌，有的当时很快就传遍了陕甘宁边区，激励着边区人民的斗志；有的至今仍在庆阳民间甚至全国广泛流传，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孙万福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证明，他不愧是一位才慧过人的农民诗人。

1944年7月13日，这位深受人们尊重的劳动英雄和农民诗人，在

去曲子为变工队买油返回途中，遇到了暴雨，涉水过河时被凶猛的洪水夺去了生命，时年61岁。在他不幸去世以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他发表了《讣告》；延安鲁艺剧团和陇东分区文化艺术团体，纷纷开会或写文章悼念。人们都对这位优秀农民诗人的不幸去世感到非常痛惜。如今，这位优秀的农民诗人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艺术遗产，仍然是中国革命文艺宝库中熠熠闪光的艺术珍品。

三、汪庭有和陇东民歌《绣金匾》

《绣金匾》是大家早已熟悉和喜爱的一首陇东民歌，但是它的作者和创作过程却一直鲜为人知。这首民歌作为陕北民歌传唱了近50年。这首感情饱满、风格细腻的民歌，是20世纪40年代，陇东根据地新正县马栏三乡（今正宁县永和乡）一位叫汪庭有的木匠编唱的。

汪庭有祖籍陕西商南县。两岁时因家乡受灾，全家人外出逃荒，父亲肩上挑着两只箩筐，一只装着破烂，一只装着汪庭有，由南向北沿门乞讨。到汪庭有7岁那年，他们逃到陕西富县的羊圈沟住了下来。第二年汪庭有就给地主放牛。13岁上他患了一场“出水病”，以后又得了“大骨节”病。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剩下他和哥哥两人相依为命。后来他又与哥哥分手，离开住了12年的羊圈沟，一个人过起了流浪生活，给人打杂做短工，掏厕所、推磨、种菜、收庄稼，什么都干。1936年他流落到了正宁县永和乡，并在那里落了户，开始种地，学做木活。由于他心灵手巧，干活认真又不计较报酬，所以叫他做木活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手艺也越来越好，渐渐成了周围小有名气的木匠。

汪庭有没有念过书，他所受到的唯一的文化熏陶，就是在四处流浪和拉长工、打短工时学唱陇东的《五更道情》、《五哥放羊》、《绣荷包》等民歌。在解放区，他的光景改变了，不再受冻挨饿，不再被人欺压凌辱。他那被旧社会压抑了的才能，在新的生活环境里很快发挥了出来。他一边做木活，一边哼唱欢乐的歌曲。为了表达自己对共产党、人民领袖和边区生活的真挚感情，他采用陇东人民喜闻乐见的《绣荷包》曲调和表现手法，开始了《十绣金匾》这首民歌的创作。

据著名诗人艾青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说，汪庭有嫌《绣荷包》表现的是男女爱情，给有威有望的人民领袖、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送过去不合适，应当绣一个大金匾。因此，他把这首民歌定名为《十绣金匾》。因为不识字，汪庭有在编唱这首民歌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他常常把第一段记住了，才能再编唱第二段。有时候，后面一段编好了，而前面一段又忘掉了。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每编好一段，马上教给村上的孩子唱。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编第二段，如果第一段唱不出来时，再找孩子们唱。就这样经过了一年多时间辛勤努力，汪庭有终于编成了《十绣金匾》。它的歌词是：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一绣毛主席，
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爱我们，
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
金匾绣得红，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陕甘宁。
二绣陕甘宁，
世事多太平，
军和民大团结，
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来是清明，
金匾绣三层，
金匾上绣的是，
模范八路军。
三绣八路军，
抗战下决心，

对民众多恩情，
爱国爱人民。

四月里立夏天，
金匾绣得宽，
金匾上绣的是，
八路军生产。
四绣军生产，
比民忙大半，
夜晚守警戒，
白天务庄田。

五月里五端阳，
金匾绣的明，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老百姓。
五绣老百姓，
抗战最热情，
组织起自卫军，
打倒小日本。

六月里热气腾，
金匾绣花云，
金匾上绣的是，
民众的劳动。
六绣民劳动，
有利有名声，
行行出状元，
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
金匾绣金线，
金匾上绣的是，
妇女闹生产。
七绣女生产，
织布又纺线，

加入识字组，
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
金匾绣得圆，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合家欢。
八绣好家常，
卫生身体壮，
全家人都和气，
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
金匾绣得长，
金匾上绣的是，
移民上天堂。
九绣难民来，
政府好优待，
老户们帮助他，
吃用有办法。

腊月里天气寒，
金匾十绣全，
金匾上绣的是，
政府恩情宽。
政府恩情宽，
冬学处处办，
有吃有穿有文化，
快活过新年。

汪庭有《十绣金匾》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而是火热的感情化成的一串串的声音，收到的艺术效果比文字写成的更为生动、强烈。除此而外，汪庭有创作的民歌还有《表顽固》、《防奸歌》等。《表顽固》也是一首长歌，分12个月来唱，每个月8句。这里摘录4段歌词：

正月里来是新年，
各位同胞听我言。
别的闲言都不谈，
单表顽固和汉奸：
顽固要把边区占，
汉奸穿针来引线。

四月里来四月半，
顽固做事欺了天，
赶的男人满山跑，
赶的女人沟渠里钻，
苦打老婆实可怜，
幼年妇女任他奸，
又抢财物又放火，
你看凄惨不凄惨？

八月里来是中秋，
友区人民加忧愁，
老也愁来少也愁，
男女相愁何日休？
老愁公差不自由，
少愁壮丁往外抽，
女愁顽固像野兽，
男愁碉堡实难修。

十二月里一年满，
家家准备过新年。
各位同胞听我讲，
地方工作要加强。
打退顽固还不算，
抗日救国保家乡。
高举大旗向前进，
最后胜利是我们。

《表顽固》配的是陇东流行的《珍珠倒卷帘》曲调,唱起来悲痛哀伤,让人听了义愤填膺。汪庭有的这些艺术成就,受到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44年10月,他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荣获“甲等艺术英雄”的光荣称号。

数十年来,汪庭有的《十绣金匾》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得到了人民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再创作和再锤炼。它传唱不久,就增加了歌颂朱德总司令的新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紧密配合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内战阴谋的斗争,原作中歌颂八路军的歌词随之作了改动,并把原作的“十绣”精练为“三绣”,演变成为在战争环境中随时随地用以教育、鼓舞人民群众的《绣金匾》。《绣金匾》不仅在战争年代充分发挥了战斗作用,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广泛传唱,妇孺皆知、人人喜爱的优秀民歌。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在这举国哀悼之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怀着悲痛的心情,对《绣金匾》进行了再创作,将歌唱八路军的歌词改为“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你”,使它变成了一曲饱含深情、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颂歌。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唱起或听到《绣金匾》时,常常被那感情浓烈、声调婉转的词曲感动得热泪盈眶。

四、从《推炒面》到《边区十唱》

解放区呀么嗨嗨,
大生产呀么嗨嗨,
军队和人民,
西里里里嘹啦啦罗罗罗哎,
齐动员呀么嗨嗨。

.....

听到这雄壮、热烈的歌声,我们的眼前都会浮现出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老解放区那军民大生产轰轰烈烈的情景,这首民歌就是有名的《边区十唱》,即后来的《军民大生产》。它广泛流传,是和一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张寒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张寒晖,1902年春生于河北定县西建阳村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1919年,他考入了保定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曾投身于“五四”新文化

运动。1925年10月,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即转为共产党员。这期间,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组织领导了“艺专工人俱乐部”,还组织“五五剧社”,编辑出版《五五剧刊》,创作发表过许多新戏剧,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寒晖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宪警的搜捕,被迫停止学业回家务农,后曾帮助定县民众教育馆搜集研究秧歌、民谣,对民间疾苦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也对民间艺术有了较多接触,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观点在他心头开始萌发了。

1930年,张寒晖再去北平,随即加入“左联”,负责组织剧社的工作。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搜捕迫害,他又先后到大名第七师范、定县职业学校当教员,坚持推进革命文艺活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31年春,张寒晖应同学之邀,到西安民众教育馆任职,组织流动图书文库,举办各种展览,积极将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观点付诸实践,编演了富于西北地方色彩的话剧,为西安工农大众演出,一时非常活跃。至此,张寒晖经过十多年颠沛流离,广泛体验了人民疾苦,受到了民间艺术熏陶,使大众化、地方化的文艺形式成为他运用自如的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有力武器。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关头,1935年9月,张寒晖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进入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工作,担任东北军政治部游艺股长,并兼任西安二中、黎明实习学校、民兴中学、东北竞存学校的教员,在东北军和青年学生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还邀集进步人士,编辑出版《老百姓报》等报刊,在陕西、河南、甘肃、晋西南等地发行,深受人民大众欢迎。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日子里,他主持东北军的“一二一二剧团”,利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界各党派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囚禁了张学良将军,又迫令东北军撤离西北。1937年春,张寒晖随军停留在安徽境内的陇海、津浦铁路线上。他看到东北军官兵思念故土不能归、奋起抗战又不准的悲痛情景,忧愤交加,痛彻肺腑。为了唤起东北军将士和全国人民救亡图存,他便以北方妇女上坟的哭声为基调,创作了《松花江上》这首歌曲。他又亲自教唱给东北军官兵,进而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这首浸透着作者爱国激情的歌曲,呼唤人们流着泪奋起抗战,流着泪收复失地,

成为一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著名战歌。然而,张寒晖只是通过他自己的口把这首歌传播开来的,因而当这首歌面世的时候,创作者却成了“佚名”,这位卓越的爱国作者的姓名反而不为人们所知了。

1941年8月,张寒晖进入他日夜向往的陕甘宁边区。他看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就放弃了他酷爱的文化艺术事业,从事起经济工作,帮助边区发展造纸工业。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协多次发电报邀请张寒晖到延安,他才又从事起文化艺术工作,并担任了边区文协秘书长。后来,他又到文协戏剧委员会工作。延安文艺界的同行们都知道他是革命文艺战线的一位老同志,能编演戏剧,还当过教员,办过报纸,搞过造纸工业,又是著名的《松花江上》的作者,对他十分尊敬。然而,他却异常虚心,埋头苦干,深入实际,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他创作了表现教育俘虏的《打开脑筋》,歌颂边区民主选举的《从心底里看人》,反映人民拥护八路军的《太平车》等曲子戏、秧歌剧,取得了文艺大众化、地方化的丰硕成果。

1944年初春,张寒晖和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著名诗人柯仲平一道,穿越人迹罕至的子午岭林区,迎着边区军民大生产和文化卫生建设的热潮,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和文化、卫生模范村——陇东分区华池县的城壕村,深入生活,帮助工作。在这个傍山依水的山村里,张寒晖经常听到农家的磨窑里传出农妇、村姑哼唱的一首传统民歌《推炒面》的优美歌声:

鸡叫头绞^①里么呼儿嗨,
叫二绞哩么呼儿嗨,
叫二绞哩么呼儿嗨,
我给干哥哥么,
齐里里里嘹啦啦啦罗罗罗得,
推炒面呀么呼儿嗨……

这歌声,伴着“踢踏、踢踏”的驴蹄声,伴着“咣当,咣当”的箩儿声,分外动听。张寒晖非常喜欢这首民歌的曲调,从农妇、村姑们那里学来

① 头绞,陇东方言,即第一次的意思。

后,便“旧瓶装新酒”,给这个曲调填入新词,创作了反映边区军民大生产的《军民合作歌》,并将演唱形式由《推炒面》的独唱改为“一领众和”。起初,这首歌是作为张寒晖创作的秧歌剧《军民合作》的主题歌传唱开来的。后来,在轰轰烈烈的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经过张寒晖的再创作,这首歌的唱词增加到了10段,故而又叫《边区十唱》。

四五年呀么哟嗨。

大生产呀么哟嗨。

边区的男男女女西里里里喀啦啦啦嗦罗罗罗。

齐动员呀么哟嗨……

雄壮、热烈,鼓舞人心的歌声,很快传遍了陇东分区、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激励着广大军民开荒生产,练兵支前,保卫边区,为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犯,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艰苦奋斗。人民艺术家的心血与陇东民间艺术的丰富营养及军民大生产的汗水,融汇浇筑了中国革命文艺宝库中一枚不朽的珍品,它是陇东黄土地上生长的一枝绚丽的奇葩!

1946年3月11日,当人们仍高唱着《边区十唱》去艰苦创业的时候,延安城内外却传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噩耗:张寒晖因患重感冒转成肺水肿,心脏衰竭,抢救无效,不幸长辞了他毕生从事的革命文艺事业,时年仅44岁。他病逝后,安葬于延安的边区文协山头上,以表达人们对这位人民艺术家的敬仰心情。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柯仲平在悼念张寒晖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你的作品和你的为人作风一样,是非常踏实、结实、深刻、非常群众化的。”一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匆匆离去了,他离去得太早太匆忙了。然而,他奉献给人民大众的艺术财富,依然放射着璀璨的光华。全国解放后,《边区十唱》又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熔铸提炼,唱词精练到五段,并定名为《军民大生产》。数十年来,这首优秀的陇东民歌,在华夏大地广泛传唱,妇孺皆知。它还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以及广播、电视等领域广为传播,成为激励人民前进的一首战歌。

第十三章

陇东人民踊跃参加解放战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虚假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准备。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短短4年时间里演出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国际风云、政治智慧、时事洞察、军事谋略、军队意志、作战才能、人心向背等，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丰饶内容。这是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关键，也是共和国诞生的一部壮丽史诗。

在陇东老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万众欢腾。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的乌云阴霾，很快便向陇东解放区滚滚涌来，形势异常险恶。1947年春，胡宗南、马步芳等部20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陇东解放区首当其冲。在解放战争艰苦岁月里，陇东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努力支援前线，竭尽人力物力，不惜流血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1949年7月下旬，陇东老解放区军民终于迎来了庆阳地区全境解放。

一、陇东人民准备自卫战争^①

一面空喊和平，一面加紧部署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在陇东老解放区，不断派出武装部队侵入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就在重庆谈判《会议纪要》、《停战协定》签订后，1945年12月26日，驻固原国民党军队400多人，进攻镇原县三岔区，占领老爷山，打伤陇东分区独立营战士和当地群众多人。在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县边界地区，国民党多次派兵向解放区抓丁要钱，宰杀群众猪羊；派遣特务便衣到解放区内搜集情报，捉拿干部群众，进行破坏活动；派工作人员到解放区强行编制保甲、强令解散人民选举产生的区乡政府；在边界地区增调军队，大修碉堡、工事，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

面对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内战的形势，1945年12月，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党的“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切实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工作。28日，陇东地委发出了《对目前形势和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同志提高革命警惕，以有备无患的精神，进入全面战备状态，不断扩大地方武装，切实执行练兵计划。1946年春，分区所辖正规部队和各县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普遍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从分区到各县、乡，逐级举办战术、战勤培训班，仅曲子、环县、庆阳、华池、镇原5县，就有2万多名游击队员、基干民兵和自卫军战士参加了整顿和训练。他们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政治方面，着重进行形势时事教育，增强士兵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和信心；军事方面，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着重练习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民兵着重练习造雷、埋雷、爆破技术及战勤服务。全区有800多人学会了爆破技术，华池县有70%的民兵、自卫队员学会了造地雷。各县都发动群众铸铁、熬硝，准备造地雷原料，仅曲子、华池、环县、庆阳、镇原5县熬硝1.5万斤。1946年10月至11月，陇东分区的练兵备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两个月扩大民兵700人，县、区、乡分层次进行训练；二是各县分别举行了7至10天的爆破训练班，参加者全都

^① 本节取材于《陇东革命斗争史（修订本）》有关章节。马西林、王钊林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掌握了制造炸药、制作地雷的技术；三是准备普通担架 1450 多副，配备抬担架人员近 9000 人；准备机动担架 126 副，配备人员 810 多名；组织运输队 192 个，配备人员 2600 多人，大牲畜 9700 头；四是建立通讯联络站 137 处，配备人员 900 名；建立哨站 108 处，配备人员 121 名；五是庆阳、合水、镇原 3 县组建游击队 8 个中队，277 人，配发轻机枪 3 挺、步枪 143 支，手榴弹 190 枚。到 1947 年，陇东根据地 8 县共有 8 个游击大队，41 个游击中队，3900 多人，还有民兵、自卫军队员 5520 人。通过练兵扩军，大大提高了陇东根据地部队和民兵的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

1945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区，在 1945 冬和 1946 年春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文件指出：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要求共产党员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在《1946 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减租和生产的意义，并指出在老解放区应进行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延安《解放日报》先后以《减租和生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为题发表社论，论述减租与生产的意义、步骤和方法，要求贯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

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和边府“放手发展生产，同时厉行节约，积极备荒，健全财经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的号召，陇东分区把清算减租和大生产运动，作为做好自卫战争准备工作的两项重要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人民大众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调动广大农民保卫边区的革命热情，陇东分区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以庆阳、合水、镇原 3 个新解放县为重点，深入开展了清查减租运动。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清算了地主任意倒佃、撤佃、假典，改定租为活租，变相抬高租额、明减暗不减等非法行为。在农民群众坚决斗争下，地主纷纷向佃农认罪，退出了 1940 年以来多占的地租，有的退还粮食，有的用土地和牲畜折算顶替。清算减租和查租查息运动，打击了不法地主，保护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激了解放区军民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革命热情。1945 年至 1946 年底，全区有 3100 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人民军队和游击队，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的动人

情景。

在清算减租的同时，陇东根据地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农村普遍组织起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抢耕抢种，纺纱织布。新宁县人民坚持劳武结合，创造了新的经验。他们在担架队集中起来尚未使用的情况下，变担架队为扎工队大搞生产；民兵集中起来没有战斗任务时即变工生产，或帮助群众生产。这个县的木莲洼村在1946年秋收时，村长组织全村人变工，两头毛驴供全村驮水磨面，两个老汉放牧全村牛羊并给牲口割草，7个劳动力种了全村250亩小麦，并由13个妇女收了全村30亩豆子，还做了许多干粮，村上派出担架、民兵、毛驴支援前线。这种把生产和支前结合起来的办法，受到边区政府的表扬，认为“这种好的范例值得各地参考采用”。在内战的炮声中，陇东分区粮食获得丰收。农民还组织起合作运输队，驮盐贩布，大大活跃了解放区的经济。各机关、部队也利用荒地种粮、种棉、种菜，开办商店和工厂，增加收入，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从而，为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做了一定的物质准备。

二、陇东根据地的“迎王运动”

1946年9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记载：“庆阳南门的牌楼上，高悬着毛主席的肖像。牌楼下，围着一群拿着慰劳品的妇女。妇女代表范娘娘捧着一朵鲜花献给王将军。二十多个妇女将点心、葡萄等礼物投向王将军的怀里。商店的老掌柜也都在门前安下酒桌，站在旁边等候敬酒。兴隆商店的老掌柜龙资阁先生，举起酒杯说：‘王将军，为了国家人民，你们受尽了千辛万苦，请干一杯！’王将军接过酒杯，连连向他称谢。一个来自乡下的农民，不知王将军是哪一位，急得跳起来。一个商人拉着他指点说：‘看！就是胸前戴着鲜花、长着胡子的那个高个子。’这个农民才满足地笑了。”这是陇东人民欢迎三五九旅和王震的一个动人场面。

1946年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把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作为起点。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的指挥下，突破国民党20余万大军的“围剿”，采取了分路突围的办法，主动进行战略转移，使敌人围歼和追剿的阴谋落空。司令员李先

念、政委郑位三率第十三旅和十五旅一部，于7月28日到达陕西南部，同当地游击队会合，创建鄂豫陕区游击根据地。副司令员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第二、第三旅和第十五旅两个团，于7月26日进入武当山区，开辟鄂西北游击根据地。担任掩护主力突围的第一纵队第一旅，为了吸引敌人，向东突围后，经过长途行军，于7月20日到达苏皖解放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和干部旅，战胜敌人的追堵夹击，一路苦战，分两路向陕甘宁边区转移。

为了粉碎敌人追歼三五九旅的企图，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迎王战役”。这次战役以新编第四旅为左翼，从长武、彬县一线出击；以警备第三旅为右翼，向合水、镇原、泾川方向出击；以警备第一旅组成若干游击队，活动于旬邑、新正地区，迷惑和牵制敌人。各路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给追堵三五九旅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为掩护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打通了道路。

陇东分区对三五九旅将要经过的镇原、庆阳、合水3县的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做好了迎接王震将军的充分准备。分区还成立了慰劳委员会，专门负责这项工作。迎接王震的具体工作，除了准备大量劳军物品、救护伤病员、组织担架、盘查放哨以外，还要配合解放军打击敌特，扫除障碍。

在镇原由县游击队配合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所率领的五、七团两个营经两昼夜激战，于8月27日攻克太平镇，并俘获敌副营长。接着七团部队又在狼口峁岷伏击了前来增援的国民党政府军新一旅一团的一个连及两个保安队。29日，警三旅占领屯字镇，俘虏镇队副段会迪等敌12人。在攻打太平镇的同时，县游击队又配合警三旅二团两个营围攻黑渠口国民党守军，占领了镇公所，俘虏镇长田养性等敌11人，并且进攻开边的羊千原深岷、大户原等处，使敌撤回县城，解除了这一路的威胁。

在新宁县，驻新宁县境内的解放军新四旅指挥员张贤约、程悦长和关中地委宣传部长王秉祥、新宁县县长王立成等，立即召开会议，制定接应三五九旅的作战方案，部署了支前工作。随即，新四旅在金村一带集结待命，新宁县军民全力做好迎接王震将军的准备工作。

其时，胡宗南率四十八旅，在良平到山河的60华里一线，设立了良平镇、平子镇、米桥镇、山河镇4个军事据点。他们还征调民工，在这一线挖掘宽3丈、深2丈的塹壕，沿线碉堡、哨卡与各据点相互联系，严密

封锁解放区。

8月26日,在三五九旅接近陇东边境的时候,新四旅以一个主力团和新宁县游击队,直越边界,主动出击,打破胡军封锁线,迎接三五九旅。他们首先击溃良平附近上苏家、王家嘴的胡宗南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三营七连,摧毁尚家洼、陈家庄敌据点,占领米桥附近的武家后庄、吉洼、东龙头和平子附近马路牌、王家沟等处,毙伤俘敌百余人,端掉了平子镇北刘家壑口等沿途的敌碉堡。29日,进攻平子镇,胡军凭借坚固高城掩蔽,又利用城墙角楼为机枪阵地。经两昼夜激战,新四旅主力团以炮火摧毁了胡军角楼机枪阵地,击毙、生俘胡部一四二团600余人,缴获大批军械弹药。

在平子战斗中,新宁人民奋勇支前,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县委书记李科为主力部队作向导,兼支前总指挥。县长王立成负责组织物资供应和伤员收容救护等工作。军队出发之前,张贤约要求王立成一夜制备200副木棺,王立成组织群众按时完成。200名决死队战士争着在木棺上号了自己的名字,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

在九岘、金村、傅家、高埠、苏城等地,新宁县人民奋勇支前,集中40万斤粮食和大批熟食。仅九岘粮站蒸的蒸馍就放满了4个窑洞,烙馍垒满高台戏楼。31日,驿马关区动员300多民兵,到李家寺一带平毁了国民党政府军封锁线的一部分碉堡。

8月29日,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旅部和所属七一八、七一九团战胜敌人的追堵夹击,胜利到达镇原屯字镇,与前去迎接的警三旅及前期到达镇原的陇东迎接王震将军工作团会师。著名记者李千峰在1946年9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上记载了这样一个动人的会师场面:

大群欢迎者分立在道路两旁蜿蜒数里,千万双眼睛,望着王将军。成千成万的欢迎者默默作愤语说:“蒋介石再来进攻边区,我非和他拼命不可,一定要为中原弟兄报仇!”人们含着激动的热泪,每个人心胸中燃烧着反对蒋介石专制的怒火。成担的西瓜,成群的猪羊,送向中原弟兄的宿营地。守卫边区部队的战士们,向他们扯送着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衣裳。王震将军在黄罗斌将军专设的宴席上,举杯庆祝胜利。韩东山司令笑语王将军说:“蒋介石悬赏三百万法币捉你,现在你可以给他打个电报,就说王震在这里。”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也成群结队地提着酒壶和纸烟来慰劳。有一位诚朴的老汉以颤动的声音对王将军

说：“为了咱全国的老百姓，你们受尽了千辛万苦。我们国民党地区的百姓，天天过着牛马生活，心里天天想着你们。王司令！干我们老百姓这一杯！”王将军举杯而尽，感激地说：“我们托毛主席的福，祝各位人旺财旺，谢谢各位的好意。”

随后，三五九旅将士由太平、孟坝、驿马关、白马铺、庆阳、连家砭、太白，到达富县、甘泉一带。三五九旅另一部分8月29日到达宫河，30日，在正宁纪纲突破敌阻击，与新四旅会合后北上延安。三五九旅将士自中原突围到与迎接部队会师，历时63天，日夜兼程5000多里，同敌人浴血奋战90多次，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们来到陇东时，已经非常疲惫。陇东军民像亲人一样接待慰问了三五九旅。到达镇原太平镇时，太平城南北两门大开，街道两旁贴满了欢迎人民子弟兵的标语。整个太平城内欢声雷动，鼓乐喧天。镇原县委书记刘文山和县政府保安科长率工作团到太平迎接。太平镇有位前清秀才赋诗曰：

蒋介石成汉奸，
想把中华都卖完。
开门迎贼陪笑脸，
勾结美国打内战。
贪官污吏到处满，
刮杀人民受熬煎。
百姓要想把身翻，
赶快起来把蒋反。

庆阳县党政军民冒着大雨，手捧慰问品，在离城五里外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候亲人到来。乡亲们还用自己编唱的歌谣迎接三五九旅。歌谣唱道：

怪不得喜鹊乱飞翔，
环江东河闹嚷嚷，
原来是王震部队回家乡。
炒鸡蛋黄又黄，
摊煎饼香又香，
慰问咱们的子弟兵，
人民江山万年长。

王震部队所到之处,群众主动组织起来为他们站岗放哨,搬运粮食和武器,护理伤病员。在这次迎接三五九旅的活动中,陇东分区各县为慰问部队筹集面粉 17 万多斤、蒸馍 1.1 万斤、小米 4000 多石。还有猪、羊、鸡、鸡蛋、饲料、饲草等。为部队做军衣 1700 多套、军被 900 多床、军鞋近万双。一共用去招待及支援经费 89 万多元。先后组织担架 300 多副,动员民工 13000 多名。还有大量瓜果、白布、纸烟、肥皂等物。陇东人民迎接王震将军和三五九旅的活动,充分表达了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体现了军民坚如磐石般的团结,也预示着胜利的明天。

三、西华池战役重创胡宗南

1947 年 2 月 28 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整编第四十八、第二十四、第一四四旅与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在国民党军马步芳部整编八十二师的配合下,向陇东根据地进犯,企图把陕甘宁野战军引向西面,然后大举进攻延安。

(一)

事实上,在这之前,为了控制延安侧翼,将解放军主力部队吸引在陇东,以便闪电式袭击延安,1946 年 10 月,胡宗南部一六五师就开始向关中分区大举进犯。11 月底,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指挥二十四旅、一二三旅,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指挥十二旅、四十八旅占领了新正县的三嘉、湫头、马栏及新宁县管辖的月明、西坡等地。青海马步芳部也南下进犯。至 1947 年 2 月 5 日,新正县全境被占,关中分区和新正县党政机关转移到新宁县麻子掌一带。2 月 28 日,国民党又调集四十八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及新编第一旅、骑兵第一旅和青海马步芳的八十二师,由廖昂指挥向陇东分区进犯。陇东分区党政机关和驻庆阳的甘工委机关撤离到华池悦乐、山庄一带,后移至元城。2 月 28 日敌占领镇原,镇原县党政机关撤至大小方山和曲子县合道一带。3 月 1 日,国民党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占领庆阳。5 月 2 日,四十八旅占领合水。边区政府为加强迁至后方党政机关的统一领导,成立后方办事处,马锡五任主任,地点在安塞真武洞李家渠。4 月 8 日,青海马步芳部八十二师一〇〇旅

谭呈祥部又占庆阳城。11日,宁夏马鸿逵部八十一师马惇靖部占领环县。15日,马步芳部占领曲子,并与胡宗南部队配合,于5月2日占领华池的悦乐、元城、将台。马继援亦率八十二师一部进驻宁县。至此,陇东分区大部分地方沦入敌人手中。

在胡马匪军占领区内,大肆捕杀无辜群众和革命干部,破坏基层革命政权,抢夺粮食,抓丁派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恢复反动的保甲制度,对人民群众实行最残酷的统治。新正县一、三区被占后,胡宗南匪军对没有转移的群众肆意蹂躏、杀害,很多妇女遭轮奸。上墙村40多家麦草垛被烧毁,一区四乡70多头牲畜被赶走。在宁县境内,胡匪军纵马到老百姓家中,砸锅摔盆,家家被洗劫一空,又放火烧了刚收割上场的小麦和没有收割的小麦。盘克原数十里农村大火几日不灭。在九岷麻子掌杀死农民耕牛10多头。国民党军所到之处,田间未成熟的玉米尽以喂马,吃不完即纵马踏平,直至苗毁方休,人称胡匪军为“一扫光”。马继援部在新宁县的木瓜原杀死新四旅生产科长苟麻子,将两个解放军伤员打死在土炕上,又追杀6个武工队员于岳木川。在康家原打死县委统战部长张树成,于绣花楼打死县干部赵立贤、付德显。宽鼻梁村群众李自有惨遭杀后,头被挂在吕家岷子柳树上。他们还把金村店3位民兵捆在树上用刀活活剐死。群众气愤地说:“马家军残忍,杀人不眨眼。”国民党军占领悦乐、元城、将台后,烧杀抢掠一月之久,共抢去群众法币94万多元、银元1509块、粮食1701石,烧毁饲草9.3万公斤,破坏农具371件,枪杀大牲畜283头,使3300多户农民遭到祸害。国民党占领区的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乘机组织“还乡团”,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坚定分子和投机分子也乘机叛变。敌特分子四处活动,造谣煽动,离间策反。陇东解放区的大部分区乡政权遭到破坏,全区近百名干部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陇东根据地。

(二)

在蒋介石的匪军占领陇东烧杀抢掠的日子里,具有革命斗争传统的陇东根据地军民并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他们怀着极大的义愤,采取游击战术,奋起自卫还击,恨恨痛击来犯之敌,使胡马匪军和国民党政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7年2月,陇东分区专署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副专员李培福在报告中指出:1947年是一个战争年,总的工作方针是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接着分区于2月26日发布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蒋军进犯、保卫边区、保卫陇东、解放西北而战斗。全区军民热烈响应政府号召,8县境内都掀起了打击入侵之敌的斗争风暴。新宁县游击队和民兵配合解放军警三旅五团在午亭子与国民党中央军新一旅二团二营激战,毙敌90余人,俘敌中校副团长刘廷俊及其部下220人。在这次战斗中,高学文带四区民兵,一次活捉敌1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3支、电话机一部。王春玉和米治堂领导生产科人员在敌后一仓库抢救粮食过千石。安子头民兵七八人,活捉胡宗南部逃敌27人,得机枪3挺、步枪10多支,装备自己建起了十三支队。民兵在敌人通过的道路上埋设自制地雷,炸得国民党兵人仰马翻。3月13日,合水县游击队和宁县工委武工队在郭家胡同全歼国民党新一旅一个营。这个县的石秀山领导五区游击队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袭扰敌人,捕捉保甲长和坏人,由于纪律严整,英勇善战,使敌人不敢轻易入侵五区,石秀山也荣获陕甘宁边区政府“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镇原县长王子厚亲自率领游击队到孟坝附近,活捉国民党保长和便衣特务3名,割断电话线几十里,并把电线杆锯为几段。马渠武工队在敌占区黑渠口烧毁营房7座、炸毁碉堡6处。庆阳县赤城区委书记王有甲带领几十名游击队员在白马铺打退一营国民党军,并动员群众转移公粮近千石。3月中旬,县武工队深入敌占区高家寺,烧毁电线杆220根。新正县游击队于4月21日袭击一区石嘴子国民党镇公所,消灭国民党镇长等40余人,吓得汤头国民党镇长连夜逃窜。这个县四、六两区人民亦奋起抗粮抗税抗征兵,捣毁敌镇公所,赶走国民党政府人员。5月18日,陇东分区独立一团和回民骑兵团在华池县红土腰岷伏击国民党中央军骑二旅四团二连,俘敌32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0支、战马32匹。华池县民兵李得海发现为国民党搜罗情报的特务阎怀,追到悦乐镇上用斧子砍死。几个群众发现国民党特务朱孝侦察温台区政府驻地,立即报告政府将其活捉。

在同敌人的斗争中,陇东老解放人民宁死不屈,用生命保护边区政府,保护干部。国民党新一旅二团进驻新宁县午亭子途中,一位姓张的长工被敌人捉住问午亭子在哪里,他说不知道。国民党副团长伏适耕

威胁说：“你敢说三个不知道，我就活埋你！”张毫无惧色，连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结果遭敌活埋。在午亭子附近，因不肯吐露机密而被活埋的群众仅挖出尸骨的就有11人。曲子天池区五乡60多岁的高老汉，把镇原县长王子厚藏在家中，由于坏人告密被国民党军抓去吊打3次，都没有说出实情。一姓王的农民在家里藏匿镇原五区一位干部，被国民党军抓去捆绑3绳，也没有说实情。合道区三乡农民王义，敌人带他去捉乡长，到乡长家门口他借口喝水，进去给乡长使了眼色，乡长得以逃脱。敌人知道后，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事后他说：“我没有黑良心！”这就是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他们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对党、对政府、对军队、对干部的深厚感情，成为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三)

胡宗南部第四十八旅进入陇东以后，骄横不可一世，其防线从正宁山河镇直到西峰，长达几百华里，意欲长期封锁陕甘宁边区。

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集团兵进陇东，是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因而决心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为主力在陇东歼敌。毛泽东特别指示，集中全力歼灭敌一个旅。这样，不仅可以推迟和打乱敌进攻延安的计划，而且可以相机出击关中，威胁进攻延安国民党军之侧背，歼灭其有生力量，打乱其部署。

1947年3月，新任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政委的习仲勋，在彬县大佛寺召开关中分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对关中分区游击战争以及配合主力作战作了讨论和布置。军事由警一旅旅长兼政委高锦纯统一领导，其一、三团休整后配合野战部队在关中周围作战。其他地方武装，包括游击队、武工队坚持在关中斗争，伺机向外发展。会后，习仲勋随陕甘宁边区野战军司令部到达关中分区以北的新宁县盘克原武洛村。1947年3月5日，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在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的领导下，组织了西华池战役。

西华池距敌我双方的碉堡封锁线南义镇60华里，镇内城廓系唐天宝年间所筑，墙高壁坚，十分险要。南北走向的街道长达3华里，居民商号1000多户。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通陕西关中，为陕甘两省货物集散重地，商业比较繁荣，物资丰富。从地形来看，西华池和陇东其他

地区一样,具有高原沟壑地区的特点,镇东西两侧都是南北走向的大沟,在军事上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准备与敌人较量的陕甘宁边区野战军团的三五八旅、新四旅和警三旅、教导二旅先于新宁县的盘克、金村、湘乐一带集结,新宁县人民全力以赴支前。3月4日,国民党第十七师四十八旅旅长何奇率部从合水老城来到西华池。配合作战的有盘踞在西北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马鸿逵部。国民党整编四十八旅共有1万余人,武器装备精良。旅长何奇,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骄横狠毒,诡诈刁顽,是一个铁杆反共分子。

解放军侦悉第四十八旅南撤至西华池的情报后,中央军委于3月2日电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集中全力歼灭其一部,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守备之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遂以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和新编第四旅进攻西华池。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除以一个团对板桥之敌防御外,其他部队随第三五八旅机动;警备第三旅第五团向赤城方向警戒。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令第一四二团为前卫,先到西华池宿营了解情况。3月3日下午,第一四二团到达西华池。何奇这次取道西华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搜掠粮食。因此,大部队到达西华池后,部队只顾寻找仓库,掳掠粮食、盐及其他物资,谁也没把派遣警戒当回事。当天黄昏时候,四十八旅属战车防御炮连排长唐清永带士兵数人到镇东沟边场上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路上行人来往不断,他立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阎进杰得到这一报告后,亲自带了几个人到沟边仔细察看,并立即电话向旅长何奇作了汇报。旅长何奇也来到沟边察看,他对阎进杰说:“你们在这里设一个排哨,把住这条路口。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接着,又靠近阎进杰低声说:“刚才西安绥署来电报,据飞机侦察得知,我旅由合水出发后,有大批解放军在我旅东侧10里左右跟进,你对沟东边来人要特别注意检查。但这一情况一定要保密,不要扰乱军心。”

晚上9时许,排哨所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当发觉时,已接近距哨兵约20多米,哨兵当即开枪射击,这四个人投掷了二枚手榴弹,即下沟走了。何奇听到枪声,派副官处长张奎武来询问情况。张奎武叫阎进杰和他的战车防御炮连人员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但何奇总认为这是局部的扰乱性质的活动,因而对其他部队没有进行相应的布置。3月5日晨,排哨突然遭到解放军密集队形的攻击,同时,战车防

御炮连的后院也遭到解放军炮火轰击。激战3小时,战车防御炮连伤亡大半,排哨伤亡殆尽。阎进杰即向何奇请求增援。但第一四三团在大街北段奉何奇命令坚守阵地,第一四二团被包围在距西华池约八里的村庄,两部都不可能派部队来援。解放军夺取排哨后,于天明时打垮辎重营,主力全部突入西华池,大街中部北段街道全被解放军占领。这时四十八旅旅部和第一四二团、一四三团的电话线已中断,完全失去联络,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战至上午10时,四十八旅旅直属部队已伤亡过半。炮火稍息时,何奇派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支援战车防御炮连,并令炮连转移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骑兵排驻地堡子门坚守;令辎重营和第一四三团放弃街东地区,撤到街西地区固守待援。

当战车防御连向堡子门转移时,骑兵排已全部垮下来了,四十八旅旅部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大约11时,解放军发起了第二次攻势,堡子门守兵几乎全部被打死。何奇手头控制不了部队,一时像热锅上的蚂蚁,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想等来第一四二团;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第一四三团和辎重营等方面的情况。正当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了他,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四十八旅在西华池被围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看完电报,长出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便一命呜呼了。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要求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同时致电西安绥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围。”当天下午,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5日中午,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四十八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解放军阵地。下午1时许,第一四二团由南边冲入西华池,第一、二营当时接替了战车防御炮连的阵地,第三营企图击退攻入大街中段和北段的解放军,以便与第一四三团会合。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几个阵地,但第一四二团伤亡惨重。

薄暮以后,胡宗南的援军还没有到来,四十八旅几位团长向万又麟建议,夜战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我们最好乘夜突围,保存实力。但万又麟认为,西安绥署命令是死守待援,万一突围失败,没法向胡宗南交代。因此,命令各部队务必坚守阵地,等援解围。夜幕降临后,解放军

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发起全线总攻，第一四二团阵地上的守军抵抗不住，很快垮了下来，向南逃跑。由于天黑，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怕擅自撤离阵地要杀头，又命令各营率领部队恢复原阵地继续抵抗。第一四三团正面阵地很快被突破，团长杨荫寰急电向陈定行求援，但陈定行已自身难保，无力去救援。解放军愈迫愈近，万又麟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配属的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的解放军占领区，从北向南进行猛射。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一时火光四起，满天通红，人喊马嘶，致使当地220多名无辜商民、民夫、伤员包括一些国民党军官惨死，烧毁民房590余间。解放军见敌人野蛮地炮击，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侦察不周，未能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暂时撤出村外，加上国民党第二十四旅正赶来增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命令攻击部队撤出战斗。

西华池战役，给进犯的胡宗南整编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少将旅长何奇被击毙，共歼敌1500余人，俘敌营长以下100余人，使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计划再次推迟。

西华池战役也是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战斗结束后，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奉命星夜兼程，赶到大、小劳山及其以东地区，构筑第三线防御地带的工事，配合教导旅和警旅第七团，准备为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再给国民党胡宗南进犯部队以迎头痛击。

四、陇东战役痛击胡马匪帮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兵分两路进犯延安。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并于13日到18日，在延安东南的临镇、金盆湾、牛武、茶坊一线展开了著名的延安保卫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共歼敌5000余人。18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19日，人民解放军撤离，胡宗南部即于当日占领延安。

中共中央虽然撤离延安，但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留在陕北，领导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西野撤出延安后，转入敌后，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延安周围的山区周旋，拖得敌人人困马乏，尔后集中兵力

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猛烈打击敌人，三战三捷，毙伤俘敌人46万，奠定了粉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基础。

(一)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后，下一步作战行动如何进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身为野战兵团指挥员的彭德怀、习仲勋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认真分析西北战场局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这时，国民党西北行辕之马步芳（陇东兵团）、马鸿逵（宁夏兵团）、马鸿宾（海固兵团）趁火打劫，先后占领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将台等城镇和三边分区的安边、宁条梁等地。陇东、三边形势趋紧。而胡宗南集团主力集结休整，不易寻找歼灭战机，加之野战兵团在延安东北作战已经出现粮食供应困难，与其坐等战机，不如主动出击青、宁二马。遂决定野战兵团主力在安塞地区休整后，西出陇东，歼击马步芳、马鸿逵有生力量。收复陇东地区后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主力，相机歼灭。

1947年5月下旬，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向陇东挺进，发动了陇东战役。在彭德怀、习仲勋亲自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离开安塞后向西隐蔽前进。部队分左、右、右中、左中四路。第一纵队为右纵队，以消灭曲子、元城敌人作为目标，并向庆阳以北推进；第二纵队为左纵队，包括教导旅，消灭合水之敌，并准备歼击由西华池、盘克、宁县方向增援之敌；新四旅为右中纵队，以消灭悦乐、阜城并攻击庆阳之敌；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兵团指挥机关和直属队为左中纵队，实施靠前指挥。

5月26日，彭德怀、习仲勋在行军途中又接到毛泽东电报，对陇东战役进行了具体指示。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兵团昼夜兼程，翻越荆棘丛生、梢林密布的子午岭山区，进入陇东地区的华池县境内。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曾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习仲勋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他详细地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彭德怀司令员，以帮助他决策。

西野总部进抵陇东后，很快侦察国民党军在陇东分布情况，并对野战兵团作战做出部署。5月29日、30日，陇东战役首先在将台、悦乐、合水打响。四路纵队按照预定方案和部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发起攻击。

在将台战斗中,国民党第六十旅一七九团是马惇靖八十一师的主力,马殿邦任团长,装备精良,战斗力强,驻守于将台及附近菩萨山、王家原地区。解放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和教导旅于5月30日零时向敌人展开攻击。由教导旅担任主攻,激战至3时许,一七九团放弃阵地西逃。解放军跟踪猛追,歼其大部。2时30分向王家原守敌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全部阵地,歼敌一部,残敌溃逃。解放军七一五团第二营位于南沟门,其任务是截断敌军退路和打击可能增援之敌。第一营于1时开始攻击,2时攻占1340高地,全歼守敌。独立第一旅第七一四团对菩萨山之敌展开进攻,以一部从东面佯攻,主力从侧后攻击。4时攻占大部阵地,歼敌大部,残敌窜至郭沟门西山最后一个碉堡顽抗。经过激烈战斗,拂晓时,终于全歼这股顽敌,上校团长马殿邦被俘。

在悦乐战斗中,解放军中路新编第四旅于5月28日进驻中庄原、杜家河一线隐蔽集结,作进攻悦乐守敌胡宗南骑兵团第二旅第三团战斗准备。29日,第七七一团进至悦乐南,阻击合水方向可能增援之敌。22时,第十六团由柳树岭出发,第一营绕路进至悦乐西南准备由中庄、郭家沟向李永湾进攻;第二营准备由西沟、寇家沟门向李家湾、悦乐村进攻;第三营准备由东南向西北助攻,并堵击可能逃跑之敌。30日凌晨2时,第一、二营发起进攻,激战至9时,除南沟门主阵地未攻克外,其他阵地全部占领。9时许,一、二营开始总攻南沟门阵地,10时全歼守敌骑二旅三团500多人,俘敌骑二旅少将副旅长陈应权,骑二旅三团少校团长汪韬,缴获战马394匹。解放军伤亡副团长1人,战士40多人。

在合水战斗中,合水守敌为骑兵团第八旅一部及甘肃保安第二团,分驻合水老城及其附近地区。骑八旅是马继援的精锐部队,由其堂叔马步銮任旅长,颇具战斗力,进攻陇东解放区时常打先锋,捕杀、镇压革命人民十分疯狂、凶残。王震率领西野左路之第二纵队和三五九旅及独立第四旅一个团,于5月28日进至合水以东地区,并于次日拂晓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以独立第四旅主力待机于合水西、南地区,准备打击增援之敌。7时,解放军向合水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烈战斗,占领了老城外围之二郎山、南寺原及东关等要点,并爆破了第一道障碍,但城垣未被突破,守敌依托城北制高点葫芦巴及城垣顽抗。合水之敌被围,马继援急令骑八旅旅长马步銮率领旅直及骑兵团第一团

1000余人驰援合水守军,进至合水南十里铺之华庆寺、白马沟地区,受到第四旅阻击,经激烈战斗,骑八旅被歼200余人,1个连覆没,余部被击溃。解放军俘获战马400余匹。30日,攻城部队又激战一昼夜,仍未破城。31日,解放军一度攻入城内,但又被敌军逐出。其时,马继援又派八十二师师长马全义为总指挥,率一百旅及骑八旅第二团,分南北两路援救合水守敌。骑八旅第二团约1300余骑,迂回至葫芦巴原与攻城部队激战,并与城内守军取得联系,使守敌坚守城垣的信心倍增;敌第一百旅亦迫进合水。由于作战良机已失,王震当机立断,将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将台、悦乐、合水战斗,共歼敌3200余人,缴获战马400余匹。战斗中,陇东独立团和华池、合水游击大队紧密配合,人民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援。华池县全县总动员,给部队带路、抬担架、救伤员、运输弹药、供应给养,并帮助部队侦察敌情,追杀逃敌。

(二)

将台、悦乐、合水战斗结束后,彭德怀、习仲勋从面临的敌情和扩大战果考虑,6月2日,决定避开国民党的阻截部队,调集主力向环县进攻,围城打援,歼灭马惇靖第八十一师。作战部署是:第一纵队新编第四旅围攻环县城;第二纵队于环县城东南及西北协助攻城,并准备打援;教导旅集结于环县城以西打援;陇东分区独立团向三岔、驿马方向展开游击,牵制敌人;军分区骑兵团担任洪德方向警戒。4日,西野部队到达曲子,国民党八十二师余部已逃,西野遂收复了曲子。在此之前,陇东分区副专员谢怀德主持在曲子土桥区召开庆阳、曲子、镇原等县负责人会议,遭国民党4个团的包围。经过战斗,多数人突围,镇原县委副书记孙久德等五六十人被俘,押在曲子。曲子收复后,被押人员解救归来。

6月9日,西野各部由曲子地区出动,6月13日先后抵达环县城附近地区。14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在环县西北击毁国民党向环县赶运物资的汽车10辆。15日,第一纵队新编第四旅及教导旅同时对环县城西北20里铺沟口、河连湾一带之敌第三十五旅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国民党军撤回环县城及其附近主阵地,企图依托县城及附近玉皇山、王家原固守。

15日23时,西野各部队对环县城发起总攻。16日1时,三五八旅第八团和七一六团占领敌王家原前沿阵地,并连续向纵深冲击,遇敌顽强反抗,伤亡过重,没有攻破敌人主要阵地。该旅七一六团占领前沿阵地后,继续向纵深推进,亦遭受守敌火力阻击,数次冲击均未成功。鉴于攻城受阻,三五八旅遂令部队暂停攻击,加紧土工作业,掘壕迫进敌军,然后组织火力,再次冲击。

新四旅七七一团于16日3时30分向玉皇山、玉皇庙守敌攻击,连克敌军两个碉堡后,与敌形成对峙。独一旅七一四团攻击敌环县城北关据点,攻击开始后,因地形不利,为敌军火力所阻。第二团以第三营对东山攻击也未能奏效,即撤至沈家沟门北山构筑工事,巩固阵地。

天亮后,王家原、玉皇山守敌实行反冲击,均被解放军击退;11时,解放军各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强攻敌军阵地,激战至13时,敌全线动摇,解放军先攻占了敌防守的核心阵地王家原和玉皇山,把敌军压向环县城内。接着又迅速攻进环县城,守敌从城东突围,向北逃窜。收复环县县城后西野第二纵队百里穷追,给马匪以歼灭性打击,前后歼敌1177人,俘敌3000余人,击毁敌汽车10辆,缴获各类枪支797支,大炮19门,骡马447匹,并缴获弹药、汽车以及大量物资。6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自环县挥师向北,收复三岔镇和甜水堡后,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挺进。30日,野战兵团主力接近定边城郊。到7月8日,歼灭宁马整编八十一师一部,余部不战而逃。西北野战军迅速收复了定边、安边、靖边和盐池等地。

西北野战兵团从5月21日至7月8日,在陇东与“三边”的南北长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地域内,沉重痛击了“青马”和“宁马”两集团,共歼敌4380余人,缴获骡马近1000匹,还有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有效地补充了部队。同时,使胡宗南集团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至此陇东战役胜利结束。

(三)

环县县城收复后在城内西野指挥部里,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与在将台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军新编八十一师一七九团上校团长马殿邦有过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这是因为马殿邦是马鸿宾的侄女婿,优待这个俘虏对做好马鸿宾的统战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彭德怀、习仲勋仔细

听了马殿邦关于国民党第八战区兵力部署及装备情况后,彭德怀先说:“马鸿宾是个好人,我们长征到同心县时,当地老百姓就说他是个好人。”他接着说:“我们准备马上释放此役所俘贵方军官。但有一封信要请你带给马鸿宾先生,等到解放兰州后你们可以起义。另外,你们在中宁县军部还关押着我们18个人,让马鸿宾先生予以放回。”习仲勋特别叮嘱问候马鸿宾,并安排带足路费,派专人和马匹护送马殿邦返回宁夏中卫县驻地。1949年9月,马鸿宾父子率部起义,建国后担任宁夏、甘肃省副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为祖国和平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陇东战役之后,国民党西北行辕撤销了陇东作战指挥所,派马鸿宾为陕甘宁边区剿匪司令,试图挽回残局。此时,陇东根据地的华池、环县、曲子和庆阳、合水、新宁、新正等县的部分地区已经收复。8月20日,沙家店战役大获全胜。24日,人民解放军在关中分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配合下,收复了新宁、新正县全境。各收复地区很快恢复了人民政权,继续进行土地改革,扩建地方武装,掀起了踊跃支前和战勤服务的热潮。陇东地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指示,先后发出了《关于配合主力争取陇东自卫战争胜利的指示》、《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陇东军民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越战越强,牵制了大批敌军,有力地配合了西野主力作战。

五、彭德怀屯字鏖兵三昼夜

在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于1948年4月、5月,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第六纵队在执行这一战役任务中,一部分部队随野战军主力攻克凤翔、宝鸡等城市,一部分部队部署于长武、彬县地区阻击马步芳匪军,以确保野战军主力侧翼安全。在野战军主力完成预定任务向陇东转移时,第六纵队担任前卫任务,为坚决掩护野战主力,在镇原屯字镇地区与优势之敌激战三昼夜,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残酷的战斗。这场战斗,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全纵队指战员在这一战役中英勇作战,许多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丹心碧血永远辉映祖国河山。

(一)

宜瓦大捷后,西北野战军南下黄龙山区,围攻洛川,久攻不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鉴于洛川地险城坚,国民党援军第五兵团行动谨慎,且黄龙山区严重缺粮,继续攻洛川和打援均有困难,遂决定以主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西府地区(西安以西泾河、渭河之间)挺进,攻取胡宗南集团的重要补给基地宝鸡,并调动和寻机歼灭国民党援军。以第三纵队及黄龙分区独立第二十二团继续围攻洛川,并相机歼灭可能由延安、洛川南逃之国民党军。1948年4月17日,中路第一纵队及右路第六纵队攻占旬邑、职田等地。18日强渡泾河占领永寿,切断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左路第二纵队攻克永寿县以东之常宁镇,歼国民党军第二〇三师两个团。19日,各纵队继续西进,至25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岐山等12座城镇,切断西安至宝鸡段铁路,接着夺取宝鸡以东的工业城镇蔡家坡和虢镇及两个火车站。宝鸡已暴露在西北野战军的火力之下。

宝鸡是胡宗南的总兵站,也是西北国民党军最重要的军需补给基地。这里拥有众多的军火物资仓库和军工厂站,又是通往四川和甘肃、青海的咽喉要道,守军为胡宗南部整编第七十六师及若干地方保安团。七十六师是清涧战役被歼后重新组建的,师长徐保,力量较弱。当胡宗南察觉解放军有夺取宝鸡的意图后大为震惊,一面急令整编第十七师等部放弃延安及洛川等地,拱卫西安,一面急令在洛川以南的裴昌会兵团火速驰援宝鸡;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亦以整编第八十二师向长武、亭口地区进攻,以钳制解放军主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一线节节抗击援敌,以迟滞其西进行动。第六纵队教导旅等则在长武、彬县一带顽强阻击“青马”部队。

1948年4月25日夜,西北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向宝鸡发起攻击,经过半日激战,26日攻克宝鸡,歼灭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部及其直属部队与若干地方保安团队。中将师长徐保企图乘坐铁甲车突围,也被解放军击伤俘虏,翌日毙命。另俘获国民党专员、县长以下多人,缴获并抢运出大批军用物资,其数量之多,是西北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但是,由于第四纵队在杏林镇地区阻击不力,加之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和整编第八十二师配合密切,增援迅速,于27日已达崔木镇、凤翔以东地区。

西北野战军为摆脱背水侧敌的不利态势,于28日拂晓前将缴获的大量装备、弹药、物资破坏后,仓促撤出宝鸡,向陇东地区转移。

(二)

胡宗南所属之裴昌会兵团、李振兵团,在宝鸡失守后,疯狂反扑,尾追西野主力北上,与“马家军”会合,企图南北夹击西野主力于宝鸡以北的狭小地带。28日,西野主力在凤翔西南灵山、蔡家坡一带与裴昌会、李振兵团激战后,总部命令六纵队北上进军镇原屯字镇,并以屯字镇为据点,吸引“马家军”,掩护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向东北方向转移,以便集中歼灭“马家军”。因此,坚守屯字镇,在整个战役中就显得十分重要。

当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得悉解放军进攻屯字镇时,认为决战时机已到,立即进行了决战部署。驻防镇原县的一百旅第三团马登霄部,由高参韩有禄率领迅速包围屯字镇;整编八十二师师长马全义率领一百旅(欠第三团)和独立骑兵五团进抵屯字镇,配合一百旅三团,完成对屯字镇解放军包围;青海保安骑兵一团向肖金镇地区进发,策应围攻屯字镇;骑兵第八旅驰赴屯字镇地区,策应马登霄团;师直属特务团、山炮营、辎重连和卫士队,由西峰出发,经肖金镇、马头坡,驰赴屯字镇附近;师直属特务营、保安队、野战医院驻西峰镇地区,由特务营营长马爱德指挥,加强防卫;师直属工兵营、特务团运输连和宁县保安队防守宁县城,由师部高参张彦和工兵营长潭腾蛟负责指挥,并对彬县、长武战役中被俘的700多名解放军严加监管;师司令部随同师直属特务团等部队向屯字镇推进。

5月2日至4日,西北野战军六纵队连克崇信及平凉白水、花所和泾川的王村镇,进占玉都、丰台、合道、平泉等镇。此时,国民党裴昌会兵团和陇东兵团马继援的一百旅也尾追而来,把六纵队拦腰切断。4日上午,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副政委饶正锡,随教导旅旅部及一、二团攻进了屯字镇;纵队部、新四旅和教导旅三团被敌人阻隔在屯字镇外头,敌人占领了屯字镇周围村庄,对屯字镇形成包围之势。

(三)

屯字镇地处陇东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原上,镇内有一土城,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200米,周围有高约20米、厚约1米多的城墙,南面是一条300多米长的深沟绝壁,沟宽约100多米,深近200米;东、西、北3面

除村庄外,地势开阔,原面东西长约30华里,南北宽不足10华里。这里地形虽然便于防守,但也易于被包围。镇内住着几十户人家,有盐店、药铺、车马店等几十家杂货店铺,还有镇公所。镇内没有水源,只在东门外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口水井,供镇上人饮用,但已被敌人火力封锁。国民党镇公所人员都已逃离,大多数群众和商民也被他们裹胁而走。在这块弹丸之地,一下驻进几千军队,显得十分拥挤,而且断了水源,更没有粮食接济,战士们又饥又渴,困难重重。有些战士将干粮袋内仅有的一点面粉,放在老百姓的罐子里,倒进一点醋,做饼子充饥。有些战士在饥渴难忍时,只好杀掉受伤的骡马充饥,饮血解渴。

解放军进入屯字镇以后,和野战军司令部失去联系,纵队领导和旅团干部爬上围墙察看地形。通过监听敌人电话,判断在北面的青马八十二师转回来了。鉴于这种复杂的情况,纵队和教导旅立即部署,让张贤约副司令员突出屯字镇,直接指挥镇子外面的新四旅等部;其余几个纵队领导和教导旅的领导仍留在镇内指挥。把二团伸到北面,一团放在东面,构筑工事,凭借土围墙抗击敌人。



屯字烈士陵园

刚刚部署完毕,驻在镇原县城的国民党一百旅第三团马登霄部已抵达屯字镇,先头部队已在屯字镇西与解放军接触,发生战斗。马继援的高参韩有禄和马登霄根据地形和兵力情况,急忙部署:一营为右翼队,攻击屯字镇南端涧沟沿起至西门;二营为左翼队,攻击西门至北城角;三营和团直属队为预备队,在屯字镇西端凹地集中待命;团部指挥所在预备队附近设立。

国民党第三团一营从中午开始攻击,城内解放军即出城迎战,战斗非常激烈,“马家军”死伤甚多。到下午2时,城内解放军又几次进行猛烈反击。“马家军”参战部队已精疲力尽,只好停止攻击,原地防守。韩有禄和马登霄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慌,立即向马继援告急。正在这时,由国民党副师长马全义率领一百旅和独立骑兵五团到达屯字镇以北地区,与马登霄团取得联系后,立即部署兵力,向屯字镇东北两面进行包围攻击。守备在东关的西野六纵队一团二营,减员较大,开战不一会儿,营长赵忠思中弹牺牲,教导员汪培模头部负伤。副营长阎德山主动负起指挥重担,在一、三营的紧密配合下,浴血奋战,始终坚守阵地。

新四旅得知教导旅被围在屯字镇内,全旅紧急集合,从30里外跑步赶到屯字镇。由于解围心切,他们连夜向敌人发起攻击。因为部队不了解敌情,对地形也不熟悉,仓促上阵,没有及时打开通往屯字镇西关学校的通道而解救教导旅出围。但是,他们与教导旅三团紧密配合,牵制敌人,大大减轻了来自南面的威胁。在这次战斗中,优秀共产党员,十六团政委常祥考、一营教导员刘宾、二营教导员史晋昌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在前,都不幸英勇牺牲。彭德怀司令员为常祥考亲笔写了悼词,号召全体指战员“更加奋战,全歼胡马匪帮,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为民复仇,为你和所有烈士复仇”。

(四)

5月4日傍晚,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命令纵队侦察科长王正臣带一侦察员,趁天黑潜出镇子,找到野战军司令部,向彭德怀报告了屯字镇被围的情况。彭总顾不得吃饭,立即飞身上马,直驱前沿阵地。一路上彭总向王正臣询问了屯字镇的详细情况。当屯字镇遥遥在望时,彭总举起望远镜,观察情况,分析敌情。

当天晚上,彭总发来电报指示:“六纵队一定要守住屯字镇,以吸引

敌人,总部和其他部队可以乘机转移,甩开敌人,重新集结,组织一次新的战役,狠狠打击敌人。”命令教导旅坚持在屯字镇吸引住敌人,等待野战军主力赶到对敌人实行反包围,然后内外夹击,全歼八十二师。

接到电报后,罗元发司令员、徐立清政委和陈海涵旅长、关盛志政委等领导,虽然身陷重围,四面受敌,处境十分不利,仍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全力以赴实现彭总战略规划,为主力创造有利战机。

5日,教导旅组织部队多次出击敌人,夺回了一些阵地和几个村子。敌人摸不清解放军有多少兵力,在解放军勇猛出击时,都纷纷退却。等解放军撤回城内坚守阵地后,敌人又回头向前推进。就这样来回拉锯七八次,苦战了一整天,敌人最终未能攻进屯字镇。六纵队在一天内的激战中,伤亡也比较大,敌人还不断地用八二迫击炮向镇内轰击。二团副政委赵明月、教导旅卫生部副部长王仲斌等都在战斗中牺牲。受伤者也越来越多,二团一营教导员刘瑞等都身负重伤。下午6时左右,战斗形势突然发生变化。解放军主力部队约有7000多人,从屯字镇西南方向神速迂回过来,将“马家军”一百旅等部三面紧紧包围起来,从腹背夹击。马家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冲锋,均未能得逞,伤亡也大大增加。这时天已黄昏,整个屯字镇在炽烈地炮火下,成了一片火海,厮杀声和枪炮声震彻四野。被包围的国民党一百旅谭成祥部和独立骑兵五团马成贤部向外线猛烈突围,先后发生10多次白刃战,均未能成功。

敌人兵力也不断增加,“马家军”已增加到四个骑兵师、三个步兵师。胡宗南的李振兵团、裴昌会兵团也由南向北推进,企图将西北野战军主力聚歼于泾川、西峰、屯字镇三角地区,情况越来越严重。

傍晚,彭总第二次发来电报,命令教导旅继续坚守屯字镇,西野主力正在部署对敌人的反包围。接到电报后,纵队和教导旅的领导立即开会,研究敌情,调整部署。加强一线的营连两级指挥,缩小一些不必要的阵地,以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徐立清政委提出要把新四旅十六团调进来,但未能成功。

晚上,陈海涵旅长和关盛志政委一直站在城墙上观察敌情,思考着天亮以后的仗怎样打,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城墙下面,关政委负了伤,还有一位参谋长被炸牺牲。撤下城墙后,陈旅长再三考虑后,随即写信命令在镇子外面的教导旅三团火速进入镇内。征得纵队领导同意,通过电台报告彭总,即派人把信送到三团去。

三团团长武生荣接到信后，随即派出七八个连队，由副团长王洁清亲自指挥，全部轻装，趁着夜色，沿着深沟崖畔的小道向屯字镇靠近，从敌人包围圈接合部的空隙处顺利地接近深沟对面的沟沿，通过互相喊话取得了联系。陈旅长考虑到三团所占据的王庄是屯字镇西南角的跳板，于是又让王洁清把一个重机枪连带回去，让其余六个连和一个炮兵连顺着深沟崖坡小路，进入屯字镇，屯字镇里的战斗力有所增强，可以继续坚持抗击国民党军。

6日拂晓，教导旅重新整编部队，把三团的几个连队统归二团王季龙团长指挥，把旅部警卫营交给一团团长罗少伟指挥，陈旅长身边只留下一个通讯连，并让通讯连把弹药交给战斗部队。当日，解放军竭尽全力，艰苦抗击敌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一直坚持到黄昏。尽管国民党兵力多出几倍，但始终没有攻占解放军的阵地。

(五)

彭德怀司令员本想以西野主力对包围屯字镇的“马家军”实行反包围，但包围还没有完全构成之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马步芳和马继援不惜血本，倾巢而出，以四个骑兵师、三个步兵师由西向南，步步紧逼，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屯字镇内是解放军教导旅；屯字镇外是青马八十二师；八十二师外面是西野新四旅；新四旅外面是国民党一百旅等部；敌人外面又是西野一纵队和四纵队一部；东南又是胡宗南裴昌会、李振兵团的十几个师尾追野战军主力，由南向北逼进。敌人的总兵力多出数倍，并有4架飞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6日，彭总又来到新四旅阵地王庄观察战况，分析敌情。晚上，他向教导旅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在接到教导旅复电之后，便和总部几名参谋人员一起，顾不得危险，直接向靠近屯字镇的沟畔走去。参谋人员都劝彭总赶快回去，但他望着沟对面的屯字镇说：“教导旅被敌人重兵包围着，我心里急啊！我作为司令员，怎么能不管部队的存亡呢！”过了一会儿，彭总又说：“罗元发、徐立清在里头，陈海涵、关盛志也在里头，他们有多少安全保障？战士们又有多少安全保障？现在，他们处在最紧要的关头，要么顺利突围出来，要么被胡、马打掉，在这种时候，我能坐得住吗？你们也应当体谅我嘛！”彭总说话的时候眼睛湿润了。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

在屯字镇内的六纵队领导,接到彭总命令突围的电报后,徐立清政委、罗元发司令员立即召集纵队和旅部的领导以及作战、侦察科长开会研究。徐立清政委对大家说:“起初,彭总命令我们坚守屯字镇,是为了掩护野战军主力转危为安。现在,彭总命令我们突围,是因为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动员部队,坚决实施彭总的命令,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怨言。”大家都同意徐政委的意见。接着,研究了突围的方向和次序,开始有条不紊的行动。

突围前,教导旅又组织了一次出击,把敌人往后压了一段距离。敌人围堵了屯字镇东、西、北三面,他们认为南面是深沟绝壁,不便行动,只用火力封锁。而且,马家军几天来一直是昼打夜停,不恋夜战。因此,解放军计划趁夜幕的掩护,分三批迅速、隐蔽地突围出去。第一批由教导旅政委关盛志带领轻伤员和后勤人员先撤出;第二批由罗司令员、徐政委带领主力部队撤出;第三批由陈旅长和一团罗少伟团长、二团王季龙团长带领警戒部队在出击敌人之后撤出。不能突围的重伤员都纷纷表示,为了掩护野战主力安全转移,要求给他们留下几枚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部队于夜间10时开始准备,凌晨1时左右,依次从近200米深的沟里,用绳索吊下沟底。行动中,队伍秩序很好,人员没有什么损失。天黑时,新四旅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教导旅突围,也在西面进行佯攻,吸引了敌人的火力。

7日拂晓,突围出来的部队共四五百人,全部翻沟上到原畔,跟随一纵队向东前进,与彭总率领的西野主力会合。当大家见到彭总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彭总看见部队都出来了,安慰大家说:“你们坚决执行命令,部队打得英勇顽强,突围出来就是胜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告诉部队,消灭马匪军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敌人进入屯字镇后,才发现是一座空城。

(六)

西北野战军转入陇东地区后,马继援立即命令其独立骑兵第五团及甘肃保安第五团进驻肖金镇,企图配合胡宗南堵截围歼西野。5月6日,西野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即向肖金镇进军,包围了守敌,激战8小时,与溃敌多次反击,并给以重大杀伤。与此同时,该旅第十一团抢占肖金镇东南8公里之三不同,构筑防御工事,以保障主力前进道路的安

全。7日晨,从屯字镇撤退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向肖金以东地区转移。西野司令部令第四纵队在屯字镇至肖金镇之公路沿线,构筑纵深野战工事,转入机动防御,掩护西野主力安全东移。

马继援得知西野主力从屯字镇向东转移,即刻率八十二师主力追击。上午8时,马继援部在肖金镇以西15公里的南庄、李家、任家胡同、马头坡等地追上了西野后卫部队第一纵队独一旅,该旅指战员在旅长王尚荣的指挥下,与敌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步骑兵的多次冲击,虽自身遭受一定损失,但遏制了敌人的攻击势头,使西野司令部和兄弟部队摆脱了敌人的纠缠。第六纵队新四旅在肖金镇西南庄李家等地与马继援部队遭遇,展开了激烈战斗,该旅十六团团长沙学凯和战士们一起,与攻上来的敌人肉搏,多次打退敌人的集团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危急关头,七七一团政委张世功率领党团员扼守前沿,杀退敌人的冲锋,稳住了阵地。17时,新四旅在转移中又与马继援骑兵团多次激战,建制被打乱,部队被冲散,遭受较大伤亡。

5月7日,彭德怀司令员在王庄指挥部队向肖金、西峰镇撤退,由新四旅担任掩护,且战且退,第四旅进至三不同地区,又与追上来的马继援骑兵团多次激战,双方伤亡惨重。5月7日上午,西野东撤先头部队第四纵队警三旅第七团包围了宁县城。不久,第六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也从焦村镇转移到宁县城郊。宁县守敌马继援部八十二师直属工兵营和师特务团1个连,加上宁县自卫队共有1300余人,由八十二师高参张彦和工兵营长潭腾蛟负责宁县城防务。

(七)

宁县城内关押着在彬、长战役中被俘的解放军及地方人员900余人,这些人员初解县城,交由宁县政府集中文庙大院看管。后因形势日紧,宁县政府害怕被俘人员暴动,又交潭腾蛟工兵营看管。潭部将被俘人员接管后,与马继援八十二师师部情报科长杨振华等对被俘人员进行区别处理,然后按干部、战士不同情况分别关押在7家地坑院内,户主均被强令搬出,然后关门上锁,布岗设哨,严加看管。西野四纵队警三旅七团接旅部命令,5月8日下午渡过马莲河,抢占东部原头,尔后相机攻占宁县城,消灭守敌,为主力东进打开通道,并解救解放军被俘人员。第七团在第五团的配合下,首先消灭了南山和东原等外围敌人,又以大

炮轰击敌军据点、工事。由于城防工事坚固，火力配备密集，七团多次攻城无果。城内被关押的解放军被俘人员，听见枪炮声，便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越狱暴动，以期里应外合，消灭国民党守军，夺取县城。被俘解放军战士高呼口号，背门板为掩体，踩肩膀搭人梯，前仆后继，冲上地坑庄崖，与守敌展开肉搏。敌工兵营长谭腾蛟急令属下疯狂屠杀，其中有400余名被俘解放军英勇就义，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五·八惨案”。

5月8日凌晨，马继援率骑八旅、独立师五团及一百旅二九八团赶来支援宁县守敌。为了掩护西野主力东移，七团接到彭德怀停至攻打宁县城的命令，部队立即撤到十里铺，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敌人。于是，全团由进攻转入防御，一、二营撤至南桥子，利用原边三层半圆形硷畔掘成战壕三层，并斩断土桥，配备好火力，以阻击骑兵；三连则在十里铺东、西两地保护侧翼安全。

下午5时许，西野主力分数路从河西坡、渭一口、南义井等多处撤到马莲河川，部队夺取春荣原头以后，遂从春荣、早胜等地向东转移。二纵队和四纵队一部，沿春荣原东撤，大批军火驮骡成四路纵队行进，新宁县干部、群众搭桥、修路、护送驮骡队过石鼓、万原峁子，马匪追至巴原、黑池、下齐一带不及而止。从早胜原头东撤各部主力，自前半夜陆续到达，食宿郭铺、北丰头、院子、西头各村。天亮后打扫地方，算清了伙食，然后由各村抽集人畜随队送行。这一路撤在最后的是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西野总部，骑兵同行20多人，从马家坪下川，在枣园附近过河，由总部警卫团后卫，从容撤退。至此，主力部队基本撤退完毕。马继援亲率骑兵第八旅马步鸾部、独立骑兵第五团马成贤部和步兵一百旅一团马璋部追至宁县，城门封压未启，马继援在南关稍停，即向早胜原追击。其六十五师李振部亦随后追来。西野总部和彭德怀、习仲勋过了南桥子后，警三旅七团一、二营方接火阻击敌人。

(八)

南桥子是通往早胜原唯一道路，两条峁道，相距千米，其地势南高北低；上嵯峁宽不过5米，长约150米；两边都是沟谷悬崖。警三旅七团一营、二营在上嵯峁居高临下，叠层布阵，集中火力，封锁峁道。马继援大兵追击至此，面对天险，奈何不得两个营的阻击。几次轮番冲击，均被狠狠遏制以退，骑兵旅下马改步兵队形向前运动，又陷入解放军火力

网,进退不得。两营乘间隙集中八二、六〇炮火轰击其马群,战马四处奔散,许多驮运弹药的骡马窜过土桥,跑到解放军阵地,弹药补充了阻击部队,战马成了解放军运送伤员的工具,马继援部遭到很大损失而不能越过土桥一步,便留下两个骑兵团配合步兵三十六师正面牵制,六十五师全面进攻,其余主力改由九龙川、马莲河川大迂回,企图侧面包围解放军。就在这个时候,七团又接到彭德怀严令:一定要阻击住敌人,保证主力摆脱敌人尾追。在此关键时刻,从屯字镇撤出来的兄弟部队警三旅五团,也在团长郭应春、政委王学礼的带领下投入战斗,配合七团阻击马部。警三旅旅长黄罗斌亲自到七团指挥战斗,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也留在清华村,准备与两团指战员共同完成军令。全旅指战员听到首长命令和决心,士气大振,五、七团紧密配合,相互为应,英勇抗击敌人。马继援部队在南桥子前边,难越雷池一步。

警三旅七团和五团在南桥子狠狠阻击马家追击大军后,为遏制其侧后迂回包围和追击,决定后撤转移阵地,另选有利地形,再行全面阻击。他们利用村庄围墙等条件,一边阻击敌追兵,一边交替掩护后撤。五团为了对付马继援骑兵的冲击和包围,全团分成两个战斗队,列成方阵,一不走旷地、二不进村庄,专拣胡同走,使敌追兵枪射不上,刀砍不着,方阵始终不乱,并交替阻击、掩护和撤退。马家军骑兵只能在平地里发狂,接近不得。就这样打退一次冲击,交替后撤一段。至史家城再次进行了有力阻击,直至黄昏,才撤到良平镇。

良平镇位于早胜镇东部,有大道通往关中根据地,地当要冲。不论敌人的正面追击部队还是迂回部队都要经过这里。5月9日下午,警三旅第七团进至良平城,团长冯有才、政委许发善立即部署兵力,一营据守城西北外围要点,卡住咽喉地带,二、三营和团直属队据守城垣,封锁通道。

10日上午9时,马继援八十二师主力齐集于良平土城周围,狭窄的小原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敌军。11时,敌人开始全力攻城,企图拔掉追击道路上的这颗钉子。七团沉着应战,战斗非常激烈。下午2时,敌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攻占了一营扼守的土围子附近民房及要点。一营遂撤入城内,半天之内打退了敌人10多次冲锋,牢牢守住了阵地。战至天黑,七团利用夜幕突围,连夜翻沟直抵正宁宫河与主力靠拢。野战司令部副参谋长张文舟在宫河原畔迎候七团,并转达彭德怀对指战

员的关怀和问候。

马继援部惧怕深入革命根据地后被歼，遂退回宁县。至此，西野摆脱了敌军追击，12日转移至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休整。

西府陇东战役不但再次给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并且在政治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州震动，人心慌乱，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发生了动摇，陇东全境解放的帷幕也由此拉开。

六、威震大西北的回民支队

在陇东老解放区，新正县龙嘴子回民支队在党的领导下，长期纵横驰骋于西北高原，剿顽匪，拒强敌，回汉族战士并肩战斗，用鲜血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创下了不朽的业绩。为了纪念这支回民支队，江西“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专门记载了这支回民支队武装斗争的光辉篇章。

(一)

正宁县五顷原乡的西渠、龙嘴子地处子午岭山麓，森林茂密，崖高谷深，层峦叠嶂，是回民聚居之地。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原陕甘边苏区所辖的三道湾和龙嘴子。这里共有回民120余户、300多口人，除了三两个富裕户之外，其余都是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逃荒到这里落户的佃农。在旧中国，龙嘴子的回族人民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凌、压迫，世代代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1932年春天，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游击队，解放了这个偏僻贫困的山村，使这里的回族人民开始当家作主。这年4月上旬，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正宁县寺村原等72个村子的农民代表选举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时，龙嘴子的回族人民也选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商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的决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使回族人民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得到了同汉族人民平等的政治地位。回、汉人民团结战斗，投入了闹翻身、求解放的伟大斗争。

1933年冬天，随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张仲良、杜宛、李尚勤等共产党员来到正宁山区，首先从龙嘴子开始，发动和领

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并由龙嘴子扩展到了整个关中、陇东根据地。此后,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也在龙嘴子相继建立了起来,一批骨干分子在斗争中不断涌现,一些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此基础上,1934年秋天,龙嘴子建立了“我国回族人民的第一个自治政权——龙嘴子回民乡”^①,破天荒地由回族人民自己当家做了主人。同时,在龙嘴子赤卫军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龙嘴子回民游击队,又称正宁游击队第十六支队。这也是我国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回民游击队。

(二)

回民支队创建初期,在红军党组织的领导下,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1934年春张仲良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转战于子午岭山区,回民支队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在五顷原、孟家河、龙嘴子、洞子沟一带没收了地主赵老八、郭进发、郭全儿、赵秉义出租的土地198亩,分给何正兴等10多户佃农,初步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缺地的问题。1934年7月,回民支队又协助第三路游击队,建立了五顷原苏维埃政府,这是正宁县最早成立的乡级革命政权。同年秋,回民支队被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南区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改编为第十六支队,王世平任支队队长,王世英任指导员。全队发展到20多人,有步枪10多支,经常配合其他支队行动。在中部县小石崖召开中共陕甘边南区代表大会时,回民支队奉命担任大会警卫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龙嘴子回民游击队成立后,立即打破回、汉地区的界限,驰骋甘肃正宁、宁县和陕西旬邑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汉族同胞组成的赤卫军、游击队和陕甘红军主力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1935年春天,蒋介石调集5万余兵力向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疯狂“围剿”。国民党军队马鸿宾部的一支骑兵部队,穷凶极恶地“追剿”宁县游击队第三支队,使这支游击队的处境一时非常险恶。在这种情况下,龙嘴子的回族人民,不顾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危,立即让宁县三支队进入龙嘴子隐蔽,英勇机智地掩护这支汉族兄弟的革命武装达一月多。在那患难与共的一个多月里,宁县三支队坚决执

^① 见高文:《蒿草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行红军游击队的纪律,非常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回族同胞也像对待亲人一般,对宁县三支队的安全和生活关心备至,回、汉兄弟在同吃、同住、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5年4月,回民支队在五顷原得到情报,马步芳的骑兵连在旬邑县杨胡同被红军击溃后,残部正向正宁境内逃窜。回民支队立即奔赴庙梁设伏,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当场抓获7人,俘虏了国民党连长冯德忠,缴获步枪6支,轻机枪1挺,子弹500余发,手榴弹20多枚。这年9月18日,回民支队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团。

1936年初,国民党纠集11个师的兵力,分3路全面“围剿”关中苏区。地处关中分区前沿的新正县,首当其冲正面受敌。为保存革命力量,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到外线作战,只留下回民支队保卫地方。此时,敌军一部闯入龙嘴子村,抢掠粮食70余石,杀耕畜30多头、羊70多只。回民支队面对强敌,依靠群众,采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忽进忽退、忽明忽暗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干扰敌人,使敌人难以立足,很快撤离。有一次,东北军一部窜进五顷原,明目张胆地打家劫舍杀害无辜百姓。回民支队闻讯赶来,突然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丢枪弃弹,抛下抢劫之物狼狈逃走。以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再也不敢轻易入侵五顷原。

1937年2月,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需要,根据关中特委的指示,新正、新宁县所有的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400人,下属3个中队。回民支队同时被改编,支队指导员王世英任大队长。回民支队在关中分区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驻守地区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监视顽军,在同国民党顽军进行边界反“摩擦”和反“蚕食”的战斗中,一次次打退了来犯的顽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和群众安全。

(三)

1941年,为了加强地方军事力量,保卫抗日根据地大后方,3月下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由边区政府派出干部在龙嘴子成立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会关中分会,将回民支队改编为关中回民支队。全队120多人,马全德任队长,隶属于关中分区司令部和新正县双重领导,装备由分区供给。从此,回民支队有了正式建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新正县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关中回民支队刚建立,就受到了一次严峻的战斗考验。当时,居住在国民党正宁县城的地下党员屈则声报

告：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计划占领新正县一区八乡张家坪的寺庙作营房。得到这个消息，新正县一区区委书记郭廷藩立即部署回民支队一边阻击顽军，一边动员当地群众，在一天之内就把张家坪的寺庙全部拆除掉，使顽军的阴谋没有得逞。这时，回民支队一面深入顽区，扰乱顽军后方，分化瓦解顽军的营垒，剪除首恶分子；一面学习文化知识，加强军事训练。回民支队的队员既提高了文化素质，又熟练了军事技术，很快成长为一支能够模范执行军队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坚强而精干的有生力量。正因为回民支队具备了优良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战斗力，所以从1941年秋开始，接替警一旅三团三营驻守湫头镇，担负起守卫新正一区大门巩家斜的重任。在这段时间里，回民支队不仅是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而且是一支精干的工作队，在保卫新正一区政权和对敌斗争中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工作失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组织的嘉奖。

(四)

1942年4月，新正县整编各路游击队，成立保安大队，下辖3个中队，回民支队被编为第三中队，马全德任队长，马全普任副队长。1944年4月，新正县保安大队进行了整编，回民支队被编为第一中队，马全德任队长，马全普任指导员。

1946年8月，回民支队根据关中分区司令部的命令，为迎接王震大军过境扫除障碍。当时位于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交界处的解家川是国民党正宁县政府、自卫队苦心经营多年的军事要塞，地势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敌军派了装备精良的30多名士兵把守。回民支队接受攻打解家川的任务后，周详地侦察敌情，经过认真分析，制定了作战计划。在地下党工作人员的配合下，10名回民支队的战士扮作“慰问”敌人的群众，混进敌碉堡，在里面摆宴设酒，行令猜拳，分散麻痹敌人。时至中午时分，路上行人稀少，碉堡内发出暗号，外面预先埋伏好的回民支队迅速出击，里应外合，俘虏了全部顽军，烧毁了碉堡，拆除了障碍。这次行动一枪未发，俘虏顽军30余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支、子弹1000余发、手榴弹20多箱及许多军用文件。

1946年，胡宗南四十八旅的一四二团、一四三团和一个炮兵团，约万余人，侵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而新正县仅有地方武装一两个连，加上

回民支队及各乡民兵不足 800 人。虽然如此,但由于回民支队及时传递情报和英勇抗击敌人,为关中分区领导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使敌人一举破坏关中地委和新正县委的计划落空。回民支队完成掩护任务撤出湫头后,被敌人四面包围。他们英勇顽强,牵制着敌人在深山梢林里辗转了 10 多天。后来,在支队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冲出重围,回到了新正县政府临时驻地新宁县一区一乡的驻地。11 月初,新正县保安大队改编为独立营,回民支队编为独立营八连。全连 120 多人,马全德、马全普分别任连长和指导员。11 月 12 日,回民支队奉命出击驻扎永和镇的胡宗南部一个营,经过激烈战斗,攻克城堡,击毙敌军 18 人,俘虏 30 余人,击伤 19 人,缴获一批步枪、机枪、六〇炮和子弹。

(五)

1947 年 3 月,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兵团 2000 余人向关中方向移动,企图偷袭关中分区司令部。马全德、马全普率领回民支队,把敌人死死牵制在子午岭雕翎关。回民支队主动出击,连连获胜。在堙岬伏击战中,击毙、俘虏敌人 14 人,缴获长短枪 14 支。7 月,回民支队在皮坊店击溃为山河自卫队运送武器的陕西省保安第六团,打死打伤 20 余人,缴获步枪 50 余支,机枪 3 挺,子弹万余发,而回民支队战士无一伤亡。至此,回民支队声威大震。8 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属部警一旅、警三旅、骑兵师在新宁县九岬西洼与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二师马继援部发生激战,双方伤亡惨重。警三旅南下休整,途中将 120 多名伤病员交给新正县,安置在龙嘴子、西渠、孟家河一带休养。回民支队日夜警戒巡逻,保卫安全。敌军两次包围搜查,均一无所获。9 月,回民支队配合西府纵队、渭北纵队攻打县香庙镇敌保安团,攻破敌碉堡两座,毙敌 10 余人,俘虏 100 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1948 年 2 月,新正县独立营八连划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二十团二营六连,马全德任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马全普任二营副教导员兼六连指导员。六连下辖 3 个排,200 多人,有步枪 200 多支、机枪 6 挺。经过长期实战锻炼,回民支队变成了一支能攻能守、独立作战的主力部队。这年冬天,回民支队配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陕西淳耀县一带活动,在铁王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歼灭了敌人一个骑兵连。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龙嘴子的回族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毛

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荒种地大生产，织布纺线做军鞋，取得了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为支援抗日战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龙嘴子的回族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广大妇女昼夜赶做军鞋，全力投入到支援解放战争的伟大斗争中。他们还派出一批青壮年组成随军支前担架队，跟随人民解放军转战陇东、关中、宝鸡、天水、兰州直到武威等地，不惜大批人力、物力，直至献出鲜血、生命，全力以赴地支援了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革命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新的功勋。

七、陇东国统区人民的斗争

在陇东，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配合解放区人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和交通员，在敌占区秘密建立联络站和情报点，穿梭于白区，往来于“虎穴”，为中国共产党转送、搜集各类情报。他们经历了重重困难与艰险，多次出生入死，又多次化险为夷，对党的事业忠心赤胆，至死不渝，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一)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县城设立了两个工作委员会。先是中共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简称甘宁工委；后是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两个工作委员会都是领导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机构。

甘宁工委于1942年在庆阳县城设立。工委刚一成立就与当时西北局设在陇东的调查站合并。这个调查站是西北局四局对外调查研究的一个工作点，设在陇东地委统战部，站长由陇东地委统战部副部长朱敏兼任，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甘宁工委隶属西北局领导，主要工作是在甘肃和宁夏“敌占区”开展统战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工委书记由朱敏担任，孙作宾任副书记，陈成义任秘书长。甘宁工委内部设一室一科。由于甘宁工委设在地委统战部，所以陇东地委也经常过问他们的工作。

1944年，西北局决定甘宁工委分设为甘肃工委和宁夏工委。甘肃工委领导机关仍设在陇东分区所在地庆阳县城，工委书记李合邦，副书

记孙作宾,领导成员有李培福、徐国桢、陈成义等。工委内部设办公室、组织科、军事科、宣传科、社会科。宁夏工委驻在定边,由三边专员朱敏担任工委书记。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在宁夏敌占区开展工作。

甘肃工委成立后,先后恢复了原平东工委、宁县县委、兰州市委和青海固工委等组织,同时又新成立了陇右工委和“十七军”工委。宁县县委和驻镇原三岔的平东工委,在敌占区发展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同时注意做敌基层政权工作,使一些国民党乡镇长、保长,名为国民党,实际上接受共产党领导,成为“两面政权”。他们在敌占区组织武装,配合解放区军事斗争,护送伤员,传送情报,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

(二)

解放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陇东视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桥头堡,党政军特要员麇集西峰,一面策划反共阴谋,一面贪赃枉法,囤积居奇,作威作福,极尽欺压剥削之能事。据《庆阳地区志》载:1946年7月后,在庆阳县国民党统治区所征赋税就有26种,额外税20种,临时摊派性的捐税多达77种。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连学校,亦难避祸。1946年6月16日,庆阳师范师生为欢送应届毕业生演戏时,与国民党驻军胡宗南部城防营一军官发生争执,城防营100多名官兵闯入学校实行报复,造成20多名师生重伤,100多名师生和群众受轻伤,制造了“六·一六”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驻军为掩人耳目,声称师范有共产党分子搞破坏,并扬言要在庆师查出共产分子,进行惩处。

1947年后,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都相继驻防陇东。所谓的“车马费”、“壮丁费”、“枪支费”、“劳军费”、“战时特别费”以及军粮、军草、军料、军柴等不计其数,全由地方筹集,强摊硬派,更加重了人民群众负担。1948年国民党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部队大量减员,为扩充兵源,从正规军到地方部队,都大规模地抓兵抓丁。与此同时,还强迫群众修筑工事,充作民夫。镇原县国民党军政机关在1949年6月以前,强迫群众在县城周围修筑大小碉堡50多座,在黑渠口、大卢原、大什字、开边、方城子等地,修筑了许多碉堡、战壕。1948年12月,县政府向各乡镇摊派民夫、牲口往固原黑城镇送军粮50万斤。1949年5月28日,国民党八十一军一〇〇师二九九团向镇原县征骡马140匹,驴440头,征调挑夫850名,民夫240名,担架310副。

国民党在对其统治区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的同时,对占领的解放区也进行疯狂掠夺。1947年春国民党进占陇东解放区后,解放区损失粮食4万石,牛5964头,农具5515件。仅合水县太白区二乡就有370头耕牛被国民党军宰杀。除了直接掠夺粮食和其他物资外,还从政策上作出若干规定,严密统治被占领区人民,并对革命成果进行反攻倒算。首先强制编查户口,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乡镇等组织。其次,强夺人民土地。国民党甘肃省府规定:凡属公有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一律从农民手中收回;凡地主土地在土改中分配给农民的,一律收归地主所有;凡同共产党一起撤走的人,所有土地一律收回。第三,强制征用民工,加强修筑陇东各县公路,作为军事运输之用。为保证上述措施的实施,国民党甘肃省府、保安司令部、军管区组织了“绥靖区政务督导团”到陇东地区进行监督推行。

(三)

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影响或间接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6年6月16日,庆阳师范流血事件发生后,陕甘宁边区所属陇东分区人民群众纷纷声讨国民党部队的残暴行径,支持庆师师生的抗暴斗争,候补国大代表田绍玺、陇东教育界名流杨正甲都发表言论,声援庆师师生,痛斥国民党部队的罪行。陇东中学师生致函慰问庆师师生,并援助法币8000元。《陇东报》第229期出版特刊,全面报道了国民党部队的罪行。1946年7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庆师流血事件经过。西峰商界为声援庆师学生,罢市一周。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庆阳师范师生的抗暴斗争。

在镇原县,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春派高俞修到国统区,同李义详等人遵照“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开边、黑渠口、屯字等乡镇开展工作。1947年,在南三镇建起了一支游击队,与解放区游击队,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活动于中原、平泉、新城、开边、黑渠口和固原边界地区,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和锄奸斗争。国民党新城镇长李应凯,勾结马继援部围剿游击队,捕押了新城八乡中共支部书记杨清阁等6人,杀害了农民杨全娃,民愤极大。根据群众要求,游击队将李应凯捉住后,就地处决。到1949年6月,镇

原县国民党保甲组织基本瘫痪,乡镇长、保长多被共产党控制,并组织人员监视乡镇人员活动,防止破坏。

在宁县,1948年10月国民党马继援部因在陇东战场上损兵折将,为补充兵源,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以到青海上军校为诱饵,欺骗宁县中山中学(今宁县一中)学生报名当兵。50多名学生不明真相,竟然报名,准备入伍。地下党组织通过王国靖等人在学生中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组织动员学生拒绝报名,展开了罢课说理斗争。校长邱树林组织校警企图镇压学生,200多名学生前往县府请愿。由于县府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没有明确答复,学生离开县府后,四散回家,使学校处于瘫痪状态,马继援以学生补充兵源的企图成了泡影。

(四)

在正宁县宫河地区,党的地下工作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到解放战争时期就没有停止过。1934年2月,董虎山被谢子长从保安派到正宁宫河一带搞党的地下工作。董虎山是宁夏海原县人,从小就给地主家拉长工。因为是拉长工的出身,所以他这次出去搞地下工作,仍然按组织上的意图装扮成打短工的样儿,从保安县来到了正宁宫河一带。

到这个地方不久,董虎山就选定最穷最苦的寺底村落了脚,给人铡草、锄地、修庄基。特别是由于他有一手盘锅灶的巧手艺,因而寻他帮忙的人特别多,这就给他创造了广泛联系群众的良好条件。寺底村距离宫河镇很近,他一方面替别人做工,一方面打探敌人的活动情况,还联系、串通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开展对敌斗争。

宫河虽是个小集镇,但它当时地处甘肃省宁县、正宁和陕西省长武、彬县的交界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敌人在这里活动的派系也很多。遵照党的指示,董虎山把了解到的敌情、民情、社情和地理环境默默地记下来,隔一段时间,借外出做工的机会,到苏区向党组织汇报。根据上级指示,董虎山首先在宫河发展党员。至1937年,已秘密发展党员10多名。随后,建立了宫河党支部,董虎山任支部书记,继续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到1942年,在西至陕西长武县相公镇,南至彬县北极镇,北到宁县早胜镇,东到正宁山河镇的广大区域,已建立了地下党支部11个,发展党员60多人。至1945年,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200多人,遍布宫河镇到山河镇沿线的各村落,在这一条80里长的敌占区,建立起了一

条地下革命红线。

随着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革命斗争越来越活跃。白天,党员们照常干自己的营生,有下地干活的,有赶脚赶集的,也有给敌人拉差的,从表面上也看不出和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同。一到晚上,就开会布置任务。有的出去贴宣传标语,有的毁掉白天敌人修的工事,有的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方圆 80 里的平原上到处都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地下党组织在宫河原建立了一条牢固可靠的地下情报输送线,并巧妙地派人装扮成担盐的、贩簸箕的,把情报送到西华池,交给上级党组织。以后,宁县早胜、春荣、良平和陕西彬县等地下党组织搜集的情报,也都由董虎山他们负责转送,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地下党组织还经常领导群众开展抗粮、抗款、抗丁等活动。有时采取硬抗,有时采取软抗,对于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付,千方百计瓦解敌人,壮大自己。

1948 年 10 月,敌人派一班马匪和一班自卫队,驻扎在南庄堡子里,扬言要镇守宫河镇,并且每一个保要 5 个兵。地下党组织立即派刘志明等同志当晚带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三支枪,分别到敌人驻扎的王录、纪村等地方撒了许多标语,说八路军要包围这股匪徒,要拔掉这个钉子,又在敌人周围打了几枪。敌人立刻慌了神,没等天亮就夹着尾巴跑回县城去了。群众高兴地说:“地下党,真厉害!又为咱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对于那些不是完全为反动派死心塌地效劳,不属于与人民为敌的死硬国民党人员,地下党也根据不同情况,利用他们为我们做工作。南庄堡子有个保长叫曹焕文,这个人不是死硬派,可以争取利用。4 月末的一天晚上,当曹焕文从家里出来到宫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十几个党员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把他团团围住,给他讲了当时的形势,警告他要暗地里为人民工作,立功赎罪。如果发现再捣鬼,就随时取他的人头。从此以后,曹焕文每次到县城开会回来,就把会议内容向地下党组织报告;他了解敌人军队有什么调动,自卫队、便衣队有什么活动,也及时向地下党报告;地下党组织有时叫他开个路条,或在什么文件上盖个章子,他都一一照办,大大方便了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南义镇是从宁县到西华池解放区的必经之路,敌人在这里设了许多“卡子”,驻的敌人多,检查也很严,是地下党与解放区来往经过的一

个重要关口。为了安全,白区地下工作者除了扮成担盐的,贩布的,把路条准备好,把文件巧妙地藏好之外,又和南义镇的国民党镇长拉上了关系,以便一旦发生事故,能够安全脱险。南义镇的国民党镇长叫曹佩玉,老家住正宁宫河西李村。他虽然当着镇长,但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也有些不满。地下党详细分析了他的情况,并经过甘肃工委同意之后,就由西李村的地下党员通过家族关系和他联系,然后地下党组织直接与曹佩玉见面,并让他把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为共产党做工作的决心写成书面材料,签名盖章后交给地下党,作为检量他的依据。由于地下党组织对曹佩玉经常进行形势和党的政策教育,他为党做了许多工作。1945年三八五旅部队经过南义镇时,地下党组织事先通知曹佩玉,让他晚上打开寨门暗接解放军入镇,他照办了,结果解放军毫不费力地把驻南义镇敌军一个营全部缴了械。

地下党组织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利用各种关系,在国统区选派了一些地下党员当“保长”,打入国民党地方政权内部,以配合地下工作。宫河一带选派了张宗义当保长,工作开展得很好,甘肃工委的负责同志可以安全来往。方圆80里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到1949年庆阳全境解放。

八、王寨原官逼民反闹解放

1946年11月16日,著名记者、作家方杰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王寨原人民推翻了蒋政权坚持自治已两年》的报道,在陇东乃至陕甘宁边区都引起了很大震动。从1945年4月起,王寨原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剥削和压迫,组织起自己的武装,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在王寨原的暴力统治,废除了国民党保甲制度,选举出了自己的乡村政权,郑重宣布自治。王寨原人民的这一创举,显示了国民党统治区陇东人民敢于反抗、英勇不屈的精神。方杰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称:“这一个奇迹,是在血泪中产生的。”

(一)

王寨原,解放前属于国民党甘肃庆阳蒲川乡。这条原长40余里,宽10余里,当时有520户人家,绝大部分是农民。国民党政权在这块土地上对人民掠夺和压榨十分残暴。每亩地征粮平均一大斗,全原2.3万亩

地,就要被掠夺2300石粮食,约占收成的一半。还有军粮、献金粮以及县、乡、保等公教人员食粮,此去彼来,再加“地亩官”仗地不公,使好些人家借粮纳粮。在一个农家墙壁上发现摊派粮款的条子,就有乡镇造产费、学校教育费、电线费、服装费、专报费、纸墨费、保公费等10多种。1头驴也半年收一次使用牌照税,十七八股的款项每户就要平均20万元法币。勒索买马买骡,如第八保一个保就要两马一骡,马要在全县全乡买同样高低尺寸、同样颜色的,否则不收,缴不上就罚更多的款子。要向西峰等地乡公所、保安队、民团、驻军草料处分别送草送料,柴要干柴,湿柴不收。送柴到西峰一次来回要两天时间,光路费一次就要花一斗麦子。胡家一个娃娃送高粱作马料,嫌颗颗小不收。胡家娃哀求:“人还吃哩,牲口咱不能吃!”就挨了一顿打。百姓经常要派差去挖壕沟、筑封锁线、修学校、运粮、运炭,12岁的李来保就被拉去修了3次。牛驴支差,有的死了,活着回来的,鞍架烂得稀脓脓的,牛也瘦得不能使唤。王寨原上没挨过打的人很少,一个保丁扬言:“我非打遍第八保的人不可!”全原百姓,不管你家里人手多少,一样要当国民兵、自卫队。每人打一根矛子,枪头月牙形,一样长短的杆子和同样的缨子,红缨和黄杆的颜色深浅也要一样,有的做了七八次才合适。1943年腊月,天上纷纷扬扬下着大雪,国民党政府在西峰举行大检阅,冻得人人身上发抖,一发抖马上被拳脚相加,当时没有一个不挨打的。

(二)

粮款差役逼得王寨原人民活不下去。他们说:“粮食是咱老百姓的护心油,护心油挖完了还能活吗?”可是,“一轮红日,两个天地”,过一道嵯峨就是解放区。群众都说:“人家边区粮款支差,咱们十停,人家还不到一停^①,八路军对百姓多好,咱们加入边区吧!”可乡公所、县政府三天两头捎来话:“粮款缴不上要杀你们的头!”第八保的群众愤怒了。他们在1944年暗中组织起来,几次签名画押写请愿书,派代表要求边区庆阳县收管,做边区的公民。当时边区政府以团结关系为由婉言谢绝,代表们噙泪返乡。第八保的群众暗地里说:“咱们200户人家,夜晚去包围边区的政府请求收下,天一明就回来,夜夜这样,不答应不停止。”群众把苦于无法

^① 一停:陵东方言,即一成。

缴齐粮款的保长、副保长、保丁都拉过来，和他们一起行动。正当此时，国民党又派第八保上交 50 多万元款子、五百多石献金粮，还要保甲长们去受训三个月。群众忍无可忍，于 1945 年 8 月宣布实行了自治。

(三)

“与其死在粮款底下，不如向国民党拼命！”王寨原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领袖黄宝珍、强德信、张福兴、李希峨（保长）的领导下，打碎了门牌，组织了游击队。“边区不收，咱自己独立自主”。他们白天劳动，黑夜打游击，蒋军一来，三声枪响，全保人起来拼命。

开始，他们只有 6 个游击队员，后来发展到 15 个游击队员。开始只有两支过去鲁大昌部遗留下来的步枪，其余都是土枪和长矛。因为他们身后有 240 多户男女老少，就这样坚持了两年，打退了蒋军四次进攻。一次来了三个便衣，黄宝珍急忙从草堆里拿出枪，取出藏在女人鞋里的子弹，和游击队长张福兴把三个便衣活捉了。1944 年 5 月 4 日，来了一连蒋军，带了 100 多条绳子，要把第八保的人全都捆起来。游击队长张福兴带了 4 个队员赶下了峽峴，连长初看只有 5 个游击队员，就下命令：“打！”可是再一看，满山遍野的老百姓，矛子、土枪、铁锹、斧头、铁叉都上来了，连忙下命令背起受伤的人逃走了，还丢下两挺机关枪，5 个游击队员打垮蒋军一连。以后又打败两次国军小股的进攻，蒋军再也不敢到王寨原来啦。

(四)

两年过去了，胜利属于王寨原的人民。残暴的蒋军不但不曾征服这 200 多户坚强的人民，到 1945 年 8 月，第六、第七两保 300 多户群众，也不再屈服于国民党的残暴统治，9 月 1 日，与第八保联合成立了自己的王寨原区政府，废除了国民党保甲制，建立了群众自己的乡村政权，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出来办事。原第七保保长席凯先生被选举为区长。10 月 20 日各乡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乡政府，选举了各村长、乡长。在第一乡乡政府成立大会上，乡长强德保兴奋地说：“开这样的会在边区是常事，在咱们这里还是第一次！大家选我当乡长，跟过去当保长不同，过去当保长是替国民党要粮要款哩，如今是要好好为百姓办事哩，我愿意！”黄宝珍先生激动地说：“过去国民党时期，粮款马鞭子跟着尻子转，咱们心齐变过来了，过太平日子。过去有人心里还害怕，国民党三天两头捎信来要第

八保的几个人头,可两年来,八保的一个人头也没有少。现在也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蒋介石不打倒,还想逼咱做牛马。咱们还要心齐,保卫咱们的王寨原!”就这样,两年来他们打垮蒋军四次进攻,打死国民党排长1名,打伤2名,俘虏了3名,王寨原一个受伤的都没有。他们还扩大了游击队,组织了自卫军,白天黑夜站岗放哨。王寨原的群众兴奋地诉说自己的翻身解放,60多岁的胡老汉流着激动的泪花说:“盼着这一天,真像盼麦子黄哟!怕我盼不到啦,今天可终于盼来咧!”

(五)

《王寨原官逼民反闹解放》的事儿,被《陇东报》记者杜锡英编写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快板新闻,在1946年12月26日至1947年1月21日《陇东报》上连载。同时,延安《解放日报》于1947年1月20日和21日也在第二版以《王寨原上官逼民反闹自治》为题全文连载,并将“快板”改为“唱词”,这种反映真人真事、具备新闻诸要素的“快板”、“唱词”,在当时边区文盲众多的历史条件下,便于读讲,通俗易懂,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在各类报刊通讯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寨原官逼民反闹革命》快板新闻是这样写的:

冷生雨来热生风。
流水不平起浪声。
这里世事不太平,
官逼民反闹革命。
诸位要知何事情。
听我把话说分明。

(白)话说那王寨原,本是那蒋家政府统治区,人民过着黑暗痛苦的日子。如今这条原翻了热浪,晒到了太阳。这条原长40余里,宽10余里,紧接着解放区庆阳边界,过一道暖峁就是“红区”。这里有520户人家,都是黑脸粗手的庄稼汉。从早到晚辛辛苦苦耙种着2300多石公粮,百姓血汗换来的果实被刮去一大半,弄得百姓少吃缺穿。更使百姓叫苦连天的是军粮,粮条子贴满一窑墙壁。因此,百姓们都说:“‘红区’百姓先一世德积得好,他们生在‘红区’享福,咱们先一世德没积好,如今生在‘白区’受罪!”有的说:“为啥‘红区’那样好,‘白区’这样糟,百姓遭灾苦情?”

一道巍峨两边天，
 天堂地狱分得显^①。
 一边百姓笑盈盈，
 一边百姓泪涟涟。
 都只为：
 太阳出来照地红，
 “红区”有个毛泽东。
 他爱百姓像亲人，
 领导着“红区”百姓大翻身。
 他是百姓大救星。
 他有朱德总司令，
 在全世界都有名。
 他带大军二百万，
 在华中、华南、华北打日本。
 又上山生产又爱百姓，
 他和百姓是一家人。
 八角开花结八角，
 蒋贼只会害人民，
 狼狗儿子没好种，
 蝎子尾巴没好心。
 蒋贼是个秦桧种，
 曾国藩，袁世凯，
 和他一个模样一条儿心，
 自从有了这个大灾星，
 咱百姓再没有过个好光景。

(白)话说那王寨原百姓过着牛马的生活，人人怨声载道，日夜咒骂着害民贼“蒋该死”。那到过“红区”的人都说：“‘红区’实在好，当官的都是百姓选。那八路军真好，不打百姓，又上山生产又开荒地！”又说：“‘红区’唱新戏闹秧歌，实在是热闹！”李老汉到“红区”看亲戚，看到一群百姓和几个穿军衣的人吵吵闹闹。他问：“那一群人吵啥哩？”“红区”

① 显：陇东方言，即清楚的意思。

人说：“开会，全是百姓的天下！‘白区’狗日的当官的，鸡肉煮的要提起骨头抖下肉来，谁敢说句他不是？唉！‘红区’百姓真是天堂里活人，‘白区’人几时能享上这福真好！”

桃花开花红艳艳，
“红区”地方好乐园。
政府县长百姓逃，
人人有权提意见。
丰衣足食光景好，
牛羊牲口拴满圈。
受苦人只要勤劳动，
当英雄来中状元。
回头再看王寨原，
年年月月受熬煎。
当官的一年三百六十天，
好事没干一点点。
远的地方咱不表，
只把西峰说一番。
西峰有个活阎王，
伤财害命钟专员。
吃喝嫖赌胡球干，
太太引着一大串。
训练特务到处钻，
暗杀活埋恶极端。
刮地皮来吸人血，
花天酒地乐得欢，
腰里银钱都装满，
可怜百姓遭大难。

（白）话说那蒋家政府，除征各种食粮外，又月月向老百姓摊派乡、保造产费、教育费、电线费、专报费、乡保公费、纸墨费等十余种，又实行那可恨的“牌照税”，那里面规定下，羊每只抽50元，骡马抽100元，牛抽500元，牛车抽1500元；又要每保买骡买马顶壮丁，第八保就要一骡一

马，全县马要颜色高低一样，又要百姓送柴、送炭、支差，逼得百姓叫苦连天：“天啊！我连穿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样多的钱叫我哪里弄去啊？捐、税、款简直把人逼死啦！”

出了这样那样来，
一件一件数不完。
仗地委员来仗地，
要吃酒肉又要钱，
谁若不塞“黑食钱”，
把地仗多又罚款。
要了军粮又要炭，
还要好料干硬柴。
胡家娃送的高粱料，
枪探条打得实凶残。
胡家娃哀求泪满面：
“实说这还是我百姓好茶饭！”
狼心蒋军口里骂：
“你再辩我打死你王八蛋”，
又拉牛驴去支差，
牲畜也要遭灾难，
有的累死在路边，
有的一去不回返，
回来的牲口都瘦干，
脊梁破来鞍架烂。
又修学校挖战壕，
苦害百姓不停点。
十二岁的李来保，
做了苦工三四遍。
庄稼地里没有管，
又要百姓去训练。
不管人手有多少，
一律编成自卫团。

每人要备一根牙，
长短颜色要一般。
数九寒日腊月天，
逼进西峰大训练，
百姓冻得抖牙颤，
脚踢拳打在胸前。

(白)话说那王寨原百姓受着苦难，又看见“红区”那样好，于是人人长叹短气地说：“咱们要想办法呀，不能让白白的被刮死，粮食是咱们的护心油，护心油被挖完还能活？”有的说：“人家‘红区’的粮款支差，比咱们十停还不到一停，咱们编入‘红区’吧！”可恨那县长马上又来一道命令：“所征的粮食缴不齐，要你们的头！”那第八保百姓听到动了怒：“日他妈的，要得世事闹，百姓起了躁，要得世事平，各家要有持枪人！”

众人咬牙拳捏紧，
口号喊的十分明：
“要得世事平，
家家要有持枪人！”
这家传到那一户，
只要百姓一条心，
翻山倒海有本领。

(白)于是，百姓们个个踊跃出钱买了几支枪，又把鲁大昌抛下的烂枪和土炮都收拾好，组织起来了。他们派代表送请愿书到庆阳城，要求收管。但“红区”政府为了顾全大局，没有答应。有的人听了便说：“球！咱们200户人去围住‘红区’政府，硬要他收管！”

百姓为过好光景，
派代表到庆阳城。
要求收管做公民，
“红区”政府谢绝没答应。
代表听了泪纷纷，
回去把话传百姓，
男女老幼听说了。

一个一个埋怨声。
 可要说在这时候，
 那狗县长又传来一道令：
 “五百石缺金粮赶快速，
 五十万款子快交清，
 所有保甲长来受训”
 百姓听了咬牙根，
 团团烈火烧心中。
 他们领袖有四位，
 黄宝珍和强德信，
 张福兴和李希崐（保长）。
 领导百姓大行动，
 举起斧头拿起刀，
 把门牌打得碎纷纷，
 成立了民主自治区，
 走狗吸血虫被赶净。

（白）话说那王寨原百姓，不愿受蒋家政府的剥削压榨，轰轰烈烈地实行自治。蒋家政府不服气，派军队数次来进攻和“围剿”镇压。可是“人民力量不可犯”，那蒋军被王寨原百姓打得落花流水，狼窜鼠逃，1名排长被打死，3名士兵负伤，3名便衣队特务被活捉，两挺机关枪被收缴，百姓一点损失也没有。

石榴开花火样红，
 王寨原百姓闹革命。
 打走坏孙吸血鬼，
 一个一个不留情。
 蒋家政府看见事不美，
 派了三个便衣来活动，
 谁知众人看得准，
 一声鼓噪出了村，
 铁叉、铁锹、斧头亮又亮，
 矛子缨缨红又红，

坏孙被围进窑洞里，
一个一个全捉定。
五月里来草青青，
蒋介石军队来进攻，
连长骑马前面走，
后面紧跟一连兵，
机枪步枪背在身，
又带一百多条粗麻绳，
要捆这原上“红百姓”。
要耍他的狗威风。
进村杀鸡又煮肉，
翻箱倒柜到处寻，
针线包包他都要，
有的还在寻女人。
狗排长生就个馋嘴，
爬上高树吃黄杏。
游击队长张福兴，
带领三个队员看得准，
“叭”的一声枪儿响，
那排长吃了颗“洋花生”，
好像鸡蛋跌地上，
哎哟一声丧了命。
狗连长以为八路到，
吓的头皮格森森，
抬头一看是百姓，
怒气冲冲下命令：
“活捉那些‘红百姓’！”
机枪打来步枪射，
噼噼啪啪显威风。
谁知那百姓早准备，
一刹时喊声山野震，
东边喊来西边吼，

好比青天霹雳声，
 铁叉、铁锹，斧头明晃晃，
 矛子纓纓红岑岑，
 山岔岔，沟畔畔，
 一满都是“红百姓”，
 个个勇敢往上冲，
 土炮轰的如雷鸣。
 那连长看见事不妙，
 下令赶快撤回兵，
 士兵狼窜鼠逃往回跑，
 前后左右百姓追得紧，
 抛了两挺机枪逃活命。
 “红百姓”得胜笑盈盈，
 骂那蒋军原是豆腐军。

(白)话说那王寨原第八保百姓在1945年4月实行民主自治，人人翻了身。那六、七保百姓看了眼也红，人人怨言，互相自问：“人家八保都闹得翻了身，不受那蒋家政府欺压，为啥咱们还要受这种苦情？咱们也来闹吧！不的话，仍是要受罪！”

四月里春暖山鸡叫，
 满地的庄稼绿茵茵，
 那第八保的百姓翻了身，
 那第八保的百姓喜盈盈。
 六、七保的百姓看见眼也红，
 怨言互相来自问：
 “人家自治享了福，
 咱们为啥受苦情？
 咱们也来闹翻身！”
 这户传到那一门，
 那一门传到那一户，
 大家商量闹革命。
 今年九月齐动手，

打碎门牌赶坏种，
 联合了那第八保，
 成立民主区政府，
 如今全原百姓开大会，
 大人娃娃一大群，
 男男女女笑盈盈。
 大人讲来娃娃吵，
 大家商量大事情。
 区乡村长齐选定，
 强德保把话讲的明：
 “这样的大会是头一次，
 大家选我当乡长，
 和当那保长大不同，
 如今是给咱百姓办事情！”
 黄宝珍话儿也讲得清：
 “蒋贼不死还会来，
 咱们大家要小心，
 大家武装组织起，
 防止蒋贼来进攻，
 保卫咱们好光景！”

(白)话说那王寨原百姓闹了自治，成立了区政府，人人高兴。60多岁的胡老汉兴奋地流出了眼泪，说：“盼着这一天，真像盼麦子黄哟！怕我盼不到啦，今天才等到！”今天，他们扩大了游击队、自卫军，武装着自己，盘查放哨，不让一个坏孙钻进来破坏捣乱。他们死也要保卫王寨原，保卫自己的好光景。真是：

冷生雨来热生风，
 流水不平起浪声。
 要得世事过太平，
 家家要有持枪人。

第十四章

伟大贡献永载革命史册

194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麇集胡宗南、马步芳等部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新正、新宁、镇原、合水、庆阳、环县、曲子等地相继沦陷敌手,在这种异常艰难困苦的形势下,陇东解放区军民浴血奋战,与侵犯边区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1947年夏天,彭德怀、习仲勋率西北野战军发起了“陇东战役”,一举收复了庆阳、合水以北的广大区域。在那艰苦的岁月里,陇东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努力支援前线,竭尽人力物力,不惜流血牺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1949年6月,时属关中分区的新宁、新正县划归陇东分区。7月下旬,陇东解放区军民终于迎来了庆阳地区全境解放。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决定,陇东分区改称庆阳分区,为甘肃省所辖9个分区之一。在中共庆阳地委、庆阳分区专员公署的领导下,庆阳、环县、曲子、华池、合水、宁县、正宁、镇原、西峰9县市的人民群众,一面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继续全力支援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一面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陇东老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发展壮大地方武装

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为了保卫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时刻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陇东分区一次又一次加强了地方武装。1945年11月,撤销陇东军分区,成立陇东警备区,由三八五旅兼。1946年前季,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警三旅即兼陇东警备区,归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辖,警三旅旅长黄罗斌兼任陇东警备司令,李合邦任政委。

这种体制,有利于军事作战。

10月,陇东警备区以庆阳、环县、曲子、镇原4县警卫队合编成陇东分区独立营,营长雷震,政委牛健民。下辖4个连,驻防镇原县孟坝镇(镇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1月,环县独立营建立,有县警卫队骨干和扩大的新兵200人,编为3个连,在环县与敌接界处警戒。在此前后,新宁县从所属5个区中选择精干民兵200余人,组成新宁县独立营;新正县在县保安大队基础上,组成了新正县独立营,两营均驻防县城边界处警戒。这时,陇东根据地除分区和上述3县独立营外,其余各县均有警卫队、游击队。民兵组织也迅速发展,县有民兵大队,区有民兵营,乡有民兵连,村有民兵排。县、区、乡长分别任大队长、营长和连长。1947年2月,针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在孟坝镇成立陇东分区独立团,马福吉任团长,党永亮任政委,牛占彪任参谋长。独立团下辖3个营,以原分区独立营为一营;以镇原扩大的新兵编为第二营;以合水扩大的新兵和肖嘴区游击队编为第三营,全团1000余人。同年3月18日,由于地方武装力量的壮大和警三旅奉调参加延安保卫战,陇东警备区改为陇东军分区,军分区成为独立的地方军事领导机关,领导和指挥分区部队及各县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边区。张仲良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徐国珍任副司令员,李宗贵任副政委,何远平任参谋长。

陇东军分区成立后,继续狠抓地方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以适应对敌斗争的紧急需要。军分区以环县独立营为基础,成立了分区独立二团,下辖3个连共300余人。原分区独立团改为独立一团,陇东回民骑兵团扩建一个连,全团辖两个连200余人。回民骑兵团原是海原、固原回民于1939年至1941年3次起义后组成的一支回民武装,因受到国民党部队反复剿杀,于1941年6月由马思义、马国瑶带领由环县进入陇东。当时部队只剩下200多人。陇东分区党政军机关热情地接纳了他们,6月下旬被编为陇东分区回民骑兵团,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为政委,成为陇东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民武装力量。陇东军分区的建立和部队的整编扩建,使陇东地方武装力量再一次得到发展壮大。到1947年7月,镇原县游击队、华池县游击支队、庆阳、合水、曲子和环县游击大队相继建立和健全,一般由各县县长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委,设有专职副大队长。新正县、新宁县游击大队也于稍后相继建立。与此同时,各县武工队也发展起来。分区专署在上半年战争动员工作

的总结中指出：“上半年陇东分区的地方兵团已发展到 3400 人，游击队已发展到 850 人，武工队 68 人，另有民兵数千人。”

胡马匪军入侵陇东，给陇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也激发了人民群众空前的斗争情绪，促进了人民武装的迅速发展。1947 年下半年到 1948 年上半年，陇东地方武装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部队的战斗力也在血与火的锻炼中进一步提高。

1947 年底，华池县游击一、二中队及各区游击队共约 400 人，在杨寺岔组建成陇东分区独立一营；曲子县一、三、四游击中队共 240 人在八珠原整编为陇东分区独立三营。独立一、三营的建立，使陇东的地方武装又多了两只紧握的拳头。1948 年初，陇东军分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独立一团由陈应堂任团长，李科任政委，雷震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全团仍辖 3 个营。以华池、曲子两县独立营为基础，并从独立一团抽员补充，重新组编了独立二团，刘明山任团长，党永亮任政委，冯学诚任参谋长，下辖两个营。回民骑兵团组建第三连，力量比以前更壮大。

同年 4 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陕甘宁晋绥军区，对所属各军区、军分区部队实行统一领导。陇东军分区改为第四军分区，独立一、二团改称陕甘宁边区警备十三团、十四团，骑兵团改称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改编后的各部队集结于曲子县合道地区进行了整训。11 月，第四军分区又复称陇东军分区，同时加强了军分区的领导力量，任命西野驻陇东骑二旅政委王再兴兼任陇东军分区副政委，何远平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嵩山任第二副司令员，李正廷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已经明显正规化的地方武装，于 1949 年春与各县游击大队一起，进行了以诉苦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军工作，以单兵战术为主的军事训练工作，使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纵横驰骋于千里陇原大地，以鲜血和生命建立了赫赫战功。

二、参军参战支援战争

1946 年 6 月 30 日，西北局发出《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11 月初召开的边区第三届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把动员一切力量，粉碎蒋军对边区的进攻，列为当时最紧迫的战斗任务。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号召在全边区开展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动员广大青年随时源源不

断地到军队里去,积极参加民兵自卫军训练,有效地配合正规军保卫边区,保卫家乡。

11月11日,朱德和彭德怀号召全边区青壮年男女要以“抢我一粒粮,还我一滴血”的精神参军参战。11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强调,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一切服从、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同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呼吁全边区人民要拼性命洒热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保卫党中央!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刘景范任主任,贾拓夫、方仲如任副主任,同时发布改组了各县领导机构以适应战争需要的命令。

在一系列动员之后,陇东根据地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一场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热潮迅速兴起,母送子,妻送夫,干部、劳模、参议员带头,兄弟争相参军,复员军人自动归队的感人情景,在陇东解放区处处可见。陇东根据地成千上万的子弟,一批又一批报名参军,补充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兵源。1946年,陇东分区在很短的时间内,报名参军的有1.4万多名,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800多名,其余或编入地方部队,或补充给各县游击队。1947年,陇东分区扩兵5000人,除补充游击队和地方部队外,向主力兵团输送兵员3000人。新宁、新正县在1947年内,三次向部队输送兵员近4600名。1948年,华池县参军青年达到400名,新正县输送兵员410多名。1949年7月18日,陇东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分区征兵以“扩大游击队,肃清地方土匪,巩固后方治安,保护人民,发展生产”为口号,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动员。新解放区虽不广泛动员,但经一般号召后,入伍者先编入游击队训练,再补充地方兵团。当时解放大军所向披靡,青壮年入伍积极性空前高涨,游击队扩充队员达到2900多名。1946年10月,扩兵的消息在镇原一传开,孟坝区两天内报名参军的就达50多人,六乡邓遂善的妻子劝丈夫参军,邓遂善报名后,妻子立即把自己的布衫脱下叫他穿上,并买布补好丈夫的裤子,亲自送丈夫到部队;七乡几个青年人伍,邻里乡亲们担来大家凑的5担馍,拿来6条毡,11条被子,每人一双新鞋欢送他们入伍。这个县的三岔一乡有个佃户叫刘义,1947年初扩兵时,夫妻俩都想叫儿子刘长德去当兵,但互相又怕对方不同意,刘义心生一计,想试探他的老婆。当村主任来家动员的时候,刘义拿起一把刀子,气呼呼地

说：“谁要把我儿子领去当兵我就和他拼命！”老婆见状急了，忙去夺下刀子说：“咱娃娃当兵是人民大事，儿子是我养的，我愿意叫去！”刘义顿时大喜，夫妻高高兴兴送子参军。这件事在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后，并编诗赞扬：“夫妻同心各有意，送子当兵保边区。赤胆忠心称模范，拿刀吓人是计。”刘长德被编入独立团警卫班，1948年在环县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1947年9月22日《陇东报》题为《保卫好光景》小通讯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8月30日镇原参军大会上，20名优秀青年报名参加西北人民解放军。三岔17岁青年李鹏章，在大会上报名时说：“前多年国民党统治三岔时，我家里年年不够吃穿。自从共产党来后，我没出过负担，前年还救济我二斗粮。如今又买下了两头牛、两条驴。刚要过好光景，胡匪就来了。我要参军打胡匪，保卫好光景。”年轻的姚尚哲，结婚的日子快到了，他也报名参军。上级很关心，决定结婚时给他放假回家完婚。会后，群众买了20斤猪肉，做了几样菜，欢送20名参军青年上前线。

据华池县志载，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全县共有3360名青年参军，相当于男性青年的60%，其中180人光荣牺牲，这个县林镇沟口村，战争年代全村8户共30余人，参军的就有9人，贫农白大妈把自己3个儿子全都送上了前线。

三、配合主力保卫边区

在解放战争中，陇东根据地人民为了保卫边区，保卫家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配合主力部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敌人入侵陇东后，游击队和民兵英勇机智，神出鬼没地拔据点，炸碉堡，割电线，埋地雷，放哨盘查，捉拿敌探，对敌人进行袭击、牵制、困扰，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潭。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曲子、环县游击大队作战20余次，打击了10余股土匪和宁夏民团及胡马匪军。镇原县游击大队仅1947年3月1日就作战7次，烧毁敌军营7座，破坏碉堡6处，割电线300多斤。合水游击队两年内参加大战斗18次、小战斗数十次，击溃了6股反动武装，摧毁国民党保甲68次，破坏敌工事50余

处,炸毁敌碉堡 11 座。庆阳游击队仅 1947 年就作战近百次,摧毁国民党保甲 52 次,割电线 590 多斤。新宁县游击队作战 20 多次,割电线 50 斤。华池县游击队作战 50 多次,消灭民团、土匪 12 股。据不完全统计,至 1949 年 7 月陇东解放,游击队和民兵与敌作战 1000 多次,伤毙敌匪 700 余人,俘敌 100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40 多挺,步枪 400 余支,子弹 3 万余发,迫击炮 20 多门,炸毁敌军营、碉堡 100 余处,破坏敌工事 150 多处,割电线 1500 多斤。

在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的同时,游击队和民兵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敌占区,一方面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消息,使敌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找不到向导,从而为解放军主力部队创造了歼敌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为主力部队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任务。在西华池战斗、陇东战役以及主力部队在陇东和关中进行的较大战斗中,成百上千的游击队员和民兵配合作战达百余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陇东地方武装与胡马匪军的斗争中,陇东军分区独立一、二团和回民骑兵团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1947 年,在陇东大部分地方沦入敌手、胡马匪军疯狂施暴的情况下,陇东地委发出了《关于全面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号召陇东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配合西北野战集团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陇东军分区对所辖部队重新作了部署,令独立二团、回民骑兵团在环县地区作战,独立一团三营在庆阳、合水、华池担任游击骨干力量,独立一团的一、二营为机动队,随分区机关并保卫分区机关后方东华池、大小凤川一带。部署后的 5 月 18 日,独立一团和回民骑兵团就取得了在华池县红土腰岷伏击国民党军的胜利。7 月 3 日,回民骑兵团与环县游击大队配合,捣毁国民党八十一师卡得荣部砖城子兵站,缴获面粉 5000 斤,玉米两万斤。月底又在甜水堡沙坡子清剿土匪耿兆玺部,毙俘敌人 13 人。在陇东战役中,陇东军分区部队配合西野积极参加战斗,牵制、袭扰和打击敌人,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受到西野首长的赞扬。1948 年初,经过重新组建整编的分区部队战斗力进一步提高。2 月 18 日,独立一、二团各一部在环县游击大队配合下,再战卡得荣部于毛井区高滩,歼敌 40 余人,缴枪 40 支,战马 40 匹,子弹万余发,六〇炮一门。4 月 19 日,胶泥腰岷战斗打响。当时整编后的分区部队正在合道川整训,国民党八十二师骑兵团和甘肃保

安六团前来袭击,分区十三团一营奉命在胶泥腰岷阻击,掩护大部队和前来慰问演出人员的转移。一营一连在连长郭进义、指导员高峰带领下坚守在最前沿,顽强阻击,最后打得只剩下5人。二、三连接替激战,使敌不能前进,终于使大部队脱离危险。在这次战斗中,十三团共牺牲100余人,被俘20多人,损失惨重。但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以一个营的力量抗击敌两个团,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毙敌200余人。二砬碌原战斗也是一次成功的阻击战。为配合西野作战,陇东军分区和三边军分区联合组成临时前方司令部,计划收复庆阳县以牵制西峰、镇原之敌。在对庆阳县城形成包围后,突然发现敌八十二师骑兵五团赶来救援,前方司令部遂放弃攻城,改为全力打援。5月1日,十四团和回民骑兵团在齐家腰岷打退敌人轮番进攻后,撤到樊家店一带。坚守在二砬碌原的十三团腹背受敌,激战后撤出与十四团、骑兵团会合,重新组织战斗。十三团炮连以准确炮火轰击敌骑兵五团,十四团和骑兵团乘机组织反冲锋,敌人阵地顿时溃乱,遗下具具尸体仓皇逃至庆阳城内,不敢出战。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实现原定计划,但给国民党八十二师狠捅了一刀,起到了一定的牵制和配合作用。1949年,经过新式整军的陇东军分区部队,配合一野进行陇原追击战,更加主动打击和消灭敌人。陇东军分区部队的战绩,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解放战争中,陇东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了许多英雄功臣,立功受奖者达300多人。1947年2月11日,边区政府发令嘉奖:率领30人突破敌200人重围,坚决保卫了王郎坡的新正县一区四乡模范民兵连长赵思泰和排长巩守信;指挥新宁县一区三乡民兵击退顽军35次进犯,坚决保卫贾峪川的民兵连长李生金;10枪命中8个敌人以及单枪攻破敌碉堡的神枪手刘治全和路进礼。同年4月14日,陇东地委决定,分区专署颁布命令:给在对敌斗争中坚决勇敢,做出优异成绩的镇原县长王子厚、四区区委书记陈宗祥、庆阳县长杨福祥、县委副书记赵云山、统战部副部长贾庆礼、合水五区区长石秀山、保安分处外勤股长薛浩平、孟坝外勤干部余凯及延安工作团谢玉山等9人各记大功一次,并号召分区全体军民向他们学习。关中分区专署通令嘉奖了新宁县委书记李科、县长王立成、大队副郝伯雄。在解放战争中,许多优秀的陇东儿女血洒疆场,壮烈牺牲,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革命铺就了胜利之路。木钵区委书记李向华、游击队长李建成,1947年5月在八珠原杏树沟为掩护八珠

区兄弟游击队转移而遭敌包围,宁死不当俘虏,双双站着自杀。合水店子区民办合作社主任彭贵,他的次子彭振刚担任肖嘴区委副书记,被敌人杀害后,他在送五子彭振怀入伍大会上高声说:“我有5个儿子,振刚牺牲振怀补,再留两个作预备!”1948年4月他也被敌人所捕,关押在平凉,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时年58岁。新宁县一支队指导员、抗大毕业生胡治德英勇善战,1947年夏在白虎村创下了自己无一伤亡而毙敌12名、俘敌4名的伏击战例,受到关中分区司令部嘉奖。同年冬不幸被捕,被敌人拴在马尾巴上,从湘乐一直拖到宁县城,脚被磨完,面目全非,后被敌人活埋。这个县的武工队长邵培田遭敌包围后,敌人逼他投降,他厉声回答:“老子舍命不缴枪!”以死相拼,重伤被俘,残暴的敌人把他的头割下来,悬于宁县城门示众。另外,还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环县县委统战部长秦明、被叛徒杀害的正宁回民游击队指挥员王世英,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的陇东独立二团团长马福吉等,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陇东人民的骄傲。

四、倾其所有支援前线

人民群众倾其所有,全力支援,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3年解放战争中,陇东根据地各县曾被敌一度占领,有的长达两年多,村舍几乎被洗劫一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然而,陇东8县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倾其所有支援解放战争,保证了部队的战勤供应。

解放军打仗全靠两只脚走路,鞋袜消耗量极大。因此,做军鞋成为支前的一件大事,而这件事全由广大妇女承担。他们利用劳动间隙和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线,不仅完成了政府下达的“任务鞋”,而且做出了大量的“慰问鞋”。1946年,陇东分区6县一共做军鞋3.86万双。1947年到1948年,陇东分区和新宁、新正两县共做军鞋9.95万双,其中,1948年一次就赶做了4万双。新正县湫头村马贵仁一家就做了36双。1949年,陇东8县又做军鞋11.6万双,其中11月至12月,一次下达的5.61万双任务全部完成。三年解放战争期间,陇东根据地8县一共做军鞋近26万多双。

解放战争中,陇东人民群众不仅踊跃交售公粮,全力为当地驻军、地方部队和党政机关供给粮食和牲畜草料,而且积极借粮资助部队,动

员一切力量为部队转运粮草和军用物资。据资料统计,解放战争中,陇东解放区为部队交纳公粮达到 9300 多万公斤,饲料 3200 多万公斤,饲草 720 万公斤。同时,还积极完成边区政府向陇东根据地下达的借粮任务。1947 年 7 月第一次借粮 4.7 万石,其中华池、环县、曲子在 20 多天中就完成 1.35 万石。1948 年 5 月 2 日,边区政府又向华池县借粮 1000 石。1949 年 7 月 30 日,庆阳分区专署通知,向新解放区的镇原、西峰、宁县、正宁 4 县借粮 18.5 万石。与此同时,陇东解放区人民承担了大量而繁重的转运粮草的任务。1946 年,陇东分区组织 5000 头毛驴运输队,转运粮食数万石,饲草 10 万余斤。1947 年,转运粮食 5000 石到志丹县,2000 石到吴旗县,1 月内就完成了任务。1948 年,为战备需要,环县转运 1500 石粮食到华池元城,向吴旗转运粮食 2000 石。曲子、华池、合水县向志丹县转运粮食 5000 石。1949 年 7 月,为保证一野用粮,陇东分区各县共向泾川、平凉运送小麦 13.3 万石,米 2 万石,麦面 7 万石,豆子 15000 石。

7 月底,陇东全境解放,为支援主力部队解放甘肃全境,陇东分区动员驮畜 1400 头,从镇原向瓦亭转送米面 100 万斤,饲料 20 万斤。7 月,环县能驮 70 斤以上的驮畜全部出动,历时 50 天,先后向固原、同心、豫旺前线转送白面 27 万斤,小米 138 石,向平凉转送小米 900 多石。8 月,一野解放兰州,庆阳、合水、曲子、环县、镇原、宁县 6 县给瓦亭转送米 3.34 万石,饲料 5000 石。宁县、正宁两县向平凉转运小麦 3 万多石,饲料 5000 石。镇原、环县向固原转送小麦 10 万石,饲料 600 石。

除了踊跃交纳公粮、借粮和运送粮草外,陇东人民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慰劳子弟兵和战勤服务活动。1947 年至 1949 年间,全区 8 县为劳军和战勤服务共无偿奉献粮食 5 万余石、饲料 3 万余石、饲草 6000 余斤、柴禾 1 亿余斤、羊 1500 多只、大肉 5 万斤、鸡 5000 多只、鸡蛋 1 万余斤,还有瓜果、蔬菜、军鞋、袜子、流通券、纸烟等,出动劳力 15 万多人,牲畜 7 万多头,以及难以计数的肥皂、毛巾、牙膏、慰问袋、糕点、熟食等。

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是战争中陇东人民一项长期的有组织的支前任务。担架队员和运输队员,平时生产,遇有战斗,召之即来,随时投入支前斗争。部队打到哪里,担架队、运输队就跟到哪里,为部队抢运伤员、弹药和粮食。1946 年,陇东分区共组织担架 4000 多副,20000 多人;运输队 192 个,牲畜近万头,人员 2600 多人。各县都设有担架运输联络

站,解决食宿。1947年,在收复陇东的战役中,全区出动担架1500多副,驮畜1300多头,投人民工7500多人。1948年,我主力部队挺进陇东,支前任务更加繁重。当年陇东、关中两个分区共出动担架3170副,驮畜2127头,投人民工17000多人。其中,新宁县组织了120副担架、300头畜力和600多人支前大军,参加了焦家坪、耀县战斗,历时两个月。1949年,为了支援一野解放大西北,陇东分区把能驮70斤以上的牲畜和牛马车全部组织起来,日夜为部队赶运粮食和军需物资。还动员民兵800多名,修桥补路,押送俘虏,破敌碉堡。动员妇女烧水做饭,缝洗衣服,慰问伤员。3月份,新宁县组织的160人担架队,随一野转战5000余里,在兰州等地战斗中抢救运送伤员200多人,有11人立功受奖,直到11月才从河西临泽县返回。同年6月,曲子、环县、华池、合水4县组织的180副担架、共1000余人,随军转战5000余里,参加了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新正县由350余人、77副担架、40多匹畜力组成的担架队跟随一野第三师,参加了解放西安、兰州、西宁的战斗,荣获“奋勇前进、积极支前”锦旗一面,立功受奖者多达38人次。陇东人民组织的担架运输队员,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伤员从前线抬下来,把弹药又送上前线,帮助部队搭云梯、挖地道,身负重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华池县担架队员张安德负伤后,仍坚持从前线抢背负伤战士,当他第四次冲上去时,不幸触雷,光荣牺牲。为了表彰陇东人民支援前线的不朽业绩和献身精神,战争结束后,部队把“巩固模范”、“坚持到底”、“光荣完成任务”的锦旗,分别赠给华池、合水、曲子担架队。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陇东根据地军民、干群之间结下了鱼水深情。人民军队和干部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陇东籍牺牲的烈士就达1815名。广大人民群众视部队和干部如亲人,不仅倾其所有养育他们,而且冒着生命危险收容安置伤病员,掩护将士和革命干部,不少群众为此献出了生命。1947年西野的伤病员寄养在新正县群众家中的就有467名,仅8月一次就寄养伤病员120多名。县、区、乡干部和群众一起日夜为他们洗衣做饭,治病疗伤,站岗放哨。二区一乡群众赵宗发一家护理伤员7名,敌人来时,他一个个背进梢林藏好,敌人走了,又一个个背回护理。华池县白马区七乡只有90来户人家,1947年敌兵来犯,恶战结束后全乡养护了1000多名

解放军伤病员。柔远乡刘沟村有位田大妈，养育了当时在陇东地委工作的宋养初、杨兵夫妇才3个月的孩子宋心鲁。她虽然有5个孩子，但精心照料宋心鲁这个革命的后代，经常背上他钻梢林躲敌人，直到解放前夕，杨兵才接走了小心鲁。新宁县一区二乡龙池村群众张喜旺，千辛万苦赚来3块大洋，买了一头大肥猪杀掉，专为30多名伤员补养身体。1947年9月，宁县工委副书记万青山在盘克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后受到10多名群众掩护治疗，他们虽遭敌人毒打，但无一人告密。屯字镇战斗结束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数百名伤员，许多群众把自家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抬出来，盛殓烈士遗体，共掩埋400多具烈士遗体。

在解放战争中，陇东地方干部和群众还收容了大批失散的解放军战士。1947年8月九岷战斗后，西野在撤退中不少人在子午岭迷路，误入梢林之中。新正县一区区长带领群众进山收容士兵近千人，仅警一旅战士就有300多人，经过慰问将养，送他们到耀县归队。在安置伤病员，收容失散人员的同时，人民群众以生命掩护战士、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新宁县一区二乡康家原有位董大妈，让被敌人追捕的县独立营管理员段英占躲在自己家中，当敌人来搜时，她跪在地下称段英占是儿子，生病忌见生人，骗走了敌人。合水县蓄嘴铺有个魏大妈，她的家就是游击队的食宿店，3年解放战争中，给部队战士和干部吃饭就用去粮食2000多公斤。宁县盘克乡刘逢浩家，3年内供给战士、干部吃饭用粮18石之多。1949年1月，马匪军袭击元城时，当地农民高刚和孙子以放羊为掩护，暗中保护陇东分区贸易公司藏起来的3大窑物资。当敌人捉住他拷问时，他不仅不说，还使眼色让孙子去向游击队报信，并想引开敌人，结果遭敌人杀害。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主动为部队侦察敌情，提供情报，设哨盘查，肃反除奸，给解放大军打击敌人以极大的帮助。3年解放战争期间，共设立各种哨站组织800多处，截获重要情报300多份，破获敌情报组织10多个，抓获敌特100多名，处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土匪头子200余人。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3年解放战争中，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竭诚至亲地拥护解放军，无私无畏地支援解放军，使来犯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灭亡。

第十五章

不朽的庆阳老区精神

我们充满激情地回忆过去,其实都是为了现在,为了我们需要的精神,为了我们时代需要的精神,这就是庆阳市大力提倡和发扬光大的庆阳老区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庆阳人民在陇东这片热土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实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不畏艰险、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勇于奉献,铸就了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今天将其称之为老区精神。庆阳老区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老区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优秀品格的集中反映,是在特定的斗争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精神。

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植根于陇东革命老区红色土地上的老区精神,曾经激励千百万人民为革命英勇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形势和科学发展的繁重任务的考验,弘扬庆阳老区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庆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庆阳老区精神的地域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形成过延安精神。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界定这些精神，应该突出它们各自的地域特点，否则就不成其为特有的精神。庆阳老区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中央、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同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困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和作风。

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在陇东，陇东老区从广义上讲，就是现在的庆阳市。把陇东革命老区放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大背景中，我们对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如下概括：陇东革命根据地是中国西北创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边区红色革命政权的诞生地，是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摇篮。她与陕北根据地合并后所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是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这块根据地，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全过程。成为全国唯一一块建立时间最长，而且从没有丢失过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始终模范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全面建设，在党中央把陕甘宁边区培育成长为新中国雏形的过程中，起到了试验、示范和带头的作用，其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十分重要。纵观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试验，陇东根据地堪称当时全国光明和进步的地方之一。

庆阳老区精神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域化了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陇东老区当年封闭的地理环境、人民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薄弱的状况，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特殊有利的条件。千百万陇东儿女流血牺牲的伟大实践，是老区精神赖以形成的根基，而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指导，又是形成老区精神的指南。运用这种先进指导思想指导老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且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培育老区精神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政党和群众的实践，共同在陇东老区这块最光明和最进步的地方，铸就了一种万众一心的追求，一种社会共仰的风范，一种磅礴于世的精神，这就是地域化了的庆阳老区精神。它是庆阳市的宝贵财富和一大政治优势。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庆阳老区精神的内涵，使其具体化、概括化，

1990年,原中共庆阳地委在《关于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的决定》中指出:“老区精神就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区精神的基本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对庆阳老区精神高度的概括,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风貌。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的庆阳老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发展和地域化的体现与升华,它同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为构筑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魂,推动历史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庆阳老区精神所体现的坚定的政治信念,曾激励着一大批共产党人,发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和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追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拼搏、大义凛然,把革命事业推向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唤起老区人民群众的觉醒。1927年,共产党人王孝锡、任鼎昌等人在宁县太昌镇创建了中共彬宁支部,后又扩大成太昌临时区委。同时整顿了青年社,组织读书会,宣传共产主义,在陇东播下了革命火种,开始了“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来到陇东地区宣传革命真理,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陇东播下革命火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老区人民坚定信心,顽强斗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拥军支前,终于取得了陇东的全境解放。

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庆阳老区精神所反映的创新意识,集中地体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高度统一。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时代的主题。创新,就是要实事求是,勇于创造。面对陇东根据地当时复杂的环境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25年王孝锡在太昌镇建立的青年社就响亮地提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观”的口号。从南梁根据地的诞生,以至建立人民政权和消除旧社会留给根据地的落后、保守、愚昧等现象,老区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陇东老区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庆阳人民正是在不断的开拓创新,勇于创造的这一革命精神的感召下,英勇不屈,前赴后继,展开了推翻旧世界、缔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

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庆阳老区精神所体现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在战争年代曾经激励陇东革命根据地人民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革命任务。为了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陇东解放区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纷纷组织起变工队、互助组，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年垦荒40多万亩，创办了纺织、造纸、火柴、火药、制毡等数十家救亡工厂，恢复和新办商店140多处，数万名妇女参与纺纱织布。涌现出張振财、高隆清、孙万福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庆阳老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奋发图强，更加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庆阳老区精神所反映的团结奋斗、面向群众的作风，既加强了党在陇东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革命人员的团结，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又团结了无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党的工作，形成了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战胜了国民党当局的进攻和封锁，巩固扩大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陇东根据地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1943年10月，陇东分区有59位劳动英雄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其中，华池县的张振财、高隆清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曲子县的孙万福被评为甲等劳动英雄，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表扬。时任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华池县长李培福被授予生产模范称号，毛泽东主席分别为他们题词：“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面向群众”，对他们的革命热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庆阳老区精神所展示的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浩气长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围剿，庆阳人民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们的尸体，又继续投入战斗，终于保住了陕甘苏区这块全国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央红军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冲杀出来后落脚的地方和抗日战争出发的地方。在庆阳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庆阳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拥军支前，充分体现了老区人民的无

私奉献精神。在战争年代,庆阳老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支援新区。妇女们为前线子弟兵们做军鞋、织毛袜、缝补衣服等,保证了战争时期的军需供给。每到逢年过节,老区人民都要捐钱、捐粮、捐肉、捐蛋等慰问当地驻军。老区人民组成各种支前队伍,随军西进。在解放兰州和宁夏战役中,共组织长短期担架 2690 多副,队员 1.36 万人,随军转战 2500 公里。仅在 3 年解放战争时期,庆阳老区近万名青年参军,36 万人(次)支前,交送军粮 9462 万公斤,做军鞋 28 万双,老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庆阳老区精神的核心与普遍意义

庆阳老区精神是老区干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这个主观能动性正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确切地说,老区精神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庆阳老区精神属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体系。从老区精神形成的过程和它的基本内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区精神的阶级基础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陇东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因而也成为实践老区精神的主体。这正是老区精神的力量源泉;老区精神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陇东早期革命斗争之火,就是王孝锡、刘志丹等革命先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把点燃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经过长征来到陕甘苏区后,陇东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毛泽东思想指引陇东老区革命斗争节节胜利。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通过老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和艰苦的创造过程,老区精神便诞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庆阳老区精神的政治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无产阶级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视为人生的根本价值,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视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体现在老区精神中的坚定的政治信仰、彻底的革命追求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正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人生观的精髓。以上三个基础决定了庆阳老区精神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体系。

庆阳老区精神具有除旧布新的积极进取力量。我们评价一种精神的作用,不仅要看到它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是否成熟,更重要的还要分析它在实践上是否有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陇东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凭着深入人心的老区精神,一心一意跟党走,千难万险不动摇,不仅在军事上彻底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铲除落后愚昧,使根据地成为当时全中国最文明、最进步的地方。建国以后,庆阳老区人民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艰苦创业,奋勇攀登,开拓了老区建设的新天地。尤其当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或者在政治上出现某些波折的时候,老区精神的价值力量便又一次在实践的磨砺中熠熠生辉,得到人们的进一步认识。老区精神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实践性?要害在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言与行相一致、理想与现实相一致,使它实践的生命之树常青。这也说明,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所以力量强大,就在于它具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除旧布新的进取力量和创造精神。

庆阳老区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升华。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丰富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许多传统美德。而陇东老区不仅是华夏始祖轩辕黄帝活动的区域,又是周人创业的地方。岐黄文化、农耕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铸就的民族精神,经过几千年的沿袭,使庆阳民风古朴,乡俗醇厚,传统美德世代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这种民族精神又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新鲜血液,从而,庆阳老区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光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庆阳老区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庆阳老区精神虽然是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却属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国的革命是划分为阶段的,党在每个不同的革命阶段都有不同的策略和方针。但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的总纲领不会因为革命阶段的不同而改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这一先进思想作指南,并为之而奋斗。庆阳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也正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庆阳老区精神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观念超越了它的那个时代而属于社会主义时代。老区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主体。庆阳老区精神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永不衰竭的力量源

泉,它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熠熠生辉。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要精神的力量鼓舞人们前进,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来推动。庆阳老区精神的普遍意义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无论是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还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它都是我们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精神支柱。它既可以为改革开放在老区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又可以激发庆阳人民为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奋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避免出现或减少发生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行为的现象。因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鼓舞我们前进。

庆阳老区精神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是陇东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一面旗帜,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它促使人们不怕千难万险,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始终不渝地追求。它是陇东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在过去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陇东根据地人民通过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促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舍生取义,凛然正气,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靠的就是自强不息的民心民气,靠的就是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今天,我们在继续推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更应该弘扬老区精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净化心灵,防止腐化堕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升华精神境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众志成城,奋发图强,不怕困难,不怕艰苦,努力工作,与时俱进,进一步积聚开创建设老区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庆阳老区精神倡导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永远是庆阳市人民追求的精神支柱。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庆阳人民就是通过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去鼓舞自己,激励自己,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相对比较丰富,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人生、社会、价值、伦理等观念和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人们却从内心深处感到崇高思想境界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单纯的追求物质、金钱、享乐、盲目崇拜,是不能完全体现人生的价值,更不能体现庆阳人民时代新风貌!我们要实现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尤其需要倡导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构筑精神支柱。

庆阳老区精神注入的巨大力量,将为庆阳市人民增添无限的人格魅力。庆阳老区精神告诉人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与党的基本经验紧密相联的。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可以救国救民。现在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仍然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既是一种作风,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忘记了艰苦奋斗,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就不可能奋力开创新局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亟需提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既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脱离中国国情提倡的高消费和“败家子”作风决不能称之为文明行为。如果在全社会、全民族都能树立和发扬艰苦奋斗、创新变革的精神,每个人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无疑会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将为老区人民增添无限的人格魅力。

庆阳老区精神的浩然正气是当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革命浩然正气是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的法宝。庆阳人民就是通过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新起点找差距,着眼形势求发展,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倡导坚定信念、开拓创新、艰苦奋斗、面向群众、勇于奉献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取得对敌斗争的辉煌胜利。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应该养成这种浩然正气。改革开放以来,庆阳老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不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精神空虚、寻找刺激等也乘虚而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吸毒、赌博、卖淫等曾在陇东大地绝迹的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并呈蔓延之态。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发生偏差,只会索取,不讲奉献,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也屡屡发生。党内的不正之风也在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蔓延的行业不正之风,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严重地干扰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社会需要正气鼓舞,人民需要精

神支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庆阳老区精神的浩然正气,去纯正社会风气,在全社会树立正气。提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使党风和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

庆阳老区精神是时代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亟需在全社会推崇,进一步发扬光大。庆阳老区精神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全社会起作用,影响教育了陇东老区几代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需要全社会推崇,发扬光大。

庆阳老区精神所蕴涵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坚韧意志,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辉。继承这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使之发扬光大,对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庆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庆阳老区精神与和谐社会

陕甘宁边区各级政权是南梁苏维埃政权的延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政权形态。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思想逐步统一,认识逐步正确,力量逐步壮大。陇东根据地各级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发展和壮大,是因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坚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庆阳老区精神所体现的实事求是思想、为人民服务宗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本身就蕴涵着与时俱进的深刻意义。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和谐社会的新视角重新审视陇东根据地执政成就和社会形态,他们发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陇东老区的社会形态已经初步呈现出和谐社会的特征。这是庆阳老区精神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收获。观察和思考陇东老区和谐社会的建设经验,探寻陇东老区社会和谐的前因后果,是中国革命史和陇东老区精神研究的新热点。

南梁苏维埃政权和陇东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形态,已经基本摆脱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当时全国最进

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这个时期陇东根据地社会形态不仅在政治层面上代表了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良性状态。对于和谐社会的标准,我们至今还在探讨,因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和谐”没有上限和终结。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社会将发生动荡。而一般社会和谐底线,用老百姓最朴素的语言表达,就是“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然而,在陇东老区,无论是陕甘边苏区,还是陇东抗日根据地,社会的和谐程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的水平。

第一,南梁苏维埃政府和边区时期陇东根据地的各级政府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凡是居住在陇东老区内的公民,年满18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普选的代表直接参与各级政权管理,密切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激发了人民拥护政府和监督政府的热忱。陇东老区民主选举各级政府领导人和民主选举各级政权都兼顾各方利益。为了使陇东老区各级政府更具有民主性,在政权建设上实行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三三制”原则,是“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的集中体现。它证明“边区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民主政权,也就享受着充分的自由权利”。那时,中国共产党对“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是间接的,不是直接和强制性的。共产党的施政主张只能向政府和参议会提出建议,而要使建议变成共同的决定,不仅要依靠建议本身正确、适当,而且还要通过政府、参议会内部中共党员的宣传、说服,取得多数人的赞成才能实现。因此,共产党所要提出的主张就必须更缜密可行,同时对党的自身也是一种约束。由此可见,“三三制”是一种政治基础大大扩展了的政权形式,它在政治上由一党领导,在组织和制度上实行党政分开、民主选举和少数服从多数。实践证明,实行“三三制”并没有放弃党对政权的领导,却使共产党人学会了在民主政权中的领导艺术和执政本领。陇东根据地的民主是靠法制保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当时上千种法律、法规,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建立了各级司法机关,基本上形成了边区高等法院、分区高等法院分庭、县司法处和地方法院三级司法机构体系,保障了陇东根据地法律的实施落实,使各级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陇东根据地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是社会各阶层公民权利的平等。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陇东解放区,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阶层的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专政。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主、资本家的土地财产,代之以减租减息的政策,调节了地主资本家与农民工人的关系。这种民主范围的扩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空前团结抗日的新局面。陇东老区各阶层的人民无论其政治态度、精神信仰、经济地位如何,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那时的经济政策同样体现了公平和正义。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陇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使各阶级、各阶层都各得其所,个人财产都能得到应有的保护,都能有资源进行生产,改善生活。

第三,陇东根据地各阶层都能融洽相处,人与人的诚信友爱使社会充满活力。那时虽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建设,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商品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而民众诚信友爱的传统道德并没有滑坡,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在不断弘扬。那时,党和政府的政策相对稳定、不胡折腾,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更主要的是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党员,从领导干部到基层干部以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和诚信友爱为风尚,尽管那时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充实和丰富,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在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基础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各阶层的融洽相处,人与人的诚信友爱,团结互助使社会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使得党和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应付当时各种困难和危机。

第四,陇东根据地是安定有序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在陇东老区的执政任务经历了由工农革命、抗日民主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党的奋斗目标和路线的转变是以政策调整的方式有序而稳步的进行,没有剧烈的断层,更没有引起陇东根据地社会政治上的大动荡。即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虽然轰轰烈烈、影响深远,但运动主要控制在党内,基本上没有对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产生太大影响。陇东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始终适应当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土地革命时期的十大政策,还是边区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绝大部分时期都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

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经济运转力求总体平稳。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使阶级矛盾得以调和,社会安定有序。1947年胡马几十万大军进攻陇东老区,但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深入人心,各级政府施政惠及百姓,敌人进入陇东老区后如同葺子蒞子,就连地主老财也很少反水。这何尝不是对陇东老区和谐社会的一种自信呢?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陇东老区执政时期就有意识的构建和谐社会,那是牵强附会,当时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和理论上还没有明确地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主要目标。但是,人们对社会富裕、安定、和谐的向往却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然会把人民群众的诉求和社会理想融入政府的施政方略,顺应民心、尊重民意不仅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那时,陇东老区各级在执政过程中,始终注意把握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取得了比国民党统治区更加和谐的社会发展成就。这些成就用现代和谐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或许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当时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东革命根据地抗日政权的民主和廉洁,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和谐交融,却是众口皆碑。

四、庆阳老区精神与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深刻论述,精辟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对于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大力弘扬作为党的优良传统集中代表的老区精神,发挥其重要的精神动力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弘扬老区精神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和契合点,让老区精神更好地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大局和全局服务。

(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强政治信念和思想道德建设。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为此要做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发

展,文化建设就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没有文化建设,就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这就要求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文化建设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胡锦涛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是以老区精神为集中代表的党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人民广泛开展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集体主义道德教育。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刘少奇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陇东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与人生价值观、道德观指明了方向。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座右铭”。许多老同志回忆说,当时的陇东根据地确实是一块圣洁的净土,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都非常好,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全边区最进步、最和谐的地方,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称颂和向往。今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吸取战争年代以革命理想信念与高尚道德教育干部群众的宝贵经验,结合实际对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价值观的教育。

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准确认识中国发展的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形成的,是毛泽东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和同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称这种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

“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前他还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导下，陇东老区广大党员干部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率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将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今天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努力促使全市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二）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庆阳老区精神的内容之一就是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革命战争年代，庆阳人民靠开拓、变革、创新精神，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旧机器，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在新形势下弘扬老区精神，就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切实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个机遇就是开拓创新。今天的创新不同于战争年代的创新，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针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经济、社会的现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则是当务之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战略决策，要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要把增强开拓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

（三）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强劲动力。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又好又快发展，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难，必须始终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大力发扬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党的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都强调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此也非常重视。胡锦涛深刻指出,“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充分考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防止和克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老老实实在地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地艰苦奋斗。”众所周知,在革命战争年代,陇东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仅仅是指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社会风气的崇俭尚实,更重要的是指事业上的顽强拼搏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无论在陕甘边苏区,还是陕甘宁边区,陇东老区军民艰苦奋斗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人们都一律“吃小米、住窑洞”;“小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的歌谣,表现了在艰难岁月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广大军民自己动手挖修窑洞、开荒种粮、纺线织布、饲养畜禽、伐木烧炭、种棉种蓝、兴办工厂,解决部队吃住用等生活困难,至今仍为人们赞扬和传颂。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突出表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与革命理想,不畏艰难困苦,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今天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需要大力弘扬老区精神,把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和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世代传承下去。

(四)面向群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代社会,以人为本包括着广泛的内涵,但其最基本的内容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深刻指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实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特别是要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而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明确提出来的,是庆阳老区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陕甘宁边

区、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党风是非常好的，在党员干部的大公无私、自觉奉献、勇于开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的影响下，当时的政风和社会风气也非常之好。毛泽东曾赞扬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整风运动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它充分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革命本色，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志。正是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熏陶下，陇东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了刘志丹、习仲勋、马锡五、李培福等一批批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好党员、好干部。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群众满意地说：“在陇东革命根据地，只见公仆不见官。”他们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生活虽然艰苦，但忠于职守、争做贡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党心、民心，成为那个时期引导人们前进的最根本的价值导向。今天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必须坚持这一价值导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党的各级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做取信于民、赢得人民爱戴的事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领群众做好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作风、纪律上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党的重大决策、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五、庆阳老区精神代代相传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战斗里程再次说明，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就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中华民族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庆阳老区人民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论是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大围剿，庆阳人民没有被蒋介石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们的尸体，又继续投入战斗，终于保住了陕甘苏区这块全国唯一的革

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央红军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冲杀出来后落脚的地方。

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年代,还是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老区精神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并且始终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新中国刚一成立,1949年10月,毛泽东就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复电,对老区人民这一宝贵精神给予充分肯定。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又给老区人民送来了毛泽东“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给老区人民以巨大鼓舞。新中国刚建立时,国民党政府留下一个烂摊子,亟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靠的就是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60年代初,由于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失误以及遇到的自然灾害,给全国的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严重困难和经受严峻考验,仍然靠的是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老区精神。1989年,江泽民视察延安时指出:“老区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老区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老区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走过了10年多的历程,当时就有人认为老区是封闭、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老区精神也过时了。针对这情况,原中共庆阳地委立即作出了《关于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的决定》,决定说,老区精神就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老区精神的基本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老区精神的基本概括,体现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之中,也是对陇东老区人民精神风貌的高度评价。

2009年6月,习近平在庆阳市调研时强调,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的政治资源,各级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正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时俱进地加以弘扬,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时刻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牢固树立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政绩观,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真正干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牢固树立艰苦创业、勤俭办

事的奋斗观,保持和发扬革命先辈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搏精神,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迎难而上、锐意进取。

精神的家园,并不永远停滞在历史陈迹之中,而今,庆阳老区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发扬光大老区精神,正在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执著的追求毅力,超凡的开拓智慧,改变着老区的面貌。全市以产业化促进农村现代化取得显著成绩,重建“陇东粮仓”初战告捷。以草畜、苹果、瓜菜为主的“六个百万”工程等特色农产品得到深度开发,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10年前,这个曾经以贫穷落后而闻名的庆阳老区,借助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利用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支撑,迅速成为全省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关专家分析说,在东部、西北、东北的老油田走过产量高峰期之后,长庆油田无疑是一个新的重要接续区,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庆阳老区另一大优势则是煤炭资源,从2003年以来,相继勘探出丰富的煤炭资源更使庆阳市“一鸣惊人”。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全市1.9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有2360亿吨煤炭资源和13588亿立方米的煤层气,煤炭资源预计占到全省的94%以上。其中,千米以上浅层资源量达190亿吨,具备建设亿吨大煤田的资源条件。正南、宁中、宁南、环县沙井子、合水西部等9大重点区块勘探开发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华能集团庆阳1200万吨核桃峪煤矿、环县刘园子煤矿、甜水堡煤矿和年产800万吨宁南煤田新庄煤矿等已正式开工建设。

随着庆阳石油化工公司500万吨炼油搬迁改造工程、兰郑长成品油庆阳支线工程以及长庆油田陇东油区生产生活基地建设等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庆阳老区和长庆油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和谐、大发展的良好态势,为陇东油区原油产量“十一五”末达到500万吨,“十二五”末达到800万吨到1000万吨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平铁路、西长凤高速公路、盐环定扬黄续建甘肃专用工程、宁长二级公路以及巴家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也都相继开工建设。南京雨润、重庆阿尔康、山东东阿阿胶、天津天士力、陕西丽彩集团等大型企业已在庆阳投资建厂。与中国铝业、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已经达成投资开发意向。

庆阳市委、市政府所在的西峰区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按照省、市提出建设全省重要能源化工基地的战略部署,西峰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带动战略,以城镇化带动工

业化、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着力实施“一轴、二心、三带、四湖、五区”城市发展战略。这就是以岐黄大道为全区发展的总轴线,建设新城区行政文化中心和旧城区商贸中心,构建东部生态旅游带、南部生态隔离带、西部生态绿化带,建设东湖、西湖、南湖、北湖四大城市水榭,着力打造空港农产品加工区和汽车城、科教创智园区、能源化工区、商贸物流区、绿色农业示范园区。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把西峰建设成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活力城市,人文魅力城市,黄土生态城市。而今,直指苍穹的巍巍井架,纵横交错的公路街道,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排列整齐的抽油机,宏伟壮观的集油站,使古老的庆阳市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庆阳市委、市政府在大力实施能源化工强市、绿色产业富民的过程中,高起点、大手笔、大投入,深入挖掘革命文化、历史文化、黄土风情文化内涵,开展“红色旅游年活动”,打造一流的精品景区旅游线路,使庆阳老区“红、黑、绿、黄”四大优势资源开发步伐大大加快。红色革命文化产业以南梁革命纪念馆建设为中心,在全市举起弘扬老区精神、传承老区红色文化的热潮;“黑”色产业以石油、煤炭资源深度开发为主,使深埋地下数亿年的能源资源成为甘肃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由此拉开了转变庆阳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大幕;“绿”色产业高举生态大旗,使庆阳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老区群众从中收获的不仅仅是越来越多的票子,更重要的从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黄”土风情文化产业被赋予更宽泛的涵义,那些曾经是古老的、传统的甚至有些过时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岐黄文化,又一次露出头角于新时代的潮头,在承载保护人类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又发挥出它前所未有的价值。陇东能源化工基地、董志原优质苹果生产加工基地、甘肃红色旅游首选之地、炎黄子孙寻根祭祖之地、陇东黄土风情文化开发传播基地、黄河流域退耕还林试验示范基地等已初具规模。庆阳市发展的实践表明,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老区精神,坚持用庆阳老区精神建设庆阳,才能推动庆阳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资料来源与主要参考书目

一是报刊资料。包括1935年9月到1949年10月1日以前刊载于《前进》、《庆阳人民报》、《救亡日报》、《救亡报》、《陇东报》、《关中报》和延安《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及重庆《新华日报》等12种报纸反映陇东革命根据地(含新宁、新正县)各项建设事业与斗争生活的新闻通讯作品180篇共40多万字,这些通讯,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当时陇东老解放区火热的革命斗争和各方面的工作。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尽管时过境迁,这些作品失去了当初的新闻意义,但却具备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是省、市党史部门征集、研究和集结出版的资料。包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庆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写的《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一辑、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本书稿在编写过程中还参考了《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1919—1949》,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编。

三是参考的主要专著。包括《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版,《习仲勋传》编委会编,贾巨川执笔;《陇东革命斗争史》(修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西林、王钊林著;《留守陇东》,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张才干著;《蒿草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5年3月版,高文著;《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王树增著;《民族英雄谢子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2月版,张锋著;《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编;《庆阳地区志》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陇东老区教育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版,甘肃教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四是直接采访资料。20世纪70年代初,担任本书主编的巩世锋,被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派驻庆阳记者站担任省台首席记者20多年,后又调任庆阳电视台台长10多年。30多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使巩世锋有机会接触庆阳老区革命斗争历史。在这期间,他曾采访过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彬宁支部青年委员王晓时、王孝锡五弟王干城和陪同王孝锡到武汉寻找党组织的西北早期党员李果等;采访过土地革命时期陕甘游击队红军领导人雷恩钧,南梁政府成立时间阎洼子村苏维埃代表武海潮,掩护习仲勋在白沙川脱险的老红军王殿斌,长征老红军、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宋仁绥等;采访过担任过关中分区宣传部长的主秉祥、新宁县委书记郭廷藩,新宁县长王立成以及陇东中学学生侯宗儒、王生金等;巩世锋还采访过陕甘宁边区著名新闻记者和文艺界老同志王作易、延国民、叶滨、马谦卿、刘金授、秦时玮、曲子贞以及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劳动英雄高隆清等。现在,他们大都已经作古,但留下来宝贵的陇东革命斗争史料,已经写进了《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在庆阳任省台常驻记者期间,巩世锋有机会多次深入南梁、寨子湾、抗大七分校、山城堡、河连湾、兴隆山等革命遗址采访。1976年和1986年他还两次沿红军长征经过陇东境内的路线和经过甘肃境内的路线采访。这一时期,他先后有300多篇新闻、通讯和革命回忆录共20多万字在省内外报刊、电台和有关书籍中收录出版,他还与高文合作主编了《陇东革命歌谣》和《陇东老解放区通讯选》两本书共60多万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2年正式出版发行。《陇东革命根据地》中的有关章节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写成的。

五是党史研究工作者和专家、教授的研究论文。2009年9月,《陇东革命根据地》初稿完成后,恰逢“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

会”在庆阳市召开，会议部分入选论文研究成果对本书稿修改、提高和完善帮助很大。特别是李蓉、李红喜、王亚民、占善钦、曲涛、李庆勇、徐振伟、黄正林、戴引兄、陈晓黄、雷鸣等专家、教授的研究成果使编者读后受益匪浅，并采用了他们的一些新观点和资料。

编 后

《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编著，五易其稿，反复修改后终于定稿，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付梓印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共庆阳市委、市政府弘扬老区精神，挖掘革命历史文化，开发优势红色资源的又一成果。如果说这本书是编著者心血的结晶，那么，我们必须对多年来搜集、整理和潜心研究庆阳革命斗争历史的专业、业余工作者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感谢，因为这本书也有他们的心血。

《陇东革命根据地》(送审稿)完成后，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给予了较高评价，当即决定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并欣然命笔作序。同时，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元忠对书稿审读工作非常重视，及时安排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处处长、研究党史资深学者王一林负责审读。王一林仔细审读后，以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名义写出了对送审书稿的审读意见和具体修改意见。审读意见说，《陇东革命根据地》(送审稿)是一部史料较丰富、翔实，历史发展的线索、脉络较清晰，史料研究较深入，史论、史观的把握较准确，历史敏感问题的处理较妥当地反映陇东革命老区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阶段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历史的佳作。尤其该书稿在撰写内容的把握处理上，既充分体现了陇东革命老区的历史是党的历史和甘肃地方史乃至庆阳地方党史重要组成部分的特点，也较真切、客观、生动地体现了陇东革命老区自始至终的地方党史的特色，是一部难得的供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学习中共党史、甘肃地方党史和庆阳地方党史的辅助读本。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编写《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是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后确定的第一个研究课题。为顺利编写和保证质量，又成立了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参加的编委会,直接领导本书编写工作。在他们的重视支持下,市委常委、秘书长樊得智和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市长刘秉宁对本书的编写进行了总体策划、具体指导和书稿的审定工作,关心编者,解决问题,拍板有关事项,直至本书出版。原庆阳地委秘书长、正地级干部卢造钧,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占年也参与了本书前期策划工作。原庆阳地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王钊林推荐副地退干部,原庆阳电视台台长、主任记者巩世锋担纲主编并执笔。大病初愈的巩世锋接受编著任务后,心系老区,忘掉疾病,发挥特长,拨冗命笔,不到两年时间,编著完成了近40万字的书稿,表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坚强毅力和对家乡、对庆阳革命老区深厚感情。担任本书编审的王钊林研究陇东革命斗争史已有20多年,从具体策划、编写提纲、确定目录做了大量工作,并毫无保留地介绍提供了相关资料。书稿完成后,他又进行了认真审改。担任本书副主编的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桂山和征研科长刘秉政对本书文字编校、插图设计、印务出版等做了许多后期协调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还有原陇东报社副总编辑高文、原庆阳市文联副主席窦世荣、庆阳市社科联主席马启昕、庆阳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培健、慕彬等同志在本书稿编著过程中,给予主编巩世锋多方面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编著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力求客观,系统、完整、历史地反映陇东革命老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制度、措施和重要史实。为了便于对陇东革命根据地全貌及其背景有所了解,对一些大的事件来龙去脉作了扼要叙述。本书共15章80多目,每目独立成篇,文字不求划一,行文力求通俗、生动、流畅,表述力求准确,使本书有较强的感染力、可读性和教育作用。

编著好《陇东革命根据地》一书是编委会和编著者的初衷和追求,但由于资料搜集还不充分,加之我们水平所限,本书错讹、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研究庆阳革命老区斗争历史的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改与订正。

《陇东革命根据地》编委会

2010年8月16日

责任编辑：陈海平
装帧设计：玄 墨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ISBN 978-7-5098-0937-2



9 787509 809372 >

定价：49.00 元